

中国皇帝全史

清

中外名人传记
青苹果电子图书系列

中国皇帝全传

清

李雪慧等编著

目 录

清

太祖爱新觉罗·努尔哈赤	(1)
太宗爱新觉罗·皇太极	(28)
世祖爱新觉罗·福临	(47)
清圣祖爱新觉罗·玄烨	(62)
世宗爱新觉罗·胤禔	(86)
高宗爱新觉罗·弘历	(104)
仁宗爱新觉罗·颙琰	(126)
宣宗爱新觉罗·旻宁	(142)
文宗爱新觉罗·奕訢	(163)
穆宗爱新觉罗·载淳	(177)
德宗爱新觉罗·载湉	(187)
宣统帝爱新觉罗·溥仪	(211)

清之卷

太祖爱新觉罗·努尔哈赤

明朝嘉靖三十八年(1559),明建州左卫女真贵族塔克世家中降生了一个男孩。他长得龙颜凤目,伟躯大耳,声若洪钟。加之他又是塔克世家中的第一个男孩,父母对他非常锺爱,这个男孩就是努尔哈赤。

一、少年坎坷 乱世立志

努尔哈赤所属的女真族是我国东北最古老的民族之一。在中国古代,她先后被称为肃慎、挹娄、勿吉、靺鞨。到五代时,始有女真之称。公元1127年,女真族完颜部首领阿骨打建立金朝,统治淮河以北广大地区长达百余年,直到1234年被南宋与蒙古的联军所灭,才又重新回归东北故土,散居在白山黑水之间。

松花江下游的依兰地区,是努尔哈赤的祖先世代居住的地方。元朝统治时期,在这里设了三个万户府。努尔哈赤的祖先充

任斡朵里万户府的万户。这是一个可以世袭的官职，从这时开始，努尔哈赤的先人便世代为官。元明交替之际，女真部族之间纷争不已，东北地区的局势动荡不安。面对这种局面，努尔哈赤的六世祖猛哥帖木儿为避战乱，于洪武年间率领部众迁徙到图们江下游斡木河畔（今朝鲜会宁）定居下来。与此同时，胡里改万户府的万户阿哈出也率族人南迁，在辉发江上游的凤州安家落户。永乐元年（1403），阿哈出到南京朝贡，明朝当即设“建州卫军民指挥使司”，任命他为建州卫指挥使。永乐三年（1405），猛哥帖木儿随明钦差千户王教化到南京入朝。明成祖也委任他为建州卫指挥使，仍然管辖斡朵里部。永乐十年，猛哥帖木儿再次入朝，明成祖赏识他的忠诚和勇武，特增设建州左卫，任命他为建州左卫指挥使。由于猛哥帖木儿为明朝忠心守边，功绩卓著，先后荣升都督佥事和右都督的职位，在努尔哈赤的家族史上留下了显赫兴隆的一页。从猛哥帖木儿算起，到努尔哈赤的父亲塔克世已是第六代了。200年来，这个家族作为明朝的臣民，世代承袭建州官职，虽然称得上家世显赫，但也历尽坎坷，几经兴衰。当努尔哈赤降临人世时，女真人内部仍在进行着激烈的纷争，被兼并消灭的危险依然在威胁着他的家族。但也正是这样的历史环境为努尔哈赤建功立业提供了广阔的舞台和良好的时机。

同所有贵族一样，努尔哈赤的父亲塔克世也把众多的妻子视为其尊贵身份的一个象征，他先后娶了3个妻子。努尔哈赤的生母姓喜塔喇氏，名字叫额穆齐，是建州卫首领王杲的女儿。喜塔喇氏生了努尔哈赤、舒尔哈齐和雅尔哈齐3个儿子及1个女儿。作为长子，努尔哈赤倍受父母宠爱，从小过着幸福快乐的生活。然而在他10岁的时候，他的母亲喜塔喇氏突然与世长辞。这

个重大的变故从根本上改变了努尔哈赤的生活，他告别了昔日骄子的优越地位，开始在继母制造的阴影中度日。他的继母纳喇氏是一个为人刻薄狠毒的女人，自从她主持家事后，努尔哈赤兄弟便失去了往日家庭的温暖，受尽了她的挑剔和冷遇。受了妻子的挑唆和影响，努尔哈赤的父亲对努尔哈赤兄弟也变得冷若冰霜。由于生活所迫，少年时代的努尔哈赤就开始用自己的双手谋生，他常常翻山越岭，出入于莽莽林海，挖人参，采松子，拣榛子，拾蘑菇，然后把这些山货带到集市上换钱，用以维持自己的生活。

努尔哈赤常去的是生意兴隆的抚顺马市，除了进行贸易之外，他更感兴趣的是通过贸易同汉人广泛接触和交往，学习各方面的知识。天长日久，他学会了说汉语，识汉字。在抚顺马市这所学校里，聪明好学、胸怀大志的努尔哈赤广采博收，学习了知识，增长了才干，开拓了视野。

强烈的求知欲望驱使努尔哈赤通过结识的汉人读了不少汉文书籍。《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他最感兴趣的两部书。书中的刘备、诸葛亮、宋江等英雄人物的智谋和作为，激荡着少年努尔哈赤渴望建功立业的心灵。每每读到精采之处，他就会情不自禁地拍手赞叹，对英雄业绩的向往溢于言表。

15岁那年，无情的生活之鞭迫使努尔哈赤带着10岁的弟弟舒尔哈齐离家出走，投奔到外祖父王杲门下。

王杲是个汉化较深的女真人，他凭借着自己的智慧和才干在动乱的年代中发迹，成为建州女真中的著名首领。明中期后，他自以为力量雄厚，便无视朝廷边将的政令，常常扰边作乱。万历三年（1574年）明辽东总兵李成梁率军攻破王杲屯寨，王杲

及亲属全部被杀。此时正在王杲家中的努尔哈赤兄弟也双双作了俘虏，聪明、机敏的努尔哈赤当即跪在李成梁马前，痛哭流涕，用汉语请赐一死。李成梁见他聪明伶俐、乖敏可怜，不仅赦免了他而且把他留在帐下做了书童，专门伺侍自己。努尔哈赤从七、八岁就开始练习骑射，到这时十六、七岁，已是弓马娴熟、武艺高强。因而在李成梁帐下，每逢征战，他总是勇猛冲杀，屡立战功。李成梁对他非常赏识，让他作了自己的随从和侍卫。两人形影不离，关系密切，情同父子。

在李成梁麾下，努尔哈赤接触汉人的机会更多了，他对汉文化有了进一步的了解，经常参战的实践，又使他的军事才能得以提高和发挥，他对自己的谋略也越来越增强了自信心。李成梁还带他去北京朝觐，繁华的街市、辉煌的宫殿，使他的眼界大开。这一切都孕育了他创立功业的勃勃雄心。

然而，努尔哈赤对李成梁的恭顺和效忠，仅仅限于表面。他对外祖父的被杀始终怀恨在心，耿耿于怀，只是当时慑于李成梁的威名，不敢轻举妄动。私下里他早已另有打算，只待有朝一日时机成熟再采取行动。

在李成梁帐下生活了3年左右，努尔哈赤以父亲捎信让他回家成亲为由，借机离开李成梁，回到了阔别已久的故乡。遵照父命，19岁的努尔哈赤与佟佳氏结了婚。按女真习俗，男儿成年就要另立门户。心肠歹毒的继母纳喇氏也正是以此为借口，唆使塔克世把新婚的儿子赶出了家门，只分给他非常可怜的一点家产。对于这些，努尔哈赤并未过于伤心和计较。他相信以自己的聪明才智和辛勤劳动，完全可以创造出崭新的幸福的生活。

独立生活后，他经常到长白山一带采集、狩猎，往来于抚顺

马市和女真地区，换取生产和生活用品。有时他又辗转各地，为人佣工。有时则听从明廷的征调，从征参战。经过几年的闯荡，努尔哈赤有了更丰富的阅历。他对各民族的语言风俗、中原地区的形势以及宫廷、官场、官军等各方面的情况都有了进一步的了解，这为他日后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二、报仇起兵 统一女真

努尔哈赤 25 岁时，女真部族之间和部族内部，为了争雄称霸，常常互相攻伐，互相残杀。建州女真有两个坚固城寨：一个是古勒城，城主是阿台；另一个是沙济城，城主是阿亥。阿台是努尔哈赤外祖父王杲的儿子，阿台的妻子是努尔哈赤伯父礼敦的女儿。王杲被杀后，阿台发誓要为父报仇，他凭借古勒城易守难攻的地理优势，依山筑城，设置壕堑，并屡犯明边，纵兵饱掠。这可激怒了明朝总兵李成梁，他决意发兵攻取古勒城，欲将阿台一部置于死地而后快。

建州女真还有个图伦城，城主叫尼堪外兰。他的兵马不多，却野心勃勃，总想吞并周围部族，称雄建州女真。为此他便极力讨好明朝边吏，并挑拨阿台、阿亥与明的关系。他向李成梁表示，自己愿意为明朝征服古勒和沙济两城作向导。李成梁决定立即出兵，攻伐古勒、沙济两城，并许诺尼堪外兰城下之日，便是他荣升建州部首领之时。

李成梁的大队人马分两路杀来，一路直逼沙济城，一路由他亲自率领，兵临古勒城下。沙济城主阿亥对官军的突然出击毫无防备，城寨不战而下，阿亥被杀。而古勒城由于阿台加意修筑，

城池坚固，难以攻取。李成梁亲临督战两昼夜，仍未攻下。努尔哈赤的祖父觉昌安听说古勒城被围，便同儿子塔克世一同前去劝解，官军放父子俩进城后阿台拒降，父子俩便都被围在城里。

再说古勒城久攻不下，使李成梁极为恼火，他责怪尼堪外兰出了歪主意，要拿他治罪。为了保全自己，狡猾的尼堪外兰又想出一条诡计。他欺骗守城官兵说，谁能杀死城主归降，就让谁作古勒城城主。阿台的部下听信了尼堪外兰的谎言，便杀死阿台，献城投降。李成梁进城后大肆杀戮 2000 多人，努尔哈赤的父祖也于混乱中被杀。

噩耗传来，努尔哈赤悲痛欲绝。他愤然来到辽东都司，义正辞严地质问明廷边吏，为何杀他一向忠顺于朝廷的祖父和父亲。明朝边吏自觉理亏，一再解释这是误杀，并马上找出觉昌安和塔克世的遗体，交给努尔哈赤安葬。后来，又赐予努尔哈赤敕书 30 道、战马 10 匹，让他袭任祖父之职，当了建州左卫都指挥使。努尔哈赤表面上接受了明朝抚慰，但内心发誓要报杀祖杀父之仇。

为了报仇，努尔哈赤决定先举兵攻打尼堪外兰。但他势单力薄，处境又非常困难。但努尔哈赤坚信自己的举动是正义的，决不退缩。他整点出父祖的十三副遗甲，率领不足百人的部众，向尼堪外兰居住的图伦城进发。尼堪外兰表面上神气十足，实际上胆小如鼠，听说努尔哈赤率兵打来了，他丢下部众，只身带着老婆孩子狼狈出逃到浑河部的嘉班去了。图伦城不攻自下，努尔哈赤凯旋而归。

不久，努尔哈赤又乘胜追击逃到嘉班的尼堪外兰。尼堪外兰闻讯后朝抚顺城南的河口守台狂奔，遭到守台官军的阻拦后，他慌不择路，又转向鹅尔浑城。万历十四年（1586），努尔哈赤再

次发兵进攻。尼堪外兰再次闻讯出逃，希图在抚顺关得到边吏的保护。边吏将他拒于边台之外，暗中通告努尔哈赤的人，努尔哈赤的人赶到将尼堪外兰砍死在边台之下。努尔哈赤除掉了自己不共戴天的仇敌，了却了一桩心愿。

当时女真各部林立，建州女真也不例外。在努尔哈赤以十三副遗甲起兵的两年内，就相继大败了建州女真界凡、萨尔浒、董佳、巴尔达四城联军和漠河、章佳、巴尔达、萨尔浒、界凡五城联军，并攻破了安图瓜尔佳、克贝欢和托漠河城。在斩杀了尼堪外兰之后，又乘胜平定了哲陈部，攻取了完颜部。在努尔哈赤日益强大的攻势面前，苏完部和董鄂部自动前来归附。到万历十六年（1588），除长白山诸部外，建州女真各部基本上被努尔哈赤统一了。5年之后，他又先后攻取了长白山讷殷、朱舍里和鸭绿江三部，整个建州女真统一在努尔哈赤的麾下。

为了扩展势力，兴立基业，在统一建州女真过程中，努尔哈赤于万历十五年（1587）在烟筒山下建赫图阿拉城称王。为显示为王的尊严，他制定出一套初具规模的礼仪。每当他出入栅城，乐队便恭立在城门两侧吹打奏乐。赫图阿拉城遂成为当时建州女真政治、经济和军事的中心，后来又成为努尔哈赤统一女真各部的基地。

随着建州女真各部统一的完成，海西女真便成为努尔哈赤攻取的又一个目标。

“海西女真”居住在开原以东和松花江中游一带，主要有叶赫、哈达、辉发和乌拉回部，又叫扈伦回部。叶赫和哈达两部势力较强。邻近经济发达的汉族城市开原、并有控制贡道的地理优势，使他们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来争雄扩展。努尔哈赤在统一建

州女真中的节节胜利被他们视为心腹大患。万历十九年（1591），叶赫部首领派了两个使者气势汹汹地找到努尔哈赤说：“乌拉、哈达、叶赫、辉发、建州，言语相通，势同一国，哪有五王分建的道理？现在的国土，你们建州的多，我们的少，你们应该从额尔敏、扎库木两地中任选一地给我们。”对于这种蓄意挑畔，努尔哈赤用严辞相斥，叶赫的两个使者只好悻悻而归。

叶赫首领讹诈遭到失败后，便通过诉诸武力来达到自己制服建州、称雄女真的目的。万历二十一年（1593）六月，叶赫先纠合海西其他三部对建州进行试探性的进攻，结果以失败告终。但叶赫并未吸收教训，同年九月，叶赫贝勒布斋、纳林布禄再次纠合海西女真的哈达、乌达、辉发三部、长白山朱舍里、讷殷二部和蒙古的科尔沁、锡伯、卦尔察三部，共九部三万兵马，分三路向建州进攻。努尔哈赤闻讯，当即进行军事部署，埋伏精兵，设置障碍，待一切就绪，便十分安然地回家睡觉。

翌日拂晓，努尔哈赤为了鼓舞士气，先率诸将祭拜了天神，然后带着大队人马踏上征途。这时，努尔哈赤派出的侦骑来报，从一个投诚的叶赫人口中得知九部联军有3万多人。众将听后都面露惊惧之色。努尔哈赤环顾四周，泰然自若的对众人说：“九部联军号称3万，但不过是些乌合之众；我们尽管人少，却心齐志坚，又能立险扼要，以一当十。只要先击杀他们的头目，其部属必会不战自溃。”听了这番鼓动，将士们顿时信心倍增，努尔哈赤又令兵士们去掉手上和脖子上的护套，轻装上阵。他分析了九部联军的阵容后，率军趁九部联兵全力进攻他的一个城堡赫济格城之机，抢占了古勒山。古勒山易守难攻，努尔哈赤居高临下，地理形势对他十分有利。再说努尔哈赤早在赫济格城严密布防，

九部联兵连攻了两天也没能攻下，见努尔哈赤占领了古勒山，便转锋来攻。努尔哈赤身先士卒，率军居高临下冲锋，他一路砍杀，连斩叶赫部九名士卒。见此情景，布斋气急败坏地冲上来，不料战马被木墩撞倒，将他掀倒在地。努尔哈赤的士兵赶上前去，一刀结束了他的性命。众兵士见首领丧命，顿时乱了方寸，无心再战，仓皇而逃。努尔哈赤率兵乘胜追击，直至哈达境内。这一仗俘获了乌拉首领布占泰和大批兵士，还斩敌 4000 余人，缴获三千匹马、近千副盔甲。

万历二十七年（1599）九月，叶赫与哈达发生冲突。哈达首领孟格布禄自知不是对手，便把自己的三个儿子送到赫图阿拉城作人质，请求努尔哈赤派兵相助。这无疑给了努尔哈赤一个出兵的良机。他即刻派费英东、噶盖率领两千兵马前去救援。叶赫得知哈达引来了努尔哈赤的援兵，顿时慌了手脚。经过一番斟酌，叶赫决定设法诱使哈达反戈一击，以便摆脱困境。叶赫部派人给孟格布禄送去一封信，信中极尽威胁利诱之能事，并声言如果哈达能捕捉建州派来的两员大将，叶赫将与哈达重修前好。孟格布禄还真上了叶赫的圈套，答应按其主意行事。闻知此事，努尔哈赤简直气炸了肺，他当即命令弟弟舒尔哈齐作先锋，率兵 1000 人去征伐出尔反尔，恩将仇报的哈达。舒尔哈齐率军赶到哈达城下，见敌军气势正盛，不敢交战，便在城下按兵不动。随即赶到的努尔哈赤冒着矢石带头猛攻。经过七天七夜的激战，努尔哈赤终于攻下了哈达城，生擒了孟格布禄。

哈达一向与明朝关系密切，如今受到努尔哈赤的兼并，自然引起明朝的重视。更使明朝警觉的，还是努尔哈赤日益独立的行为冒犯了天朝圣威，因此命令他恢复哈达部。努尔哈赤觉得自己

还没有足够的力量同明朝抗衡，就把自己的女儿嫁给孟格布禄之子吴尔古代为妻，送他回哈达为王。但哈达部实质上已是有名无实了。1601年，建州乘哈达发生大饥荒，将其灭亡。建州自此也更加强盛起来，其势发展迅猛，已非明朝的力量所能控制。

随之，辉发部又成为努尔哈赤攻取的目标。万历三十五年（1607），努尔哈赤先派精兵数十人装扮成商人混入辉发城，作为内应。随后，他亲率兵马逼近辉发城下，里应外合，一举灭亡了辉发。

辉发灭亡之后，努尔哈赤的目光又转向了乌拉部。乌拉可不同于哈达和辉发，它城池坚固，人多地广，努尔哈赤对其一直采取了招抚的策略。古勒山之战俘虏了布占泰后，努尔哈赤非但不杀他，反而将他奉养起来，礼遇有加。后来乌拉部首领满泰被杀，努尔哈赤又把布占泰送回去继位。努尔哈赤还先后将侄女和女儿嫁给布占泰，希冀用联姻来笼络他。

万历四十年九月，借乌拉骚扰建州和未及时进贡，努尔哈赤又亲率大军征讨乌拉。建州兵人强马壮，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连下乌拉六城。惊慌失措的布占泰乘小船逃到乌拉河上，他装出一副可怜相哀求努尔哈赤手下留情。努尔哈赤历数了他忘恩负义、屡背盟约的罪行，看在往日的情份上，赦他不死。努尔哈赤命令布占泰将人质送到建州，留下军士千人驻戍，遂率大军撤回。

第二年，努尔哈赤以布占泰再次背约为由，又一次兵临城下。在来势凶猛的建州大军面前，布占泰丢盔弃甲，只身逃往叶赫。建州军击溃敌兵3万，斩杀1万，获甲7000副，灭亡了乌拉。至此，海西扈伦四部只剩下叶赫一部了。

1619年努尔哈赤发动了攻取叶赫的战争。战前，他将诸王

贝勒召集起来，商讨攻打叶赫的作战计划，并发誓不荡平叶赫，决不回师。万历四十七年（1619）八月二十一日夜，代善、皇太极率部来到叶赫。当时叶赫有东西两座坚固的城堡，分别由两个首领金台石和布扬古坚守。叶赫军队勇猛善战，精于骑射，但久经沙场、训练有素的建州兵士更是锐不可挡。叶赫兵战了几个回合，见不是建州的对手，不得不退入城内坚守。他们在城上发射箭矢，投放巨石，抛掷火器，建州兵死伤惨重。经过反复搏杀，在东城被炸塌后，建州兵冲入东城，但叶赫人据家死守。在这种情况下努尔哈赤采用攻心战术，传下命令：凡城内军民，投降者一概不杀。此法果然奏效，叶赫军民闻讯后，纷纷放弃抵抗投降。只有首领金台石继续带着家眷、近臣躲在堡楼上负隅顽抗。他的外甥皇太极和投降的儿子德尔格勒在楼下大声喊话，劝他投降，他却无动于衷。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努尔哈赤的兵士准备用斧子砍毁石楼，金台石见走投无路，又想放火自焚，结果建州兵士一拥而上将他俘获。金台石如此顽抗，努尔哈赤便下令绞死了他。

闻知东城被攻克，西城也乱了阵脚。布扬古的堂弟打开城门投降，代善最后将布扬古的住所围了个水泄不通。为了保全性命，在得到降后不杀的许诺后，布扬古被迫向建州兵投降。努尔哈赤对布扬古以礼相待，用金杯斟酒为他压惊，以示宽大之意。但布扬古见了努尔哈赤却立而不跪，并无丝毫感激之情。努尔哈料恐怕留下他终将成为后患，第二天便下令绞死了他。努尔哈赤对其他降民一律宽大，允许他们随身带着弓箭衣物，迁移到建州。

在统一建州和海西四部的同时，努尔哈赤对东海女真诸部

也采取了征伐与招抚两手并用的策略。从万历二十六年开始，努尔哈赤从东海女真瓦尔喀部、窝集部和虎尔哈部先后向建州迁入5万多人。到万历末年，所有女真部落都被统一了。

三、建国整顿 雄心伐明

万历四十四年（1616）正月初一，是努尔哈赤建国称汗的日子。赫图阿拉城热闹非凡，内城正在举行隆重的登基仪式。努尔哈赤的儿子们和八旗首领及文武百官按八旗的顺序站立在“尊号台”两旁。当努尔哈赤登上宝座时，八大臣手捧劝进表章，一字排开跪倒，众臣紧随其后跪拜在地。努尔哈赤的侍卫巴克什额尔德尼接过八大臣呈上的表章，高声朗读。表章中为努尔哈赤上尊号为“奉天覆育列国英明汗”。读罢表文，努尔哈赤起身离开宝座，焚香祷告，率众臣行三跪九叩礼。随后又登上宝座，接受各旗大臣的贺礼。礼毕，努尔哈赤宣告建立“大金国”，年号为天命。这就是我国历史上的“后金”。

仪式结束后，众大臣举杯畅饮，举城一片欢腾。然而，此时此刻努尔哈赤并没有被欢乐所陶醉，他若有所思的神情中略带几分疲倦之意。自25岁起兵，到如今登基称汗已经58岁了。他于花甲之年登上多年来梦寐以求的汗位，30多年来为建立女真国所进行的浴血奋战和苦心经营，此刻都历历在目，萦绕在他的心中。

努尔哈赤深知要建立国家必须有雄厚的物质基础，因此他着力发展农业、手工业和商业。

在农业方面，努尔哈赤采取的主要措施是组织屯田和扩大

农耕范围。建州的谷地平原都被开垦，就连难以耕种的山地也有许多地方种上了庄稼。每攻取一地，努尔哈赤便根据当地条件安排耕种、放牧或屯种。攻取哈达后，他在这里大力提倡耕垦土地，放牧马牛。灭掉辉发后，他又在当地安置了千余户居民进行屯种。

建州地区的手工业本来很落后，铁制农具和布匹、丝绸等大量生活用品都要依赖从汉族地区输入。努尔哈赤力图改变这个局面。他很重视工匠，认为他们远比金银珠宝贵重，是真正的无价之宝。由于他的倡导，建州地区的手工业很快初具规模，能炼铁、采矿并制造精良的军械。赫图阿拉城就有连接数里的作坊，专门制造各式各样的兵器。

努尔哈赤一方面积极发展建州地区的经济，一方面致力于发展与汉族地区的贸易，以此来弥补建州经济上的欠缺。他用当地出产的人参、貂皮、东珠、马匹等特产换回所需要的物品。为了解决湿人参容易腐烂的问题，努尔哈赤还创造了煮晒法，即把人参煮熟晒干，然后保存起来待价而沽。由此汉商故意拖延时间以便压价收买的企图便无法得逞了。由此一项，仅在抚顺一市，努尔哈赤每年就获利高达几万两。

创建八旗制度，也是努尔哈赤的一大功绩。八旗制度的雏形是女真氏族公社末期的狩猎组织。那时，每逢出师行猎，氏族成员便每人出一支箭，以10人为一单位，称“牛录”，是汉语箭或大箭的意思。10人中立一总领，称“牛录颜真”。颜真，是主的意思。牛录颜真即大箭主。在女真社会生产不断发展的同时，牛录组织也日益扩大，并衍变成奴隶主贵族发动掠夺战争和进行军事防御的工具，但它的突出特点是具有显著的临时性。努尔哈赤

把它改造为常设的社会组织形式。1601年，他把每个牛录扩充到300人，分别以黄白红蓝四色旗作为标志。由于兵力不断增加，1615年努尔哈赤又在牛录之上设立甲喇和固山，以5牛录为1甲喇，5甲喇为1固山。甲喇设甲喇额真统领，固山由固山额真统辖。每个固山还设梅勒额真2人，作为固山额真的助手。这样，原来的4大牛录遂扩大为4大固山，仍以四色旗为标志，又称四旗。后来又增编镶黄、镶红、镶蓝、镶白四旗，与前面四旗合称八旗。八旗制度是“以旗统人、即以旗统兵”的兵民一体、军政合一的社会组织形式。八旗兵丁平时耕垦狩猎，战时则披甲出征。八旗旗主即8个固山额真都由努尔哈赤的子孙担任，他们集军事统帅和政治首领的身份于一身。努尔哈赤则是八旗的家长 and 最高统帅，他为八旗军队制定了严密的纪律。八旗制度的实行，提高了女真的军事战斗力，也促进了满族社会的发展。

创制和颁行满文，是努尔哈赤在满族文化发展史上建立的一个里程碑。努尔哈赤兴起后，建州与明朝和朝鲜时常有公文来往，但因没有女真文字，只能由汉人用汉文书写。每逢向女真人发布政令，则先用汉文起草，然后再译成蒙古文。女真人讲的是女真语，书写却用蒙古语，这种语言与文字的矛盾，促使努尔哈赤决意创制记录满族语言的符号——满文。他命额尔德尼和噶盖承担了创制满文的任务。但他们俩都觉得女真人使用蒙古文由来已久，现在要创造自己的文字，困难太大，简直不知从何处下手。努尔哈赤便让他们参照蒙文字母，结合女真语言拼读成句，再撰制成满文。噶盖后来因罪被杀，就由额尔德尼完成了创制满文的任务。满文的创制和颁行，加强了满族人民内部和满汉之间的思想文化交流，也加速了满族社会的封建化。

建国称汗后，努尔哈赤花了很大精力整顿内部。与此同时，他将兵锋公然指向了明朝。而明朝当时的政治腐败与军备废弛，又是导致努尔哈赤实行战略转移的催化剂。

天命三年（万历四十六年，1618）春天，一切准备停当，努尔哈赤率领众臣众兵，祭祖告天，宣读了“七大恨”伐明誓词。誓词说：

“我的父祖未曾损害明的一草一木，明却无端起衅将我的父祖杀害，恨一也；明虽挑起事端，但我仍想与明修好，划界立碑，共立誓言，互不侵扰，但明军践踏盟约，越我边界，出兵卫助叶赫，恨二也；清河两岸明人，年年入我境内劫夺，我遵照两国盟约，捕杀越界汉人，明朝却诬我擅杀，扣我使臣刚古里等 11 人为人质，逼我杀 10 人换取，恨三也；叶赫之女本来已经许配于我，但因得到明朝的支持，叶赫又将已聘之女改嫁给蒙古，恨四也；柴河、三岔、抚安等三地，历代属我部所统，明却不让三地民众种田收割，发兵驱逐，恨五也；我奉天意征讨叶赫，明却偏听叶赫之言，遣使对我谩骂凌辱，恨六也；明朝逼我把所俘哈达之人退还，结果被叶赫所掠取，恨七也。明朝欺人太甚，情理难容。因这七大恨之故，誓师伐明！”

与此同时，努尔哈赤又颁布兵法，申明军纪。他告谕众兵说：“今日发兵，征讨的是明军。对沿途民众，不许欺凌蹂躏；对抗拒我军者，格杀勿论；对于归顺者，切不可妄加诛杀。”

第二天，努尔哈赤率领着千军万马浩浩荡荡向抚顺进发。濒临浑河的抚顺城是明朝设防的要塞，又是明与建州互市的重要场所。青年时代的努尔哈赤经常出入这里进行贸易，因而对抚顺的山川形势和各方情况了如指掌。他决定以计智取，辅以力攻。他

先派一人到抚顺，声言明日有 3000 女真人要来做生意。第二天，扮作商人的后金先遣部队就来到抚顺城内，诱使当地商人和军民与之贸易。抚顺守军做梦也没有想到，后金兵士已遍布集市，后金主力又接踵而至，乘机突入城内，与先遣部队里应外合，一举攻取了抚顺城。抚顺守将李永芳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束手就擒。辽东总兵张承胤闻讯率兵万人仓促来援，这时努尔哈赤已经撤出抚顺，在中途设下埋伏，全歼了张承胤的援军，缴获了大批武器辎重满载而归。

努尔哈赤起兵伐明，初战便大获全胜，兴奋不已，但他并未被胜利冲昏了头脑。他深知明朝现在虽然江河日下，但毕竟还是一个庞然大物，还有相当的实力，不能贸然大举进犯。因此，他对明朝不断进行试探性的进攻。攻陷抚顺城 3 个月后，他又用计智取了清河城，杀死守将及兵民万余人。随着接连不断的胜利，努尔哈赤的胆子也愈来愈壮。明朝派来使者求和，努尔哈赤借机向明朝提出一系列要求。经济上，他要求给他和众贝勒、大臣加缎 3000 匹、金 300 两、银 3000 两。政治上，他要求明朝尊他为王，承认他的所作所为是合法的，撤回明朝派驻叶赫的官兵，当时努尔哈赤还未灭掉叶赫。他声言只有满足了这些条件，方可罢兵谈和。显然，堂堂“天朝”是不会接受这样的要求的，双方的一场更大规模的战争已是箭在弦上、一触即发了。

四、大战萨浒 攻占辽沈

努尔哈赤相继攻陷抚顺、清河，明朝震动，告急文件如雪片般飞向京师，一向置国家大事于不顾的昏庸皇帝万历坐立不安

了。他想，一个小小异族之邦竟敢如此猖狂，实在是不能容忍，他认为努尔哈赤的一系列要求纯粹是非份之想，坚决予以拒绝，并决定调兵遣将，犁庭扫穴，全力消灭后金。他亲自颁布圣旨，交九卿科道会议辽事，并立即起用杨镐为兵部右侍郎兼辽东经略。为了进攻后金，明朝在全国加派辽饷，转输粮秣，以应军需；还咨文朝鲜，胁迫其出兵，合力征讨；明王朝还颁布全军；晓喻天下：擒斩努尔哈赤者，奖赏万金；明王朝迅速调集各地官兵 8.8 万多人，加上来自叶赫、朝鲜的援兵，共十几万人，准备分兵四路合击努尔哈赤的中心赫图阿拉城。

明东、北两路军由于山路崎岖等各种原因，拖延了进军的时间。唯独杜松一路昼夜兼程，日行百里，于三月一日来到萨尔浒。他们兵分两部：一部在萨尔浒山下扎营，另一部由杜松亲自率领向东北方向的女真的要塞吉林崖进军。努尔哈赤统帅八旗军近 6 万人前来迎战。他对代善等人说：“明兵依仗人多势众，可以分散作战；我们要集中优势兵力逐路击破明军。吉林崖明军只派小股兵去监视就行，萨尔浒的明军一定要好好对付，千万不能掉以轻心。只要打败了萨尔浒的明军，吉林崖的就会不战自溃。”布置之后他亲率 6 旗兵力包围萨尔浒，派四贝勒皇太极率领其余两旗前往吉林崖，监视明军的动静。

奉命在萨尔浒扎寨的明军，初至萨尔浒谷口便遭后金 400 名埋伏者的袭击，兵伤马毙，锐气大挫。而对冲杀而至的六旗铁军，他们慌忙列阵，仓促迎战。开始，明军施放的火炮使没有火器的后金六旗兵暂时受阻。但精于骑射的 6 旗兵随之仰面扣射，顿时矢箭如雨，铁甲骑兵又乘机奋力冲击，打得明军四处逃窜，方阵大乱。在震天的呐喊声中，后金兵冲进明营，歼灭了驻守萨

尔浒山的全部明军。

随之，努尔哈赤挥师前往吉林崖。原来坚守吉林崖的后金军队见杜松率部抵达山脚，便从山上冲下来迎击。此时，皇太极率领的两骑兵马正好赶到。杜松军腹背受敌，眼看就要招架不住，萨尔浒大营已破的消息又在这时传到，顿时军心动摇。杜松正待收拾残兵撤退，努尔哈赤的六旗军似从天而降，挡住了明军的去路。士气颓落的明军乱作一团，后金兵乘胜而战，士气高昂，杀得明军尸首遍野。明军主将杜松左右冲击，也未能杀出重围，最后矢尽力竭，落马而死。明朝四路大军中的一支主力就这样毁于一旦。

接着，努尔哈赤马不停蹄，率师北上，去迎击马林的北路军。马林一部得知杜松惨败的消息后，将士哗然，士气低落，滞留在萨尔浒西北 30 里处的尚间崖消极防守。

努尔哈赤急驰至尚间崖，他登高远眺，见马林的营壕内外防守严整，便下令军士绕道而行抢占尚间崖顶，以便居高临下，杀明军个措手不及。代善、阿敏和莽古尔泰抢占有利地形后，各率部属直冲敌阵，奋力拼杀。仓卒之中明军用枪炮还击，但后金来势迅猛，锐不可挡，明军扔下火器争相逃命，死伤惨重，仅总兵马林等少数人策马而逃。

努尔哈赤连胜明朝西路和北路两支大军后，又得消息：另外两路明军正从东、南两个方向逼近都城赫图阿拉。他当即班师回京。为了避免与两支明军同时交战，努尔哈赤心生一计。他把缴获的杜松令箭交给明军降卒，让其假扮为杜松的使者去催促刘綎廷前来会战。刘綎一部这时正从宽甸向赫图阿拉行进，道路艰险，又受后金砍倒的树木阻碍，行军速度很慢。接到杜松的令箭，

刘綎不知其中有诈，他唯恐杜松独占头功，遂加快速度，向赫图阿拉孤军深入。努尔哈赤令代善、莽古尔泰和皇太极率主力迎战刘綎。皇太极抢先占领了山头，埋伏起来。待明军进入伏击后，后金的攻势似山洪暴发，打得明军晕头转向。刘綎奋战了几十个回合，两臂都受了重伤，最后力竭身亡。明朝士兵被杀者无数，尸横遍野，惨不忍睹。努尔哈赤自己带 4000 兵士守城，准备对付李如柏的南路军。

在沈阳坐镇的辽东经略杨镐，派遣四路大军出师后，自以为胜券在握，只等着部将报捷。哪里料到，不过几天功夫，三路大军相继败北。他料定幸存的李如柏更不是后金的对手，便急命李如柏回兵。胆小怯弱的李如柏，出师最晚，且行动迟缓，所以还没同后金交手。接到杨镐的命令，他就像得到了大赦，率部落荒而逃。

在这次著名的萨尔浒大战中，努尔哈赤仅用 5 天时间，就大败明朝十几万大军，称得上是他军事指挥艺术的一次精湛表演。他以集中兵力、各个击破为原则，以铁骑驰突、速战速决为法宝，以诱敌深入、以静制动为手段，以亲临战阵、身先士卒为表率，终于取得了以少胜多的辉煌战绩。

萨尔浒大战之后，明朝在东北的统治日趋崩溃，而已经立住了脚跟的努尔哈赤，则开始由防御转入进攻。

万历四十八年（1620），万历皇帝病死，一个月后，刚刚继位的太子朱常洛又吞红丸死于乾清宫。朱常洛的长子朱由校继承了皇位，是为熹宗天启帝。从此，宦官专权，宦党与东林党之间的党争愈演愈烈。大臣之间结党营私，排斥异己，互相攻讦。熊廷弼虽然身居千里之外的边陲，但由于他性情刚直，不受贿循

私，不巴结权贵，得罪了一些奸佞之人，遂成为被攻讦的对象。忌恨他的权贵们屡次上书，以莫须有的罪名弹劾熊廷弼。他先后5次上疏自辩，针砭弊政要害，并请求皇上信任边吏，用而不疑。但是，明廷气数将尽，已经不辨忠奸，到底自毁长城，罢了熊廷弼，改派袁应泰任辽东经略。

袁应泰走马上任后，宽娇属下，随意撤换武将，很快造成了军纪松弛、军纪混乱的局面。他又不分良莠，收纳了许多蒙古和女真的降兵，大量敌探乘机混入，成了后金的内应。刚刚由熊廷弼恢复巩固起来的辽东防务，被袁应泰搞得一塌糊涂。

一直在拭目以待的努尔哈赤见时机已到，于天命六年（1621）春，发动了辽沈之战。

沈阳在明代是辽东重镇之一，它被作为辽阳的“屏障”而受到重视。这里精心构筑了坚固的防御体系。努尔哈赤的大军在城东七里处安营驻扎。他几次派少量兵士诱明军出战，每次都让他们佯装败退，以便麻痹明军。

当努尔哈赤认为决战的时机成熟之后，便派后金的精锐骑兵设下埋伏，然后又派兵到沈阳城下挑战。贪功轻敌、有勇无谋的明总兵贺世贤果真中了圈套。他率万余兵丁出城迎战。后金兵假装败逃，贺世贤紧追不舍，进入了埋伏圈。当他发现自己中计时，为时已晚，身中数箭坠马，被后金兵杀死。之后努尔哈赤统军奋力攻击城的东北角。开始明军在城上使用火炮，重创后金兵。但火炮连发使炮身炽热，必须使其降温后才能再射。后金兵利用这个间隙，进逼城下，猛攻东门。激战之中，一些原先混入城内的女真降民突然将吊桥绳砍断，放下吊桥，后金兵一拥而入，攻占了沈阳城。这次战役，使明朝7万兵民丧生。

攻占沈阳不久，努尔哈赤又召集诸贝勒大臣，宣布了向辽阳进军的重大军事决定。

辽阳当时是东北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的中心，明朝对其极为重视，将城池修建得异常坚固，并有严密的防御体系。

在经过几番野战大大削弱了明军之后，三月二十一日，后金军在努尔哈赤率领下向辽阳发起总攻。守城军士乱作一团。各城门相继失守，正在镇远楼督战的袁应泰见大势已去，城池难保，遂焚楼身亡。监军崔儒秀上吊自杀。几经奋战之后，后金终于占领了辽阳。接着，努尔哈赤将后金的国都迁到了辽阳。以后努尔哈赤率军几经征战又攻占了整个辽西地区，兵锋直指山海关下。

五、计丁授田 迁都抚蒙

进占辽河流域、迁都辽阳之后，如何治理和巩固这个幅员辽阔、人口繁盛的地区，成了摆在努尔哈赤面前的重大课题。

辽沈地区汉族人口众多，由于明朝在这里长期实行军屯制度，农业比较发达。后金进入辽沈后，激烈的战争使生产受到严重破坏，不少汉族地主官僚非死即逃，大片的土地荒废了。新迁入的八旗军民和当地汉民，都急需恢复生产以安定社会。天命六年（1621），努尔哈赤颁布了“计丁授田”之令，将辽沈地区的闲废田地 30 万日（日是当时辽东计算土地的单位，1 日约合 6 亩），分给后金士兵。后来，他又令辽东五卫及海州、盖州、复州、金州四卫共交出无主田地 30 万日，实行“计丁授田”。

继“计丁授田”之后，努尔哈赤又于天命十年（1625）发布了“按丁编庄”令。八旗军进入辽沈后，大量汉人被俘后没为奴

隶，编入奴隶制田庄。但他们生活困苦难以聊生，叛亡殆尽。鉴于这一情况，努尔哈赤颁行的“按丁编庄”令规定：所有被俘获的奴隶均编入田庄，从而使庄田转变为官田，使原来为奴隶主服务的田庄过渡为封建制田庄。以“计丁授田”和“按丁编庄”为标志，后金初步完成了由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转变。

迁都辽阳一年后，因辽阳城年久失修、且面积过大不宜防守，努尔哈赤便想另筑新城。他说服了众贝勒、大臣，调集上万名民工在辽阳城东的太子河边破土动工。民工们昼夜不停地营造，新城很快建成了，城方圆约6里，城墙高达12米，开设了8个城门。努尔哈赤对新城非常满意，命名为“东京”。他率领众贝勒举家迁居东京，还将景祖、显祖的陵墓也迁到附近的鲁阳山上。

在东京住了不过3年，努尔哈赤又决定把都城迁到沈阳。诸王大臣一听就急了，他们七嘴八舌地劝阻说，东京刚建就舍弃太可惜，迁都劳民伤财，民不堪苦。听了这些话，努尔哈赤顿露不悦之色，说：“你辈哪里晓得我迁都沈阳的用意？沈阳乃战略要津，西可征明，北可攻蒙古，南可伐朝鲜。再说，附近有浑河和苏克苏护河，可以顺流而下运来木材，建造宫殿又有何难？此事我已拿定主意，你们不必多言。”众人见努尔哈赤动了肝火，也就不再言语了。

天命十年（1625），征明心切的努尔哈赤，未等兴建新宫室完毕，就迁都沈阳。此后，他大兴土木，改建了沈阳城，使之成为后金新的统治中心。

明后期，蒙古逐渐形成了漠西厄鲁特蒙古、漠北喀尔喀蒙古和漠南蒙古三大部。其中漠南蒙古与后金接壤。努尔哈赤深知，

降服蒙古既能解除同明作战的后顾之忧，又可解决后金兵力不足的困难。因此，他对蒙古采取了攻抚结合以抚为主的策略。漠南蒙古的科尔沁部，曾参加以叶赫为首的九部联军，大败而逃，后来又同乌拉合兵抵抗建州兵。随着后金的强盛，科尔沁自知不是对手，便遣使请盟，联姻结好，努尔哈赤尽弃前嫌，欣然与科尔沁部通婚。他先后以科尔沁两贝勒的女儿为妃，他的儿子也相继纳蒙古王公之女为妻。1614年，他的次子代善、五子莽古尔泰、八子皇太极和十子德格类全都娶了科尔沁蒙古女子。尔后，蒙古又同他的十二子阿济格和十四子多尔袞联姻。努尔哈赤也不断将建州女子嫁给蒙古王公为妻。1614年喀尔喀蒙古巴岳特贝勒的儿子恩格德尔归顺建州女真，努尔哈赤十分高兴，立即将弟弟舒尔哈齐的第四女嫁给他为妻。后来恩格德尔与妻子来朝，受到努尔哈赤的特殊礼遇。朝拜时，努尔哈赤让恩格德尔率众蒙古贝勒在贝勒代善之后叩头，而二贝勒阿敏、三贝勒莽古尔泰、四贝勒皇太极等都在恩格德尔之后。恩格德尔对努尔哈赤自然感恩戴德。朝觐后，他要求偕公主留居建州，努尔哈赤允其所请，发誓对他要像对待自己的亲生儿子一样，还赐给他4处田庄，20个满汉奴仆。努尔哈赤这些具有策略性的举动，对蒙古诸部首领产生了极大的吸引力，很多人相继投奔后金。科尔沁、喀尔喀等部先后成为后金的政治同盟。

但是，努尔哈赤以抚为主、联姻结好的策略并非对所有蒙古部落都能奏效，以察哈尔部林丹汗为首的蒙古诸部，一直联合明朝，与后金为敌。林丹汗占据漠南蒙古的大片地域，他野心勃勃，力图称雄蒙古。为了对付后金，明朝极力笼络林丹汗，每年赠银4000两，后来又增至4万两。林丹汗兵强马壮，又有明朝作靠

山，对后金的态度非常骄横。万历四十七年（1619）十月，他派使给后金送了一封书信。他在信中自称为：“蒙古国统40万众的英主成吉思汗”，称努尔哈赤为“水滨三万人的英主”，同时还威吓努尔哈赤：若取向广宁发动进攻，决无好下场。林丹汗如此狂妄，努尔哈赤气愤至极。第二年他派遣使者送去了笔锋犀利的复信，他在信中历数林丹汗败于明朝之辱，想以此激起林丹汗的旧恨，拆散他与明朝的联盟，并极力夸耀八旗的军威，拉拢林丹汗归附后金，共同抗明。但这一切都未能奏效，林丹汗囚禁了努尔哈赤的使者，以此作为对努尔哈赤的回答。

由于林丹汗势力较强大，加上有明王朝支持，努尔哈赤几次想对他动兵而又做罢，但后来林丹汗暴虐无道、穷奢极欲，大失人心，内部开始分崩离析。他属下的一些部落将领暗中与后金来往，就连他的两个孙子也跑到后金，向努尔哈赤叩首行礼。努尔哈赤对林丹汗始终采取孤立、打击的策略。天启五年（1625），林丹汗率兵攻打后金的姻盟科尔沁部，努尔哈赤立即出兵援助，打败了林丹汗的进攻。

努尔哈赤以抚为主的对蒙政策，为日后满族统一蒙古诸部奠定了基础。与蒙古交好成为有清一代的基本政策。

六、宁远兵败 抑郁而死

辽西地区失陷后，明政府深感形势严重，又一次征调全国各地的军队会集山海关，全力固守，并将积极主张抗击后金的大学士孙承宗、兵部主事袁崇焕派往关外考察军务。

袁崇焕来到边关果然不负深望，很有作为，他首先向孙承宗

提出要固守山海关必须先守宁远的建议，要求重新修建宁远城。宁远（今辽兴城）地处辽西走廊中段，它依山傍海，形势险要，是由沈阳通往山海关的咽喉要塞。孙承宗采纳了袁崇焕的建议，加意修筑宁远。按照袁崇焕的设计，宁远城新建的城墙高 3. 2 丈，底宽 3 丈，顶宽 2. 4 丈，宁远遂成为关外的军事重镇，孙承宗又修缮了锦州、松山、杏山、右屯及大小凌河等地的城池，遣兵分守。一条以宁远和锦州为中心的防线迅速建成了，辽西的局势重新稳定下来。

努尔哈赤此时正忙于迁都，探知孙承宗在辽西严阵以待，他一直没有贸然进攻。但不久明朝内部的党争再起，孙承宗尽管满腹韬略、守边有方，却因秉性忠直遭到魏忠贤一伙的忌恨和排挤。继任孙承宗的是魏忠贤的同党高第，他精于投机钻营，对打仗却是一窍不通。他对后金怕得要死，认为关外必不可守，只想躲在山海关内苟全性命。因此，他不顾袁崇焕等人的强烈反对，尽撤锦州等地的防务，将各城兵力强行调入山海关。孙承宗苦心经营的“宁锦防线”就这样被破坏了。只有袁崇焕坚决不撤，他斩钉截铁地说：“我在宁远做官，就要在这里死守，决不撤退！”

努尔哈赤迁都完成后一直在寻找征伐明朝的时机，得知明军更换主帅全线撤防的消息，他喜出望外，决定立即出兵。天命十一年（明天启六年，1626）正月十四日，努尔哈赤亲率 10 余万八旗大军向辽西杀来。

一路上，后金军队长驱直入，不费吹灰之力就占据了锦州、松山等大小城池，只剩下宁远这座孤城还由袁崇焕固守着。努尔哈赤认为，后金大军压境，宁远一座孤城已是唾手可取，便派人给袁崇焕送去招降信，用高官厚禄引诱他献城投降。袁崇焕毅然

拒绝了后金的招降，全力准备迎战，与宁远共存亡。

当时，袁崇焕的兵马还不到3万，要战胜努尔哈赤的13万军队，谈何容易！他将城外的所有明兵调入城内，将武器兵力集中起来。又将城外的百姓动员进城，把城郊一定范围内的房屋粮食全部烧毁，使后金兵在宁远城外一无所获，袁崇焕用佩刀刺破手指，写下血书，表示要誓死守住宁远。宁远军民为他的爱国热情所感动，全城同仇敌忾，决心同后金军队决一死战：将士们分别据守，老百姓也带着自备的武器登城防守，体弱的就帮助供应饮食，捉拿奸细。

努尔哈赤见袁崇焕誓死不降，亲自指挥千军万马齐攻宁远城。后金的战车、骑兵、步兵铺天盖地，向宁远压来。努尔哈赤采用战车同步骑结合的战术几乎是所向披靡，不知攻下过明军多少城堡，但是在宁远城下，他们的战术失效了。袁崇焕指挥城上的大炮待后金兵冲至城下时一齐开炮，随着一声声巨响，后金兵成片倒地，连专门对付明军火器的柙车也被炸得粉碎。强攻失败了，后金兵又躲在加了厚板遮蔽的战车下靠近城墙，想凿洞进城。宁远的城墙本来就修筑得特别厚实坚固，又加上天塞地冻，凿城的进度很慢，但这毕竟是对宁远的一大威胁。袁崇焕又采用了火烧的新法子，来对付凿城的后金兵。他命令将全城贡献的被褥一卷卷扔下城墙，后金兵不知其中厉害，蜂拥而上，你抢我夺。正在这时，明军投下的火把点燃了裹在被褥中的火药，刹时间烧成一片，不少凿城的后金兵葬身火海。

努尔哈赤指挥后金军队整整攻了三天三夜，部下死伤无数，他自己也负了伤，但宁远城依然固若金汤，巍然屹立。努尔哈赤不得不承认自己无计可施。在凛冽的寒风中，他带着残存的兵力

撤回沈阳。

努尔哈赤大概到底没有搞清自己失败的真正原因：袁崇焕指挥有方，固然是战胜后金的重要因素，而宁远百姓不堪后金的暴虐统治，在袁崇焕的号召下，一呼百应，毁家相从，与宁远守军结成了坚不可摧的铜墙铁壁，更决定后金此次战败的命运。一系列的军事胜利使努尔哈赤头脑发热，难以进行冷静的思考，他本想在宁远重演当年轻下辽沈的一幕，并未进行认真的准备，便大举进兵，终于在众志成城的明朝军民面前败下阵来。

宁远战败给努尔哈赤造成了巨大的精神创伤，为此努尔哈赤的心情一直忧郁不安，加上已近七旬高龄，又要连续多日征战，这些都严重损伤了他的身体健康。

天命十一年（1626，明天启六年），努尔哈赤终因痼疽突发离开了人世，享年 68 岁。

太宗爱新觉罗·皇太极

一、英姿少年 行伍健儿

明万历二十年（1592），努尔哈赤第八子皇太极出生。清代官书上讲，太极音同台吉，蒙古人把王位继承人叫做台吉，并习惯于在台吉前面加上黄、红等颜色名称。汉族人则把皇位继承人叫做皇太子，也同皇太极音相似。总之，皇太极

是个十分显贵的名字。

皇太极的确是得到了父亲的喜爱。皇太极的生母叶赫纳喇氏是叶赫部酋长杨吉砮的女儿。杨吉砮当初见努尔哈赤英气非凡，觉得定成大器，便主动将自己的小女许配给他，美丽动人的叶赫纳喇氏是努尔哈赤的第六位妻子，待人宽厚，处事稳重，在努尔哈赤的妻、妾中很受努尔哈赤的恩宠。子以母贵，她所生的儿子也得到了努尔哈赤的疼爱，努尔哈赤家中有教育子女的专门教师，皇太极从小便受到了一定的文化教育。他天资聪慧，凡是接触过的事物过目不忘。在他长大成人投身行伍的时候，努尔哈赤军中众多的战将几乎都是不识字的文盲，只有皇太极够得上一

个粗通文墨的“秀才”。

由于连年烽烟不息，父兄经常出征作战，少年时期的皇太极便主持家务。努尔哈赤拥有众多的妻妾、子女、奴仆、财产，而且当时家事与国事的界限并不十分清楚，两者常相互混杂。处理这样繁杂的家政，对皇太极来说是副不轻的担子，也是个极好的锻炼机会。而少年皇太极干得颇为出色。据史书记载，在他7岁以后，努尔哈赤就把大部分家政交给了他，皇太极根本无须父亲多加指点，就能把繁杂的事务干得井然有序。

不过，皇太极并非命运的宠儿。12岁那年，他遭到了丧母的不幸。而政务缠身，不断征战的父亲此时又无法给予他太多的照顾和体贴。这样，少年皇太极不得不早早开始摆脱对父母的依赖，在生活的激流中自立图强。

明万历四十年（1612）秋，年方21岁的皇太极第一次跟随父兄出征作战，参加了对乌拉部的征伐。但努尔哈赤只是命令部下四处焚毁敌人粮草，却不发动进攻。血气方刚的皇太极急于陷阵冲锋。努尔哈赤耐心开导他说，在砍伐大树的时候，必须用斧子一下一下地砍，才能渐渐把树砍断。对付乌拉部这样的强敌，怎能试图一举将它歼灭？只有将其所属城郭一一攻取，最后才能灭亡它。经过对乌拉部连续不断的征伐削弱，到第二年，努尔哈赤终于灭掉了强大的乌拉部。努尔哈赤的教诲也深深地印在了皇太极的脑海。后来他在继承汗位后，仍遵循这个“伐树”的策略，对明朝长期征伐，从不断削弱它的旁枝开始，最后断其主干。皇太极出色的军事才干，就是在和父兄一起征战的戎马生涯中逐渐增长提高的。

皇太极的长兄褚英，是一员疆场骁将。努尔哈赤晚年也曾有

意培养他做为自己的继位人。但褚英心胸狭窄，拥权自重，对自己的兄弟和群臣百般欺凌。皇太极等人忍受不过，禀报了努尔哈赤。努尔哈赤大为愤怒，下令监禁了褚英，后来又因有人告他有篡位行为而将其处死。

褚英失势后，年青的皇太极作为父亲的得力助手却不断受到重用。努尔哈赤于万历四十四年（1616）称汗后，在10多个儿子中，选定皇太极与次子代善、侄子阿敏、五子莽古尔泰为四大贝勒，佐理国家政务。4个人按月轮流值班，国中一切机要事务都由他们负责处理。皇太极没有辜负父亲的期望，积极参与政务、军事的谋划和决策。万历四十六年（1618），努尔哈赤公开向明朝宣战，进兵攻打抚顺。皇太极巧献妙计，预先派军卒扮作贩马商人混进城内，然后大军凭借夜幕的掩护兵临城下，发炮为号，里应外合。结果一举拿下了抚顺。

在萨尔浒之战中，皇太极不仅身先士卒冲锋陷阵，而且献计献策指挥若定，俨然是一位智勇双全，部署有方的战将了。

皇太极不仅在战场上骁勇非常，在处理政事时，更是头脑冷静，果断机敏，颇有全局观念。在努尔哈赤虑事不周之时，皇太极时常提出建议，把事情处置得更妥贴。后金与蒙古察哈尔部长期以来一直存在着矛盾冲突。一次，努尔哈赤听说自己派往察哈尔的使者被杀了，心中很是恼火，也想杀掉察哈尔部的使者。皇太极及时向父亲建议：传闻未必可靠，不如派人去察哈尔部，约定时间双方同时放回使者。如果过期不放，再杀掉他们的使者也不迟。努尔哈赤采纳了皇太极的建议，但察哈尔部方面一直杳无音讯，约定的日期过去了也未见动静，努尔哈赤这才杀掉了察哈尔部使者。其实后金的使者并未被害，事后他又逃了回来。皇太

极虑事周全，措置得体，政治上日趋成熟。当时朝鲜派往后金的使者回国后向其国王反映，皇太极是努尔哈赤诸子中最为勇敢且富于智谋，得到努尔哈赤偏爱的王子之一。

天命十一年（1626）八月，68岁的努尔哈赤死了。经过诸兄弟子侄的共同协商，公推35岁的皇太极即汗位。皇太极推让再三后接受了众议，于九月一日登上了后金汗位，并决定从明年起改元天聪。

二、安抚民众 加强集权

皇太极登位时，形势并不乐观。连年的对外战争、繁重的兵役负担，使得国内的下层民众人心厌战，怨言四起。后金上层统治集团内部也不稳定，充满勾心斗角的矛盾斗争。尤其严重的是，后金国内的满、汉民族矛盾相当尖锐。努尔哈赤一生戎马倥偬，艰难创业，为后金大业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但他晚年在取得辉煌军事胜利的同时，也犯下了严重错误。在向辽沈地区推进的过程中，他坚持“诛戮汉人、抚养满洲”的政策，大肆屠杀和奴役汉族百姓。他对于敢于抗拒的汉人一律格杀勿论，对于俘获的大量汉人则分给满族官兵做阿哈——奴隶。奴隶们被强迫在主人的庄园和家庭中从事各种繁重的劳动，连年苦累不堪。虽然后来努尔哈赤在建国后实行了“计丁授田”“编庄授田”等封建化措施，缓和了一些，但仍不彻底。悲惨的生活迫使辽东地区的汉族人民奋起反抗，他们举行暴动，暗杀女真人，由此，使得女真统治者恐慌不安，岁无宁日。努尔哈赤甚至下令，女真人出门不得单人行走，必须10人以上结伴同行，否则要罚

银。由此可见当时民族关系的紧张程度。

在错综复杂的形势下，皇太极继位后处乱不惊，胸有成竹。他大胆地冲破祖宗法度和传统习惯的约束，在政治、经济、军事等各个领域中实行全面改革和调整。

皇太极首先着手解决尖锐的民族矛盾问题。他一上台就强调，要治理好国家，必须先安抚民众，并且有针对性地把安民的重点放在安抚汉人上。他上台不久就改女真族为满州族，以改变历史上女真人与汉族的对立仇恨。接着又颁布法令宣布，对满人、汉人一律公平对待，两者享有同样的政治、经济权利。

在努尔哈赤统治时期，辽沈地区存在着为数众多的奴隶制庄园——拖克索。身处卑贱地位的农奴们经常受到主人的欺凌侵扰，倍受煎熬。皇太极对庄园中农奴的人数进行了裁减，规定每个庄园只能拥有8个农奴，其余的汉人则从庄园移居出去，编为民户。这样就使大批汉人农奴获得了人身自由。崇德三年（1638），他又下令解放农奴，使他们成为独立生产的个体农民。这对后金的农业生产大有好处。

天聪五年（1631），皇太极又正式颁布了《离主条例》，规定贵族的奴婢可以通过告发主人的罪行获得自由。以往，因不堪忍受民族歧视和压迫，汉人纷纷逃亡的现象是普遍存在的。努尔哈赤对逃跑的汉人实行了严厉的惩治措施。不管是逃跑被逮还是谋划逃跑而被逮的，一律都要处死。皇太极变换了策略，他规定：以前有私逃的，或是与明朝暗中来往的，一概不予追究。今后只将在逃而被捕获的人处死；虽然想逃，但未采取行动的，即便被人揭发出来也不论罪。皇太极的新规定受到了汉人的极大拥护。后来，皇太极又进一步放宽了“逃人法”，允许汉人逃走，即使

抓住也不治罪，但逃到明朝统治地区便不许再返回来。

另外他还改变努尔哈赤时期对待汉族知识分子及汉官的政策，对他们量才录用，对范文程、鲍承先、宁完我、高鸿中等富有政治经验和统治才能的更是授与高官。对汉族自动归降的降将有的不惜封王，这大大扩充了其统治基础，也稳定了辽东汉族人心。

皇太极登极后，把发展农业放在了恢复经济的首位。针对满族贵族惯于征战掠夺、轻视务农的做法，皇太极多次训戒他们应改变观念，要认清耕织生产的重要性，不要只看重绸缎锦帛之类。他告诫说绸缎锦帛都是些粉饰之物，即使没有它们也不会有多少妨害。他一再重申“我们出兵征伐，目的在于掌握土地、人口，作为立国的根本。并非只为了贪图财利。使生活充裕的途径，全在于抓紧农业生产。”汉官曾批评努尔哈赤在位时期大兴土木，百姓深受困扰，皇太极吸取了此中教训，特别注意珍惜民力，保证农民有足够的生产时间。皇太极虽然身为一国之君，但对于农业生产的具体环节关心入微。他多次强调在安排农作物种植时应该根据不同的自然条件因地制宜。在地势低下、土性潮湿的地方应种植水稻、高粱；在地势较高、土性干燥的地方可广种杂粮。并且应该抓紧农时，及时播种、耕耘，以保证较好的收获。否则，一旦遇到虫、涝等自然灾害，就会措手不及。

从保护农业生产的角度出发，皇太极制订了一系列法令。他宣布对大牲畜实行保护政策。禁止滥杀牛、马、骡、驴，禁止牲畜践踏农田，牲畜闯入农田损坏了庄稼，必须追罚牲畜主人的银两，并由牲畜主人赔偿损坏的庄稼。为了加强护农法令的贯彻，皇太极以身作则，亲为表率。每当他行军出猎的时候，即便是在

严寒时节，他也总是吩咐把自己的住处安排在野外，从不肯轻易闯入屯堡，惟恐惊扰了其中的百姓。

皇太极的努力取得了明显的成效，首先是民族矛盾得到极大缓和，再有是后金的农业生产较快地摆脱了不景气局面，粮食生产逐渐达到了可以自给的程度。到1639年时，后金一年在酿酒方面的用粮就达数10万石之多。

在皇太极继承汗位之前，后金的手工业尚处在刚刚起步的阶段。规模有限，水平不高。所生产的布匹、铁器、船只等项都远远无法满足需要，大量的物资必须从明朝、朝鲜等地运进来。即汗位后的皇太极力图尽早扭转这种窘境，为此他采取了种种措施。他大力提倡种植棉花，在后金境内四处推广纺纱织布，并经常奖赏技艺出众的纺织工匠。到了1633年，后金的纺织业技术已有很大提高，各种精细布匹都能够织造出来，已能满足后金境内的需求。在矿冶业方面，皇太极积极支持开矿冶炼，创办了不少冶炼场。冶炼业的发展直接带动了兵器生产。从天聪五年（1631）开始，后金已能够成批生产极有威力的“红衣大炮”。“红衣大炮”在皇太极对明朝、朝鲜的战争中发挥了很大作用。此外，在皇太极的积极倡导下，后金造船、陶瓷等业也有长足的进步。

随着农业、手工业的恢复、发展，商业贸易也出现了比较兴旺的局面。在对外贸易方面，后金用大宗的人参、东珠、貂皮等地方特产，同明朝、朝鲜、蒙古通商，换取粮食、布匹等生活用品。在后金内部，皇太极鼓励各族商人设店售货，开设当铺，发行借贷，并允许粮食投放市场，但不许商人囤积居奇，进行商业投机。为了疏通后金的商业网络，皇太极非常注意整顿商业税

收，严禁有关官员利用职权之便，损公肥私，受贿漏税。镶蓝旗官员法都在掌管辽东城西关红、蓝桥的税收时，偷税 12 两银子，随即被皇太极革去了职务。

经过皇太极 10 多年的励精图治，后金逐渐摆脱了经济凋敝的阴影，安定了人民的生活，增强了国力，从而为进一步向外扩张打下了比较坚实的物质基础。

对外扩张作战不仅需要坚实的经济后盾，而且离不开强悍善战的军事队伍。皇太极积极扩编八旗，严饬军备，就是要保持雄厚的军事实力，确保对外战争的胜利。

努尔哈赤在军事上取得的辉煌战绩，与他拥有一支八旗劲旅有密切关系。由精于骑射、作风顽强的满族人所组成的满族八旗具有很强的战斗力。当时明朝方面有着这样一句话：“女真满万不可敌。”但满族人口不多，兵源有限，在战争中满族八旗不断减员，而对外战争仍是相当频繁，并且战争的规模也日趋扩大，如何才能保持和发展一支强大的军事队伍，以立足于不败之地呢？

皇太极充分利用了蒙、汉归附和被掠人口这个优裕的兵源。在满族八旗之外，他正式建立了蒙古八旗和汉军八旗。早在努尔哈赤时期，努尔哈赤就开始把归服的蒙古人编为蒙古牛录，隶属于满族八旗。随着蒙古族归附者日益增多，牛录数目也不断增加。到了皇太极时期，开始了大规模的编旗活动。天聪七年（1633），编成蒙古两旗，称为“右营”和“左营”。两年后察哈尔部被征服，皇太极又将原来的蒙古牛录加上内外喀喇沁蒙古的众多壮丁，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扩编，正式成立蒙古八旗，旗制与满族八旗相同。

汉军八旗正式组建于天聪五年（1631）。皇太极下令在隶属于满族八旗的汉人壮丁中，每10人抽调1人入征，组成了1500人的汉人军队，队伍中的士兵多为炮手和枪手，娴于火器，这支队伍在满语中叫做“乌真超哈”（重兵）。汉军很受皇太极的重视。皇太极曾多次检阅过这支队伍，崇德二年（1637），汉军扩编为左、右翼两旗，后来又扩为四旗。到了崇德七年（1642），汉军再次扩到八旗。八旗汉军由此成定制，旗制也与满族八旗相同。蒙古八旗和汉军八旗与满族八旗有一点很大的不同是，满族八旗的旗主都是实行世袭制，而蒙古八旗和汉军八旗的旗主则由皇太极任命，不称职者可随时撤换。所有的满、蒙、汉八旗军队，都由皇太极直接指挥和调遣。

为了改变汉人心中八旗军烧杀抢掠的形象，在每次出征前，皇太极总要详细申明军纪。比如不得杀害降民，不得离散降民父子、夫妇，不得奸淫妇女，不许践踏禾苗，不许酗酒等等。若士兵违犯了军纪，不仅本人受罚，领兵的将官也要受到牵连。每当战事结束后，皇太极都要进行认真的总结，让部下举报各种违纪行为，严肃处理。

在皇太极极力推行改革的过程中，他遇到了一个重大阻碍，即他手中缺乏足够的权力。努尔哈赤死后，后金出现了“八王共治”的局面。拥有极大权力的八旗旗主贝勒们操纵着国家决策机构——议政会议。军政大事都由集体定夺，汗不能违背旗主们的意愿独断专行。若汗平庸无能，旗主们还有权更换汗主。

雄心勃勃的皇太极不能长期容忍这种局面，所以从即汗位之日起，他就开始积极筹划，着力加强君主集权，削弱权贵们的势力。天命十一年（1626）九月，皇太极在八旗各设总管旗务大

臣一名，他们直接掌管旗中一切民政事务，可以和贝勒们一起参议国事。后来，皇太极又设立佐管大臣、调遣大臣各 2 名，协理旗中事务，分别重点负责刑法和出兵驻防。这样一来就打破了旗主们独擅一切的局面，分散了他们手中的权力。

在汗位初步稳固之后，天聪三年（1629），皇太极在贝勒大臣会议上宣布了一条重要决定：免去三大贝勒轮流执政的权力，改由诸贝勒们代理。以此为起点，三大贝勒的显赫地位不断受到了摧抑。

三大贝勒的特权被摧垮了，“八王共治”的局面也已经瓦解，皇太极可谓是大权在握。天聪九年（1635），后金从蒙古苏泰太后手中得到了历代传国玉玺。君臣上下顿时欣喜若狂，认为这是吉祥之兆。在群臣的一致推举下，皇太极于第二年的四月十一日正式即皇帝位，定国号为大清。他由后金的天聪汗一举登上了“真龙天子”的宝座。

早在天聪五年（1631），皇太极就仿照明朝制度，设立了吏、户、礼、兵、刑、工六部。每部由一名贝勒总掌部务，下面分设承政、参政、启心郎等官。此时，贝勒们与皇太极已由原来的并列关系转化为封建的君臣隶属关系，到了崇德五年（1640），皇太极又下令废除了贝勒主持部务的制度，将中央统治机构的权力进一步集中到自己手中。崇德元年（1636），皇太极设立了监察机关——都察院。都察院具有一定的独立性质，其职责就是劝谏君王，弹劾臣下的不法行为。同年，皇太极还设立了蒙古衙门，专门负责处理对蒙古方面的事务。两年后蒙古衙门改称理藩院。后金的行政机构经过这一番比较大的改革，更有利于皇太极加强君主集权。

后金的行政机构经过完善之后，还需要建立一支素质过硬的官吏队伍。在这方面皇太极十分注意人才的选拔。他向臣子们说：“治理国家，人才是根本。你们做臣子的都应把荐贤当做一件大事。”

实行科举考试是皇太极选拔人才的一项重要措施。在执政期间，皇太极举行了多次考试，从满、汉、蒙等各族生员中拔取优秀人才，有时他还单独对汉族生员进行考核，对汉族生员中原来沦为奴仆的，他都将他们从奴籍中拔出。通过科举考试，一大批有才干的知识分子——主要是汉族知识分子被皇太极网罗到了各级行政机构中，维护着后金的统治秩序。

三、纵横驰骋 决战决胜

作为开国立业的一代君王，皇太极在充满了血与火的沙场上，留下了光辉的业绩。皇太极继承汗位的时候，后金仍没有摆脱四面受敌的局面。皇太极曾对当时面临的形势进行了分析：后金东邻朝鲜，北接蒙古，西面则是明朝。后金的扩张活动对明朝、蒙古和朝鲜都构成了直接威胁，使得它们对后金抱有很深的敌视。在与后金相抗这一点上，它们有着共同的利益。

为摆脱险恶的处境，首先要确立对敌策略。经过反复权衡与思考，皇太极决定对主要敌人明朝采取议和的策略，先争取时间，再图大举；蒙古和朝鲜则是内顾之忧，必须先加以解决。

长期以来，朝鲜一直是明朝的忠实盟友。明朝方面打算利用朝鲜对后金实行牵制，明军毛文龙部就驻扎在朝鲜境内，得到朝鲜的物质资助，经常对后金出击骚扰。为了征服朝鲜，天聪元年

(1627) 一月，皇太极乘朝鲜发生内乱之机，派遣阿敏统率 3 万军队出征朝鲜。后金军队突袭义州，全歼了城中朝鲜守军。同时又分兵夜袭铁山，击败了驻扎在那里的明军，迫使其退往皮岛。接着又攻占了江华岛，俘获了朝鲜王妃、王子和宗室大臣。李仁宗走投无路，只得出城投降，与皇太极签订了城下之盟。盟约中规定，朝鲜向清称臣，成为清的属国。每年必须送纳大批贡品，并将国王的两个儿子送到沈阳作为人质。接着，皇太极又发兵攻取了皮岛，全歼驻岛明军。皇太极对朝鲜的战争取得了彻底胜利，将朝鲜完全控制在自己的手中。

在后金西北的是蒙古。当时，蒙古部落众多，基本上可分为三大部分，其中，漠南蒙古地处明朝与后金之间，位置尤为重要，成为明与后金争夺的重点。明朝每年拿出大量钱财，羁縻漠南蒙古各部，要他们抵御后金。皇太极则采取软硬兼施的两手策略，以强大的武力为后盾，积极争取蒙古各部归属自己。对于归顺后金的各部首领，皇太极一律予以优厚的待遇。

漠南蒙古各部中最强大的是察哈尔部。察哈尔部首领林丹汗恃强自傲，依仗明朝在政治、经济上的支持坚决与后金为敌。林丹汗对属下各部的统治也十分残暴，他到处出兵攻掠，滥施淫威，经常向各部索取各种财物，挑起争端。林丹汗的暴虐统治激起土默特等部联合起兵反抗，但结果损失惨重，不得不向后金求援。皇太极借此机会，召集漠南蒙古部落的一些代表在沈阳会盟宣誓，决定联合出兵攻打察哈尔部。然后皇太极以盟主的身份征调科尔沁、喀喇沁、敖汉等部兵马，会同后金军队一起西征。联军在席尔哈、席伯图等地接连击败了察哈尔部军队，向西一直追击到阿尔泰山方才收兵。为了加强对归附于自己的蒙古各部的控

制，皇太极在这次西征后向各部颁布了从征军令，严申军纪，强调对不服从约束的漠南蒙古各部要绳之以法。

天聪六年（1632），皇太极再次调集归附的蒙古各部兵马同八旗军一道大举西征。他在昭乌达（今昭乌达盟）会集蒙古各部首领，对他们出兵的表现做了总结。然后挥师向西疾进。林丹汗因部属纷纷叛离，力量削弱，自觉抵挡不住皇太极的兵锋，便率领部众再次向西奔逃，一直渡过了黄河，向西藏方向逃去。天聪八年（1634），林丹汗在青海大草滩出天花而死，部众纷纷逃散。皇太极闻讯后立即派多尔袞率兵前去招抚林丹汗的残部。第二年，林丹汗之子额哲率领部众归顺了后金。从此，漠南蒙古完全被皇太极所控制，明朝在蒙古一线受到了严重威胁。

黑龙江地区是皇太极先人的故乡。努尔哈赤在世之日，后金已经统一了黑龙江下游地区，但黑龙江中、上游地区仍在其控制范围之外。皇太极继承了父亲的遗愿，不断向黑龙江中上游地区发展势力。他继续推行努尔哈赤招抚与军事征服相结合的策略，但不偏重于武力。他指示北征的将领要对当地的民众讲明：我们的祖先都是一家人，这在典籍上记载得明明白白。要用同宗同语的观念感化当地民众，与他们同甘共苦，笼络人心。在他的招抚政策下，众多的部落纷纷归附了皇太极，向皇太极纳贡称臣。到崇德七年（1642）时，东自鄂霍次克海滨，西至贝加尔湖的广阔地区都被纳入了清的版图。皇太极将当地被征服的民众都编入了旗籍，设官员管理当地事务，征收赋税。这样，皇太极完全肃清了自己后方和侧翼的异己力量，他可以腾出手来，全力砍伐明朝这棵大树了。

1628年，明天启帝死，崇祯皇帝上台，加上他已完全征服

朝鲜、蒙古的大部也已归服，因此，皇太极认为攻击削弱明王朝的时机来到，因此立即率领大军绕过了明军防御坚强的宁锦防线，取道蒙古南下。大军从喜峰口越过了长城，攻陷了遵化等城，一直打到北京城下。明朝崇祯皇帝慌了手脚，急令袁崇焕率领边军回援。袁军与皇太极在北京城下展开了激战，互有伤亡。皇太极在激战中施展反间计，让手下人给一个被俘的太监透露风声说，袁崇焕与皇太极订有密约，要共成大事。然后又故意放跑了这个太监。多疑的崇祯帝得到报告，心中顿生猜忌，袁崇焕被下狱问罪，第二年竟被凌迟处死。皇太极不费举手之劳，就借崇祯帝之手除掉了一个劲敌。接着，他又率军击溃了满桂等人率领的明朝各路兵马，接连攻克了永平、遵化、迁安、滦州等城。随征的将领们纷纷要求皇太极一举攻下北京城，皇太极表示，北京城是可以集中力量攻下来的，但明朝国力尚未倾颓，灭亡明朝不能做一朝一夕的打算。不如加紧整顿军队，等待时机。他安排了永平、迁安等 4 城的防守，然后率军返回了沈阳。

为逐步消耗明王朝，最终取而代之，皇太极自此一面假意求和，一面不断向明进攻。从 1634 到 1638 年，皇太极又先后 4 次出兵进入明朝内地。由于明朝统治的腐败，后金兵在历次征战中往来驰骋，如入无人之境。比如在崇德元年（1636），阿济格率军入塞，大小 52 战全部告捷，攻陷城池 60 余处，劫得人口、牲畜共 18 万。崇德三年（1638），多尔衮和岳托等人又率领清军打进了明朝内地，在内地转战了半年之久，接连拿下了 70 余处城池，俘虏人畜 46 万有余，皇太极反复进兵征伐，震撼了明王朝的统治，同时也给内地人民带来了深重灾难。比如在天聪八年（1634），后金兵在保定城大加杀戮，城中的房屋几乎被焚烧一

空，街道上尸首狼藉，甚至连水井中也填满了尸体。崇德四年（1639），济南又遭到了清军的洗劫，许多无辜百姓都死在了清军的屠刀之下，城内外留下的尸体达 13 万具之多，景象悲惨之极。虽然皇太极曾多次申明军纪，但他发动战争的目的之一就是要掠夺损毁明朝的财物人口，最终达到极力削弱明王朝的目的。

在对明朝边打边谈的过程中，情况逐渐有了变化。到 1636 年皇太极称帝前后，后金政权的肌体已经变得强健起来，来自朝鲜、蒙古的威胁也被解除。在变化了的形势面前，皇太极因势利导，最终抛弃了对明朝议和的幌子而转为力主征伐。他在给崇祯皇帝的信中也一反过去谦恭的态度，咄咄逼人地宣称：“自古以来，天下都不是一家一姓固定占有的。天道的变化循环往复，不知有多少人登上了帝王的宝座，那能有帝王的后代长久充当帝王的事情！”明王朝也不甘心坐以待毙，一场酝酿已久的双方决战，松锦大战在崇德四年（1639）爆发了。

锦州位于辽西，是关外明军防御体系中的坚强堡垒。明朝在这里驻有大批兵力。以前虽曾放弃，后在宁远大捷后，逐步收复。在锦州的周围，则分布着松山、杏山、塔山等城，对锦州起着拱卫作用。崇德四年（1639），下定决心的皇太极首先对松山发动了强攻，但在明军的顽强抵抗下清军攻势受挫，松山依然为明军所控制。第二年，皇太极派遣济尔哈朗、多铎等人率军修筑义州城，在那里驻兵屯田，作为攻取锦州的前哨阵地。进而皇太极又陆续增调人马逼近锦州，在城外挖掘深壕，将锦州城团团围困起来。1641 年，由明将指挥的守卫锦州外城的蒙古军队慑于清军的军威投降了皇太极，困缩在内城里的明军面临着十分危急的形势。这时，明朝蓟辽总督洪承畴奉旨率领 13 万大军前来解锦州

之围，洪承畴是一个富于作战经验的人，他采取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的策略，徐徐向锦州靠拢，不给清军任何分化以各个击破之机。这个策略是对头的，但明朝崇祯皇帝和兵部尚书陈新甲却主张速战速决，一再督促洪承畴快快进兵。洪承畴无奈，只得加快进军速度，率大军抵达松山。在城北的乳峰山一带结营扎寨。明军大营连绵不断，马、步军相互掩护，军威颇为雄壮。多尔袞等人与明军几次交战，人马损失了很多，不得不将队伍向后撤退，把守各处要隘地段。这时，锦州城中的明军乘机反扑，夺回了外城。清军接连失利的战报传到了沈阳，沈阳城中人心惶惶，皇太极也是心急如焚。他拖着病体，亲自率领大军驰援前线，要与明军决一死战。

皇太极的御驾亲征大大鼓舞了清军的士气。皇太极以必胜的口吻对将领们说：“我只怕敌军听说我领兵前来便仓皇逃窜了，若是上天保佑，敌军还没有逃走，那么我必定像用猎犬追逐野兽一样击溃他们。”他仔细观察了地形和明军的阵势，把清军布置在松山和杏山之间，切断了明军的粮饷供应，把松山城和城外的明军一并包围起来。两军几经大战，清军又夺取了笔架山的明军军粮，并进一步收紧了包围圈。然后深沟高垒。明军屡攻不胜，又丢失了军粮，很快因军粮匮乏而军心动摇，许多将领都想突围奔回宁远。洪承畴别无他策，也只得孤注一掷，下令全军突围。不料皇太极对此早有算计，各路清军严阵以待。漫山遍野溃逃的明军四处受到封堵截杀，伤亡极为惨重，一部分突围到了杏山的明军在奔向宁远的中途又受到清军的重创。在短短的10天之中，明朝13万大军损失殆尽，被斩杀者就达5.3万多人，只剩下洪承畴率领1万多残兵败将困守在松山城。崇德七年

(1642)，松山城中的明朝副将夏承德降清，松山城失陷，洪承畴被俘。经过皇太极一番耐心的劝降，洪承畴最终叩首归降了清。接着，锦州守将祖大寿见大势已去，也献城出降。随后塔山、杏山相继落入清军手中。历时两年多的松锦战役，皇太极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明朝的精兵良将已经所剩无几，皇太极完全控制了关外的局势。

四、柔情依依 溘然长逝

松锦决战的胜利给皇太极带来了巨大的欢欣，但在决战过程中他的宸妃却突然与世长辞了，这在他的私生活中激起了深深的波澜。提到皇太极的私生活，不能不谈到他的后妃。皇太极身处帝王之位，拥有众多的后妃，仅为他生育过儿女的后妃就达15人之多，为他养育了14个女儿、11个儿子。在他的诸子中，除久经战阵、功绩斐然的长子豪格外，其余的或少年早逝，或才能平庸，事迹平平。

在皇太极身边的后妃中，地位最为尊崇的是清宁宫皇后、关雎宫宸妃、麟趾宫贵妃、衍庆宫淑妃和永福宫庄妃。有点奇怪的是，这5位妇人无一不是满族人，全部都是蒙古族人。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因为皇太极的婚姻有很强的政治色彩。从努尔哈赤时期开始，后金统治集团为了巩固和扩大自己的政权基础，极力谋求同蒙古族结盟，以便携起手来共同对付明朝。他们采取的行动之一就是与蒙古各部联姻。明万历四十年（1612），努尔哈赤迎娶了蒙古科尔沁部明安贝勒的女儿为妻，这是满蒙联姻的开始。此后，许多后金的贝勒大臣都迎娶了蒙古贵族女子，皇太极

后来的皇后也是在努尔哈赤执政时期从科尔沁部迎娶的。

但她 11 年里未曾生养儿女，这使得她本人和科尔沁部的王公们都有些不安。天命十年（1625），孝端文皇后的侄女、科尔沁部贝勒寨桑的女儿布木布泰又由兄长陪送到了后金，被皇太极纳为妃，她就是后来的永福宫庄妃。庄妃在五宫后妃中年纪最小，正当妙龄，并且容貌出众，妩媚动人。据传，明将洪承畴在松锦决战中被清军生擒后，坚决不肯降清。是庄妃的美貌和规劝使他归降了清朝。庄妃为皇太极生了 3 个女儿、1 个儿子，这个儿子便是后来的顺治皇帝福临。庄妃一生历经天聪、顺治、康熙三朝，对清初兴国大业多有贡献。在皇太极离世之后，多尔袞和豪格为登上皇帝的宝座展开了激烈的争夺，两人剑拔弩张，互不相让，并且各自得到了一班贵族的支持。庄妃这时从中施展了巧妙的政治手腕，取得多尔袞的支持，将自己的儿子、五岁的福临立为皇帝。福临的儿子玄烨（后来的康熙皇帝）在即位之初也得到了庄妃的多方指点。庄妃一直活到了康熙二十六年（1687），享年 75 岁，死后被追谥为孝庄文皇后。

但是，在众多的妃子中，最得皇太极欢心的乃是关雎宫的宸妃。宸妃海兰珠是永福宫庄妃的姐姐，晚于妹妹 9 年入宫。为什么会出现博尔济吉特氏姑侄 3 人入宫侍奉一君的情况呢？原来，在宸妃入宫以前，孝端皇后、庄妃都未曾生养男孩，科尔沁部的贝勒却是非常希望将来由本部落妃子的儿子继承大位，以保证本部落的尊崇地位，于是便有了再选佳人入宫的打算。而皇太极则久闻海兰珠生得是天姿国色、月貌花容，且禀性贤淑文静，不可多得，也很愿意将海兰珠纳入宫中。天聪七年（1633），哲哲皇后的母亲科尔沁大妃偕同次妃（宸妃、庄妃的生母）来到沈阳朝

见皇太极，皇太极招待得极为热情。双方在盛宴言欢之际，定下了皇太极与海兰珠的亲事。第二年，海兰珠由兄长吴克善陪同来沈阳与皇太极成婚。婚后，海兰珠倍受皇太极的恩宠，两人是情投意合，相亲相爱。皇太极将一腔柔情都付予了海兰珠，在崇德元年（1636）册封后妃时，海兰珠被封为关雎宫宸妃，地位仅次于清宁宫皇后。

崇德二年（1637）七月，宸妃生下了一个男孩，这是皇太极的第8个儿子。皇太极异常高兴，马上宣布将皇八子定为皇储，并破天荒地颁布了大清朝的第一道大赦令，在金銮殿、清宁宫等处大宴宾客，盛况空前。谁料想，皇八子出生仅半年就突然夭折了。宸妃受不了这个沉重的打击，从此郁郁寡欢，不思茶饭，身体渐渐虚弱下去。

崇德六年（1641）九月，皇太极正在松锦战场上指挥大军对明军展开攻击，忽然传来了宸妃病重的消息。皇太极吃了一惊，将军务托付给将领们，自己启驾奔向沈阳。途中，他特地派大学士希福、刚林等人骑行在前，向宸妃传达自己的问候。17日五鼓时分，皇太极的车驾刚进沈阳城门，就听到了宸妃病逝的噩耗。皇太极的心几乎碎了，来到宸妃的灵柩跟前，他痛悼离去了的心上人，禁不住掩面大哭起来。他下令：对宸妃的丧殓一切都要从厚发送。

宸妃去世后的第二年（1642），松锦决战结束了，清朝逐鹿中原、定鼎九州已成水到渠成之势。可是皇太极却无法完成这一大业了。多年操劳政务和四处征战，已经耗尽了他的精力，宸妃的去世又给他精神上以重大创伤，终于在崇德八年（1643）八月的一个夜晚，在清宁宫内的御榻上离开了人世。

世祖爱新觉罗·福临

爱新觉罗·福临是清王朝的第三位君主，也是清王朝入关以后的第一个皇帝，他能登上帝位是清王朝各派势力相互争斗与妥协的结果。

一、幼年登基 叔父摄政

崇德八年（1643）八月十四日黎明，后金皇宫内纷纷嚷嚷，门外，两黄旗精兵张弓挟矢，层层设防，一派兵戎相见之势。五天前，清太宗皇太极突然病死，此时，诸王大臣们正为王位继承一事僵持不下。

竞争主要在皇太极的长子肃亲王豪格和皇太极的弟弟睿亲王多尔衮之间展开。

拥有皇长子地位又具有实力的豪格一派剑拔弩张、咄咄逼人。势在必得，多尔衮、多铎、阿济格三兄弟战功卓著又拥有两白旗实力，更是轮番上阵、毫不示弱，一场流血冲突眼看就要发生。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多尔衮提出拥立皇太极的第九子福临继位，由郑亲王济尔哈朗和自己共辅国政。这一招确实厉害，选福

临作幼主，堵住了要求立皇子的两黄旗大臣的嘴；提议济尔哈朗作辅政，又拢住了其统辖的镶蓝旗人的心；据有两红旗的礼亲王代善本没有参加角逐的打算，自然顺水推舟地表示赞同。多尔袞的折衷方案被各方通过了。

福临就这样被推上了皇位。从表面上看，他的登基很有些偶然性。但是，多尔袞自然有他的考虑：只有立幼帝，他才能真正掌握辅政大权，这样，具有执政能力的皇长子豪格和年龄较大的皇子叶布舒、硕塞就均被排除在外。几个年幼的皇子中，福临的生母——永福宫庄妃是皇太极晚年最得宠的皇妃，子以母贵，福临承继皇位当最合先帝心意，诸王大臣对此自然也没有异议。

崇德八年（1643）八月二十六日，福临在沈阳正式即位，第二年改元顺治。此时，正值明朝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军攻占了北京城，崇祯皇帝用一根绳索在景山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在这历史转折的紧要关头，降清汉人范文程上书为多尔袞出谋划策，力劝他要趁明朝崩溃而农民军立足未稳之时，不失时机地攻取北京，取明朝而代之。遇事一向敏捷果断的多尔袞，也觉察到此乃千载难逢的天赐良机，因此打起为崇祯帝报仇的旗号，数日之内便聚集起大批兵马，日夜兼程向山海关进发。

三天之后，进军的清军正遇山海关总兵吴三桂迎降，清军顺利进入山海关。不久在古长城的山海关一带，李自成的农民军与多尔袞率领的清军和吴三桂军展开了一场殊死搏斗。在清兵和吴军的夹击下，农民军大败退回北京，由于所剩兵力已难以据守，旋即仓皇撤离。大顺军来去匆匆，在北京城仅仅停留了四十余天，在历史舞台上留下了一幕令人深思的悲剧。由于清军进占北京的最大障碍已不复存在，各地官绅又由于仇恨农民军，因此对

清军望风而降，多尔袞的大队人马便长驱直入开进了紫禁城。

顺治元年（1644）九月，顺治在济尔哈朗护送下由沈阳来到北京。十月初一，举行了隆重的庆祝开国大典。清晨，在诸王及文武百官的护卫下，顺治亲至天坛宣读告天礼文，正式宣告清王朝对全国的统治。随之是大封开国功臣，顺治命令将多尔袞兴邦建国的伟业刻于石碑以传告后世，还封他为叔父摄政王。可以说，尽管在隆重的大典上即位告天的是幼帝福临，但由此而威权并加的却是摄政王多尔袞。

多尔袞清楚地知道：顺治在北京登基，远非真正的中原平定、全国统一。此时，大顺军尚有几十万兵马，各地农民武装更是出没无常、防不胜防。在南京，明朝遗臣奉福王朱由崧建立的南明弘光政权也是威胁清廷的另一支力量。为了清除心腹之患，十月十九日，多尔袞封英亲王阿济格为靖远大将军率部征讨大顺军。紧接着，又命定国大将军豫亲王多铎挥师南下，征讨南明。在清军的剿杀下，大顺军也曾一度进行反攻，但终于丢弃西安，于次年二月进入湖北，阿济格率清军紧追不舍。五月，李自成在湖北九宫山殉难。此后，坚持抗清的大顺军便大势已去了。偏安江南一隅的弘光政权，空有富庶的土地和明朝遗留的几十万人马，却君昏臣奸，大敌当前，还在醉生梦死、自相残杀。多铎的大军几乎是兵不血刃，就于顺治二年四月逼近江南重镇扬州。在顽强抵抗城陷后，面对异族的屠刀，督师扬州的史可法高呼“吾意早决，城亡与亡”，从容就义。由于守城兵士和百姓给清军以重创，多铎遂下令屠城十日以示报复，至五月初二日“封刀”，扬州百姓死亡人数超过了80万，血流成河，惨不忍睹。这就是历史上血腥的“扬州十日”。攻克扬州后，清军很快攻下镇江，兵

临南京城下。此时，弘光帝已仓皇出走，南明大臣多人冒雨迎降清军。弘光帝几天后被俘，在百姓的唾骂声中被解回南京。

平定江南的告捷文书传入京师，这时又传来了李自成遇难的消息，清廷上下欣喜若狂，似乎天下已尽入清军之手。多尔袞显然被迅速得来的胜利冲昏了头脑，他于六月初五日下达了“剃发令”，命令江南各处军民尽行剃发，“倘有不从，以军法从事”。“剃发令”犹如火上浇油，激起了江南人民奋起抗清的斗争。“头可断，发不可丢！”各阶层人民纷纷揭竿而起，打出恢复明朝的旗号。江阴、嘉定先后爆发了规模浩大的反剃发斗争，市民和四乡农民群情激愤，守城抗清，在重创清军后，先后遭清军血洗。满清统治者的民族高压政策激起了反剃发斗争，又进而引燃了遍及全国的抗清斗争，这的确是多尔袞和满清贵族所始料未及的。

直到多尔袞去世，他所期待的天下大一统的局面也没有出现。但是，清朝入主中原、天下初定的首功的确是而非他莫属。随着地位愈加尊崇，他也愈加擅权专断，有恃无恐。他肆无忌惮地排除异己：豪格到底被罗织的罪名置于死地，济尔哈朗也因“擅谋大事”被剥夺了辅政大权。一切政令皆出自多尔袞之手，他甚至将大内的“信符”贮于自己府中。每当他入朝时，诸臣皆下跪行礼，多尔袞是大清国实际上的皇帝，已成为当时朝野皆知的事情。而福临不过是“惟拱手以承祭祀”而已，甚至有记载说为了保全自己儿子的皇位，顺治的母亲孝庄皇太后曾下嫁给了多尔袞。如果说这一点有疑问的话，那么多尔袞被加封为皇父摄政王则是确凿无疑的。

二、少年亲政 治国有方

几年过去了，福临步入了少年。他不仅骑射之术日精，更关心治国用兵之道。但是，顺治的叔父、摄政王多尔衮并没有丝毫归政的意思。历史常常因偶然的事件而改写。顺治七年（1650）十一月，多尔衮出猎坠马受伤。这次受伤后他卧床不起，于十二月初九日在喀喇城去世，享年 39 岁。多尔衮虽中年早逝，但他生前威比天子，富过君王，死后恩义兼隆，荣哀备至，可以称得上是善始善终、结局圆满了。但是，形势很快便出人意外地急转直下。多尔衮死后两个月，苏克萨哈、詹岱首告多尔衮曾“谋篡大位”。以郑亲王济尔哈朗为首的诸王大臣也纷纷上奏，追论多尔衮独擅威权、挟制皇帝、逼死豪格、纳其妃子等一系列罪行。顺治皇帝下诏剥夺了多尔衮的爵位，没收他的财产，又命令毁掉他的陵墓。人们挖出他的尸体，棍打鞭抽，然后砍掉脑袋，暴尸示众。通过这些处置，顺治感到出了一口闷气，多年来他容忍多尔衮的僭妄之举所郁积的种种不快，一下子发泄出来。同时，安抚了诸王大臣的愤怒情绪，并给予那些想继续预政的诸王大臣们一个暗示：想觊觎皇位、欺逼圣上是没有好下场的！

十四岁的顺治此时才成了真正的一国之主。顺治八年（1651）正月十二日，他御太和殿亲政。

由于宫廷中良好的学习条件，顺治六岁时就对读书颇具兴趣，为了学习中国历代帝王的治国修身之道以提高自己的水平，亲政后更奋愤攻读。他以少年人所特有的热情和勤勉，阅读了大量汉文书籍，左史庄骚、先秦两汉、唐宋八大家、宋元著述。后

来，他还曾回忆起这段读书生活。他说，那时除了处理军国大事，便是读书，但因当时顽心尚在，多不能记牢，就五更起来再读，到天大明时便能背诵了。勤奋读书使他摆脱了先辈那种落后民族的草莽之气，而颇具文人学士之风，给他的政策以十分深刻的影响。从此，他不再像自己的先辈一样单靠“武功”治天下，转而以“文教”作为治国之本。

针对多尔袞摄政时期实行的一些弊政，经过与大臣们反复商讨，顺治决定首先采取一些措施缓和民族矛盾，在军事上，他决定首先采取以抚为主的怀柔政策和先西南后东南的战略措施。顺治当时，江、浙、闽、粤一带有郑成功的水师出没，滇、桂、川、黔的大部又被李定国等分据，清军穷于应付，疲于奔命。因此，集中兵力于一隅，改变两个战场同时作战的被动局面，是尽快结束战争再造一统的上策。八旗劲旅娴于骑射，“固习于陆战”。郑成功指挥的三千多艘船只云集在厦门附近的港湾河口，令清兵望而生畏。因此惟有采取先西南后东南的战略才为适宜。为了实现这一战略部署，顺治采取了两项措施：一方面极力争取招抚郑成功，以便集中兵力对付西南战场；一方面任命洪承畴为五省经略，直接负责西南的战争。他还谕令兵部，对各地小股农民武装，不管人数多寡，罪行大小，只要能真心改悔，主动投诚，全部赦免其罪，由当地政府安置。命各级官吏将文告遍布通衢要道，使之家喻户晓。

顺治十年（1653）五月，洪承畴出任湖广、广东、广西、云南、贵州五省经略，总督军务，兼理粮饷。顺治给予他节制升迁地方文武官员、决定进兵时机的大权，特令他遇到紧急情况，可以“便宜行事，然后知会”。这种知人善任、事权划一的作法，有

利于指挥者主动灵活地捕捉战机，为西南战局的根本改观提供了重要保证。洪承畴对皇帝的意图自然心领神会，他谋略很深，又十分熟悉西南的山川形势，到任不久便有了起色。他先是控制了湖广，在南下时机业已成熟之际，适逢孙可望为权欲所驱袭击李定国，后来又走投无路投靠清军。孙可望“开列云贵形势机宜”作为进见之礼，使洪承畴尽知义军内情，遂大举向西南进军。清军相继攻克贵阳、重庆、遵义等地，于顺治十六年（1659）一月进入云南，在永昌磨盘山一带歼灭了李定国主力，桂王朱由榔逃入缅甸。至此，最后一个维系明朝遗民的南明政权已经名存实亡。

西南形势出现根本好转后，郑成功仍在坚持抗清拒不受抚。这时，顺治的态度开始强硬起来。顺治十四年（1657）三月，他下令对郑成功“当一意捕剿，毋复姑待”，一个月后又将其父郑芝龙及其亲属子弟等“俱流徙宁古塔地方，家产籍没”。在顺治的招抚下，郑氏部将黄梧、施琅、苏明相继降清，抗清形势趋于低潮。在这种情况下，郑成功率师东渡，驱逐荷兰殖民者，收复了台湾。持续了近年20的大规模武装反清斗争已接近尾声，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封建王朝终于在刀光剑影中完成了草创。

顺治深知“帝王临御天下，必以国计民生为首务”，为了迅速改变国穷民匮的局面，他十分重视恢复正常的社会经济秩序。顺治十年（1653），他采纳了范文程等人的建议，设立兴屯道厅，在北方推行屯田开荒。在四川等地，则实行由政府贷给牛犂种银，任兵民开垦的鼓励政策。由于当时清政府自身财政困难，无力筹措大量牛种银两，因此收效不大，也未能推行全国。此后，他先后颁发了督垦荒地劝惩则例和官员垦荒考成则例等，鼓励垦

荒。顺治十四年（1657），清政府以明代万历年间的赋役额为准，免除天启、崇祯年间繁重的杂派，不久又编成《赋役全书》颁行天下。政府还向税户发放“易知单”作为缴纳赋税的凭据，以防止各级官吏的加征和私派。第二年，河南巡抚贾汉复奏上了清查垦荒地九万余顷、每年可增收赋银 408000 余两的报告。鼓励垦荒的措施立见成效，使顺治十分喜悦，他对贾汉复大为称赞，并立即加以提拔重用。

圈地，这是多尔袞摄政时期一项很大的弊政。这一时期曾进行了两次大规模的圈地。开始声称只圈无主荒地和明朝勋贵的土地分给满族官兵，实际上随意将民地指为官庄，把私人熟田硬说成是无主荒地，后来索性不论土地有主无主，一律圈占。田地一旦被圈，田主也马上被驱逐，家中一切财物都被占有。许多百姓被搞得倾家荡产，无以为生。被圈的土地中只有少量分给了八旗旗丁，大部分落入皇室王公和八旗官员之手。由于兵役繁重，旗丁的土地往往抛荒不能耕种，由此造成生产的极大破坏。鉴于圈地所造成的严重后果，顺治亲政后便下了严禁圈地的谕令。他认为，田野小民全仰赖土地为生。听说各地都在圈占土地作为打猎、放鹰的往返住所，便迅速令地方官将以前所圈土地全部退还原主，使其抓住时机耕种。后来，他再三重申，永远不许圈占民间房屋和土地。以后，虽然零星圈占土地的行为时有发生，但在顺治期间再没有进行大规模的圈地，这种危及千家万户的滋扰总算暂时中止了。

清朝初年，多尔袞对文武官员的烧杀掳掠、贪污行贿多持放纵态度，造成吏治腐败。这些人奸淫劫掠、刻剥民财、强买强卖、占产索食、私受民词、草菅人命……可谓无恶不作。吏治惊人的

腐败威胁着清政权的巩固和稳定，也影响着与南明的对峙。顺治十分了解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他说，朝廷要治理国家、安抚百姓，首要任务就是惩处贪官污吏。他下达了惩治贪官的谕令，明示臣下。谕令督抚对所属官员严加甄别，对那些扰民的官吏立行参劾。他又派出权力很大的监察御史巡视各地，对违法的总督、巡抚、总兵进行纠举。临行前，顺治亲自召见了他们，对注意事项一一作了指点。不久，漕运总督吴惟华、江宁巡抚土国宝、云南巡抚林天擎等人就因贪污不法苛派累民被革职。巡按御史顾仁辜负圣上重任，执法犯法，“违旨受赃”，被立即处死。据记载，仅顺治九年被革职的贪官污吏就达 200 余人。

顺治的这些努力，虽没有从根本上革除封建官僚机构的弊病，但对稳定清朝初年的统治确有作用，使之在与南明的争战中占据了优势地位。

三、重用汉官 礼遇洋人

顺治很明白，要加速统一中国的进程，巩固大清江山，就必须依靠汉官。在他亲政后，清廷中汉官的地位和作用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原来清廷有一条旧规，汉官在各衙门中不能掌印，即当家不能做主。顺治亲政不久规定，谁的官衔在前，谁就掌印。顺治十二年（1655）八月，都察院署承政事固山额真卓罗奉命出征，顺治即命汉官承政龚鼎孳掌管部院印信。龚鼎孳闻命后，诚惶诚恐，战战兢兢，以一向以满臣掌印上疏推辞。但顺治仍坚持让他掌印。从此以后，汉官掌印才正式作为一种制度确定下来。内阁大学士，起初满人是一品，汉人只是二品，顺治十五年（1658）

改为全是一品。六部尚书起初满人一品，汉人二品，顺治十六年（1659）也全部改为二品。

汉族大学士洪承畴、范文程、金之俊等，既熟悉典章制度，又老谋深算、富有政治斗争经验。顺治对他们都很信任和重用。亲政不久，他就任范文程为原先全由满人出任的议政大臣，使之得到了汉人从未得到的宠遇。他与范文程常在一起探讨如何治理国家的问题。范文程告诉他统治者所实行的政策，要顺乎民心、合乎潮流，并提出兴屯田，招抚流民，举人才不论满汉亲旧、不拘资格大小、不避亲疏恩怨等重要建议，大多被他采纳。他与范文程过从甚密，常在其陪同下“频临三院”，“出入无常”，宫廷内院几乎成了他的“起居之所”，连朝中一些汉官也为之不满，顺治却毫不在意。范文程在他手下屡屡加官进爵，当范文程年老体衰、上疏乞休时，顺治仍然恋恋不舍，命他养好病后再加召用。

顺治重用和宠遇汉官，就是要“图贤求治”，使清王朝长治久安。但是，在他内心深处，仍存在着满州贵族对汉人本能的一种猜忌心理。他最担心汉官结党，因此时时加以防范。顺治十年（1653）四月，大学士陈名夏、户部尚书陈之遴、左都御史金之俊等二十七名汉官联名上疏，要求重治杀害妻妾的总兵任珍。顺治立刻警觉起来，认为陈名夏等人是党同伐异，便令各部七品以上官员云集在午门外，对陈名夏等人议罪，结果，陈名夏等人分别受到降级、罚俸的处分。后来，大学士宁完我又以痛恨剃发、鄙视满族衣冠、结党营私、包藏祸心的罪名弹劾陈名夏，使他终被处决。类似的猜忌、防范乃至加害汉官的事时有发生，但总起来看，顺治对汉官还是信任和重用的，也正是这些人在他统治期间助他一臂之力，使这位年轻的皇帝尚能有所作为。

顺治八年（1651），由大学士范文程引见，福临与汤若望相识了，这位年已59岁、学识高深的外国传教士很快就博得了年轻皇帝的好感和敬仰。这一年，汤若望被诰封为通议大夫，他的父亲、祖父被封为通奉大夫，母亲和祖母被封为二品夫人，并将诰命绢轴寄往德国。不久他加封太仆寺卿，接着又改为太常寺卿。顺治十年（1653）三月，又赐名“通玄教师”。顺治皇帝不仅使他生前尊贵荣耀，连他的身后之事也打算到了。顺治十一年（1654）三月，就将阜城门外利玛窦墓地旁的土地赐给汤若望，作为他百年后的墓穴之所。后来，顺治亲笔书写“通微佳境”的堂额赐给他悬于宣武门内的教堂内，还撰写碑文一篇，刻于教堂门前，赞扬他“事神尽虔，事君尽职”。在顺治的恩宠下，汤若望真可谓是爵位连进，尊荣有加。因顺治的母亲孝庄皇太后认汤若望为义父，他便按满族习惯尊称汤若望为玛法，即汉语的爷爷。

顺治对汤若望这种不同寻常的恩宠，究竟原因何在？他曾经对左右大臣这样说过：“汝曹只语我大志虚荣，若望则不然，其奏疏语皆慈祥，读之不觉泪下。”又说：“玛法为人无比，他人爱我，惟因利禄而仕，时常求恩；朕常命玛法乞恩，彼仅以宠眷自足，此所谓不爱利禄而爱君亲者矣！”

对皇帝的知遇之恩，汤若望感激涕零。因而，他常常直言以谏，为顺治执政出谋划策，充当着心腹顾问的角色。顺治皇帝临终时议立皇嗣，专门征求汤若望的意见。汤若望以玄烨出过天花为由，主张立玄烨为皇位继承人，顺治最后一次遵从了他的意见。

顺治宠遇汤若望，使天主教也得以在华风靡一时。汤若望在中国与西方传教士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使大批传教士涌入中

国，获得了传教的自由。自顺治亲政到康熙初年的十几年中，全国至少有 10 万人领洗入教，而在此之前的 70 多年中，总共才有 15 万人入教。

四、崇尚佛事 废后宠妃

如果说，顺治对天主教的兴趣主要是缘于对其“玛法”汤若望的尊宠的话，那么，顺治对佛事的崇尚，的确是心向往之。

清初，临济宗著名禅僧玉林琇年仅 23 岁就做了湖州报恩寺住持，这在禅门实属罕见，遂为佛子们看重。顺治耳闻玉林琇的大名后，便诏请他入京说法。不料，玉林琇意然摆起清高的架子来，接到诏书后，他先是卧床不起，后来又以先母未葬为借口婉言谢绝。直到第二年，在几经催请下，他好不容易启程赴京，谁知走到天津又称病不行。直到顺治应允他问道完毕立即送归，玉林琇才终于到了北京，得到顺治十分优渥的礼遇。顺治将他以禅门师长相待，请他为自己取法名为“行痴”，自称弟子，还时常亲临玉林琇的馆舍请教佛道。玉林琇也极力以佛教影响顺治，经常讲得皇帝喜悦异常，并因此授给他黄衣、紫纁、银印、金印等，还先后赐予他“大觉禅师”和“大觉普济禅师”的称号。玉林琇的目的在于提高自己的威望，并借助皇权扩大自己宗派的势力，而顺治则从佛教中找到了某种慰藉自己心灵的意念。尽管目的不同，却殊途同归，皇帝和禅僧被佛教紧密联系在一起。

顺治刚满十四岁时，皇太后根据当时摄政王多尔衮之意，选定科尔沁卓礼克图亲王吴克善之女博尔济吉特氏为皇后。顺治八年（1651）八月十三日举行了隆重的大婚礼，奉迎皇后入宫。这

一天，京城内外一派万民同庆的景象。宫内各处御路用红毡铺地，各宫门双喜大字高悬。但是，隆重热闹非凡的婚礼，并没有给皇帝带来美满的婚姻。皇后天生丽质，乖巧聪慧，但是婚后不久，就与皇帝产生了裂痕。顺治对皇后的所作所为很快就发展到不能容忍的地步。两年后将其废黜，降为静妃，改居侧室。博尔济吉特氏为什么被打入冷宫？顺治本人认为她处心不端，非常刻毒，妒忌之心很重，见到容貌稍微出众的人就十分憎恶，必欲置之于死地。对皇帝的一举一动，她无不猜防，以致皇帝不得不别居他处，不与之相见。皇帝一向爱慕简朴，她却癖好奢侈，所穿服装皆以珠玉绮绣缀饰，不知珍惜，进膳时，有一件器具不是金制的，便十分不高兴。对她的所作所为，皇帝忍无可忍，忧郁成疾。皇太后得知其中原由之后就让他酌情裁夺，皇帝由此决定废黜皇后。但是，废后一事并非一帆风顺。顺治虽居一国之尊，但受礼法约束，也不能轻易行废立皇后之举。当废后的打算为大臣们所知后，大学士冯铨、陈名夏等人先后上奏，请皇帝深思熟虑、慎重行事。他们认为皇后正位以来没有什么明显过失，这样轻易废黜，不能服皇后之心，也不能服天下后世之心。假若皇后确实不合皇帝心意，可仿效旧制选立东西二宫。但顺治决心已下，难以更改，经过一番周折后，最终还是废了皇后。从诸大臣当时的奏书看，皇后也未必就如顺治所斥责的那样狠毒不仁，或许就是人们常说的，两个人没有缘份吧。

顺治一生共有后妃 19 人，但他最宠爱的大概就是董鄂氏了。据说，董鄂氏原本是顺治的异母兄弟襄亲王博穆博果尔之妻，却受到顺治狂热的爱恋。博穆博果尔为此对董鄂氏大加申斥。顺治闻知此事后，竟打了弟弟一个耳光。不久，博穆博果尔

怨愤而死，年仅 16 岁。等董鄂氏二十七天丧期服满，顺治便册立她为贤妃，时为顺治十三年，皇帝 9 岁，董鄂氏 18 岁。一个月后又被晋为皇贵妃，颁诏天下。清朝册封妃嫔原来并不颁诏天下，顺治的破例之举足以证明他对董鄂氏的宠爱。皇贵妃之父也极受宠遇，连升三级，并得到大量的赏赐，死后被追封为侯。

董鄂氏曾为顺治生了个儿子，即皇四子，子因母贵，据说皇帝曾准备将他立为皇太子。但不幸的是，他生下三个月后还未命名就夭亡了。事过不久，皇帝眷之特厚、宠冠后宫的皇贵妃也因忧伤过度玉殒香消，时值顺治十七年（1660）。她仅仅陪伴了顺治四年就匆匆离去了。董鄂氏之死使顺治陷入了无法摆脱的痛苦之中。皇贵妃死后，皇帝用蓝笔批本达 4 个多月，而清朝定制，皇帝及太后之丧，蓝笔批本也仅以 27 天为限。顺治既然不能与他心爱的贵妃共享永年，只好以这些殊遇来表达和寄托自己对她的无限爱恋和怀念。他亲自为董鄂妃书制的《董妃行状》洋洋洒洒数千言，追念两人朝夕相处的恩恩爱爱。为了抚慰顺治，太后同意追封董鄂氏为皇后，即孝献皇后。

尽管顺治以种种特殊待遇对待死去的宠妃，却没有使他哀痛至极的心情得到慰藉。此后，他的情绪日益消沉，本来就很孱弱的身体，越发显得力不能支了。

顺治十八年（1661）正月初二，顺治亲往悯忠寺观看亲信太监吴良辅的削发出家仪式，回宫后便卧床不起，染上了可怕的天花。立嗣顿时成了当务之急。孝庄文皇太后一向对皇三子玄烨刻意培养，寄予厚望，坚持立他为皇太子。顺治派人征询汤若望的意见，他的意见与太后相同，本想立次子福全的顺治只好同意了这个意见。自知死期将近，顺治召诸王贝勒和众臣前来宣布遗

诏，在遗诏中他宣布由八岁的玄烨继承皇位，由异姓功臣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鳌拜四人辅政。

遗诏念罢，顺治也一命归天，年仅 24 岁，他在位 18 年，亲政 11 年。颇具个性的顺治被谥为“章皇帝”，庙号“世祖”。

清圣祖爱新觉罗·玄烨

一、少年老成 智除权奸

玄烨是顺治皇帝的第三个儿子，生于顺治十一年（1654）三月十八日。他的生母叫佟氏。佟氏的祖父佟养真跟随清太祖努尔哈赤兴兵抗明，是清朝的开国功臣。她的父亲佟图赖是汉军正蓝旗人，也屡建战功。佟氏家族也因此成为八旗汉军中显赫一时的名门大族。顺治皇帝为了缓和民族矛盾，改变在蒙古贵族中选妃的习俗，开始在汉军中选妃后，佟氏被选入清宫。但佟氏不受顺治宠爱，因此，玄烨也遭顺治帝的冷落。

值得庆幸的是，玄烨的祖母孝庄皇太后对玄烨母子格外钟爱。她派自己的侍女苏麻喇姑协助保姆照看玄烨，教他读书写字。她还经常亲自对玄烨加以教诲。祖母的教诲犹如春风化雨滴入幼年玄烨的心田，这不仅在一定程度上补偿了他所渴望的父爱，更重要的是培育了他日后作为帝王不可缺少的品质。

尽管孝庄皇太后一直在用未来君主的标准培养玄烨，但顺治却一心一意要让宠妃董鄂妃所生的四皇子做太子。但谁曾想，

皇四子福薄命浅，才3个月便夭亡了。从此，玄烨的处境才有了好转。玄烨6岁时，同哥哥福全、弟弟常宁一同进宫拜见顺治。向父皇请安完毕，顺治便问儿子们有何志向。常宁年仅3岁，不会回答。福全为庶妃所生，年纪长但地位低，他答道：“愿意做一个贤王。”而玄烨则高声回答：效法皇父，勤勉尽力。顺治知道这是太后的授意，开始有了由玄烨继承皇位的想法。两年后，年轻的顺治皇帝一病不起，在孝庄皇太后的坚持下，顺治立下了以玄烨为皇太子的遗诏。

顺治十八年（1661）正月初九，玄烨在孝庄皇太后的亲自主持下，登上皇位，改次年为康熙元年。孝庄皇太后由此又担负起辅佐第二代幼主——康熙的重任。康熙即位第5天，她便向王室宗亲、文武大臣发出谕旨：要报答我的儿子顺治皇帝的恩情，就要偕四大臣尽心协力共辅幼主，这样才能名垂青史。太后的威严与对皇孙的深情溢于言表。四大臣辅政，也是孝庄皇太后同顺治反复考虑后采取的新体制。按清代旧制，由宗室诸王辅佐幼主处理政务。但太后对顺治初年睿亲王多尔衮摄政后独断擅权的往事记忆犹新，所以一改旧制，让元老重臣佐理政务，而把决策权抓在自己手中。除此之外，太后把更多的精力放在指导康熙学习执政上。她谆谆教导康熙，不辜负百姓的期望，宽裕慈仁，慎言谨行，继承祖先基业。

康熙即位时，还不满8岁。他尽管在祖母悉心培育下大器早成，但担负管理国家的重任还为时过早。好在顺治在遗诏中已作安排，委托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和鳌拜辅政。四大臣在顺治帝的灵位前曾立下誓言：要竭尽忠诚，不谋私利，不结党羽，不受贿赂，忠心仰报皇恩，全力辅佐君主。四大臣中的索尼、鳌拜

和遏必隆都是两黄旗人，是跟随清太宗南征北战的元老勋臣，后来又拥立年幼的顺治皇帝即位。多尔衮擅权时，由于他们忠于顺治，被视为眼中钉，先后被革职、削爵并籍没家产。直到顺治亲政，他们才复了职，并且进一步受到重用。四大臣中的苏克萨哈虽是多尔衮属下的近侍，但他在多尔衮去世后，检举多尔衮殡葬服色违背祖制并企图谋反的罪行，深得顺治帝和太后的信赖。长期以来，他们对顺治和太后忠心耿耿，所以能以异姓臣子的身份位居宗室诸王贝勒之上，担起辅佐幼帝康熙的大任。

辅政之初，四大臣遇事协商，凡欲奏事，一同进谒皇帝或太后，待太后决策后，再由他们以皇帝或太后的名义发布谕旨。辅政大臣虽无决策权，但他们可以入直、票拟并代幼帝御批，后来鳌拜专权乱政就钻了这个空子。

鳌拜是镶黄旗人，是清朝开国元勋费英东的侄子。显赫的门第和卓著的战功使他青云直上，位至公爵。鳌拜野心勃勃，善于玩弄权术，骄横跋扈，人多惮之。身为四朝元老的索尼尽管德高望重，这时已年老体弱，力不从心了。遏必隆为人怯懦，没有主见，又加上与鳌拜同属一旗，利害相关，所以总是随声附和。苏克萨哈虽然在四大臣中仅居索尼之次，但他资望浅，又与索尼素有嫌隙，与姻亲鳌拜也时常反目，常常在辅臣中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这样，协商辅政的局面不久便被打破了，大权逐渐落到了一心独揽朝政的鳌拜手中。他任人唯亲，广置党羽，不断扩大自己的势力。大学士班布尔善、吏部尚书噶褚哈、工部尚书济世都是他安插在要害位置的亲信。遇到政事，他们常常私定对策，然后才上奏皇帝，甚至拦截奏章，阻塞康熙同臣下的直接联系，以便把持朝政，架空幼帝。

康熙六年（1666年），鳌拜为对自己的正白旗有利，执意调圈已耕作了几十年的旗地，引起土地荒芜和民怨沸腾。户部尚书苏纳海、总督朱昌祚、巡抚王登联名上书反对，鳌拜大怒，硬逼康熙同意处死三人，但未能得逞后，竟矫旨将三人绞死。

索尼看到岁鳌拜如此跋扈，深感愧对先帝的重托而又无能为力。因此在康熙14岁时就多次上书要求康熙亲政，以削夺鳌拜的权力。

康熙得到祖母太皇太后的允许，按照祖制遂于康熙六年七月初七举行亲政大典。康熙亲政前，索尼已去世，鳌拜的野心进一步膨胀，想越过苏克萨哈和遏必隆，占据索尼的位置，进而成为宰相，更加大权独揽。于是，他拉拢苏克萨哈推荐他，遭到拒绝。旧恨新仇使鳌拜立意除掉苏克萨哈。苏克萨哈自知斗不过鳌拜一伙，为了免除杀身之祸，欲激流勇退，故上书请求去守候先帝陵寝。康熙不理解苏克萨哈的行动，一面派人去询问原因，一面请议政王大臣会议议处。鳌拜怕苏克萨哈的要求一旦获准，自己也要效仿他交出辅政大权，便给苏克萨哈罗织了心有怨恨等24条罪状，必欲处以极刑。议政王大臣会议在鳌拜的操纵下，奏请将苏克萨哈凌迟处死。收到奏章，康熙十分震惊。他认为苏克萨哈是前朝重臣，又勤勤恳恳辅佐七载，理应酬报，又何罪之有？他当即召见议政王杰书和鳌拜、遏必隆等人，指出复奏有误。鳌拜先发制人，强词夺理地说：“我同苏克萨哈本来没有什么怨仇，只是他欺君罔上，才秉公而断，要对他重重治罪。不然，再有人学他的样子就不好办了。”康熙说：“欺君罔上的人眼下不是没有，苏克萨哈还是守规矩的。”康熙不允鳌拜所请，鳌拜恼羞成怒，瞋目挥臂，连日在金殿上强奏，他的党羽们也亦步亦趋，为

虎作倖，终于威逼年少的康熙下了绞死苏克萨哈的命令。面对鳌拜的步步进逼，康熙已经忍无可忍了。但康熙深知鳌拜党羽众多，势力很大，加上他是武将出身，有一身好武艺，不是轻易能制服的，如果稍有不慎就会祸及自身，因此，他在暗中加紧了除掉这个权奸的筹划。由于现有的侍卫大多受鳌拜控制，不甚可靠，康熙第一步先从各王府中挑选了上百名亲王子弟做他的侍卫，组成善扑营，整天让他们摔跤弄拳，不出一年，便个个练得武艺高强。鳌拜听说此事，以为皇帝年少贪玩，并未放在心上。第二步康熙又封鳌拜为一等公，鳌拜更觉得平安无事了。第三步任命索额图为一等侍卫。索额图是索尼的儿子、康熙的叔丈人，他同康熙以下棋为名，制定了擒拿鳌拜的整体方案。为了保证行动万无一失，康熙事前把鳌拜的党羽先后差遣出京办事，他又召集善扑营成员进行动员。康熙问大家：“你们惧怕皇上还是鳌拜？”侍卫们齐声答道：“独畏皇上！”这一天，康熙召鳌拜单独进宫议事，鳌拜像往常一样大摇大摆地走进宫内，只见康熙端坐中间，两旁是威风凛凛的少年侍卫。鳌拜见势不妙，还想故伎重演，大发淫威，不料康熙一声令下，少年侍卫们一拥而上，七手八脚便拿下了鳌拜。这个横行数年、权倾朝野的权奸顿时成了阶下囚。康亲王杰书奉康熙的命令审讯了鳌拜。不久，便公布了鳌拜结党专政的30条罪状。最后念其当年搭救清太宗皇太极有功，赦免了他的死罪，让他在监禁中度完了余生。康熙还依据罪行轻重惩处了鳌拜的党羽，罪大恶极的济世等人被处死，其余的被革职降级。与此同时，受鳌拜诬陷的苏纳海等人得到了昭雪。苏克萨哈的后人承袭了他的爵位和世职。康熙对各级官员大规模进行了调换，并下达了《圣谕十六条》，意在刷新朝政，彻底清

除鳌拜的恶劣影响。

年仅 16 岁的康熙在战胜鳌拜集团的斗争中，显示出惊人的魄力和才智。从此，他便将朝政大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开始充分施展自己的政治才能。

二、力平三藩 收复台湾

康熙亲政后，经过一番考虑，将当务之急的治国大事列出，然后亲自书写了“三藩、河务、漕运”的条幅悬挂在宫中柱子上，以随时提醒自己。由此可见解决三藩是康熙朝夕不忘的首要大事。三藩，是指明朝降将吴三桂、尚可喜、耿仲明三个藩王，他们分别盘据在云南、广东、福建三个省区。三藩王在明末清初先后降清，为清兵入关立下了汗马功劳。吴三桂被封为平西王，尚可喜和耿仲明也分别被授予平南王和靖南王的封号。

尚可喜因为年老多病，已把藩事交给儿子尚之信主持。尚之信残忍狂暴，酗酒嗜杀，连老子也不放在眼里。他曾经割下行人的肉喂狗，甚至无故刺死尚可喜派来送信的宫监取乐。尚可喜担心儿子早晚会闹出事来，同时也不甘心受他的挟制，便在康熙十二年（1673）春上书，请求回辽东老家养老，早已有撤藩打算的康熙遂命令撤掉尚藩，将其全部兵士撤回原籍。消息传来，吴三桂和已承袭靖南王爵号的耿精忠（耿仲明之孙）都惊恐不安，他们也上书假意要求撤藩，来试探朝廷的动向。

康熙召集了众臣议定撤藩之事。大部分人持反对意见。他们提出了种种理由：有的认为移藩后要派军队去原藩地镇守，劳费太大；有的为吴三桂说情，说他镇守边关，地方安定，没有谋乱

的征兆。议政王贝勒大臣们也议论纷纷，莫衷一是。只有兵部尚书明珠、户部尚书米思翰、刑部尚书莫洛等少数人坚决主张撤藩。二十岁的康熙皇帝力排众议，做出了最后裁决：“从其所请，将三藩全部迁到山海关外。”他指出，三藩王手中都握有重兵，已形成了尾大不掉之势，吴三桂等人怀有野心，蓄谋已久，如果不及早除掉三藩，势必养虎成患，危害天下。于是，康熙派侍郎折尔肯、学士傅达礼赴云南，户部尚书梁清标赴广东、吏部侍郎陈一炳赴福建，催促办理撤藩事宜。

吴三桂当年为报家仇勾引清军入关屠杀农民起义军，使清兵得以长驱直入。他事明叛明，降清又心怀异志。镇守云南后，吴三桂利用独占一方的特权，招降纳叛，横征暴敛，不断扩充实力，在三藩中势力最大。他的野心也随之膨胀起来。他以藩府名义任命的官员，吏、兵二部不得干预，他推荐的被称为“西选”的官员遍及天下。凡要害地方，他都千方百计安插进自己的死党。他的儿子吴应熊被召为皇太极之女的额附（即驸马），从而成为吴三桂安插在京城的耳目。吴三桂属下有 53 佐领、士兵 1.2 万多人。每年朝廷向吴藩支付的俸饷就达 900 多万两白银。吴三桂还自行征税、开矿、铸钱，与西藏互市茶马，聚敛财富，秣马厉兵。诡计多端的吴三桂在加紧准备叛乱的同时怕露出马脚，遂大兴土木，搜罗美女，做出安于享乐、胸无大志的样子来麻痹视听，暗中加紧操练，待机而动。

康熙十二年（1673）冬，吴三桂认为时机已到，遂自封为“天下都招讨兵马大元帅”，举起“兴明讨虏”的旗帜，公开叛乱。

吴三桂公开叛乱后，他分布在各地的党羽纷纷响应。各地的告急文书频频传至京城，举朝震惊。原来反对撤藩的人乘机诋

毁，认为吴氏叛乱是撤藩引发的。大学士索额图竟要求杀主张撤藩的明珠等人以谢叛逆。年轻的康熙皇帝临危不惧，严厉驳斥了这些护藩的论调。他说：“三藩势焰日炽，撤亦反，不撤亦反，因此决不仿效汉景帝诛晁错以平七国之乱的做法。”随后，康熙下达了武装平叛的命令。

这时其他两藩也举起了反旗，一时战火燃遍了大半个中国。康熙认为吴三桂是三藩之乱的祸首，灭掉吴三桂，其他叛军就会不打自散，于是他确定了重点打击吴三桂的策略。康熙任命勒尔锦为靖寇大将军，命令他由湖南进剿叛军，严防叛军东犯湖广；又派将军瓦尔洛进驻四川，断绝叛军入蜀之路；同时命莫洛率兵驻扎西安，阻止叛军进兵西北。

曾经嚣张一时的吴三桂在康熙周密的布署和接连打击之下，见大势已去，还想垂死挣扎，急急忙忙演出了登基称帝的丑剧。康熙十七年（1678）三月，吴三桂派人在衡阳草草修建了百余间庐舍，用黄漆涂刷房顶权做皇宫。三月十八日，吴三桂匆匆登上了临时搭成的祭坛祭祀天地，改国号为周，但是，吴三桂彻底扔掉“复明”的遮羞布，将自己的狼子野心更大白于天下，处境不仅没有好转，反而更加孤立。此时，清军的攻势更加锐不可挡，吴氏小王朝日益陷入内外交困的境地。年已 67 岁的吴三桂惶惶不可终日，突患中风噎膈症死去，仅仅做了不到 5 个月的“皇帝”。吴三桂死后，由儿子吴世璠继皇位。

康熙十九年（1680）年，康熙下令清军分三路进军吴三桂的老巢云南，向叛军发起总攻。不久清军攻入云南，将叛军的老巢昆明包围的水泄不通，守军大都投降，吴世璠走投无路，最后只好穿戴着皇帝衣冠服毒自杀。康熙二十年（1681），历时八年、祸

及大半个中国的三藩之乱终于被平定了。

三藩之乱被平定后，康熙决意收复台湾。当时统治台湾的是郑成功 12 岁的孙子郑克塽。

明末国势衰败，兵备废弛，台湾岛遂被乘虚而入的荷兰殖民者占领。康熙元年（1622）二月一日，仍在坚持抗清的郑成功收复了被侵略者霸占 38 年的台湾。就在这一年，郑成功之子郑经在属下的拥立下自称为王，统兵反对郑成功。年仅 39 岁的郑成功在病中突然遭受如此沉重的打击，忧愤而死。三藩之乱中，郑经曾与耿精忠合谋进攻广东，约定事成后平分秋色。耿藩降清之后，郑经仍旧纠合部属骚扰沿海一带，烧杀抢掠，一派海盗行径。郑经这时已经背弃了郑成功据台抗清复明的初衷。以后在清军的打击下，郑经很快在东南沿海失去了立足之地，率部回到台湾。康熙二十年（1681）郑经死后，他的长子即位，但不久就被侍卫冯锡范等人绞杀。冯锡范又拥立自己的女婿、郑经的幼子郑克塽为王，篡夺了大权。此时，郑氏集团已经失去了人心，台湾政局动荡不安。

三藩基本平定后，康熙接受了福建总督姚启圣的建议，决定乘郑氏集团内乱的时机用武力收复台湾。康熙用武力收复台湾的决心已下，任用得力的军事将领便成了当务之急。姚启圣曾经多次保举郑成功旧部施琅任福建水师提督，后来施琅又得到别的大臣的大力推荐。但由于施琅为降将遭到不少非议，康熙力排众议，于康熙二十年（1681）七月向议政大臣们郑重宣布：任命施琅为福建水师提督，加封太子少保。

施琅走马上任后，立即着手调整兵力，训练水师。为了等待适当的时机，出师时间一拖再拖，转眼到了康熙二十一年

(1682)，一时群言四起。这期间，施琅与姚启圣又在进剿安排上意见相左，施琅三次上书要求授予他专征权，由他统领军队自行进剿。尽管康熙对一再推迟出兵也有不满，但他没有被舆论左右，考虑到海战须蹈不测风浪，事先很难猜度，他采取了十分慎重的态度。他用人不疑，为了确保战斗胜利，同意了施琅的请求，给予他专征大权。

康熙二十二年（1683）七月，施琅率领两万多名官兵，分乘230多艘战船，直捣澎湖。清军战舰云集海面，争先恐后进攻，反而影响了攻势，又赶上潮落风逆，施琅的指挥船顺流而下，陷入重围。提督銜署右营游击蓝理奋不顾身地冲入重围，与施琅合力攻打，四艘敌船被打沉。激战中，蓝理被炮火击中，肠子流出，但稍加包扎，又投入了战斗。施琅也不顾自己血流满面，仍然指挥着战船突围。初战失利后，施琅对水师进行了短期整顿，遂与郑军展开了决战。清军船队以5只船为1个作战单位，称为“五梅花”战术，相互配合默契，以5打1造成局部优势进击敌船。战斗从清晨一直持续到傍晚，矢石如密集的雨点，炮火遮住了天空。经此一战郑军主力几乎全军覆没，台湾的门户被打开了。困守孤岛的郑克塽见大势已去，不得不派人向清军送上降表。收到降表，康熙认为：如果不准许其投诚，郑军残部还可能流窜他处制造事端，不如招抚为善。他还决定对归降的郑氏大小官员加恩予以安置。康熙的谕旨打消了郑克塽最后的疑虑。八月十三日，施琅率领的清军在鼓乐声中登上台湾岛，郑克塽率属下列队恭迎。至此，台湾又回到了祖国的怀抱。

台湾回归后，围绕台湾的弃守朝廷中又出现分歧。有人以台湾孤悬海外为理由，主张把台湾人全部迁进内地，放弃台湾。有

人竟然主张把台湾赐给荷兰人，令其世守输贡，以示圣朝天威。施琅为此专门在台湾进行了实地考察，据实据理驳斥了弃台的论调。他上书康熙，力陈台湾为江、浙、闽、粤四省安全的要害，为东南之保障，弃之必酿成大祸，留之则永固边防。因此，台湾不仅不能放弃，还必须加强防务。康熙接受了施琅的建议，在台湾设立台湾府和台湾、凤山、诸罗三县，并向台湾派遣了 8000 名驻兵，向澎湖派遣了 2000 名驻兵。这样就大大增强了东南海防，并且促进了台湾经济文化的发展。

三、激战雅克萨 平定噶尔丹

东北地区一直被满族视为祖先的发祥地。十七世纪，沙俄将侵略魔爪伸向了这块肥沃的土地。沙俄的侵略，是康熙的心腹大患。亲政以后，他便密切注视着沙俄的侵略活动，多次派人了解东北地区的地形、交通及风土人情各方面的情况。但由于当时先是明末农民起义未平，后又有三藩之乱，康熙对沙俄侵略的反击还顾不上。康熙二十一年（1682）春，三藩之乱刚被平定，康熙率文武大臣赴盛京告祭祖陵。大典之后，他立即巡视了乌喇地区（今吉林市），并率属下围猎习武；还泛舟检阅了水师。开始了武装抗俄的准备，同时他也没有放弃和平解决中俄边界争端的努力。

但几经接触，沙俄政府无意进行和谈，反而趁清政府全力平定三藩收拾残局，收复台湾等用兵之际，扩大了对中国北方领土的侵略。在沙俄无意和谈而且侵略活动日益扩大的情况下，康熙决定进行武装反击，驱逐沙俄侵略者。康熙二十一年（1682），康

熙派郎谈、彭春以捕鹿的名义到前线实地勘察地形，调查沙俄的侵略活动。次年，康熙又决定派兵于第二年秋天到黑龙江流域永久驻守。开赴黑龙江地区的清军受到当地各族人民的欢迎和支持。军民共同打击沙俄侵略者，到康熙二十二年（1683），黑龙江流域中下游地区的沙俄侵略者基本被肃清，只有雅克萨还被沙俄侵略者盘踞着。

在黑龙江地区各族人民的支持下，清军为收复雅克萨做了大量准备。在清军进攻雅克萨前遵照康熙的谕旨，清政府向沙俄一再表示和平解决边界问题的愿望，但沙俄方面置之不理，仍然继续在雅克萨进行战争准备。康熙二十四年（1685）六月，清军兵临雅克萨城下。

六月二十四日，彭春率领的 3000 大军分水陆两路夹击雅克萨城。第二天清晨，清军派出林兴珠的藤牌兵阻击来自黑龙江上游的哥萨克援兵。藤牌兵头顶藤牌，裸身入水，手持大刀前进。由于有藤牌遮蔽，敌人的刀枪无法施展威风，清兵的大刀却所向无敌。敌人见状，又惊又怕，大喊着“大帽子鞑子来了”竞相逃命。大部分援敌就这样被藤牌兵击溃了。当晚，清军发动了猛烈的攻势。他们在城南佯攻，牵制敌人的兵力；又在城北架起红衣大炮进行主攻。经过一夜激战，雅克萨的塔楼、城墙全被摧毁，还击毙了 100 多名敌人。城内还聚集了一小撮顽敌，于是清军在城下三面堆积柴草，准备焚城。走投无路的侵略者被迫向清军投降，他们的头目托尔布津还向清军统帅立誓，永远不再来雅克萨捣乱。遵循康熙的旨意，清军统帅彭春接受了敌人的投降，将他们免死放归。有 45 人自愿留在中国，也得到了准许。这些曾经在中国的土地上横行多年、杀人越货的“罗刹”，如今在中国军

民的打击下，一个个赤身露体，光着脚狼狈逃离了雅克萨。降敌离去后，清朝将雅克萨城堡彻底摧毁，撤回了瑷珲。

但是战火刚刚平息，托尔布津等残匪便纠合了尼布楚方面的援军卷土重来，又窜回雅克萨。他们在原城堡的附近重新构筑了工事，妄图永久霸占这块中国的领土。消息传到北京，康熙立即命令清军速备战船再攻雅克萨。他又亲自召见郎谈，作了战斗的具体部署，要求清军全部彻底地消灭雅克萨守敌，然后在雅克萨驻兵把守。

康熙二十五年（1686）七月，第二次雅克萨之战开始了。清黑龙江将军萨布素率领 2000 大军，从水陆两路向雅克萨发起猛攻。与此同时，康熙皇帝继续向俄方提出举行谈判的建议。清军在雅克萨城外挖掘工事、建立堡垒围困敌人。城中出击的敌人多次被清军击溃。经过两个月的激烈战斗，敌人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城中只剩了 100 多个残兵败将，托尔布津也被击毙。清军在城的南北两面修筑炮台，准备炮轰雅克萨。此时，清军的胜利已是指日可待了。迫于清军的强大攻势，俄方不得不同意通过谈判和平解决边界问题。清军遂于这年的十二月十日解围，等待两国的谈判。

双方全权代表在经过多次谈判，中国做出了一些让步之后，康熙二十八年（1689）九月七日，中俄双方达成了和平解决边界问题的协议，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尼布楚条约》。《条约》明确规定，以外兴安岭至海、格尔必齐河和额尔古纳河为中俄两国的国界，确认了黑龙江和乌苏里江流域都是中国的领土。中国将尼布楚割让给俄国。条约的其他条款还就两国贸易、边民等事宜做了规定。条约的内容，曾用满、汉、蒙、俄、拉丁五种文字刻成

界碑，高高竖立在中俄边界上。它带来了中俄东部边境 100 多年的和平，也成为康熙抵御沙皇侵略、维护和平和国家主权的历史记录。

康熙收复雅克萨之后，立即着手平定噶尔丹分裂祖国的叛乱。噶尔丹是漠西厄鲁特蒙古准噶尔部的头领。康熙十年（1671），噶尔丹夺取了准噶尔部的统治权后，又用武力并吞了厄鲁特蒙古的其他各部，占领了青海和新疆天山以南的广大地区。当时，我国蒙古族除了漠西厄鲁特蒙古外，还有漠南蒙古和漠北喀尔喀蒙古。漠南、漠北蒙古分别居住在内蒙和外蒙，早就归顺了清朝。为了吞并喀尔喀蒙古，噶尔丹自康熙十三年（1674）起，便经常派人到沙俄进行秘密活动，寻找靠山。长期以来，沙俄就伺机将侵略魔爪伸进厄鲁特各部，但是他们的武装入侵和诈骗活动一直未能得逞。这时，他们与噶尔丹的叛卖活动一拍即合，相互勾结起来，准备攻打喀尔喀蒙古。

康熙二十七年（1688），噶尔丹向喀尔喀蒙古发动了突然袭击。他配合沙俄侵略者，击溃了土谢尔汗的蒙军，将库伦城化作一片废墟。在追击喀尔喀蒙古的途中，噶尔丹叛军大肆烧杀抢掠，人们丢下帐篷器具、马驼牛羊，昼夜不停地向南逃命，一时死者相枕，道路为之堵塞。这时沙俄乘机胁迫喀尔喀蒙古的上层人物叛国投俄，遭到了宗教首领哲布尊丹巴等人的坚决抵制。在哲布尊巴丹的率领下，喀尔喀蒙古归附了清朝。康熙派人抚慰了来归的喀尔喀部，发给他们生活用品，将他们暂时安置在科尔沁草原。康熙二十九年（1690），噶尔丹以追击喀尔喀蒙古为名，再次发动武装进攻。他带领的两万名叛军自呼伦池南下，杀进了内蒙古地区。叛军的前锋一直打到距离北京仅九百里的乌珠穆沁，

京师震动，许多店铺停止了营业。

对噶尔丹的叛乱，康熙曾经给予多次规劝，要求他罢兵息战，归还喀尔喀蒙古的故地。同时也加强了塞外的兵力，做了武装平叛的准备。面对更加严峻的局势，康熙决定亲征噶尔丹，捣毁叛军的巢穴。当时朝中多数大臣主张同噶尔丹妥协。他们认为噶尔丹地处僻壤，他的叛乱无碍大局，应当治以不治，任其自然，同时大军远征茫茫沙漠，胜负很难预料，因此反对康熙亲征。康熙则认为噶尔丹一日不除，边陲就一日不宁，只有平定叛乱，才是万年之计。他排除了各种干扰，为保天下大一统的局面，毅然率军亲征。

康熙二十九年（1690）六月，康熙亲临塞北，指挥大军迎战噶尔丹。八月，清军在乌兰布通与叛军交战。噶尔丹依山面水布下“驼城”，用来抵挡清军的攻势。“驼城”是将骆驼捆绑卧地，在驼背上堆放箱垛，再加盖湿布布置而成的。叛军满以为“驼城”坚不可摧，易守难攻。可是在清军猛烈的炮火攻击下，骆驼非死即伤，反而成了叛军逃跑的障碍。驼阵被攻破了，清军大队人马掩杀过来，直杀得叛军横尸遍野，大败而逃。噶尔丹带着残兵败将，好不容易才突出重围。以后康熙又经过二次亲征，终于平定了为时10年的噶尔丹叛乱，粉碎了沙俄分裂中国的阴谋，巩固了西北边疆。

四、整饬吏治 广揽人才

康熙深知，贪官污吏的勒索和压榨是激起民变的直接原因。为了清王朝的长治久安，他十分重视整饬吏治。他采纳了“民生

安危视吏治，吏治贪廉视督抚”的建议，特别注意处置腐败的高级官吏。

山西巡抚穆尔赛一贯贪酷不法，康熙对他的劣迹也时有所闻。一天，康熙向大学士勒满洪等人查询穆尔赛为官是否清正，他们竟徇私包庇，欺骗圣听，妄图掩盖穆尔赛的丑行。康熙对外官与京官相互勾结、贪赃枉法的现象早已深恶痛绝。所以在查明穆尔赛的罪行后，不仅将他革职收审，判处绞刑，还给勒满洪等人连降两级的处分。

湖广总督蔡毓荣在平定三藩时任绥远将军。接受攻打吴氏巢穴昆明的命令之后，他按兵不动；等他人攻破城池，他反而大肆抢掠本应充公的吴氏财物，然后对贵戚重臣广行重贿，将他人战功贪为己有，由此竟然升官进爵。蔡毓荣的罪行败露后，也受到了严惩。

在惩治贪官的同时，康熙多方扶持清官廉吏，大加褒扬，以起到移风易俗、扶正抑邪的作用。但在当时贪风盛行的官场上，为政清廉者实属凤毛麟角，因此康熙一朝大树廉吏的榜样。被康熙誉为“天下廉吏第一”的于成龙就是一个受百姓爱戴的清官。早在顺治朝任广西罗城知县时，于成龙便插棘为门，累土为几，他清贫的生活和卓著的政绩一时传为佳话。康熙十四年秋天，黄州发生了严重的自然灾害，于成龙发放的赈济粮救活了几万灾民的性命。后来他离开黄州赴福建按察使任所时，几万黄州百姓送行到九江，哭声与江涛声连成一片。于成龙的廉能勤政，深得康熙赞许。康熙二十年，他特地在懋勤殿召见于成龙，称他为“当今清官第一”，还赏赐白金、良马、御诗等，勉励他始终如一，保持气节。于成龙自此为政更加勤勉，常常通宵达旦。他善于微服

私访，升任两江总督后，属下官吏不敢为非作歹，不久江南风气大为改观。但是，深受康熙信任、政绩卓著的于成龙后来受挟私报复者陷害，被迫离任。康熙又特下诏令留任。他去世后，遗物只有一袭棉袍和一些盐豉。康熙始知于成龙的确一生廉洁，所谓后来变更素行的说法纯系欺罔之语。为官清正反遭非议，康熙感慨不已。为了使廉风发扬光大，他特地为于成龙题了“高行清粹”四个大字。

康熙对于成龙的去世十分痛心，他询问廷臣：“当今像于成龙这样清廉的还有几人？”廷臣当堂举荐了张鹏翮等七人。康熙南巡经过张鹏翮的任所兖州府，发现果然名不虚传，从此一再提拔重用。陈王宾是康熙晚年时出现的清官。他认为，贪取一钱与取千百万金没有什么差别。因此，他的衣食住行都十分俭朴，对不义之财分文不取。他独自骑马带着行李到山东首府济南赴任，官吏们谁也没有认出他就是新任巡抚。康熙称他为苦行老僧，并说：“陈王宾出身非世家大族，又没有门生故旧，天下人对他的清操交口称誉，不是确有实事，哪能名闻遐迩？”因此，康熙在他病故后追授礼部尚书，荫一子入监读书，以表示对清廉之臣优礼有加。

由于康熙对整饬吏治坚持不懈，不断清除贪官，褒扬清官，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但是当时的官吏日渐腐败，加上俸禄也确实偏低，已经积重难返，康熙费尽心力进行的察吏，也只能是小修小补，并不能从根本上扭转当时的政风。

康熙统治初期，尽管各地的反清斗争已经被基本镇压下去，但是民族矛盾仍然相当尖锐。三藩之乱就带有明显的民族色彩。尤其还有相当多的汉族知识分子采取不合作态度，这一切都构成

了对清王朝的潜在威胁。康熙认为，士为四民之首，要争取民心，扭转汉族人民的反清情绪，关键在于促使汉族知识分子转变反清立场。于是，康熙采取了种种措施争取和笼络汉族知识分子。

他首先从尊重汉族历史传统与儒家文化开始。例如在他南巡时，曾多次亲自拜谒明太祖的陵墓，并亲笔写了“治隆唐宋”的匾额，悬挂在陵殿前。他还提出要查访明室后代，授予官职，让其看守陵墓。后来没有查到，便改派清朝官员按时致祭。他还亲临孔庙祭祀，对孔子的后裔大施恩宠，从感情上对汉族士大夫进行笼络。

除了进行传统的科举考试外，康熙还于康熙十七年（1678）特设“博学鸿词科”，千方百计吸引明代遗老及各种人才参政。康熙还要求各级官员都要将自己知道的学行兼优之士举荐给朝廷，以便他亲自考察录用。经各地官吏推举，有143人参加了康熙十八年（1679）的体仁阁考试。清政府给了应试者十分优厚的待遇，除了发给往返路费、衣食费、柴炭银外，康熙还亲自赐与了丰盛的筵席加以款待。表面上考试进行得郑重其事，康熙还亲自阅了卷，但实际上对应试者十分迁就，百般照顾。严绳孙只作了一首诗，潘耒、施闰章的诗不合韵律，都被录用。彭孙遹故意将词写得言词不通，也被录为一等。可见，为了广泛招揽人才，康熙不拘一格，确实花费了一番苦心。这次考试录用的50人都被授予了翰林院的官职，奉旨编修明史。高官厚禄和种种特权使这些人逐渐放弃或动摇了反清立场，落第的文人学士也无颜再以明代遗老自居了。博学鸿词科的设立确实起到了一箭双雕的作用。

但是应试的只是当时汉族学者的二、三流人物，而顾炎武、黄宗羲、李颀等著名学者始终拒绝应试，康熙对他们也采取了宽

容的态度。关中大儒李颀以身体有病为理由拒不应试，被强行从家乡抬到西安，李颀便绝食抗议，连续六天汤水不进。清朝官员无可奈何，只好又派人将他送回。后来，康熙来到西安，指名要见李颀，李颀托病推辞。康熙不仅没有怪罪他，还亲题了“志操高洁”的匾额赐给他的儿子以示褒扬。太原的傅山被役夫用床抬到京城外 30 里的地方，他誓死不入城，京中的王公大臣们慕名纷纷前来看望，傅山大模大样地躺在床上，既不迎送，也不施礼。结果地方官员只得以傅山老病为由奏请免试，得到康熙的准许。康熙所以能够容忍这些人抵制考试的种种大不敬行为，一方面是因为他们名满天下，影响极大，不愿意轻易触动他们，另一方面他们拒绝出仕，只是退居家中讲学著书，还没有直接触犯清王朝的统治。

不过，康熙朝也发生了十几次文字狱上。如果说发生在康熙亲政前的庄廷钺一案与他没有直接关系，那么发生在康熙五十年至五十二年（1711—1713）的戴名世一案，便确系康熙所为了。戴名世是安徽桐城人，自幼聪颖好学，喜读史书。晚年他身居故里，整理了《南山集》一书。书中记载了南明诸王的史事，并采用了同乡方孝标的《滇黔纪闻》中的一些史料。戴名世还主张以桂王死后的第一年作为清的定鼎之年。戴名世 57 岁才考中进士，担任了翰林院编修。谁想到 59 岁这年便大祸临头，他的《南山集》被左都御史赵中乔告发为诽谤朝廷之书。结果戴名世被判凌迟处死，戴氏、方氏家族 16 岁以上的男子全部被判处斩，女子及 15 岁以下的男子被没为家奴。族人的所有职衔全都被剥夺。到结案时，经“宽大处理”，戴名世才免遭凌迟，改判为处斩，方孝标这时已死，还被坐尸。只有族人方苞幸免于难，他原

也被判处斩，只因其文章早已名满天下，康熙怕引起众怒，才下令“免治”，但仍然一度被编进汉军旗中受到管制。平时与戴名世有交往的官员，有30多人被降职。受到案件牵连的，多达300多人。

由此可以看出，出于巩固统治的需要，康熙确实笼络了一大批人才为清王朝所用，但他对汉人的猜疑也是根深蒂固的。

五、重农贵粟 勤勉好学

清兵入关以后，在多尔袞执政时曾大规模地进行圈地，把落后的农奴制生产方式强加在中原人民头上，严重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顺治亲政后虽有所缓和，但由于当时大规模的战争尚未结束，因此，到康熙时，广大农村还是满目疮痍，农民不得温饱，国家财政入不敷出。于是，康熙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

康熙即位后，便下令停止圈地。但由于鳌拜一伙人从中作梗，圈地仍禁而不止，有时规模还相当大。清除鳌拜后，康熙重申了永远停止圈地的命令，并要求将已圈土地还给农民。康熙二十四年（1685），康熙再次明确规定不许圈种民间新开垦的土地。这样，阻碍农业生产的圈地活动才逐渐被制止。直隶各省修建寺庙，侵占了大片农田，康熙也明令禁止。

鼓励垦荒是康熙采取的又一项重要措施。明末农民战争期间，许多藩王的土地被农民耕种了。康熙承认了这一既成事实，下令各地督抚正式将这些土地给予原来耕种的农民，并禁止作价转让部分土地。这些被称为更名田的土地，约计有16.6万多项，

而且多是肥沃的良田，一经正式属于农民，大大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康熙十二年（1673），为了鼓励在更大范围内垦荒，康熙宣布：各省今后开垦的土地，耕种10年后交税。同时用授与官职的办法鼓励地主招民垦荒。规定开荒20顷以上，又通晓文义者，授予县丞，不通文义者，授予百总；开荒100顷以上，通晓文义者，授予知县，不通者，授予守备。这些措施对地主和贫苦农民都很有吸引力，于是河南、山东、直隶的老百姓纷纷前往东北垦荒，湖广人民也踊跃去四川垦荒。垦荒农民的汗水不久便换来了丰硕的成果。到康熙三十年左右，清王朝田亩达到了明王朝的高峰，比清初更翻了近一倍。到了康熙五十一年（1712），边远省份的荒地大多已经变成良田。无怪康熙颇为自负地说：“云南、贵州、广西、四川等省，人民渐增，开垦无遗……”此时，除了无法耕种的不毛之地，可以称得上是“四海无闲田”了。

蠲免地丁钱粮，是康熙为了恢复生产采取的又一项重要措施。统一台湾后，康熙认为，国家已经安定，要使百姓安居乐业生活富裕，蠲免钱粮势在必行。康熙二十六年（1687），康熙下令免去江宁等七府及陕西全省600多万两钱粮，后来又先后蠲免过各省的钱粮。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国库充裕了，蠲免钱粮的数额也随之增多。康熙四十一年（1702），因云、贵、川、粤四省没有经常得到蠲免，康熙下令宽免四省四十三年钱粮。以后康熙常下令全国各省轮免。据统计，自康熙元年到康熙四十四年，蠲免钱粮的总额达9000多万两白银。尽管得到蠲免政策实惠最多的是钱多地广的富户，贫苦农民相比之下获利甚微，但是不能否认，蠲免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农民的负担。这种与民休息的政策，对于全面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起到了积极作用。

清初的赋役制度沿袭明制，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和人口的增多，已经不能适应实际情况。康熙先是下令修改赋役制度，于康熙二十六年（1687）完成了《简明赋役全书》。到了康熙五十一年（1712），康熙又对赋役制度进行了重大改革，以清除旧赋役制度的弊端。康熙宣布：以康熙50年的全国丁银数为标准，以后永不增减，此后到达成丁年龄的人一律不再承担丁银。这项被称作“滋生人丁，永不加赋”的措施成了清代地丁制度的基础。后来，康熙又在广东试行了“摊丁入亩”的征税方法，即把全省丁税统统归入田赋，实行征收田赋带征丁银的方法。这样就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赋役不均的现象，使无地的逃亡农民免于丁银之苦，重新回到土地上来，也使负担向土地占有者转移了一些。

治河和漕运都是康熙十分重视的大事，而漕运的恢复又在于治河的成功，因此康熙在兴修水利上倾注了许多心血。康熙执政期间治理的河流主要是黄河、淮河和运河。由于频繁的战争，黄河长年失修，形成了严重的水患。在康熙即位后的最初16年中，黄河竟决口67次。当时黄河下游的部分河道与淮河、运河汇合，黄淮泛滥后，洪水便倒灌运河，切断南北漕运。为了根治黄河，变水害为水利，康熙任命水利专家靳辅为河道总督，另一位专家陈潢做他的助手，开始了大规模的治河工程。当时正是三藩之战进行得非常激烈的时候，足见康熙对治河是十分重视的。靳辅采用了明代潘季训“以堤束水、借水攻沙”的方法，又用开中河、修堤坡等方法作辅助，一年之后，饱受水患之苦的7个州县的土地便能够重新耕种了。又经过十几年的努力，水归故道，漕运无阻。对治河取得的巨大成绩，康熙曾在第一次南巡时，赐诗给靳辅加以嘉奖。康熙的6次南巡都以巡视治河工程为重点，

对治河是很大的推动。他对治河的具体措施认真研究，提出了一些很有见地的意见。第三次南巡时，他沿途亲自用水平仪进行测量，发现黄河河床高于两岸田地，指出这是产生灾害的根源，要根治水患，必须深挖河道。他提出用木制的立体治河模型代替平面图纸，以便制定更切合实际的治河方案。他乘坐小舟，不避风浪，亲自察看水情。康熙还亲自主持了浑河的修治工程。浑河素有“小黄河”之称，经常改道，危害沿岸百姓的生命安全，有时还直接威胁京城。康熙曾经 13 次巡视浑河，经过试验确定了治河方案。在康熙的督促下，浑河治理工程于康熙四十年（1701）竣工，浑河遂改名为永定河。治理后的浑河堤岸坚固，两岸是百姓新盖的房屋和茂盛的庄稼，出现了一派繁荣景象。对治河这件关系国计民生的大事，康熙抓得很有成效。他的名字，将不仅作为治河的组织倡导者而且作为一个颇有建树的水利专家被载入史册。

康熙采取的一系列措施促进了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到康熙末年，耕地面积和人口都有了大幅度的增长。国库收入十分充裕，年年有余。国库存粮达到几千万石，京城的国库爆满，只得将漕粮截储在运河沿岸的苏杭等地。国库中有些粮食存放时间过长，竟变质作了肥料。

有感于明代奢侈败国的历史教训，康熙很注意节俭。南巡路过南京，他曾做《过金陵论》表达自己的这种心情。康熙初年，宫中所有人员合计才 800 余人，这与明宫廷仅宫女动辄几千，太监动辄几万相比确实是大大减少了。因此宫廷的费用与明代相比也大大节省了。明代仅光禄寺每年用银即达 100 万，康熙时只用 10 万；明代工部每年宫廷修造用银最少约 200 万，而康熙时只

用二三十万；明代的宫中建筑都要用楠木料、临清砖；而康熙时除特殊需要宫中一概用普通砖瓦。据康熙自己说，他的所有行宫都不进行特别装饰，每处花费不过一二万金，只占每年治河费用的1%。康熙还说，明代一日之费，可抵今一年之用。这话显然有些夸张，但也能说明康熙反对奢侈、提倡节省的效果是很显著的。

“满招损，谦受益”是康熙常说的名言。他为政讲求实效，一贯反对浮夸虚饰。因此，他多次拒绝了臣下为他上尊号的请求。平定三藩之后，朝臣请上尊号，康熙拒绝说：乱贼虽已削平，疮痍尚未全复。如果政事不能修举，上尊号又有什么益处？朕断不能接受这样的虚名。讨平噶尔丹之后的康熙三十六年（1697），诸王、贝勒、贝子、文武官员及远近士民来到畅春园，搞了一次更大规模的请上尊号的活动。这已是第五次为康熙请上尊号了。康熙仍然坚决拒绝，他说：“天视天听，视乎民生，后人自有公论。若夸耀功德，取一时虚名，大非朕意，不必敷陈。”后来，借他的生日等机会，臣下又多次请上尊号，直到去世康熙也没有答应这些请求。他还一再拒收朝臣进献的生日贺礼，不准为他举行大规模的祝寿活动。他50岁生日时，朝廷官员献上了鞍马缎匹和“庆祝万寿无疆屏”等生日贺礼，他婉言谢绝道：“我的诞辰，你们这样进献，各督府也一定会仿效，所以我决不能接受。”在他去世前不久，他最后一次拒绝了群臣为他第二年举行“万寿七旬”贺礼的请求。康熙六十一年（1722）十一月七日，康熙病逝，庙号“圣祖”。

世宗爱新觉罗·胤禛

康熙十七年（1678）十月三十日，在庄严而又神秘的紫禁城中又诞生了一个男婴。这个婴儿就是 44 年后登上乾清宫内金碧辉煌龙椅的清朝的第五代君主胤禛。

一、韬光养晦 终登皇位

胤禛与康熙众多的儿子一样在帝王家的荣华富贵中慢慢长大。康熙对他的儿子们是严厉的，教育抓得非常紧。皇子年满 6 岁便入南书房读书，学习的课程有满文，汉文，蒙文及儒家的经史书籍，另外还有军事，体育等科目。皇子的师傅都是翰林院中的博学大儒。皇子上课的规则是严格的。每天五鼓，天还未明，便须起床，进书房学习。每天的课程皆是排好了的，先读史、作文、然后有满文师傅教满文，下午学习骑射。直到太阳落山，一天的功课才算结束。康熙皇帝看到一些贵胄之家对子孙娇生惯养，长成大人，则是废物，害了子孙。因此，他对诸皇子要求甚严，康熙帝经常在繁忙的政务中，检查皇子的功课，尤其告诫他们要熟读四书五经，贯通性理，以儒家

的伦理道德规范自己，成为一个德才兼备的人上之人。

随着年龄的增长，康熙皇帝还让他的儿子们接触一些军政事务，经受实际锻炼以增长知识和处理问题的能力。自8岁以后胤禔经常随父皇去边塞，了解边塞形势。康熙三十二年（1693），15岁的胤禔同几位哥哥参加了曲阜祭祀孔子大典。第二年和康熙三十九年（1700）两次随父亲考察了无定河（又名浑河），并亲自主持了无定河的治理。康熙三十五年（1696），胤禔真与诸兄弟参加了对噶尔丹的讨伐，他受命掌管正红旗的大营，虽然这只是象征性地坐镇正红旗，并没有真正亲临前线、躬冒矢石，胤禔还是从中学到了许多知识。康熙四十二年，他跟随康熙南巡，由德州、济南、泰山、沂州，经淮安、扬州，镇江而达杭州。返途经南京、沛县、东平、东昌返京。历经4个月时间，胤禔详细了解了沿途风俗民情及运河闸坝工程。

清朝的传统原是不立太子的，皇位的继承人是老皇帝死前指定的。这种不立储君的方法既有利也有弊。其利在于各个有继承皇位希望的人都能效忠皇帝，拼命出力，博取皇帝好感，以求被立为君。弊在不立储君，觊窥皇位者多，容易造成父子兄弟之间的勾心斗角，甚至刀兵相见，酿成争位的大祸。康熙皇帝即位后斟酌立太子的利弊，决心改变清朝的习惯，学习前人立嫡长子为太子的办法。康熙十四年（1675）他将孝诚皇后所生年方2岁的皇二子胤礽立为太子。皇长子胤禔因为是庶生，没有得立。其后，康熙的几个儿子争夺储位，刀光剑影，不可开交。胤礽立而废，废而又立。

康熙因废太子问题，劳神伤心，生了一场大病。而诸皇子多忙于经营自己势力、争夺储位，很少关心父皇的病。只有胤禔

和胤祉问医问药，关怀备至，很得康熙的欢心。所以，在胤礽复立之时，康熙大封诸子，胤礽与胤祉、胤祺一起被封为亲王，超过了胤禔等人，得到了很大的胜利。此外胤禔很懂得伪装、韬光养晦、避免锋芒太露而遭忌妒。他能在形势未明之前与各方面都保持良好的关系，有效地保护自己。他虽然对胤礽表示关心，同时也与胤礽保持某种联系。对其他兄弟，他在父皇面前只说好话不讲坏话。有人需要时他都能给以支持。他得到亲王之封后，自己上奏要求降低世爵，提高其他兄弟地位。他这样的做法，很得康熙好感，称赞他明白事理，获得了康熙的信任。

胤礽的复立并没有平息诸子之间的争夺，也没有消除他与父皇之间矛盾。胤礽复位后，照旧收集党羽，招兵买马，迅速纠合了一批亲信大臣。眼见他羽翼日益丰满，日益骄横无忌，康熙只得再次采取断然措施，于康熙五十年（1711）十月再次废掉了他。逮捕了太子党人，将托合齐焚尸扬灰，耿额，齐世武等人锁拿审问，同时明确表示不再立太子。他说没有合适的人，立了反而引起争斗，本朝向无立太子惯例、不立亦不为过。

巧于心计的胤礽看清了胤禔、胤禔，包括胤祉都不可能被父皇选为嗣君了，他在其他诸皇子中年令居长，占据一个好的地位，当然也就产生了接班的想法。暗地里做些准备、胤礽的做法是尽可能地迎合父皇的意旨，取得父皇的喜爱。外松内紧，一方面底下加紧活动，分别取得了守卫京师的步军统领隆科多和在西北手握重兵的川陕总督年羹尧的支持。一方面向父皇，向世人表现出自己对皇位没有兴趣，麻痹康熙和诸位弟兄。

自胤礽二次被废之后，康熙对胤禔更器重了，许多重要的国务活动让他参加。康熙五十一年（1712），胤禔参加了对太子

党人的审判。康熙五十四年（1715），参与议定西北军事。五十七年（1718）皇太后安葬，胤禔代父读文告祭。康熙六十年（1721），康熙登极60年大庆，胤禔前往盛京大祭。回京后，又衔命祭祀太庙，后殿。同年，会试不第士子以取士不公闹事，胤禔受命处理。当年冬至，他还奉命代父皇祀天于圜丘。康熙六十一年（1722），胤禔带人盘查京通仓物。这说明，康熙对胤禔真已有了一定的想法，让其全面参与军政事务。

康熙六十一年（1722）十一月七日，康熙皇帝病了，冬至的祭天礼由胤禔代行。十三日，康熙在畅春园召见胤禔，在胤禔未到之前，康熙已向在病榻旁的胤祉、胤祥、胤禩、隆科多等人交待由胤禔继皇帝位，胤禔到后，向父皇问安，康熙告诉了他病症，胤禔含泪进行了劝慰。到晚上八点左右时，康熙溘然长逝。胤禔哀号痛哭、隆科多乃当众口头宣布康熙遗诏、命胤禔即位，胤禔当时惊恻昏倒，在大家的劝慰下，强起办理父皇丧事。当晚将康熙遗体运回后宫，次日封胤禔等人为王。召胤禔回京，关闭京城九门。十六日向天下颁布遗诏。二十日胤禔登上了皇位受百官朝贺，改第二年为雍正元年。宣布继承父皇的一切法规，不作变更，呼吁皇室团结，诸兄弟一体，共图清朝万世之固。

雍正的即位是不是康熙的意旨，合法与否一直是人们议论的话题，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二、惩除政敌 巩固皇权

雍正坐上皇帝宝座，他的兄弟们，尤其是胤禩、胤禵是不

死心的。一天不彻底解决兄弟间的争斗，他的皇位就一天坐不稳。而这件事情的处理又远较一切事情为复杂，不能不花费他大量的精力。

雍正即位的第二天便封他的政敌胤禩为亲王，让他和胤祥（皇十三子，与雍正关系最好）隆科多，以及胤禩的亲信马齐一齐为总理事务大臣，办理一切事务。同时还任用了胤禩的一些亲信人物。雍正这一着大出人们意外。胤禩的手下人个个弹冠相庆，只有胤禩心怀疑惧。他对人说：“皇上今日加恩，焉知没有明日杀头之意？”胤禩作为局中人自然比别人想的深刻。但雍正这样做却有效地堵住了许多人的嘴。同时也将胤禩控制在自己手中，逐步分化他的亲信，力求暂时稳住胤禩，以待时机成熟时再下手杀他。

对待胤禔，他的同脱弟弟，雍正真是不好下手。胤禔是皇位最有力的继承人、又加上社会上传扬的雍正夺了胤禔皇位的谣言，胤禔很是受人同情，因此，它具有潜在的号召力，雍正决不能掉以轻心，泛泛视之。父亲一死雍正火速令胤禔回京参加父皇的丧事，将前线军事交与雍正的大舅子年羹尧处理。胤禔到京之前，专门派人请示，是先谒父皇梓宫，还是先朝见新君。雍正命他先谒父皇灵柩。胤禔到灵堂，望见父皇灵柩，百感交集，哭倒在地。雍正远远地站在一旁，胤禔对登上皇位的亲哥哥，当然满怀仇恨，但人在矮檐下，又不得不敷衍向哥哥叩头。雍正为表示自己的兄长风度，上前扶他，胤禔却不理他，使雍正很难下台。这使雍正非常不快。雍正因此借这件事，斥责胤禔“气傲心高”，削除了他的王爵，只保留贝子封号。过了一个月时间，雍正和诸皇子送康熙灵柩安葬东陵。事毕后，便令胤禔

题留下看守父陵，实际上便把他囚禁在了遵化。胤禔的几个亲信也被收拿治罪。

雍正对胤禔的无情，使他们的母亲吴雅氏非常伤心，但她管不住哥哥，帮不了弟弟。一气一急之下便生出病来。雍正元年（1723）五月二十二日得病，次日便死了。这个小家出生的女人，无福去做荣贵的皇太后，撒手离开了这个骨肉之间不能相亲相爱的世界。吴雅氏的死，据雍正的政敌说，是她要见胤禔，雍正不允许，她一气之下撞了铁柱子。这个说法真实性颇大，雍正为了安慰他的母亲，马上封胤禔为郡王，但仍圈囚在遵化，他的妻子也很快染病而死。胤禔遭到如此打击，感到悲愤而又沮丧，向雍正表示他已走到生命的尽头。希望哥哥放他一马，因此以后才保住了自己的性命。

皇九子胤禔，皇十子胤禔亦是胤禔的支持者，他们对雍正的上台同样心怀不满。雍正在胤禔回来后命胤禔前往西宁办事，暗里令年羹尧把他软禁在西宁。同时借故将胤禔革去郡王爵位囚禁于京师。对废太子胤初，大阿哥胤禔，他照样予以严行禁锢。

雍正在处理诸兄弟中，初期并不残酷，不危及他们的生命。他知道在刚继位时若开了杀戒，会激化皇室的矛盾，反倒不利于他的统治。但雍正对诸兄弟政治上的迫害却是一步步加紧的。

经过了两三年准备，他的权力已巩固，他就准备彻底解决问题了。雍正四年（1726）正月，雍正罗列了胤禔种种不法，将其降为民王。圈禁高墙，赐名“阿其那”，意为狗。五月向内外臣工，军民人等颁布胤禔等人罪状，不久死于囚所。胤禔赐名“塞思墨”，意为猪。同年八月胤禔被害于保定。九月胤禔也不

明不白地死于禁所，胤禔亦于雍正六年（1728）死于禁地。唯有雍正同母之弟胤禔保留下一命，活到乾隆二十年（1755）。至此，雍正彻底结束了诸兄弟争夺皇位的斗争，巩固了他的地位，加强了皇权，确定了他不可动摇的权威。雍正从皇位的争夺中摆脱出来之后，以更多的精力投入到治理国家的事务中去。

三、改革积弊 禁止朋党

康熙后期，官吏贪污，吏治腐败。因此钱粮短缺，国库空虚，造成很多严重的社会问题。雍正当皇子时深知要富民富国首先便是整顿好吏治。但是，整顿吏治，在官僚队伍头上动土也不是容易的，弄不好则一发不可收拾。雍正知道“吏治乃一篇真文章也”，他决心做好这篇真文章。

钱粮亏空是当时一个大问题，主要出在官吏贪污上。雍正继位，内阁起草登极恩诏，就开列了豁免官员钱粮亏空一条。雍正马上觉察了，当即将这条勾去，他决不宽恕官员的贪污。十二月十三日，他给户部下达了全面清查积欠钱粮的命令，让各地严格执行。查清亏空何项，原因是什么，并责令所有亏空三年内必须补齐，且不许苛派于民间。因上司勒索及公用者分别处分。属侵欺贪污者，赔补外还要惩办主犯。随即，在中央设立会考府，由怡亲王胤祥，隆科多负责将清查进行到底。

会考府是中央的审计机关，各部，各省皆由其督责。会考府查出户部亏空 250 万两，雍正令户部历任堂官，司官，部吏赔 150 万、另 100 万两由户部逐年弥补。清查中涉及高级官员也决不容情，当时有许多郡王、贝子将家产拿到大街上变卖赔补亏空。对

有些贪污多的官僚，雍正就抄他的家，以家产抵空。

地方的清查更为雷厉风行。因亏空，许多省级官员被革职查封抄家。对赃官，采取严厉手段，抄家之外，命其亲戚代赔。凡亏空赃官，一经揭露便予革职。各省被革职罢官的官员多达 1/3，有的达到一半。因此，社会上说雍正“好抄人家”。雍正则说这是应该的，不能让贪官污吏占到一点便宜。全国全面的清查收到很好的效果，3 年之间，基本上清理了康熙以来的所有积欠，充实了国库，打击了贪官。

官吏的贪污有官僚队伍的素质问题，在清代还有具体客观原因，那就是官吏俸禄太薄。清朝一品官每年才 180 两银子，七品官 45 两。靠这一点俸禄家口都养不活，还要送往迎来，年节应酬，打点上司。要让他们不想另外的办法来搞钱除非让他们饿死。所以清朝官场上地方官靠的是苛捐杂税，最主要的是征收赋税银两时加收“火耗”，来充填私囊。上面的清寒的京官、省官靠的是下边各种名目的送礼来生活。这样一个官场，怎么能不腐败。

各级地方官员，贪污勒索的手段一般均以“火耗”为名。其所用名义是国家征收赋税为散银，上交国库时要溶铸成银锭，因此要有损耗，称为“火耗”。因此要多征，用多征的部分弥补损耗。另外，征粮还有“雀耗”、“鼠耗”等名目。“火耗”之征，各地不同，但都越来越重，有的地方 1 两正赋加 4、5 钱“火耗”。雍正非常清楚，无限制地征“火耗”就是剥削民脂民膏，久而久之，非酿成大乱不可。可是如果禁止收“火耗”，各级官员又断了财路，断了生路。雍正很慎重地考虑这个问题。雍正三年（1725）五月，湖广总督杨宗仁提出“火耗”由国家规定征收数，

统一征收。一部分归到省里作公用，一部分分给各级地方官。他的意见，得到雍正的赞赏。

为了慎重起见，雍正命议政王大臣召集中央有关部门详加议处。讨论的结果，各执一说。雍正大为恼火，斥责他们目光短浅，不再听他们意见。雍正4年七月断然下令实行“火耗归公”。规定各地火耗征收比率依各地情况而定，只许比原数少，不许增加。所收“火耗”全部提解到省。拨出一部分作为官吏养廉银，其他用于地方公费，此法很快全国实行。各地“火耗”率皆比原额有所下降，多的由80%降到18%，如山东等省。全国各省“火耗”率普遍保持在20%以下。“火耗”归公后给各级官员发放养廉银，养廉银的数额很多，远远超过俸禄。如一品官养廉银每年有2万两，是其俸禄的100多倍、七品官养廉银亦达2000两左右，是其俸禄的40余倍。

清理亏空，火耗归公，实行养廉银三事同时进行，使官吏对小民任意加派、官场间收受规礼、贪污勒索的陋习有了很大改变，促使官僚队伍走向清廉。同时也使国库充实，地方公费充足，收到了一石二鸟的效果。

为了增加国家收入，打击不法地主官僚逃避赋役，平均劳役、丁役，或将负担转到小农头上的情况，雍正三年（1725），雍正决定实行“摊丁入亩”制度。将丁役摊到土地上去，谁田多，谁出力役多，没田的少出役。这个办法当然是对小农有利的。自明朝张居正“一条鞭法”提出这个设想百年来一直实行不下去，雍正决心完成它。他以明确的认识，坚强的毅力促成了这一赋役制度的大变革。从此后没有了丁役，小农负担减轻了，压抑了富户，扶植了贫民，彻底解决了丁役不均，放富差贫的弊端。从另

一方面说，因土地是固定的，而人丁是流动变化的，因此丁粮合收，使清政府的丁银收入有了保证，因此对国家亦是有利。所以这次赋税改革是一个有重大意义的历史事件。

四、加强集权 巩固边疆

雍正是一个精明的皇帝。他非常了解康熙后期上上下下报喜不报忧给他父亲造成许多事情的失察。他登上了皇位，便不能再容许这样的情况发生。他要更加牢牢地掌握他的权力，便需要十分清楚地了解全国每天发生的事情，做到耳聪目明。为了这个目的，雍正对王朝的行政制度做了些改革和创造。主要的改革，一是完善了密折奏事制度，二是创设了军机处，目的是为了加强皇帝的集权。

清王朝的公文往来，主要是题本和奏本。题本是官员因公事所上的奏章，要加官印。奏本是个人私事，不用公章。二者皆由通政司送皇帝，其实到皇帝之前便已由内阁看过了。因此这两种公文都是公开的。这样，便有许多局限，有些事情官员不敢公开讲，皇帝便无从知道。所以康熙年间便产生了补救的办法——秘密奏折。秘密奏折是皇帝最为心腹的人，最相信的人才能用的。所奏内容，风俗民情、地方治安、官员情况、以及气候、粮价、民间琐事无所不包。这种奏折直接送皇帝，别人不得开启。皇帝看完，批示后发回本人保管。但是康熙时期，能用密折奏事者不多，还没有形成严格的密折制度。

雍正上台后，感到密折是了解下情的最好办法。他首先扩大了可写密折人的范围，令各省督抚皆有此权限。后来又给提督，

总兵官、布政使，按察使和学政官员密折权力，对一些中下级官员，经过雍正特许，亦可密折奏事。临时差往地方的官员亦有此权。估计雍正朝先后拥有密折奏事权的可达 1000 多人。

密折制度的建立，使雍正更能对全国上上下下了如指掌，广辟耳目。因此，处理各类事情能洞察秋毫，一言中的，加强了行政效率。雍正朝一切大政皆有密折的功劳。耗羨归公，摊丁入亩，改土归流，他皆有周密的调查、有与心腹大臣许多的论证，因此施行起来得心应手。密折又起到了严密控制官员的作用，使官僚人人自警自惕，兢兢业业一心为公，因为，他们的所作所为皆逃不脱雍正的眼睛，密折像一根无形的鞭子，驱赶着他们。雍正创立密折制度没有明代东厂之弊，而收东厂之实效，这正是雍正的高明之处。

雍正的另一创造便是设立军机处。雍正七年（1729），西北对准噶尔用兵。为了更准确，迅速地处理各种军机大事，他在他的寝宫养心殿附近设立了军机处。军机处不是一个衙门，没有属员，只是一个临时处置机密军事事务的机构，内设军机大臣和军机章京。军机大臣不是专职，是临时抽调来的、雍正比较信任的官员，原来的职务照兼。军机章京也是抽调来的，仍属原衙门编制，升转在原衙门进行。军机章京是负责文字工作的秘书类人物，雍正以军机处为工具，他的谕旨直接由军机处转发。雍正每天都定时召见军机大臣，有事随时召见，军机大臣常半夜不能休息。

军机处初设是办理西北军务，后来雍正觉得军机处用的顺手，西北军务完毕，便用来办理国家所有机密事务，所以在雍正手中，军机处已代替了内阁，成为国家实际中枢。凡重要机密之

事皆由军机处办，内阁只能办一般性事务。军机处除了承命办事之外，还有为皇帝出谋划策，提供谘询，参加议政的任务。军机大臣是雍正挑选的，统统属于他的亲信，事事秉命于他个人，因此雍正非常牢固地抓住了国家一切权力。

雍正继位时，清王朝的边疆地区并不安定。首先是青海、西藏动乱不已。青海、西藏地区的蒙古人在康熙时已归顺清朝。由于准噶尔部的挑动，青海的罗卜藏丹津在雍正元年夏天叛乱。他放弃清朝封爵，恢复旧日称号，进攻不跟他走的另外两个蒙古亲王，扣留清朝官员，进攻西宁。雍正听到前方传来的消息，决心武力平叛。谕令川陕总督年羹尧为抚远大将军，主持剿灭军事。年羹尧作了周密部署，雍正元年冬天，连打了几个胜仗，降敌10万。罗卜藏丹津逃到了柴达木。岳钟琪率5000精兵，乘大雪直捣敌巢。第二年二月初八大败罗卜藏丹津，俘其母亲和妹妹，罗卜藏丹津男扮女装逃往准噶尔。胜利结束了平叛战斗。其后，清对青海地区加强了统治，设立了青海办事大臣，处理蒙藏民事，下置若干州县，使青海直接隶于中央政府，改变了康熙时对青海间接统治的方法。平叛后，在青海各地开展了屯田，兴办农业水利，对当地少数民族经济发展多方扶持，取得了很大成功。

西藏地区在康熙时已驱逐了准噶尔势力，并留兵2000驻守，任命亲清的藏人担任西藏地方领袖。雍正元年，雍正听四川巡抚之请从西藏撤回了军队，雍正五年（1727）便发生了阿尔布巴叛乱。后藏政府首领颇罗鼐率兵坚决平叛，与敌周旋。雍正闻讯令川、云驻军出兵进藏。次年秋，一举平定叛乱。西藏平定后，雍正从长远利益考虑，决定强化对藏控制。在西藏设立了驻藏大臣，留兵2000防守。同时，将西藏宗教领袖达赖六世迁于康定，

派兵看守。初步稳定了西藏局势。

西北准噶尔部在康熙年间数次发难，经康熙几次用兵，形势趋向缓和，但依然与清朝处于敌对状态。经常挑起事端，挑动青海、西藏、蒙古地区的蒙古族闹事。因此，准噶尔部不平，清朝的西北边境便不得安宁。雍正继承其父遗志，决心彻底解决准噶尔问题。但由于雍正决策的失误和前线将领的轻率，清军多次失利，直到雍正去世也未能达到目的。

西南云贵地区向为少数民族聚居之区。明代以来中央皆以土司制度统之。即由少数民族酋长自治。这些少数民族头人世世代代承袭其职务，对当地人民进行残酷压迫和剥削。土司之间又经常为争夺土地山林人口而争战，有时候又联合起来反叛中央政府，抢掠汉族及他族人民，明朝时一直为国家大患。清朝也沿袭了明的土司制度，行之近百年，土司制的各种弊病愈演愈烈。

雍正从康熙年间便深知土司之弊，但怎么解决却没有办法。雍正二年冬，雍正任命鄂尔泰为云贵总督，让他一方面平定贵州土司叛乱，一方面认真调查研究找出解决土司问题的根本办法。雍正四年（1726）九月，鄂尔泰提出云贵土司改土归流的设想。雍正认为这是治本之策，便当机立断，责令鄂尔泰完成此事。并且迅速为他配备了必要的助手。为了鄂尔泰工作的方便，雍正重新改定了云贵川的行政区划，授他为云贵广西三省总督。

鄂尔泰自雍正四年下半年开始剿平了叛乱土司，首先对这些土司改土归流。然后，及于未叛土司。废除少数民族的头人，设立府县，派遣流官管理，并力行清查户口、田土，对忠于朝廷的土司给以荣誉世职，妥善安置。到了雍正八年（1730）云贵改土归流工作基本完成。此举打击了叛乱分裂势力，加强了中央对

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统治。

五、善于用人 勤于治政

雍正才思敏捷，由于有深厚的文学、史学、经学功底，其思维非常有逻辑，非常条理。他每天都要看大量的文件、密折，亲自书写批示。少则数字、数十字，多则上千言，皆是一挥而就，且行文流畅，入情入理。他作的批示很少涂抹，很少改动。往往几百字、上千字的批示一字不动，或很少改动。他一天处理那么多事，可以说一日万机。能够做到这样，足见其才识过人。雍正的书法亦很好，康熙很欣赏他的字，每年都令他专写扇面，多达100多幅。他留下的手迹很多，现存朱批奏折原件还可以看到他的字，运笔流畅、娴熟、结构严谨，功底深厚。

雍正的政治才能表现在他了解下情、了解臣下、了解自己，能够运用一切手段去实现自己的目标。

雍正说他事事不如其父，惟有了解下情比康熙强。他清楚地知道天下弊病在哪里，官场恶习什么为最劣，因此处理政务得心应手，没有事情能瞒过他的眼睛。尤其是他的知人善任、控御臣下的本领更为他人所不敌。

雍正常说：“治天下惟以用人为本，其余皆枝叶事耳。”在通行“人治”的中国封建社会，雍正的认识可以说是非常确切的。只要用人得当，天下皆可以治。雍正在作皇子的时候，就形成了他自己的用人原则和用人风格。

康熙用人较为宽厚。官僚队伍相对稳定。但是，康熙时形成了庸才充斥、官场腐败的现象。雍正欲一改康熙末年状况，造就

一支振奋有为，有开拓性的官吏队伍，来保证他的政治目标的实现。因此，其用人原则便不同于他的父亲。雍正的用人原则，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用人原只论才技，从不拘限成例”。中国历代人君用人的不同总在于德与才的如何偏重，也就是重德还是重才？德才兼备的人是有的，但数量少，远不够国家之用。大部分官僚皆属中才，就看人君怎么使用。一般来讲，德高者往往才不具，多为忠厚老成、谨小慎微、兢兢业业、缺乏开拓精神的君子型人物，这种人可以信任，但不能用于成就一项大事业。而有才者，又往往恃才傲物，不拘泥于道德的约束，不容易驾驭，甚至大节、小节皆有瑕疵，为君子所不齿，经常受人攻击，而成就大事业往往是这样的人物。

雍正用人是根据历史的要求。在他那个时代，为着除旧布新，革新政治，必须用一批有才干的大臣，就是这样的人有那样那样的错误也要用。他认为国家设官定职，原是为了办事，而不是为了用人，尤其不是以官职养闲人、庸人。谁能把事情办好就用谁，而不必拘泥于他的出身、他的声望或德性，在这个前提下，对有缺点的才干之臣加强教育，对庸才，则要让他腾出位子来给有才能的人。雍正曾在田文镜的密折上这样批道：“凡有才具之人，当惜之、教之。朕意虽魑魅魍魉，亦不能逃我范围，何惧之有？及至教而不听，有真凭实据时，处之以法，乃伊自取也，何碍乎？卿等封疆大臣，只以留神用才为要，庸碌安分、洁己沽名之人，驾驭虽然省力，唯恐误事。”可以说，这段话概括了雍正的用人之道。

对官僚，即使是贤才，雍正要求也很严。历代君王要求大臣不过“清、慎、勤”三个字，而雍正认为只有这三条要求还不够。

做官，尤其是高级官吏，还应当眼光远大，有全局意识，胸襟宽广，不然的话，人品再好也不过一具木偶泥胎。对于真正的才干大臣，雍正打破了官吏升转惯例，给以高官厚禄、越级提拔。他给几个心腹大臣田文镜、鄂尔泰等人的上谕中，一再让他们荐才，他虚己以用，不拘资格。而对于疲软官员、他动真格的，以察典处之。雍正时期，无能的官员被罢斥的很多。雍正也因此得了个“刻薄寡恩”的名声。

从整个雍正时期看，雍正对于才干之臣一点也不刻薄。他常常用赏赐世职、加级，赐四团龙补服、双眼花翎、黄带、紫辮，赐“福”字，赏食品药物等办法奖励能臣。有病的大臣，他亲派御医前去看望。像杨宗仁、宋玮、方觀都受过这种殊荣。江苏巡抚陈时夏要将在云南的老母迎养于任所，雍正就令云南督抚将陈母送去。对政见不同的大臣，只要他公忠任事，雍正照样信任。像朱轼，曾反对他搞耗羨归公，反对西北用兵，但朱轼有才干，忠于朝廷，雍正照样信用他。李元直为监察御史，疏奏中侵及雍正，言词激烈，雍正认为他没有恶意，赐给他荔枝，要他直言无防。这种例子在雍正时非常多。

雍正的用人有他自己的特点，可以说是才德并重，而偏于才，其沽名钓誉、洁身自好、庸懦守旧的人他是不用的。他的这种用人方法辅成了他的一代之治。

雍正这个人很自信，过分的自信，这就决定了他性情刚毅。他教育臣下不要优柔寡断、不要瞻前顾后、拿不定主意。要认准了就干，不怕困难。他本人就很果断，摊丁入地，耗羨归公都是他认准了的，所以不顾舆论坚决干到底。他这种性格的另一面就是急躁。康熙皇帝曾就此批评过他，说他“喜怒无常”，实际掌

权后性格也没改变过来。他轻举妄动的事也不少，如强迫闽广土人学官话，结果毫无成效。他气愤时常说过头话、走极端，有暴怒的毛病。经常有这样的情况，一个官员激怒了他，他在批示上将这人大骂一顿、狗血喷头，当转过念头来，又去表扬人家。他性格刚愎，但有时也能认错。年羹尧等案处理后，他也多次公开认错，说自己用人不当，应当引咎。

他处理朝政非常认真，容不得半点虚假和模棱。他看奏章很认真，经常能从中发现问题，一发现问题便非追出个结果来不可。他的批示如果不能立刻引起臣下的反映他就发火，所以雍正时期行政效率异常高，他的这种工作作风不可避免地被臣下说成是“苛察”。雍正说他处于天子之位，总揽万机，必须认真。那些害怕君主英察的人无非是想欺骗君主，掩盖他们的作奸犯科。

雍正没有声色犬马之好，继位后放掉了宫内所养全部珍禽异兽。他不事游猎，连父皇那样的巡游也不搞。他很喜欢园林，他常年办公的地点就在圆明园，该园经过扩建修缮，湖光山色，风景如画。闲暇时，雍正喜欢留连于园中山水之间。其他生活用具，雍正亦不太讲究。吃喝方面，只是喜欢喝点酒，也有节制。当时西方传来的新鲜东西，像温度计、望远镜、玻璃眼镜他接受的很快，还让宫廷匠役仿造，赐给亲近大臣。

雍正共有8个后妃。这在清代皇帝中，乃至历代帝王中都是少的。他当皇子时只有一妻一妾。继位后根据历代惯例，为了“广嗣继”才纳了几个妃子。

雍正继位后勤政好学，事必躬亲，身体状况一直很好。雍正七年曾大病了一场，但一年后已完全痊愈。但到了雍正十三年（1735）八月二十一日，雍正在圆明园偶感不适，他未在意，仍

照常办公。到二十三日晚上病情加重，急忙召见弘历及亲信大臣，谕及后事，二十三日子时，也就是二十二日深夜，雍正便死了。

高宗爱新觉罗·弘历

康熙五十年（1711）八月十三日，乾隆帝弘历出生在雍和宫。因他长得大头大耳，高鼻梁，长身子，故深得他的爷爷康熙帝的钟爱。

雍正十三年（1735）八月，雍正帝得急病死。大臣鄂尔泰和张廷玉等人一面料理丧事，一面齐集文武百官到太和殿，从“正大光明”匾额后面拿下雍正帝立储的遗诏，向诸皇子宣读。遗诏上写着：“着皇四子弘历即皇帝位”。于是，原为宝亲王的弘历就被拥上宝座，阶下大臣齐呼“万岁”，新皇帝传旨，大赦天下，以明年为乾隆元年。他就是历史上的乾隆皇帝，庙号是清高宗。

一、驭臣有术 威柄独操

乾隆帝刚即位时，还是个 20 余岁的青年。当时，朝中大臣分为鄂尔泰和张廷玉两个帮派，这已成了公开的秘密。鄂、张都是先朝重臣，党羽甚多，朝野臣僚要么投在鄂尔泰门下，要么求

张廷玉庇荫。两派明争暗斗，互相倾轧，连刚毅果断的雍正帝都感到束手无策。因为这两人都有大功于国，所以雍正帝特许二人死后附太庙配享。太庙是皇帝家族的祖庙，臣僚能得到配享的待遇，那是极高的和十分罕见的荣宠。这两大派系朋党的存在，给乾隆帝提出一个突出的难题，即能否妥善处理两派的关系，这成为朝政能否正常运行的关键。

乾隆帝继位后明确表示痛恨私立朋党，同时，对两派臣僚一视同仁，有功即赏，无功即罚，决不少贷。如果要起用哪一个人，不只询问一方，而是令各人直陈。同时还要询问许多其他的人。被询问的人都需质言直语，倘被发现故意掩盖或美化，轻则被训斥，重则被解职回籍。于是，朝中虽有门户对立，但双方都兢兢业业地为朝廷尽力，任何一派都不敢骄横。在乾隆朝，这种门户对立不但没有明显影响朝政的运行，有时反而促使双方都争相为国立功。

乾隆帝对臣下恩威并施，凡是为国立功者，可以顿升公侯。如出征将领凯旋归来，乾隆帝通常在紫光阁宴劳。后来，乾隆帝命画工为功臣画像，挂在紫光阁中，以示荣宠。因平定准噶尔和南疆大小和卓木的叛乱，功臣 100 人画像入阁，其中以大学士傅恒为第一。以平定大小金川的叛乱，又画功臣 100 人像入阁，以大学士阿桂为第一。后又以平台湾功，绘功臣 20 人像入阁。阿桂虽未至军中，但图像仍为第一。最后以击退廓尔喀进犯，绘功臣 10 人像入阁，阿桂以自己未亲自参与战斗，恳让福康安为第一，阿桂列第二。乾隆年间，将领在外多能用事，战争都以胜利告终，这与乾隆帝不吝褒奖是有关系的。

乾隆帝虽然儒雅风流，但权柄从不稍假予人。自雍正以后，

军机处就成了皇帝下面的最高权力机构。乾隆帝每天早上都到军机处理政。夏天，他到军机处时天也就明了；冬天，他到军机处时也就是五更时分。军机处一般有十几个人，每天晚上要留一个人值班，以备有急事，候乾隆帝临时召见。又怕事情多一个人处理不了，每天还要有一个人早早地到军机处相助，当时称之为“早班”。乾隆帝从寝宫出来，每过一道门就放一声爆竹。听到爆竹声由远至近，军机处官员就知道皇帝要来了。一般情况下，乾隆帝到军机处后，蜡烛还要点一寸多天才明。军机处的官员每五六天轮一早班，尚感到很辛苦，乾隆帝却天天如此。这使得军机处官员不敢稍有懈怠。倘如边疆用兵，只要有军报送来，就是在半夜里，乾隆帝也要立即亲自观览，随时召军机处官员面授机宜。军机处官员按照他的口授拟好文，再交给他过目。这中间往往需要一二个时辰，而乾隆帝还披着衣服等待。军机大臣都可以专折奏事，最后均听乾隆皇帝决断。

乾隆帝鉴于明代宦官多通文墨，故能够弄权，把明代政治搞得一塌糊涂，所以他一改旧制，将原来教习宦官读书识字的内书堂废掉。乾隆帝说：“内监的职责就是供命令，只要略识几个字就行了，何必派词臣给他们讲文义呢？明代宦官弄权，原因就在这里。”自乾隆三十四年（1769）以后，内宫便再也不派词臣教习宦官了。

乾隆帝还有一个禁止宦官弄权的措施，那就是凡当差奏事的宦官，一律都要改姓为王。这样，外廷官员就难以分辨，避免了他们之间的勾引。有一个叫高云的贴身宦官，他向乾隆帝说了几句外廷臣僚的事，涉及到朝廷事务，乾隆帝立命将这个宦官处死。

清代的宦官由内务大臣管辖，不许宦官到外边胡作非为。乾隆二十二年（1757）四月，直隶总督方观成上疏，弹劾巡检张若瀛，说他竟敢擅自杖责内监，这是一种目无皇上的大不敬行为，乾隆帝览疏，不但未准奏，反而斥责方观成不识大体。没过几天，那个被弹劾的张若瀛却连升七级。为了这事，乾隆帝特发了一道谕旨，凡内监在外边滋扰生事者，许外廷官员随时惩治。更有趣的是，有一个在御前听用的太监，乾隆帝直呼他为“秦赵高”。实际上这个宦官并没干什么坏事，乾隆帝这样称呼他，只是为了向他示警。正因为清前期对宦官管理较严，所以清代没出现过象明代那样的宦官之祸。

乾隆帝接受了历史上外戚为乱的教训，对后宫的管理也很严格。皇后只能管理六宫事，不得干预外廷政事。他还用历史上著名的有德行的后妃为例，作“宫训图”十二帧，每到年节就在后宫张挂，作为后妃们学习的榜样。例如，其中有“徐妃直谏”、“曹后重农”、“樊姬谏猎”、“马后练衣”、“西陵教蚕”等等。在宫中举行宴席时，乾隆帝还让后妃们以“宫训图”中的人物为内容，联句赋诗。后妃母家人虽不时蒙得赏赉，也不乏高官显宦，但都不敢过于弄权。

二、平靖边疆 谨守国门

雍正年间曾大规模的“改土归流”，将许多世袭的土司改为流官。雍正末年，由于某些善后工作不妥，贵州云南等地的少数民族苗族又发生叛乱，清廷派刑部尚书张照前往平叛。他反对鄂尔泰所推行的“改土归流”的政策，密奏“改流非策”，甚至提

出要将大片西南土地放弃。他不懂军事，混乱纷更，故虽大兵云集，却旷日无功，苗族西南叛乱的规模越来越大。乾隆帝即位不久，听到这种不好的消息，颇为震怒，决心调整布置平定叛乱。他断然下令将张照逮治下狱，另派张广泗经营苗疆。

张广泗是治苗的老手，经过通盘筹算后，制定了“暂抚熟苗，力剿生苗”的策略。乾隆帝很赞赏他的计划，命他照计划行事。张广泗号令严明，对苗众先分首恶、次恶、协从三等惩治，因此进军所向克捷。张广泗的捷报传来，乾隆帝笑容满面，立命张广泗为贵州总督，兼管巡抚事。乾隆为照顾苗民的习俗和安抚他们，又规定苗民诉讼，仍按苗俗审理，不拘律例。初次用兵即获大胜，这使得乾隆帝对用兵增强了信心。他在位期间，多次对边疆用兵，虽损失惨重，但总算都取得了胜利。他在晚年自诩“十全武功”，就表现了他对用兵胜利的沾沾自喜的心情。

在乾隆帝在位的60年间，他多次对边疆和属国进行征讨，这成了他政治生涯中极为重要的内容。

乾隆十二年（1747），大金川首领莎罗奔公开叛乱。乾隆帝命张广泗为四川总督，全力进剿。莎罗奔负险顽抗，清军多次失利。乾隆帝又派大学士讷亲前往督师。讷亲趾高气扬，一到前线，就严令三天攻下叛军核心据点刮耳崖，否则以军法从事。结果是损兵折将，讷亲自感失误，从此不敢自出一令。张广泗受了讷亲的斥责，对讷亲不知兵而事权反出己上感到不满，故负气推诿。过了半年，银饷花费不计其数，而战功却无。乾隆帝大怒，立命将张广泗逮治来京，说他“负恩忘国”，按律斩首。接着传旨，命讷亲回奏。讷亲尽把责任推给张广泗。乾隆帝将讷亲的奏折掷到地下，命侍卫到讷亲家，取出讷亲祖父遏必隆的遗剑，派人送往

军前，令讷亲自裁，之后，乾隆帝另派大学士傅恒为经略，增派军队，和岳钟琪分两路进剿。莎罗奔乞降，大小金川遂告平定。乾隆帝十分高兴，对傅恒优诏褒奖，把他比作平蛮的诸葛武侯，封他为一等忠勇公，岳钟琪封为三等威信公。在凯旋时，乾隆帝命皇长子和诸王大臣郊劳，他亲自在紫光阁行饮至礼，并在丰泽园赐宴随征将士。

乾隆三十一年（1766），大金川再次叛乱。乾隆帝命四川总督阿尔泰率军往剿，多年无功。乾隆帝下令杀了阿尔泰，另派大学士温福督师，以尚书桂林为总督再征大小金川。用兵数年，劳师靡饷，清兵接连受挫。乾隆三十八年（1773），乾隆帝因温福已战死，桂林无功，遂以阿桂为定西将军，严令剿灭叛匪。乾隆四十一年，（1776），阿桂攻克了大金川的最后据点噶尔崖，叛乱被平息。叛乱头目索诺木和莎罗奔率家族 20 余人出降。阿桂献俘京师，乾隆帝御午门受俘。索诺木和莎罗奔被凌迟处死，其家族人等有的被杀，有的被监禁，有的被发边为奴。乾隆帝封阿桂为一等诚谋英勇公，并画像入紫光阁。此役后，改大金川为阿尔古厅，小金川为美诺厅。

乾隆二十年（1755），乾隆帝派兵平定准噶尔部的叛乱。康熙帝和雍正帝对准部多次用兵，但未根本解决问题。准部时服时叛，成为清廷一块很大的心病。在厄鲁特蒙古内附后，乾隆帝感到形势有利，遂命班第为定北将军，以归附的阿睦尔撒纳为定边左副将军，分两路向准噶尔部进攻。准噶尔军纷纷投降，接应清军。清军兵不血刃进入伊犁。叛乱头目达瓦齐见势不妙，率数十人往南疆逃窜。南疆维吾尔族各部纷纷响应清军，摆脱准噶尔的统治。达瓦齐逃到乌什，被维吾尔人民擒获，押送清营，继而被

解送北京。乾隆帝痛斥了达瓦齐叛国的罪行，但为了照顾民族关系，赦免了他的罪过，还封他为亲王，让他住在北京，受到很好的待遇。

乾隆帝在平定了达瓦齐的割据势力后，为了削弱准噶尔部的割据势力，把厄鲁特四部封为四汗，使各管所属。但是，阿睦尔撒纳自恃平叛有功，一心想当四部的总汗。乾隆未答应他的这种要求，但给了他特殊的荣宠，晋封他为双亲王，食双俸。他仍不满足，制造分裂的野心恶性膨胀起来。他不穿清朝官服，不挂清朝官印，行文各部“以总汗自处”，积极准备叛乱。乾隆二十年（1755）九月，乾隆帝命他到避暑山庄入觐，想调虎离山，消患于未然。阿睦尔撒纳看出了清廷的用意，在半路上逃回，公开打出了叛乱的旗帜。

叛乱迅速扩大，驻守伊犁的班第兵败被杀。乾隆二十二年（1757），乾隆帝命衮札布为定边将军，出北路；命兆惠为伊犁将军，出西路。清军长驱直入，锐不可挡。阿睦尔撒纳仓皇逃入俄国。后来，他因患天花病死，俄国把他的尸体送给清廷。

南疆接着又发生了大小和卓木的叛乱。大小和卓木就是霍集占兄弟。他们是南疆的宗教首领，在维吾尔族中有很强的号召力。叛乱爆发后，迅速蔓延，乾隆帝派往南疆的使臣也被杀害。兆惠刚平定了天山北路，乾隆帝又命他立即率军赴南疆平叛。兆惠率领的清军仅 3000 人，被霍集占率领的 1 万多叛军围困在黑水。包围历时 3 个月，叛军始终未能攻破。乾隆帝命驻守乌鲁木齐的将军富德赴南疆增援。霍集占在清军的内外夹攻下迅速土崩瓦解，霍集占兄弟被当地部族所杀，这场叛乱最后被平息。

乾隆帝鉴于准噶尔部屡次发生叛乱，便于乾隆二十七年

(1762) 在惠远城设伊犁将军，总辖新疆南北两路事务，从而加强了中央政府对新疆的统治。

乾隆年间，清廷与周边国家也时有战事发生。乾隆帝在平定了大小金川的叛乱后，又命阿桂赴云南，与云贵总督李侍尧勘定中缅边界。因叛乱者有不少人逃往缅甸，乾隆帝命他们整修战备，向缅甸索要叛人。缅王孟驳闻讯十分恐慌，马上遣使奉表入贡，表示愿意献还俘虏，只请求开关互市。乾隆帝答应了缅甸的要求，但缅人只将叛人放回了一半。乾隆帝遣使切责，缅甸新王孟云慑于中国的军威，便遣使奉金塔一座，驯象八只和宝石、番毡等物求贡，并将叛人全部送回。乾隆帝十分高兴，乃颁诏封孟云为缅甸国王，并谕暹罗，不可与缅甸继续构兵。从此以后，缅甸和暹罗二国都臣服清朝，不敢轻易发动战争。

乾隆二十六年(1791)八月，廓尔喀侵略军进犯西藏，深入到日喀则，占领了札什伦布寺，将六世班禅遗留的金银财物、法器珍宝抢劫一空，并到处烧杀抢掠，使西藏僧俗人民遭受了极大的灾难。乾隆帝闻讯后，即派福康安为将军，海兰察为参赞，调兵入藏，迎击入侵的敌军。清军所到之处，受到西藏人民的支持和欢迎，达赖喇嘛还亲自带领僧俗人等协助作战。清军很快将廓尔喀侵略军逐出西藏，并越过喜马拉雅山，到达距加德满都仅20英里的纳瓦科特。廓尔喀统治者遣使求和，表示今后永不侵犯西藏，并归还掠夺的金银宝物。福康安奏请乾隆帝谕示，乾隆帝接受了廓尔喀的停战条件，命福康安撤兵返回西藏。

乾隆帝感到西藏地方政府太腐朽，无力阻止外来侵略，行政体制也存在着不少弊端，遂命福康安与达赖、班禅共定西藏善后章程，这就是著名的《钦定西藏章程》。它成了中央政府为西藏

地方政府制定的最高法律。乾隆还提高了驻藏大臣的权力，对防止西藏农奴主贵族搞分裂割据有重要意义。还密切了中原与西藏人民的关系，加强了清朝中央政府对西藏地区的管辖。乾隆皇帝为迅速击退廓尔喀的侵犯，为西藏问题的妥善解决感到十分高兴，特晋封福康安为武英殿大学士，封为贝子。

乾隆帝对自己的武功很得意，亲自撰写了《十全武功记》。乾隆五十七年（1792）十月，他命人建造碑亭，以满、汉、蒙、藏四种文字铭刻碑上，以昭示他的武功。所谓“十全”，是指两平准噶尔、定回部、两定大小金川，靖台湾，服缅甸、安南，两服廓尔喀，合计为十。他自诩为“十全老人”，并镌刻了“十全老人之宝”。他凭藉清初发展起来的国力，东征西讨，使清朝的国势在乾隆年间达到极盛时期。

乾隆在注意巩固边疆与周边国家关系时，对这时已来到东方，进而叩响中国大门的西方殖民主义者也给予了足够警惕。

清朝在康熙帝统一台湾后，开四口与外国通商，中外贸易一时呈现出兴盛状态。乾隆初年，英国商人来华贸易的越来越多，他们与中国的行商相勾结，经常干一些违犯中国法律的事。乾隆二十二年（1757）十一月十日，因英商洪任辉“屡次抗违禁令”，乾隆帝传谕外国商人，以后只准在广州一口通商，禁止外商再往厦门、泉州、宁波三地贸易。两年后，乾隆帝命臣下制定了《防范外夷规条》，史称“防夷五事”。其大体内容是：禁止外商在广州过冬；外商必须接受中国行商管束稽查；禁止外商雇用役使中国人；外商不得雇人传递信息；外商不得在广州自由出入等等。同时，在广州设立保商制度，保商都由官府派遣，凡外来人员、船只、货物和纳税等事，都由保商担保。还规定，金银、五谷、

丝斤等物一律不得出洋。后世人们所常说的清代的“闭关政策”，主要就是指乾隆帝所颁行的这些法令和措施。

当时，英人在对华贸易中居于主导地位，贸易额也最大，广州的中国行商欠英商债款的纠纷不断发生，乾隆帝颇为恼火，命广东地方官对外商和中国行商严加控制。外商在中国发展贸易愈加困难。为了发展对中国的贸易，英国决定派高级使臣来华，这就出现了历史上有名的马戈尔尼来华事件。

乾隆五十八（1793），以为乾隆皇帝祝寿为名，英王遣马戈尔尼出使中国。此人富有外交经验，曾出使过俄国，并且在印度任过长官。为了显示英国文明程度高，所带贡品都经过精心选择，主要是天文、地理仪器、钟表、图象、军器、音乐、器皿等物，共19件，价值1.3万英磅。为了显示马戈尔尼地位隆崇，除了东印度公司派有两艘船以外，另派兵船一艘。在启程来华之前，东印度公司先期通知两广总督，由总督奏达乾隆皇帝。乾隆帝听说大英帝国遣使为自己祝寿，满心欢喜，传旨准英使由天津入京朝觐。

马戈尔尼一行由广州经舟山，到达山东登州海面。当地官员上船迎接，并向英使宣读乾隆帝的谕旨。因为这时正值夏季，乾隆帝正在承德避暑山庄，马戈尔尼则表示，他愿意“敬赴山庄叩祝”。

马戈尔尼八月初到热河，但关于觐见礼仪问题却颇费周折。乾隆帝要臣下导英使行“三跪九叩”礼，马戈尔尼认为不合英国礼俗，拒绝接受。为此，乾隆帝大为不快，要臣下传谕英使，既然来中国，就要遵守中国法度和礼仪。乾隆帝认为英使“妄自骄矜”，下令“全减其供给”，实际上是向英使施加压力，预示着这

次朝觐有夭折之势。最后达成折衷办法，许英使跪一膝行礼。

农历八月十日正式觐见。马戈尔尼向乾隆帝呈递了表文，奉献了礼品。乾隆帝回赠英王的礼物也很多，对马戈尔尼本人也厚加赏赉，并赐予一道敕书。马戈尔尼虽然在热河一个多月，但关于商务问题却一直未得表达。回北京以后，马戈尔尼书面提出六项要求，其主要内容是要扩大贸易，增加通商港口，允许英人在广州居住，请允许占用一小岛贮存货物，允许传教士在各省传教。乾隆帝回复了英王来书，断然拒绝了英人要求。特别是对英人想占用中国岛屿之事，乾隆帝更是严词申谕：“天朝尺土，俱归版籍，疆址森然。即岛屿沙洲，亦必画界封疆，各有专属。”乾隆帝在敕谕中反问道，倘若别的国家纷纷效尤，也要中国赏给岛屿以住买卖之人，怎么都能答应它们的要求呢？

对英国殖民者的领土要求，乾隆帝作出如此严正的回答，维护了中国的主权和尊严。马戈尔尼感到所求无望，遂于九月三日离京返国，颇有怨望。

乾隆年间，西方国家中除了英国遣使来华外，其他不少国家也都曾遣使来华。乾隆十八年（1753），葡萄牙使臣巴哲格来中国。乾隆帝对葡使颇为优遇，特令沿途供应“量从丰厚，以示怀远之意”。乾隆帝还特派内务府郎中和德人钦天监监正一起到广州迎接。乾隆帝在回复给葡王的“敕谕”中，除了表达友好的语言以外，有关通商诸事全未涉及。

乾隆六十年（1795），荷兰以祝贺乾隆御极六十周年为名，派德胜为正使来华。乾隆帝认为“此系好事”，特令广东地方官派人沿途护送，妥为照料。军机处官员验礼品后，颇嫌菲薄，认为都不是贵重之物。乾隆帝未予计较，仍照常予以赏赐，还赐予使

臣一个亲笔写的“福”字。

三、风流天子 香妃殉节

乾隆帝边疆用兵，连传捷报，再加上连年风调雨顺，海内升平，他俨然感到自己是个太平天子。因此纵情享乐，干出了不少风流韵事。康熙时曾修建了一处畅春园，赐给了当时还是藩王的雍正帝，后赐名为圆明园。雍正帝即位后，对圆明园大加扩建，添了不少的楼台亭榭。现在轮到了乾隆帝，他拨出库中大量白银，命工部规划大规模扩建。一时集中了大批的能工巧匠，费了无数心血，在什么地方植树，什么地方栽花，某处凿池，某处叠石，点缀得优雅别致，不论春夏秋冬，都感到相宜。乾隆又责成各省督抚，搜集了无数的珍禽异卉，古鼎文彝，一齐陈列园中，供皇家人员玩赏。园林告成后，乾隆帝奉了太后，到园中游玩。他还发了一道圣旨，自后妃以下，凡公主、宗室、命妇以及近属，都准入园游玩。

这一天，时值春季，风和日丽，乾隆帝护着皇太后在前，后妃公主等在后随行，两旁迎驾的人统已站定，妇女个个都打扮得花枝招展。其中一位命妇，鸭蛋脸，弯弯的眉毛，鼻子丰润，粉腮上还有两点酒窝，鬓边插着一朵红花，娇楚动人。乾隆帝看到这个美貌妇人，心神飘荡，正不知怎样是好。因当着众人，不便细问，只呆呆地看着。一会儿，皇后到那丽人跟前，称她为“嫂嫂”，乾隆帝这才忽然想到，那个丽人正是内务府大臣傅恒的妻子。在随意闲游时，傅夫人跟在皇后后面，乾隆帝不时回头。傅夫人也有意无意地瞻仰御容。回宫后，乾隆帝的眼前常常现出傅

夫人那妩媚的面容来，因而连朝政也赖得去处理，整天无精打采。

在皇后生辰那天，乾隆帝的精神忽然振奋起来，因为傅夫人这天要进宫为皇后祝寿。这天在坤宁宫开宴，为皇后庆贺千秋节。乾隆帝早早地退了朝，到坤宁宫入席，与傅夫人又是联诗，又是让酒。自此以后，傅夫人常常被召入宫，陪皇后散心。日子一久，傅夫人就常留在宫中歇息。其间，乾隆帝不时与傅夫人偷偷寻欢作乐。一些宫女虽然心里明白，但不敢声张。

乾隆帝为了与傅夫人可以经常偷情，多次派遣傅恒至边疆统兵作战。后来，傅夫人生下一子，满月时抱入宫中，请乾隆帝赐名。乾隆帝看这个孩子肥硕强壮，面容很象自己，故十分宠爱，赐名叫福康安。以后福康安8岁时，乾隆帝即让他在御书房和皇子们一起读书，12岁时便被封为贝子。长大后被封为大将军，多次受命出征，终乾隆一朝受到乾隆无微不至的呵护。

时间长了，皇后渐渐悟出了其中的蹊跷，但为顾全面子，又因傅夫人是他的嫂子，不好说破，只得把苦水咽在肚里，加上立为太子的儿子和另一个儿子先后夭折，更是整日里闷闷不乐，面容也显得一天天地憔悴起来。

乾隆帝与富察皇后原本十分恩爱，只为了傅夫人的事，二人才稍稍乖离。乾隆帝为了给这位富察皇后解闷，便下旨东巡，谒孔陵，祭泰山，游览了不少名胜。尽管景色宜人，但富察皇后总打不起精神，时时忘不掉死去的儿子。在旅游中受了一些风寒，遂一病不起。随行的御医无论怎样用药，总不见皇后的病情好转，反倒一天天加重起来。乾隆帝感到很焦急，立命回銮。沿途又找山东的一些名医诊治，都无效验。刚到德州，皇后就死了。

乾隆帝感到十分悲痛，扶棺大哭。回京后治理了丧事，谥号孝贤皇后。

富察氏虽然身为皇后，但平时很节俭，穿衣从来不挂珠翠。后宫中人大都有用金银线缀成的荷包，她认为已属奢侈。她每年送给乾隆帝的佩囊只是用鹿皮制成，其用意在于清人起身于关外，寓有不可忘本的意思。因此，乾隆帝对这位皇后格外敬重，之所以谥号“孝贤”二字，正是为了褒奖她的贤淑。

因孝贤皇后早逝，乾隆帝对皇后母家格外恩遇。皇后的兄弟不是封侯，就是封伯，皇后全家有 14 人得到爵位。几乎达到了“外家恩泽古无伦”的地步。

有关乾隆帝的风流佳话中，传闻最多的莫过于香妃了。乾隆二十三年（1758），南疆发生了霍集占兄弟的叛乱，乾隆帝派兆惠等人前往镇压。第二年叛乱被平息。兆惠俘获了霍集占的妃子香妃。她身上生来就有一种异香，不用涂脂抹粉，香气袭人，人们因而称她为香妃。乾隆帝的后宫虽说嫔妃成群，但却没一个有这种天然香味的。兆惠俘获香妃后，为了取得乾隆帝的欢心，立即派人密折奏闻。乾隆帝闻报大喜，命兆惠尽快送往京师。因路途遥远，怕长时间风霜跋涉有损香妃的容颜，命兆惠派可靠的人好生护送，并谕示沿途地方官，要好生安排香妃一行的食宿起居。

香妃到京后，宫监将她引入内宫，进见乾隆帝。果然是玉容未近，芳气先来，这种芳气既不是花香，也不是粉香，而是一种奇芬异馥，沁人心脾。宫监让她到御座前行礼，但她全然不睬，只是泪眼汪汪，令人十分怜爱。乾隆帝说她生长在边远地区，不懂朝中礼仪，遂命不必苛求。按照乾隆帝的意思，宫监将香妃领

入西苑居住。之后多次派能言善辩的宫女劝说，但香妃或面若冰霜或只是垂泪。再到后来，香妃对前来劝她的宫女说，如果皇帝逼她，她就用匕首自杀。甚至还说，她不想白白地死去，即使自杀，也要再杀一个足以抵得上她的前夫的人。

乾隆帝本人也不时到西苑小坐，希望时间一久，她那思念前夫之心就会消失。一遇到什么节日，香妃就暗暗地落泪。乾隆帝见此情状，回来与和珅计议，以后香妃的饮食起居，完全按照回族人民的传统格式，吃回式蔬菜，穿回式衣服，另选派回族妇女对她好生侍候。按照乾隆帝的命令，在西苑为香妃建起回式的房屋，还修建了回教礼拜堂，想以此取悦于香妃。有时，乾隆帝还派人领着香妃到风光秀丽处去游玩。可以说，凡是想得出来的办法都用上了。但是，尽管乾隆帝百般劝诱，但香妃始终不肯屈从。

皇太后听说了这件事，生怕香妃在深更半夜里刺杀了自己的儿子，便把乾隆帝召入内宫，对他说：“这位妃子既然不肯屈服，你就不如杀了她以成全其志向，要是不的话，就干脆把她放归乡里，还让她住在宫中干什么呢？”乾隆帝明知香妃志不可屈，但总舍不得杀了她，也不愿意让她回乡。

这样停了几年，倒也无事，在冬至那天，乾隆帝去天坛举行圜丘大祀，皇太后趁机派人把香妃召入慈宁宫。香妃入宫后，皇太后命人把大门上了锁，虽皇帝来也不得入内。皇太后把香妃召至跟前说：“你志终不肯屈，那末你到底想怎么着呢？”香妃答道：“只愿一死！”皇太后见她说得坚决，就说：“那末我就赐你一死，行吗？”香妃马上跪下叩头说：“太后遂了我的这个志向，恩德比天地还大。”说着说着，泪流满面。皇太后一时也感到非

常难过，遂命人将香妃引入旁边一间小屋，梁上系着细绳，让香妃自缢而死。

这时乾隆帝正在天坛大祭，忽听下人飞马来报，说香妃被皇太后锁在慈宁宫，生死不知。乾隆帝闻报大惊，大礼还未做完，即命驾仓忙回宫。因宫门已上锁，无法进入，乾隆帝遂在宫门外大哭。不大会儿宫门开启，皇太后命人领乾隆帝进入，这时香妃已经气绝。但她肤色仍象活时一样，脸上似乎还含着笑容。乾隆帝见状十分悲痛，命人置备棺木，以妃礼厚葬。

四、宠信和珅 笼络文人

和珅是乾隆第一权臣，从后来被查抄的财产来看，也是中国第一号大贪污犯。他之所以能骄横跋扈，自然是因为深受乾隆帝宠信所致。但是，乾隆并不昏庸，而是一个非常老练刚毅的皇帝，怎么能对和珅的奸贪毫无觉察呢？更何况，即使不算和珅当侍卫小官的年月，仅从进入权力核心算起，和珅弄权亦有 20 余年，如果说乾隆帝毫无觉察，那是不可能的。奇怪的是，乾隆帝对和珅却一直宠信不衰，其中必有极深的原因。

据某些野史记载，原来，雍正帝有一个妃子，长得十分娇艳美貌。那时，乾隆帝是个年近 20 的皇子，一次因事进宫，从这个妃子身边经过。这个妃子正在对着镜子梳发，乾隆帝忽地从后面将她的头抱住，用两手捂住她的两眼。其实，乾隆帝只是与她开玩笑，说不上有什么不正的心术。这个妃子不知道是乾隆帝，一时惊慌，用梳子向后击去，正打在乾隆帝的额头上，还留下了一个小伤痕。第二天，乾隆帝进宫去看她的母亲。他母亲即雍正

帝的皇后，皇后见他额头上有个伤痕，问是怎么回事，乾隆帝支支吾吾地不想说，但经不住皇后的再三盘问，就把事情的经过说了出来。皇后一听大怒，怀疑这个妃子调戏太子，立命将妃子赐死。乾隆帝十分惊慌，想坦白承认是自己的过错，不能责怪这个妃子，但又未敢直说。踌躇了半天，未想出好法。当他跑到妃子住所的时候，这个妃子已经上梁自尽。乾隆帝非常悲痛，用手指在妃子颈上按上硃印，默默地说：“是我害了你，魂如有灵，等20年以后再来与我相聚。”说罢，满怀悲痛回到自己的住所。

乾隆中期，出身于满洲正红旗的和珅在銮仪卫当差役，即为乾隆帝抬轿子，地位很低。有一天，乾隆帝到圆明园中去闲逛，起初天气有些阴，不觉得炎热。但是到了中午，云开日出，遍地阳光，顿感炎热起来，仓猝间却找不到黄盖。乾隆很生气。正在这时有人马上送上了黄盖。乾隆一看来人，是个美貌少年，唇红齿白，是个美貌少年，就问：“你何人？”来人应道：“奴才名叫和珅，是满洲官学生，现充銮仪卫差役。”乾隆觉得此人面熟，似乎在什么地方见过，但又一时记不起来。回宫以后还一直惦念着这件事。他忽然想到，和珅的面貌与那个妃子相似。于是，便密召和珅入宫，令跪在跟前，反复端详，果然相似。再看和珅的颈上，也有一个痣，宛如手指的印痕。这时，乾隆帝便认定和珅是那妃子的后身，倍加怜爱。经询问，知道和珅颇通文墨，于是立即提升他为宫中总管。

和珅骤升要职，自然十分感激，侍奉乾隆帝十分尽心。乾隆帝常令他跟在身边，有问必答，句句称旨，乾隆帝心里也格外高兴。和珅日受宠任，乾隆帝似乎日夜少他不得，乾隆帝似乎感到，对和珅宠爱一分，就能减轻一分自己对那位妃子的负罪

感。原来，身为皇帝的乾隆帝信奉佛教，很迷信佛家生死轮回的学说。他既然把和珅看成了那妃子后身，那末他觉得在和珅身上多施恩德，就等于是对那妃子的报答。在这种心理的支配下，和珅便直步青云，后来更为所欲为。

和珅本来只是一侍卫，乾隆帝不久就把他提为户部侍郎。和珅口齿伶俐，办事干练，处处合乾隆帝的意，只是贪墨成性，要他去掌管户部，侵渔货财十分方便，所以不久就遭到御史们的弹劾。你一本，我一本，说和珅如何贪脏，如何欺君，但乾隆帝全当成耳边风。乾隆帝甚至还对和珅说：“你我是一家人，你喜欢多要几个钱，也无妨，那些御史们说，就让他们说去。”得了乾隆帝这话，和珅的胆子就更大了。外廷臣僚见参劾和珅不但无效，反而和皇帝越发亲热，甚至晚上他还陪乾隆帝在御书房睡觉。这样一来，任凭和珅如何贪没，如何弄权，也没人敢弹劾他了。

和珅很快被提升为军机大臣，在乾隆后期执政达 20 余年，累官至文华殿大学士，封一等公。和珅的弟弟和琳也迅速飞黄腾达，由一个生员升为兵部侍郎，不久又升为工部尚书，乾隆末年还曾代福康安为主帅。在外人眼中，和珅一家与乾隆皇帝简直就是一家人，由此谁还敢再说半个不字。

乾隆帝无论到哪里去，总要把和珅带在身边。后来，乾隆帝把自己的第十个女儿和孝公主嫁给和珅的儿子丰绅殷德。和孝公主最受乾隆帝喜爱，乾隆帝出猎或微行时，常把和孝公主带上。和孝公主好穿男子的服装，骑马射箭也是好样的，又伶牙俐齿，遇到乾隆帝有什么烦恼事，她三言两语就使乾隆帝转愁为喜。乾隆帝把自己最喜爱的女儿嫁到和珅

家，使和珅更加有恃无恐。有一次他们同行市中，衣铺中挂着一件大红呢夹衣，和孝公主很喜欢，说了一句好，和珅便立即买了下来，花了 28 两银子，双手捧给和孝公主。乾隆帝微微一笑说：“你又要大人破费了。”和孝公主高兴，和珅比他还高兴。

和珅与乾隆帝做了儿女亲家，更加横行无忌。朝中大臣，多是和珅党羽。他家中的积蓄，比皇帝家里还多。他的一些家奴在京师横冲直撞，无人敢惹。有一个叫刘全的家奴，仗着和珅的威势四处勒索，家资万贯。御史曹锡宝上了一本，未敢直接弹劾，只是弹劾他的这个家奴。乾隆帝命廷臣勘查，廷臣怕得罪和珅，也不仔细查问，就说曹锡宝风闻无据，反而加给他一个妄言的罪名。像和珅的一个家奴都参劾不倒，谁还敢对和珅怎么样呢！

直到乾隆晚年，和珅一直受宠不衰。乾隆六十年（1795），要禅位给嘉庆皇帝，这使和珅吃了一惊。和珅极力劝阻说：“内禅的大礼，前史上虽有所闻，但也并没有多少荣誉。现在皇上精神矍铄，身体康健，再过上一二十年禅位不迟。皇上多在位一日，百姓也多感戴一天，我等奴才也愿皇上永远庇护。”话说得面面俱到，十分恳切。以前，和珅怎么说，乾隆帝便怎么行，但这次却坚决不从。乾隆帝对他说：“我这次决心已定，不用再多说了。我和你有缘分，所以能这样长久相处。如果换别的人，恐怕就不许你这样了。以后你检点一些为好。”在乾隆帝当太上皇的 4 年间，嘉庆未处治和珅。等乾隆帝一死，嘉庆帝立即将和珅抄家，和珅被赐死。和珅被抄家产达 8 亿多两白银，包括嘉庆帝在内，朝野上下

无不吃惊。所以当时流行一句谚语说：“和王珅跌倒，嘉庆吃饱。”

乾隆帝在这时也搞文字狱，但他更多的是对汉族知识分子采取一系列笼络的政策。其中主要手段之一就是编书。一是开“三通馆”，编纂了大型的典志书《续通典》、《续通志》、《续文献通考》。二是开“四库全书馆”，历时15年，编成了我国历史上最大的一部丛书——《四库全书》。集中了当时大批名流学者，其中最著名的有：纪昀、于敏中、王念孙等。《四库全书》在我国文化史上占有很重要的地位，保存下来许多有价值的典籍。后人在利用这套大型图书时，自然会联想到乾隆帝对中国文化的贡献。但是，乾隆帝也正是在编这套图书的同时，对中国古代文化典籍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清查和销毁。

据记载经他批准销毁的书籍“将近3000余种，6.7万卷以上，种数几与四库全书相埒。”象顾炎武、黄宗羲、黄道周、张煌言等人的著作都在违禁之列。

乾隆帝把大批著名文人集中到京师，与他们中间的某些人建立了密切的来往。作为二十四史之一的《明史》，经康熙、雍正两朝的编纂，乾隆初年已基本完成。在刊印时，乾隆帝常亲自校勘。明史馆的人员便故意在明显处错写几字，待乾隆帝去改正。乾隆帝也为自己校出错字而高兴。但是，经他一过目，就成为“钦定”，其中有些故意写错的字未被校正过来，只好将错就错。现在《明史》清宫刻本常有错字，原因就在这里。

乾隆通过编书一方面密切了与知识分子的往来，笼络了

一批知名文人，另一方面又使他们穷经皓首，整日埋头于古纸堆中，从而达到了一箭双雕的目的。

乾隆帝在位的60年间，无论文治还是武功，都有数端功绩可述，况且在位时间之长古来罕见，他对此十分得意。乾隆四十五年（1780），他70高龄，自称“古稀老人”，并镌刻了“古稀天子之宝”。又因五世同居，所以又刻了“五福五代堂古稀天子宝”。乾隆五十年（1785），为庆祝自己御极50周年，特在宫廷举办“千叟宴”，特邀请朝野1000名年过古稀的人入宴，以粉饰升平。当他80高龄时，又镌刻了“八自耄念之宝”。他自称在中国历代帝王中，自己的年岁之高，在位时间之长，为自古以来所未有。到乾隆末年，中国人口达到了3亿多，这也是中国自古以来所未有。但乾隆帝却感到，这正是他统治下中国进入了太平盛世的表现。

乾隆六十年（1795），有一天乾隆帝把诸王大臣召入内廷，说自己准备把皇位传给太子，自己称太上皇。各位大臣极力劝阻。乾隆帝执意不允，为此专颁谕旨，说明自己决心要禅位的原因：“我25岁即位，当时曾对天发誓，如能在位60年，就将传位给嗣子，不敢上同皇祖61年的在位年数相同。现在初愿已偿，怎么还敢再生奢望呢？现立皇15子颙琰为皇太子，命他嗣位。我自应随时训政，不劳你等忧虑。”遂确定明年为嘉庆元年，命礼部制定禅位大典。因内禅为创例，清代未实行过，礼部只有参酌古制，定得冠冕堂皇，乾隆帝立批照行。

嘉庆元年的第一天举行内禅大典，乾隆帝在太和殿亲自将御宝授予嘉庆帝。诸臣先恭贺太上皇乾隆帝后，太上皇还宫。嘉庆帝遂登帝位，接受众臣朝贺，颁行太上皇传位诏书，

普免全国钱粮，并下诏大赦。

乾隆帝退位后称太上皇 4 年。嘉庆帝每遇有军国重事，都要亲到内廷请乾隆帝裁决。当时，由于社会矛盾激化，以湖北、四川为中心，暴发了全国性的白莲教大起义。乾隆帝留下来的实际上是一个掏空了的烂摊子。嘉庆四年（1799），乾隆帝寿终正寝，享年 89 岁。

仁宗爱新觉罗·颢琰

颢琰是清高宗乾隆的第 15 个儿子。乾隆二十五年（1760）十月初六日，颢琰诞生在圆明园的“天地一家春”。他长得高鼻梁，宽面颊，貌相俊秀。由于生活在富贵的帝王之家，他具有优裕的物质生活条件，自幼便受到了严格的贵族教育，举止端庄凝重，为人内向多思，因此很得乾隆器重。

一、内禅继位 惩处和珅

颢琰是在乾隆三十八年（1733）立为皇储的。乾隆按照雍正时定下的规矩，将颢琰的名字写在诏书上，然后把诏书密封起来，放在乾清宫“正大光明”匾额的后面。乾隆皇帝是个权力欲很强的人，身体又非常健康。一晃 20 年过去了，颢琰仍呆在皇储的位置上。在这期间，他被封为嘉亲王，逐步由弱冠少年越过了青年时代而步入了中年。乾隆六十年（1795），垂垂老矣的乾隆皇帝决定举行内禅让出帝位，自己退为太上皇，这种帝位交接

方式在清朝历史上是唯一的一次，在整个中国古代社会也不多见。

1796年正月，紫禁城里举行了庄严的内禅仪式，颋琰陪同乾隆到奉先殿等处行了礼，又在太和殿接过了乾隆亲授的宝玺。这样，他正式进入了皇帝的角色，年号嘉庆。然而，在登基后的最初几年，嘉庆根本谈不上有何作为。因为太上皇乾隆仍贪恋君临天下的权势，宣称自己健康状况依然很好，每天都是勤勉不倦地处理政事。所以继续把握着朝廷中的一切军政大权，各项用人理政的措施都要由他决断。直到嘉庆四年（1799）正月，89岁高龄的乾隆一命归天，嘉庆至此才开始亲政，成为真正的天下之主。

嘉庆从乾隆手中继承的，不但有君临天下的权势，还有夕阳西下、悲风不息的动荡时局。乾隆朝是清王朝盛衰的转折点。在康熙、雍正两朝文治武功的基础上，乾隆在他统治的前期励精图治，使清朝的统治达到了强盛的顶点，社会经济出现了繁荣景象，耕地、人口有了显著增长。乾隆中期，全国的耕地面积已经达到7.8亿多亩，超过了明末耕地的最高数字，比顺治时期增加了1/3左右。到乾隆末期，全国人口也急剧增加到3亿左右。在政治上，乾隆前期多次蠲免赋税，革除苛政，打击朝廷朋党，惩治不法官吏，一度出现了奋发有为的局面。但是，从乾隆中期开始，大清的国势走上了下坡路。

首先，吏治陷入了腐败的泥淖。乾隆陶醉于所谓的盛世景象之中，志满意骄，自以为是，对一些切责时弊，指陈自己过失的意见总是十分反感。一班朝廷大员为了迎合乾隆的虚骄之心，刻意粉饰太平，报喜不报忧，极尽阿谀逢迎之能事。乾隆的心腹重

臣和珅，任军机大臣 24 年，深得乾隆的倚重。他凭借手中的权柄，在朝野上下结党营私，顺我者昌，逆我者亡，横行不法。当时的官吏若想得到肥缺、尽快升迁，都要巴结和珅向他送纳重贿。和珅贪财嗜货，多方搜刮，聚敛了惊人的财富。由此上至朝廷，下到地方，贪赃枉法的风气十分盛行，和珅的所作所为只是其中的一个显要例子而已。乾隆为此曾诛戮了一批贪官污吏，其中包括不少督抚大员，但除此之外他并没有采取多少彻底的措施。因而逃避了法网的贪官污吏大有人在。官场上依然充斥着一片乌烟瘴气。

其次，土地兼并严重。土地兼并始于康熙中叶，到了乾隆后期，土地集中的现象已经极为严重。有人指出当时的状况是：占有土地的人还不到十分之一、二，其余十分之八九的人，不是沦为佃户，就是变成乞丐或流民。官僚地主占有着大量土地。如直隶怀柔的大地主郝氏，家有上等良田 1 万多顷，军机大臣和珅占田 8000 顷，甚至连他的奴仆也有人占田达 600 多顷。广大的贫苦百姓则多是没有立锥之地。失去土地的贫苦百姓在水深火热中挣扎，朝不保夕。嘉庆元年（1796）二月的一个夜晚，北京城就有 8000 多乞丐冻死在街头，其惨象令人触目惊心。与此同时，统治阶级的生活与贫苦百姓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乾隆皇帝喜欢炫耀，他先后 6 次南巡，又曾 5 次巡幸五台山，5 次告祭曲阜，7 次东谒祖陵，2 次巡游天津……，再加上连年用兵，耗资无数，劳民伤财。在皇家婚丧寿庆的仪式和众多的园林工程中，乾隆更是大肆铺陈，尽情挥霍。清初的社会风俗崇尚俭朴，官僚地主们的穿着多用土布、黄麻制成，冬天穿皮衣的人也不多见。到了乾隆末期，社会风气由俭入奢，变化极大。官僚、地主、商人各阶

层无不沉浸在奢华的氛围中。在繁华的扬州城里，富商大贾们竞相挥霍，耗费巨资营建私宅，添置歌童舞女，平时总是华衣美食，炫耀浮器。统治阶级的纸醉金迷和贫苦百姓的倍受煎熬，预示着社会的衰败和动荡。

第三，社会矛盾尖锐，农民起义不断发生。在官僚、地主的残酷压迫和剥削下，社会矛盾激化了，下层人民的反抗斗争接连不断。乾隆中叶之后，先后爆发了山东王伦起义、甘肃少数民族起义、台湾林爽文起义、湘黔苗民起义等规模较大的武装斗争。下层人民各种方式的反抗斗争如澎湃汹涌的波涛，强烈冲击着清王朝的统治，使它日益走向衰朽。

上述情况表明，摆在嘉庆面前的形势是严峻的，要扭转衰败的政局、中兴国家大业的担子相当沉重。为了扭转衰败的政局，嘉庆皇帝以铲除和珅打响了亲政的第一炮。早在亲政以前，嘉庆已经洞悉和珅的奸佞贪婪，只是自己手中无权，无法对他采取行动。

乾隆的去世给当时的政局带来了一场转机。在乾隆去世后的第二天，和珅就被嘉庆撤除了军机大臣、九门提督的职务，遭到了软禁。御史王念孙等人此时纷纷出来揭发和珅的罪行，要求皇上将其严加惩办。他们的想法正对了嘉庆的胃口，在半月之内，嘉庆宣布了和珅的二十条罪状，将他逮进了大狱，随后又下令将他赐死。和珅的一班亲信，如福长安、苏凌阿、吴省兰等人，也分别被定罪降黜。

和珅被逮捕下狱后，他的家产被嘉庆下令抄没入官。和珅在他当权的20多年里，巧取豪夺，广蓄家私。他被抄没的家产共有109处，约有83处没有估价，仅算其中已估价的26处，价

值就达 2.2 亿两白银。后来有人估计，和珅的整个家产可折合白银 8 亿两之多。当时清政府每年的财政收入约 7000 万两白银，和珅一人的家产就相当于朝廷 10 余年的总收入，真是十分惊人。嘉庆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铲除了和珅，受到了许多人的赞许。人们在灰黯已久的现实中见到了一线曙光。

二、整顿吏治 倡导节俭

嘉庆皇帝注意从他父亲乾隆皇帝只倚重和珅一人，偏听偏信，犯下许多错误中吸取教训，意识到要扭转衰败的政局，单靠自己个人的智慧是不够的，为君者应该做到耳聪目明，集思广益，广泛听取臣子们的意见。于是他颁布谕旨，要求九卿科道官员中担负着进言职责的，对于用人行政方面有什么看法、建议，都要奏闻上来。为了鼓励臣子们敢于直言，嘉庆做了保证，表示自己不会轻易对进言者加罪。他说：“我既然提倡直言，若再对直言者加罪论处，那岂不是有意陷害臣子吗？”前内阁学士尹壮图、前御史曹锡宝当年分别因上疏指责和珅及其亲信的丑行而遭到贬斥。嘉庆在亲政后马上出面为尹、曹平冤昭雪，对他们的举动褒扬了一番。不久，陕西贡生何泰上书向嘉庆指出，应该黜奢崇俭，扭转日益趋于奢靡的社会风气。嘉庆表示赞同，特地赏赐了何泰 2 匹缎子。

长期以来，腐败堕落的吏治犹如附在病体上的毒疽，蠹国害民，为患匪浅。能否使吏治改观，也将是嘉庆能否扭转政局的一个关键。在整顿吏治方面，嘉庆下了不少功夫。他曾专门撰写了《义利辨》、《勤政爱民论》等文章，颁示给群臣。他认为，百姓

之所以敢于揭竿起事，大多是由于贪官污吏对百姓敲骨吸髓，为非作歹，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有戒于此，嘉庆在亲政之后对贪官采取了接连不断的惩治措施。湖北襄阳道员胡齐仑，在任期间经管湖北的军需供应，肆意侵蚀挥霍，亏空银两 20 多万，嘉庆断然将胡判处了极刑。嘉庆四年（1809），在一年的时间里，嘉庆就亲自过问处理了四、五起大的贪污案件。江苏淮安府的知县王仲汉，谎报县里户口，侵吞大量赈灾银两，并毒死了要揭发其罪行的查赈官员李毓昌，然后又勾结知府王穀，狼狈为奸，掩饰劣迹。此案暴露后，王仲汉、王穀都被处死，两江总督铁保被革职流戍。这一年，总管内务大臣广头、巡漕御史英纶因为贪婪卑污先后被嘉庆处以绞刑。工部书吏王书常，造假印、写假条，从户部冒领了数 10 万两白银！案发后，王书常被处死，有关大员禄康、费淳等人也遭到降黜。嘉庆坚持这样的原则：害民之官必宜去，爱民之言必宜用。一批为官清廉、勤勉称职的官员得到破格提拔重用，其中四川南充知县刘清就是受到嘉庆青睐的一位。嘉庆在审讯被俘的白莲教起义军首领王三槐时，得知刘清居官很得人心，百姓称之为“刘青天”。在对刘清考察了一番之后，嘉庆决定将他提拔任用。刘清后来历任四川建昌道员，山西布政使等要职，并在镇压四川白莲教起义的过程中发挥了不小的作用。

怠惰偷安、萎靡不振是乾隆末期官场上普遍存在的现象。嘉庆把这点视为国家的隐忧，认为必须要加以整顿。他多次告诫臣子们应该勤于职守，克己奉公。有一次，内务府官员在处理膳房的一件小事时，敷衍塞责，拖了 40 天才解决了问题。嘉庆得知此事后厉声斥责这帮官员：“几句话就可以了断的事情，奏折上也超不过百字，为何处理得如此拖沓？！”从嘉庆元年到嘉庆十一

年，直隶 24 个州县里被侵吞白银 31 万多两，经过查核，发现司书王丽南等人在此期间串通舞弊，伪造印章、串票，盗取银两，活动得相当猖獗。嘉庆痛斥直隶历任督抚大员：发生了这样严重的事情，你们竟然懵然不知，形同木偶，在任期间你们都管了些什么事！最后，按照其在任期间虚收银两数目的多少，将直隶历任督抚颜检、瞻柱、胡季堂等人分别治罪。

但是，嘉定惩治腐败与整顿吏治是不彻底的。他处理贪官污吏的措施中严惩不贷者有之，姑息宽容者更不鲜见。比如嘉庆在处理胡齐仑贪污军需一案时，发现永保、庆成、毕源等大员与此案都有牵连。这些人都有收取贿赂、侵蚀滥用国家公帑的劣迹，但在结案时嘉庆只严惩了胡齐仑一人，其余的大员或是因为祖上立有助功，或是因为已经故去，都免于深究。他们被抄没的家产，也大多被嘉庆加恩赏还。因此，吏治腐败堕落的局面并没有多少改观。

不过，嘉庆在当政的 20 多年里，对自己的要求却的确是非常严格的。他每天都要处理繁多的政务，孜孜不倦，从不懈怠。嘉庆十三年（1808）四月，嘉庆喜得皇孙，内阁因此有两天没有向他递送奏章，嘉庆马上对阁臣提出了批评。过了几天，端午节到了，朝廷大臣们又没有向嘉庆奏事，嘉庆大发脾气，亲自对各部院衙门进行查核，结果查明吏、刑、工等部都是有事不奏，嘉庆随即把有关官员交到都察院论罪议处。

嘉庆亲政伊始，朱珪曾向他提议要身先节俭，崇尚清廉，嘉庆后来对这一点始终比较注意。以往各省官员进京觐见皇帝时，按照俗例都要进呈贡物。官员们为了给自己邀宠求荣，竞相奉珍宝古玩，花样不断翻新。嘉庆四年（1799），嘉庆在惩办和珅的

同时，通谕内阁说：地方官员们操办的各种贡物，难道是自己掏腰包？想必都是从州县以下层层敲榨而来。官员们不断剥取于民间，百姓们怎能承受得了！况且呈献上来的古玩珍宝，饥不可食，寒不可衣，真是不如粪土。从此以后，凡是进呈违禁宝物的官员，都要予以惩处，决不能轻恕。他得知上年底由叶尔羌解运进京的大块玉石正在运送途中，随即传下谕旨，不论这些玉石运到了何处，都要放弃在当地，无须继续前行。同年，嘉庆还废除了年节时分大臣们进呈如意的规矩。他讲道：“年节时节大臣们进呈如意，是为了取意吉祥，我觉得这没有多大意义。大臣们觉得那些东西是如意，而我看上去反倒不如意。”

为了遏制奢侈之风，嘉庆身体力行，带头倡导节俭。在乾隆多次巡游地方时，各地官员为他修建了许多奢丽的行宫，嘉庆觉得这实在是过于铺张浪费。他认为，各地的行宫只是为了休息一宿而已，用不着刻意修饰。从经济上看，一处行宫若能省下三、四万两银子，十处可就是三、四十万两了。嘉庆十四年（1809），嘉庆在巡幸五台山之前特地打了招呼，要求地方官员在途中不得大肆铺陈，务必追求俭朴。同年，在庆祝他的50大寿时，嘉庆下令不准在民间广陈戏乐，巷舞衢歌。御史景德为了讨好皇帝，奏请祝寿期间京城演戏10日，以后作为定例，立即被嘉庆革掉了职务。嘉庆就此向大臣们指出：“我发现前代在这种场合的表现比较奢侈，总是要欢宴聚会，上演好多天的戏曲。我心里鄙薄这些做法，并将此作为自己的鉴戒。倘若我忘记了民间疾苦，奢侈地操办庆典，做臣子的应该上书劝谏，这是爱君之道。现在景德竟然向我提出这种建议，他把我当成了什么样的君主？”

对于众百姓的苦难处境，嘉庆是有所了解的，官逼民反的现

实更使他心有余悸。对于他来说，缓和尖锐的社会矛盾，安定百姓的生计，刻不容缓。乾隆中叶以后，随着国家的由盛转衰，政治腐败，经济拮据，广大的农村中，连年水旱，灾害频仍，严重地威胁着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对此，嘉庆告诫地方官员，灾情发生后要予以高度重视，认真抚恤灾民，即使花钱再多，也不要吝惜。事实证明，嘉庆在灾区赐赈蠲租时，的确是没有吝惜金钱。在治理黄河的工程上，嘉庆更是有巨额的花费，前后动用了4000多万两白银，自雍正朝以来，每年治河的工料费一般是60万两白银，从嘉庆十二年（1807）起，嘉庆将工料费骤增到每年160万两。他还屡次对吝惜费用而延误治河工程的事情提出批评。非但如此，嘉庆对治河工程也提出过一些合理的见解。他认为，治河的关键是要保证入海口地段畅流无阻。黄河以前出事，大多是由于入海口地段淤塞，下壅上塞，酿成灾患。因此，他多次提醒治河官员要注意这几点，认真组织民工挑挖疏导。

本来，由于国家积衰日久，国家积蓄并不富足，加上在镇压农民起义、治河、赈灾等方面又有很大开销，使财政更加吃紧，这便迫使嘉庆想方设法，开源节流。他下令裁减了一部分常备兵，节省军事开支。同时，继续实行捐纳制度。不过，嘉庆始终认为开捐决非良策，不过是损下益上之举，准备在川楚白莲教起义平定之后就予以停止（事实上，他并没有做到这一点）。对于增加盐价、赋税折银浮收之类的做法，嘉庆的态度基本上是否定的，他表示，食盐是人民生活日用品，一旦增加盐价，则人人都会受到扰累。因此对之要慎重考虑。赋税折银浮收会对国家财政收入有好处，但百姓要深受其害，贪官污吏又可以从中大做手脚。嘉庆十四年（1809），闽浙总督阿林保奏请漕粮加折收纳，结

果遭到嘉庆的一顿痛斥。清朝入关以来，八旗兵都驻扎在北京和其他大城市，依靠粮饷过活。随着八旗人口的不断增加，而兵有定数，饷有定额，结果逐渐产生了一大批闲散旗人。清政府又不允许他们从事各种生产活动，这批闲散旗人整日无所事事，游手好闲，吃喝玩乐，成为毫无自立能力的蠹虫。为了维护他们的生计，清政府不得不多次赏赐银两，增加兵额，背上了一个沉重的经济包袱。嘉庆经过筹划，决定将一批闲散旗人送到地旷人稀的关外，由官府拨给他们土地，他们可以把土地出租给佃户开垦，也可以自己耕种。但这些八旗子弟早已习惯于恣情享乐的城市寄生生活，如今连受领土地、坐收租息也不愿意，嘉庆的移垦措施最后只能以失败而告终。

三、镇压起义 闭关锁国

前面说过，嘉庆即位时，社会矛盾尖锐，农民起义不断发生，就在嘉庆元年（1796）他刚刚登上皇帝宝座，就爆发了震撼全国的川、楚、陕白莲教大起义。白莲教是唐末以来流传于民间的一种秘密宗教，当时在川、楚、陕等地相当盛行。白莲教的教义宣传世界上存在着明、暗两种对立的因素，它们分别代表善良、合理和罪恶、不合理，两种因素一直进行斗争，但最终光明一定会战胜黑暗。白莲教的教徒都自认是“无生老母”的儿女，应当同生死，共患难。灾难深重的贫苦百姓，为了寻找精神上的寄托，纷纷加入了白莲教。与现实相联系，白莲教徒们提出了“清朝已尽”、“日月复来属大明”等口号。清政府发现白莲教的发展对自己的统治构成了威胁，下令严拿白莲教徒，地方上的贪官污吏趁

机掀起了一股敲榨勒索百姓的歪风。比如四川达州知州戴如煌，派出 5000 多名衙役，以搜捕白莲教为名，肆意搜刮民财，弄得当地民不聊生。湖广武昌府同知常丹葵，在缉拿白莲教徒的过程中，暴虐贪横，残害百姓。对人稍有怀疑，就动用酷刑，将人钉在墙壁上，或者用铁锤猛敲身体，令人肝胆欲裂，痛不欲生。在其他地区，这些现象也不少见。于是，小规模白莲教起义不断发生。这次川、楚、陕白莲教起义首先在湖北宜都、枝江两县爆发，接着迅速扩大到襄阳，长乐、长阳等地，四川、陕西的白莲教组织也纷纷起义响应，白莲教起义的烈火汇聚成一片，声势浩大。起义军依靠广泛深厚的群众基础和川、楚、陕险恶复杂的地理形势，与清军周旋作战，摆疑阵、设埋伏、攻城池，机动灵活，行动飘忽，多次挫败了清军的围剿。

川、楚、陕白莲教大起义使太上皇乾隆极为震惊，他命令川、楚、陕各省的督抚将军率军全力镇压境内的起义军，并陆续抽调八旗兵和各省的绿营兵参战。然而几年下来，虽然投入了大量兵力，耗费了 7000 多万两饷银，白莲教起义的烈火却仍持续燃烧。这除去起义军方面的骁勇善战之外，在很大程度上与清军的腐败堕落有关。清朝军事力量的两大支柱八旗和绿营到此时已经严重丧失了战斗力，军纪腐败不堪。士兵们平素敲榨百姓、抢掠财物是无所不能，与起义军交锋时却毫无斗志，畏缩不前。军中将领侵吞军饷、贪赏冒功、懦怯避战的现象更是屡见不鲜。白莲教起义爆发后，在京的八旗将领曾一度踊跃请缨参战，但他们率军到了前线却只顾四处搜刮财物，根本不听军令约束，以致前线的清军将帅叫苦不迭，请求嘉庆赶快将这批京兵撤回去，以免影响作战。无奈之中，清政府只得组织地方武装乡勇团练来加强镇压白

莲教起义的力量。乡勇不是国家正规军，受到八旗和绿营的歧视。作战时乡勇被推到前面作替死鬼，战事结束后各种功劳却没有他们的份，乡勇对此心怀不满。这样反复围剿的结果，只能是徒自劳师靡饷！

嘉庆面对征剿不力、烽烟不息的形势，忧愤交加，寝食不安。亲政之后，他在总结以往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立即着手调整对付起义军的对策，嘉庆四年（1799），他惩治了和珅、戴如煌、常丹葵、胡齐仑等人，把“官逼民反”的罪责都推到了这些贪官污吏身上，借以平息民愤。他通谕清军将领，以往有的将领不以军务为重，投机钻营，冒功吞饷，今后对这些弊端要坚决杜绝。为了改变各路清军不相统属、作战行动难以协调的局面，嘉庆任命勒保为经略大臣，统一指挥川、楚、陕、豫、甘五省的军队。勒保在职的半年里，局势未见好转，嘉庆遂将勒保逮捕治罪，以明亮接管经略事务。明亮也是乏力回天，嘉庆又将明亮撤职代之以勒登勒保。在半年之内，嘉庆三次更换经略大臣，可见他镇压起义军心情的迫切。此外，嘉庆还严惩了一批作战不力的统兵大员。永保、景安、秦承恩、惠龄等人因为“纵贼”的罪名，或者被定为死罪，或者被遣戍边疆，或者被降级调用。以往运转不灵的清朝军事机器，在嘉庆的操纵下开始加速运转起来。

太上皇乾隆镇压白莲教起义一味实行军事围剿。嘉庆从几年的实践上看出这种做法并不能完全解决问题，于是采用了剿抚兼施的两手策略。嘉庆宣布“但治从逆，不治从教”，即对白莲教的活动不予禁止，但对白莲教起义军要坚决镇压，嘉庆几次下诏，允许一般起义军将士投奔朝廷，凡能擒获起义军首领归顺的，都可受到赏赐，临阵投降，或者是自行逃散的，也可以放归

乡里，安排生计。可是嘉庆的招抚政策并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白莲教起义军将士同仇敌忾，即使在作战不利的形势下也是咬紧牙关，浴血奋战，决不轻易向朝廷投降。这使得嘉庆感到非常恼火，他采用了坚壁清野政策。这项政策早在白莲教起义初期曾由明亮等人提出过，当时未被乾隆重视。嘉庆在亲政之后对这项政策加以充分肯定，下令在川、楚、陕、甘等地广为推行。坚壁清野的主要内容就是在起义军出没地区四处合并村落，修建堡垒，在山区扼险结寨，在平原地区掘壕筑堡，将百姓都驱赶到堡垒之中，清查户口，限制人员出入，强行隔断起义军与贫苦百姓的联系。寨堡四起之后，嘉庆又积极组织团练乡勇，扩大地主武装。他下令军中努力纠正以前的做法，不得歧视团练乡勇。凡乡勇立功、阵亡者都要同正规军一样对待。嘉庆推行的这些措施给白莲教起义军形成了严重威胁，起义军在人员的补充、给养的供给等方面都面临许多困难，游击作战四处受阻，清军在战场上逐渐占据了优势。

嘉庆九年（1804），白莲教大起义被镇压下去了。这次起义历时近十年之久，起义军纵横川、陕、楚、豫、甘5省，抗击了清政府从16个省调集的军队，使清政府耗费饷银2亿两，严重地动摇了清朝的统治基础。从此，清王朝陷入了武力削弱、财政窘迫的困境，嘉庆的日子愈发难熬。

就在川、楚、陕白莲教起义方兴未艾之际，湘、黔一带的苗民起义又掀起了澎湃的波澜。虽然起义规模较小，但此起彼伏，相互呼应，一直坚持到了嘉庆十二年（1807）。

嘉庆十八年（1813），北方大地又涌起了农民起义的风云，李文成、林清等人领导的天理教起义爆发了。天理教是白莲教的一

个支派，它的教徒按八卦名称分股活动，所以也称为八卦教。川、楚、陕，白莲教起义失败后，天理教首领李文成、林清等人积极活动，秘密组织反清起义。嘉庆十八年（1813）九月，河南方面不慎泄露了起义的机密，李文成身陷图圉，河南滑县的天理教徒遂提前举行起义，救出了李文成。直隶的长垣、东昌，山东的曹县、定陶随之也接连起事。嘉庆闻讯后急忙饬令直隶总督、河南巡抚率军前去镇压，可他万万没有想到，起义军战士竟然打进了北京皇宫！九月十五日，林清组织的一部分起义军化装潜入了北京城，然后按照原定计划，在内线太监的引导下分别由东华门和西华门闯进了宫中。他们白布裹头，高举“大明天顺”、“顺天保民”的大旗，奋勇冲杀。至今，隆宗门的匾额上还留有当年起义军射上去的一个箭镞。在起义军战士的喊杀声中，正在宫中南书房的皇次子旻宁和几个亲王慌忙组织侍卫抵抗，接着又有大批官军从神武门入宫，势单力薄的起义军战士经过一番苦战，抵挡不住优势敌人的攻击，进攻皇宫的战斗失败了。

宫中发生激战时，嘉庆正在承德避暑山庄。得到消息后，他震惊不已，马上急匆匆地赶回了北京。他颁布了“罪己诏”，惊呼这次事件“变生肘腋，祸起萧墙”，实在是旷古奇闻。紧接着，他下令严密搜捕林清等人，将林清诱捕处死。同时，又调集各路清军，对河南李文成领导的起义军进行血腥镇压。十一月，李文成在林县司寨被围，壮烈战死。天理教起义的火焰被扑灭了。

此时的清王朝不仅内乱不休，而且外患迭至。嘉庆当政时期、英、法等资本主义国家已先后完成了工业革命，正积极向东方拓展势力，古老的中华帝国成了西方殖民者觊觎的重要目标，商人、传教士、炮舰、鸦片纷纷涌来。对于西方殖民者对华的军

事挑衅，嘉庆始终保持了高度的警惕。嘉庆十年（1805），英国四艘军舰以为货船护航为名，闯到澳门和广东口岸，嘉庆立即训令两广总督要密切注意英国人的动向，不准其自由行动。嘉庆十三年（1808），英国又借口帮助澳门的葡萄牙人抵御法国人，派军队在澳门登陆，随后有3艘军舰闯到黄埔，200多名英国士兵和水手进驻了广州十三个行商馆。面临英国人如此嚣张的行动，嘉庆以日传五百里的特急军令，指示广东地方官员迅速整饬军备，在英国人面前要态度强硬。若英国人敢于违反约束，对他们将不惜动用武力剿办。广东的督抚大员吴熊光、孙玉庭措施不力，表现软弱，嘉庆毫不犹豫地革掉了他们的职务，并一再嘱咐继任官员到任后对涉外问题要悉心筹划，不能大意。嘉庆二十一年（1816），发生了颇有点滑稽色彩的阿美士德使团事件。这一年，英国派遣阿美士德率领一批人，带着一些外交、商务上的要求来到北京，要求觐见嘉庆，嘉庆允诺予以接见，但就在接见之前清朝官员与阿美士德等人在觐见礼节上发生了争执。清朝官员把阿美士德使团当作贡使对待，而英国人坚持不行三跪九叩大礼，双方形成了僵局。嘉庆十分生气，下令把英国使节立即遣送回国，负责接待的一班大臣也被严加议处。

另外鸦片这时已开始危害中国。鸦片本来是作为药品输入中国的，开始输入量也不多，直到雍正中期每年也就二百来箱。但自清中期以来，西方殖民者为了扭转在对华贸易中的不利地位，赢得巨额利润，开始不择手段地将大批鸦片运进了中国，乾隆时已达到每年四千箱左右。鸦片的大量输入使中国国内财政、军事、人民生活等方面都受到严重损害，嘉庆对此认识得相当清醒，采取了多种戒烟措施。嘉庆规定，外国货船来华贸易时，在

澳门要受到检查，并要由行商出具保证书，保证船上没有夹带鸦片。在内地，嘉庆多次下令严厉打击鸦片贩子，禁烟不力的官员必须受到惩处，那些吸食鸦片的人也要被治罪。

对于西方传教士在华的活动，嘉庆也予以多方限制。嘉庆十年（1805），一个名叫德天赐的西方传教士不听清政府的禁令，在内地刊书传教，结果被嘉庆下令押到热河加以囚禁。同年，嘉庆还下令销毁了一批西方传教士的经卷，惩处了对西方传教士约束不严的内务府大臣。嘉庆十六年（1811），嘉庆又下令，在华的西方传教士，除了在钦天监负责天文观测的以外，其余的都送到广州打发回国。

嘉庆在位的 20 多年，清王朝中兴的局面并没有出现，而嘉庆却在不知不觉中走到了生命的尽头，嘉庆 37 岁时才登上皇帝宝座，称帝之后，他很早就开始考虑嗣位者的问题。在他的 5 个儿子中（长子夭折），他最中意的是皇次子旻宁。嘉庆四年（1799），旻宁被定为皇储。嘉庆二十五年（1820）七月，嘉庆前往热河行猎，中途中暑，身体状况突然恶化。二十五日，他在承德避暑山庄与世长辞。后来，他被安葬在清西陵中的昌陵。

宣宗爱新觉罗·旻宁

清乾隆四十七年八月初十日
(1782年9月16日)，北京嘉郡王府邸撝芳殿里，一声新婴长啼，嘉郡王颢琰喜生贵子。他就是后来的清宣宗道光皇帝旻宁。

一、躬行节俭 力戒奢靡

嘉庆二十五年(1820)夏秋之交，京城气候格外闷热，令人烦躁难忍。旻宁侍奉年过花甲的父皇巡幸热河避暑山庄。嘉庆皇帝年老多病，原想巡幸热河，暂避朝廷繁重公务和京城燥热的天气，好好静养一番，待秋凉后回京。不意到了避暑山庄，竟是头晕眼花，浑身发热，生起病来。旻宁日夜衣不解带，寸步不离，小心服侍，诚心祷告上苍保佑父皇早日康复。无奈天限难过，七月二十五日，嘉庆皇帝不顾皇子及随扈王大臣们呼天抢地悲哭嚎啕，离开了人世。

国不可一日无主，嘉庆皇帝病危时晓谕众臣谓：“朕早于嘉庆四年遵照祖制，亲书‘立皇次子旻宁为皇太子’字样，装匣密封，藏于京城乾清宫‘正大光明’匾额之后，现朕疾势将不起，

著即传位于皇太子旻宁”。嘉庆归天后，热河随扈王大臣们即遵旨拥立旻宁即皇帝位。旻宁以恭奉大行皇帝梓宫回京，暂缓登极，直至回到京师，一切安顿就绪，始于八月二十七日在太和殿即皇帝位，颁诏天下，以第二年为道光元年。

道光登极君临天下，很想有一番作为，以规复“康乾盛世”旧观。可此时的大清王朝百弊丛生，要振兴祖业，当从何入手？想来想去，念及乾、嘉两朝东征西讨，南巡北幸，耗尽了资财，而宗室贵族、皇亲国戚，率皆腐化奢靡，祖宗入关前的淳朴节俭习俗，早已丧失殆尽。于是，道光断然决定先从矫正人心风俗入手，倡行节俭，力戒奢靡，企望不数年，整个满族臣民尽皆“返本还淳”，恢复入关前淳朴节俭的旧俗，大小文武臣僚及天下百姓竞以俭朴为荣，从而使仓廩充溢，国库丰贍，以规复祖宗盛世旧观。

为了实施他的思想主张，道光即位后以新帝诏旨形式颁发了其著名的“声色货利论”，着力阐明声色货利为害之大，关系到大清王朝的生死存亡，指出声色“常人惑之害及一身，人君惑之害及天下”，要求为官从政者不为声色货利所诱，严格“检束身心，屏除声色”，力崇节俭，一切“概从朴实，勿尚虚文”。终道光之世，朝廷治国方略虽然不同时期各有侧重，但道光一直把倡节俭、杜奢靡放在十分重要的地位，对大小文官武吏要求更是严格，谆谆告诫他们要懂得“一丝一粟皆出于民脂民膏”，应是格外珍惜，处处要“务存俭约之心”，千万不可为声色所迷惑。

道光倡节俭、杜奢靡，并非是说在嘴上，写在纸上，而是采取措施，付诸行动。他的倡行节俭的谕旨和措施，尽管在整个统治阶级中收效甚微，但他自己确乎是躬亲实践，身体力行。

在饮食上，一般情况下皇帝照例每餐至少有二十几样菜肴，道光觉得这样过于靡费，常年每天多者准令做4样菜，有时则只要1碗豆腐烧猪肝，闹得管御膳房的官员们叫苦不迭，因为皇帝越是铺张，他们才越有机可乘，有油水可捞，只一碗豆腐烧猪肝，实在是无法虚报冒领。道光如此节省，朝廷文武初时将信将疑。道光初年两次大宴群臣，凡赴宴文武官员，无不瞠目咂舌才始信其真。一次是皇后千秋节（生日），道光设宴赏赐内廷诸臣，有缘赴宴文武都以为皇后生日，皇帝不会马虎潦草，定可一饱口福。谁知道道光早经谕令备宴官员，皇后千秋庆宴，只准宰猪两只，用打卤面招待群臣，其余概行裁减，搞得赴宴文武哭笑不得。另一次是大学士长龄平定回疆叛乱，监押叛乱首领张格尔班师回朝，道光亲御午门受俘，随后在万寿山玉澜堂摆宴庆功。此次文武百官以为平定回疆，皇上心里高兴，该会好好庆祝一番。结果开宴后，群臣谁也不敢动筷，原来每张桌上只摆了几样小菜，质低量少，若一齐动手，立时就会菜光盘净，无奈只好陪着皇帝喝两盅酒了事。此后文武百官始信皇帝节俭不虚，上朝时个个都装出节俭的样子，以致颇受宠信的大学士曹振镛，当道光问其在家吃鸡子要花多少银子时，他竟谎称自幼患有腹胀气满的毛病，生平从未吃过鸡子！

道光服饰上的节俭，在历代君王中也属罕见。其改制罩衣和补缀套裤两事，为晚清士大夫广为传诵，影响颇大。清代皇帝冬季常穿珍贵毛皮罩衣，道光登极后，内务府上衣监为他准备了一件黑色狐皮罩衣。这种罩衣外皮内缎，用料内阔外狭，四周缎子衬里显露其外，称为“出风”。黑色的毛皮缀在上好的缎子面料上，显得雍容华贵，典雅庄重。道光以为狐皮是猎获野物所得，

缎子为百姓辛勤制作而成，是缎子当比狐皮贵重，况且“出风”部分纯系装点好看，毫无实用。于是，他在见到那件狐皮罩衣后，即传令内务府改制，谕以四周不许显露多余缎面。清代内务府贪污中饱是尽人皆知的，道光的节俭使内务府的官员们大为沮丧，此次奉旨改制罩衣，以为可趁机捞点油水，遂上奏说“改制罩衣，需银千两”。不料弄巧成拙，道光听说改制件罩衣竟要如许银子，当即改变主意，传谕谓：“改制花费既多，著暂免，此后新制，概勿出风”。随后又将此事谕知入值的军机大臣，致使京城大小官员，从此冬季穿着毛皮罩衣，十几年间不敢有“出风”者。

道光服饰不但不求华美，而且少穿新衣，特别是不显眼的衣物，更是多穿一日是一日。清人服饰以袍褂罩身，裤子极少外露。为了节省，道光长年多穿旧裤，日久膝盖处先行磨破，就令内务府差人补上一块圆形补丁。朝廷官员历经多次亲身所验，已深知皇帝节俭是实。于是，内廷大小臣工为了显示自己不负圣望，也在尽力“节俭”，不管裤子真破了还是假破了，纷纷在膝盖处打起补丁来，一时套裤打掌之风大盛。

除饮食服饰外，道光在内廷后宫及外出一应所需用品方面，亦概行节省俭朴，力戒奢靡浮华。道光登极后，内务府按向来惯例为他准备了御用砚台40方，每方背面都镌刻“道光御用”4字。道光在见到内务府奏报所备御用品清单时，觉得一人如何能用40方砚台，放置不用，未免可惜，当即传谕留下两方，其余分赐内廷诸臣，并诏令此后有关地方勿须再常年备制贡品砚台，笔砚为中国古代公务不可或缺之物，御用砚台有专门地方常年备制，御用毛笔也历来都是特制紫毫笔，笔管上均加镌“天章”、“云汉”等字样。所谓紫毫，即刚锐的紫色兔毛，为世所罕见。白

居易有《紫毫笔》诗，曰：“江南石上有老兔，吃竹饮泉生紫毫。宣城工人采为笔，千万毛中选一毫”。极言紫毫之珍奇贵重。道光觉得紫毫笔既然如此珍贵难得，即命此后不再征用，御用笔更换为普通臣民常用的纯羊毛或羊毛与一般兔毛相间合制而成的毛笔，同时以御用毛笔“笔杆镌字，每多虚饰”，谕令以后也一律同民间毛笔一样，只据情标明其系“纯羊毫”或“羊毫兼毫”即可。如此俭朴，在历代封建帝王中，可谓如同笔中紫毫，“千万毛中选一毫”了。

道光躬行节俭，力戒奢靡，表面上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统治阶级上层的一部分人，多少地遏制了奢侈腐化之风的恶性发展，但终究难以实现其令满洲臣民“返本还淳”、规复祖宗盛世旧观的原望。况且时势业已大变，传统的节俭观丝毫无助于起弊振衰，大清王朝不可避免地在衰败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二、整顿吏治 努力禁烟

道光登极承继大统后，面对“四海秋色”的清王朝，在躬行节俭、力戒奢靡的同时，多方设法，孜孜求治，试图起弊振衰，企望能早日归复祖宗盛世旧观。为此，他朝思暮想并采取了一些措施整顿吏治，力图做个明君；有时也能顺应时势，支持进行些小改革；终生不忘严禁鸦片，以杜白银外流之源。但可惜的是，道光之世的大清王朝，整个官僚阶层腐朽堕落，寡廉鲜耻，大多苟安其位，以保身家利禄，极少有人顾及国家安危和百姓死活；神州大地，内里是“大乱将起，悲风骤至”，外部则西方资产阶级乘坚船携利炮，频频叩关，终于破门而入。

中国历代封建王朝，自古就有所谓捐纳制度，即有钱便可买得官做，小官则可花钱买大官。清袭古制，不过最初规定花钱买官者只给虚衔，不予实授，捐官者单有官之名号，并无官之职责，当然也无俸禄，其实是花钱买个荣誉虚衔。自嘉庆朝起，国库空虚日甚一日，而庞大的官僚机构、军需费用及治河、赈灾等处处需要开销，于是捐例大开，朝廷把卖官鬻爵看作是一大可靠财源，虚衔实缺兼卖，以广招徕。捐纳实缺和科甲出身为官者在职权、俸禄方面一般无二，只是出身不同而已。渐渐实缺不够，则又创出“候补”名号，每月在吏部抽签一次，分发到中央各部或各省听候委用。由是，凡有足够的钱，无论其人德行才智如何，均可买得官做。官既是花钱买来的，一旦走马上任，便如狼似虎，捞本赚利，极大地加剧了清王朝吏治的败坏。道光身为皇子之时，对此就有所了解，认为官场贪污中饱，贿赂公行，皆与捐纳制度有关，称帝后即决心除此祸患。但是，在与朝廷重臣筹商废除捐纳制度时，朝臣皆以为“军需、河工、赈灾，处处需费浩繁，时下国库收支赤字甚多，其捐纳一项，未便全废”。

面对朝廷诸臣的一致反对，道光只好作出让步，但废除捐纳的初衷未改，于道光二年（1822）颁诏谕令天下，要各地嗣后严格捐纳制度，毋得滥开捐例，“其现任官员，一概不准加捐职衔，永为定例”道光对花钱买得官做的人，始终感到厌恶，总是放心不下。每当京官外放或地方官因故觐见，临行前他都不厌其烦地嘱咐其要对捐纳出身的官员多加注意，谓“捐班之员，素不读书，将本求利，廉之一字，诚有难言。有钱不作他图，倾其所有以求为官者，居心可知。此等人物，朕实是放心不下，到任后务须从严究查，多加防范”。

在设法整顿吏治，企望起弊振衰的过程中，道光逐步认识到，“官官相护”、“贿赂公行”等官场之恶，在很大程度上与上头有关，因而警告官职显赫的重臣和宗室贵族，要他们时时记着乾隆朝的贪相和珅，晓谕鼓励天下臣民大胆告发侵公扰民之官，从重惩治上层不法官员。道光七年（1827），有人控告协办大学士、理藩院尚书英和的家人张天成，依仗主人权势，勾结地方官，私自抬高租息，欺压无辜百姓，肆意勒索民财。道光对此十分重视，认为张天成之所以敢横行不法，其根在英和，因此除对张天成及有关地方官依法惩处外，谕令将英和“革去协办大学士和理藩院尚书之职，夺回紫缰”（紫色的马缰，系清代皇帝赏赐宗室和勋臣的一种特殊荣誉标志）。随后又令“交部严加议处”。对中央朝廷重臣如此，对地方上一些官吏的违法行为，道光也往往追究其上司的责任。道光十五年（1835），湖南湘潭县知县灵秀，听说手下捕役有个女儿生得花容月貌，遂不择手段诱娶此女为妾，满足兽欲后，又复辗转售卖，捞获重利。后经人告发，道光大为震怒，谕令将灵秀革职，发往伊犁充当苦役，终生不许放还。此事本与省里大员无关，但道光怀疑属下不法，即是上司查审不力甚或有意包庇的结果，而上司所以如是，少不了是平时收受贿赂。于是，传谕将湖广总督、湖南巡抚及布政使、按察使，一并交部议处。

澄清吏治，侧重于上层，道光一直坚守不渝，即使宗室贵族、皇亲国戚亦不例外。

道光三弟 惇亲王绵恺，年过而立之年，膝下无子，不知何故（或许求子心切，欲探求子之方），竟与宫内太监张明德私相往来，违犯皇室家法，道光七年（1827）因此被降为郡王衔，革

除一切职务，并受到严厉训斥。后来谨慎从事，循规蹈矩，一度又复亲王衔，得授“内廷行走”及宗人府宗令等头衔。谁知时过境迁，绵恺又旧念复萌，将宫内太监私藏于王府。消息走漏，道光闻讯查实后，当即谕令再行将绵恺降为郡王，革除一切职务，并罚俸3年。绵恺壮年无子，过继儿奕缵业已去世，家庭生活颇不愉快，加之此次打击，不久即郁闷而逝。

皇侄奕纪，道光中期曾一度备受恩荣，先后晋二等镇国将军，赏给紫缰，擢户部尚书，总管内务府大臣、御前大臣兼管理藩院事务，显赫一时，渐渐志满意得，遇事不知自忌，一些趋时附势的内外官员也纷纷巴结逢迎。道光二十年（1840），道光以理藩院行使职权不当，决计借机惩戒奕纪，以使其有所顾忌，克尽职守，谕令将理藩院尚书赛尚阿降为二品顶戴，与管院大臣奕纪一并交部严议。随后，他又通过多方查讯，得知弈纪有收受属下司员馈送银两情事，遂谕令夺回弈纪紫缰，革去其御前大臣、户部尚书、总管内务府大臣职务。不久，道光觉得弈纪在天子脚下竟敢私自收取下级司员礼品，如此处分恐还不足以警来者，于是再颁谕旨，令将奕纪捉拿问罪，遣戍黑龙江。奕纪以所管理藩院行使职权稍有不当和收受一位下级官员馈送银两而遭此重处，廷臣无不悚然。

另外道光继位后，一直大力禁绝鸦片。鸦片最初由葡萄牙人当作药材输入。早期葡萄牙作为药材向中国输入鸦片时，虽有人开始食用，但数量极少，未对整个社会造成多大危害。后来，英国人东来，在印度半岛建立了庞大的殖民贸易垄断公司——东印度公司，实行对印度乃至对整个亚洲的殖民掠夺贸易和侵略扩张活动。在早期同中国的贸易中，中国的丝、茶、陶瓷、大黄以

及糖等土特产品受到当时西方人欢迎，出品量逐年递增，而作为英国主要输华商品的各种贵重毛纺织品，由于中国官僚士绅穿的是綾罗绸缎，老百姓则穿自制的土布，因而长期滞销，致使英国在正常中英贸易中连年亏本，每年不得不运来大批白银，以补亏空。

为了既得到中国的丝、茶等土特产品，又不用往中国输送白银，英国资产阶级费尽心机，寻求良策。在用炮舰暂时还打不开中国大门，其他商品也难以打入中国市场的时候，他们找到了鸦片这种特殊商品。鸦片既可弥补英国对华贸易逆差，又可以在精神和肉体上摧残中国人民，为最终打开中国大门奠定了基础。于是，英国自公元1773年起，排挤了葡萄牙、荷兰等国，逐步确立了对中国鸦片贸易的垄断权，开始有组织地向中国输入毒品鸦片。

自鸦片吸食之法传入中国后，烟毒就日益泛滥起来，逐渐引起中国统治者的重视。早在雍正七年（1729），清廷即颁发禁烟令，严禁贩卖、吸食鸦片。嘉庆五年（1800），清廷首次禁止从外洋进口鸦片（以前做药材进口合法），以后又多次颁发禁令，制订禁烟章程，发布贩卖吸食鸦片治罪条例，意在清除烟毒祸害。结果是鸦片由合法纳税进口变为违法偷运走私，烟价大涨。广东海关及其他文武官员，甚至于朝廷重臣，都直接或间接地从鸦片走私中捞到好处，以至无视朝廷禁令，帮同或袒护中外鸦片贩子进行走私活动，致使烟毒迅速弥漫全国，白银源源流向国外。

道光对鸦片烟毒的危害有着深刻的了解，御极后决心根除此患。道光元年，他即匆匆发布谕旨，严申鸦片禁令。两广总督阮元，借助新帝即位之威，查出十三行总商伍敦元默许外国进口

商船夹带鸦片，随即请旨严加惩办，并制定了严格的外船进口检验程序和对贩卖、吸食鸦片及开办烟馆者的惩处条例。一时间，夹带鸦片的外国进口船只被纷纷查获，驱逐出口，澳门的一些囤积贩卖鸦片大户也先后落入法网。查禁鸦片，初见成效，道光喜出望外，决心再接再厉，于道光二年（1822），谕令沿海各省督抚严拿烟贩，翌年又饬廷臣议定地方官查禁鸦片烟不力及失察处分条例，同时诏令严禁民间私自种植制造鸦片。

道光根除鸦片祸患的决心不可谓不大，查禁鸦片烟毒的诏令不可谓不严。然而，英国政府既已确定了鸦片侵华政策，鸦片贸易业已给英国及英印政府和东印度公司带来了巨大利润，那他们就决不会善罢甘休。在广东方面查缉日严，广州、澳门既不能进口也不便囤积鸦片之后，外国鸦片贩子们便在珠江口大鱼山洋面一带的伶仃岛周围停置大船，存放鸦片。这些停置的大船，每只约可装载鸦片 50 余万斤，称为“趸船”。凡装载鸦片的船只均先驶往趸船卸下鸦片，然后载着合法货物并夹带极不易发现的少量鸦片样品进口，与内地鸦片贩子看样订货，在广州借交易货物之名把一切手续办理完毕，然后雇佣组织亡命之徒，乘坐特制的武装快船到趸船取货，黑夜偷运走私，分发各地。于是，尽管道光再三颁发“杜绝鸦片来源，以求净尽根株”的谕令，但随着他整饬吏治的失败和全国军备的愈益废弛，国内则走私网遍布天下，国外则先是英国，继而是美国，公然以武力保护走私，或建立庞大的舰队直接组织走私，致使鸦片输入量激增。道光元年，输入中国鸦片不足 6000 箱，道光十三年（1833）时增至 2 万余箱，至道光十八年（1838）则翻番为 4 万余箱。

鸦片的不断输入和烟毒的日益泛滥，不但严重摧残了中国

人民的身心健康，而且造成白银大量外流，清政府国库空虚，银价飞速上涨，国计民生穷蹙日甚一日，从而引起中国朝野的极大关注，道光作为一国之主，更是忧心忡忡，无奈禁令屡颁，鸦片烟毒焰日张，苦寻良策而不可得。

道光十八年（1838）闰四月，鸿胪寺卿黄爵滋上疏道光，指出断绝鸦片的根本之计在于根绝吸食，“无吸食，自无兴贩；无兴贩，则外夷之烟不禁亦自不来”。认为以往禁烟之所以未著成效，是由于刑法过轻，提出吸烟论死之说，请求道光颁诏晓喻天下，所有吸食鸦片烟者，限令一年为期戒绝，到期未戒或未全戒者，则一律处以死刑；如有为官之人知法犯法，一经发现，本人处死之外，其子孙永远不得参加科举考试。

黄爵滋吸烟论死的奏疏，对道光是个严峻的考验。平民吸烟论死，倒还好说，官员论死，已觉难办，而皇亲国戚、宗室贵族中若有人被告发出来，将如何处治？经反复权衡，他觉得保国保民保住皇帝尊位才是头等大事，鸦片烟毒继续泛滥，迟早要毁大清江山。于是，他一面谕令各将军、督抚就黄爵滋吸烟论死之说各抒己见，详细议复，一面采取严厉措施，从上头做起，以向天下诏示自己的禁烟决心。在接到黄爵滋奏疏不到两月时间里，道光先行将一批查有确据的吸烟官吏革职，其中庄亲王、辅国公因常到僧尼庙内偷食鸦片，分别被革去王爵和公爵；同时将两年前上奏请放宽烟禁的许乃济，降为六品顶戴，勒令退休返乡，诏令在两湖地区禁烟卓有成效的林则徐进京觐见，商讨禁烟大计。

林则徐进京后，道光赏其紫禁城骑马殊荣，接连8次单独召见，共议禁烟事宜，经过反复商讨，道光决定双管齐下，一面于道光十八年（1838）十月十五日命林则徐驰赴广东“查办海口事

件”，意在杜绝鸦片进口。为表示他对林则徐的信任和器重，特颁给钦差大臣关防，谕令所有该省水师兼归节制。一面则命朝臣严定禁烟章程，以求根绝吸食。新定禁烟章程明确规定：“凡吸烟之人，均限一年半时间戒除，限满不知痛改前非者，无论官民，概拟绞监候”。新定章程经道光审阅批准后，名为《钦定严禁鸦片烟条例》，颁发全国遵照施行。

自黄爵滋吸烟论死之疏上达朝廷始，在道光亲自主持下，经过各有关方面约半年时间的讨论准备，神州大地除西藏地区以外，掀起了一个轰轰烈烈的全面查禁鸦片烟毒的热潮。各地查拿鸦片贩子，缴烟土，收烟具，封烟馆，惩治大小吸烟官吏，通令鸦片烟鬼限期戒烟，可谓如火如荼，雷厉风行。鸦片烟毒似乎从此真的要在华夏神州净尽根除了。

三、抵御侵略 力不从心

面对举国一致的禁烟热潮，道光欣喜异常，心想多年痼疾，一旦扫荡净尽，规复祖宗盛世旧观有望，总可以告慰列祖列宗在天之灵了。可他做梦也没有想到，英国资产阶级为了维护罪恶的鸦片贸易，悍然发动了大规模的侵华战争，结果不仅使他根除鸦片烟毒的全部方案措施尽皆落空，而且把他推到了清朝有史以来初次蒙受外国资本主义列强的深重打击，并被迫屈辱求和的被动境地。这还得从林则徐到广州禁烟谈起。

道光十九年（1839）初春，林则徐携钦差大臣关防到达广州后，与两广总督邓廷桢、广东巡抚怡良、水师提督关天培等和衷共济，内则查办收受贿赂、包庇鸦片走私之文臣武将，惩治贩毒

奸商，劝戒吸毒兵民；外则晓谕各国来粤商人，限期缴出国放于外洋趸船的全部鸦片。为预防万一，林则徐于查禁鸦片的同时，一面饬人搜集翻译外国书报，了解西洋国情及来粤商人动静，力求知己知彼；一面招募水勇，整顿水师，加固增修炮台，购买西洋大炮、战船，积极整军备战。

面对林则徐雷厉风行的禁烟措施，以英国为主的外国鸦片贩子们有些着慌，纷纷找英国在华商务监督义律商量办法。义律鉴于中国官方禁烟向来虎头蛇尾，一阵风过去便万事大吉，一切照旧，认为此次也不过是做做样子，吓唬胆小的，抓几个倒霉的罢了，约定众洋商拒缴鸦片。林则徐看看限期将过，外国鸦片贩子们毫无动静，便传令四处张贴告示，告谕中外，谓“本大臣奉旨来粤查禁鸦片烟毒，若鸦片一日未绝，本大臣一日不回，誓与此事相始终，断无中止之理”。表示此次禁烟势在必行的决心。随后，他即采取断然措施，将黄埔港所有外国商船统统封仓，不准装卸货物，同时下令撤出广州商馆里的全部中国雇员，派兵围困商馆，断绝了水陆交通。至是，聚居商馆里的外国商人们纷纷抱怨义律毁了他们的生意，龟缩在这里的鸦片贩子们更是慌了手脚，急请义律寻求解救之策。此时义律已无良策可寻，心中暗暗计谋报复行动，表面上不得不派人请林则徐解围，答应劝说鸦片贩子们缴出全部鸦片。

道光十九年（1839年）三月，以英国为主的鸦片贩子先后缴出鸦片1.9187万箱又2119袋，共计237.6万多斤。林则徐收缴完毕，即奏报朝廷请示处理办法，同时下令解围开舱，恢复中外贸易。道光闻报大喜，传谕林则徐等将所缴鸦片烟土，“即在虎门外当众销毁，无庸解往京师验看，俾令沿海商民及在

粤夷人，共见共闻，咸知震骇，永杜后患。”是年四月二十二日至五月十五日，林则徐遵旨偕邓廷桢等率广东文武员弁，在虎门海滩将收缴鸦片全部彻底销毁净尽。斯时沿海居民及外国商人、传教士等观者如堵，百姓欢呼，烟贩们震恐痛心不已。是为历史上有名的“虎门销烟”。

虎门销烟后，林则徐传令各国进口贸易商船具结声明：“嗣后来船永不敢夹带鸦片，如有带来，一经查出，货尽没官，人即正法，情甘服罪”。凡从事正当贸易的外国商人，无不遵令具结进口，惟英国商务监督义律，蓄意挑起事端，纠集兵船拦截其本国商船，不准进口具结，并多次袭击中国水师。林则徐一面下令严惩来犯英国兵船，一面奏报朝廷，建议对包括英国在内的所有外国商船，实行“奉法者来之，抗法者去之”的策略方针，以集中力量打击不遵中国法度或敢于来犯之敌。此时道光正陶醉于销毁鸦片的喜悦中，自思多年流毒，一旦扫除净尽，从此白银不再外流，国库渐可充裕。闻报义律胆敢犯顺天朝，当即怒火中烧，传谕沿海加强防御，切令林则徐等万勿示以柔弱，谓“朕不虑卿等孟浪，但戒卿等不可畏葸，所有英吉利大小船只，尽行驱逐出海，嗣后片帆不得入口贸易”。道光二十年（1840）一月，林则徐遵旨断绝了中英贸易。

道光原想以天朝声威慑服英夷，岂知英国为了保护鸦片贸易，已决定发动大规模的侵华战争。道光二十年（1840）五月，英国兵船 40 余艘到达中国海面，先行封锁珠江口，正式挑起了第一次鸦片战争。

英军在广东滞留月余，北犯福建，未能得手，当即兵进浙江，攻陷定海，随后又移师北进，兵至天津白河口，投送英国外交大

臣巴麦尊给清政府的照会，无理要求中国皇帝为英人昭雪在粤蒙受的“冤屈”，赔偿鸦片烟价，并割地通商。按惯例，清王朝地方大员不能擅自接收外国照会，更不敢向皇帝呈递外人照会。无如英国船大炮猛，而且除广东、福建预做防备之外，各省既无坚实战船能够御敌于大洋之外，又无阻敌登岸之可用大炮和能战之兵。直隶总督琦善此时已顾不得成例所碍，径直接受照会，允为代达朝廷，并上奏道光说：“英夷船坚炮利，无可与敌。夷船不来则已，夷船若来，则天津等各大海口断不能守”。朝廷内外一些平时安逸享乐的行家里手，均害怕战争打扰其安乐生活，而果真英国人登岸，奉命拒敌，又不知这仗到底是如何打法。他们为英国坚船利炮所吓倒，只求早早结束战争，纷纷散布流言，有人谓林则徐广东缴鸦片，原是先许重价收买，而后食言负约，以致激变；英人兴兵，实是请求天朝大皇帝给个公道，开恩恢复通商。有人则说邓廷桢调赴闽浙总督，毫无作为，英人未攻厦门，硬是上奏朝廷，谎报战功。一时间，朝廷上下，乱哄哄吵做一团。

道光获悉前敌败耗，耳听各种流言，翻阅琦善奏章和巴麦尊照会，不觉对林则徐等产生怀疑，暗思英军威逼京师，孰是孰非，一时真伪难辨，不妨颁旨诘问林则徐，看其何词以对；诏令琦善与英人交涉，虚与周旋，试看结果如何，再作守夺。其诘责林则徐的谕旨，措词激烈，大略谓：“命你赴粤查办海口事件，业经一年有半，然外而断绝通商，并未断绝；内而查拿犯法，亦不能净尽，无非空言搪塞，不但终无实济，反生出许多波澜！思之曷胜愤懑，看汝何词以对联也？”在给琦善的诏旨中，则令其转告义律说：“天朝皇帝抚绥四海，恩布中外，凡外藩来中国贸易者，稍有冤抑，自会立即查办。上年林则徐等查禁鸦片烟土，未能仰

体大公至正之意，以致受人欺蒙，措置失当。兹所求昭雪前冤，大皇帝早有所闻，必当逐细查明，重治其罪。”意想以此先令英军退去，然后从长计议。

琦善所辖防区，天津共有弁兵 800 名，山海关一带连一尊合用的大炮也没有，英军北上，早已慌做一团。接奉道光诏旨后，心中暗喜，自思有了退敌法宝，当即照会英国侵华军总司令懿律（义律的堂兄），明确表示说：林则徐在广东查禁鸦片“办理不善”，大皇帝已知其非。至于巴麦尊照会中所求各节，尽可慢慢商量，希望英军返回广东，静待大皇帝派出钦差大臣“秉公查办”。时值深秋季节，天气渐凉，英军不便在北方采取大规模行动。懿律接到琦善照会后，即顺势率军南下广东，准备伺机再发。

英军南下，琦善上奏朝廷大肆渲染自己“退敌”有方。道光接报后，觉得这英夷原来并非桀骜，那林则徐等恐是有负朕意，确乎办理不善。于是降旨命琦善为钦差大臣，前赴广东继续办理中英交涉，同时令将林则徐、邓廷桢等革职查办。

琦善奉旨到广东后，一意媚外求和，实指望退出英兵，报功邀赏。岂知英军南下本是缓兵之计，一面在广州与清交涉提出更为苛刻的侵略要求，一面暗中调兵遣将，琦善毫无战守准备，步步退让，答应了英国侵略者几乎全部无理要求，只是关于割让香港一事，不敢做主，准备上奏朝廷请示后再做明确答复。英军调兵遣将停当，不待琦善答复，即发兵攻占大角、沙角炮台，进而威逼虎门，并单方面发布未经议定签字的所谓《川鼻草约》，强占了香港。

道光派令琦善赴广东时，原想引英军南下，姑允恢复通商，惩办林则徐，以换得英国全部撤军，消除战祸。免得大动干戈，

劳师靡饷。不过，那时他既不认为英国坚船利炮威不可挡，也不完全相信英人会轻易就抚，因此谕令琦善到广州后，要“一面与之论说，力争折服英夷，一面妥为预备，如其桀骜难驯，毋得示弱，有失天朝体面。所需御剿兵丁，可一面飞调，一面奏闻，不必先行请旨，以误戎机”。英军在广州再次发难，攻占沙角、大角炮台消息传至京师，道光因事先已有所预料，并不惊慌，当即传旨责令琦善“赶紧团练兵勇，奖励士卒，并储备军需粮饷枪炮火药，严惩英夷”。同时，诏令对英开战，命御前大臣宗室弈山为靖逆将军，户部尚书隆文、湖南提督杨芳为参赞大臣，征集各路大军共计 1.7 万余人开赴广东前线，意欲一举荡平入侵之敌。不料琦善毫无战心，竟上奏说广东“地势无要可扼，军械无利可恃，兵力不固，民情不坚，若与英夷交锋，实无把握，不如暂示羁縻……”道光览奏不觉动怒，心想如此懦夫，如何堪当前敌？正思降旨斥革，又接广东巡抚怡良等密折，参奏琦善一意孤行，不听众文武劝说，私允割让香港。怡良密折真是火上烧油，道光阅后直气得手足冰冷，两眼昏花。稍待镇静，提笔在琦善奏折上批道：“汝被人恐吓，甘为此遗臭万年之举，今又摘举数端，恐吓于朕，朕不惧焉”。随即传谕，令将琦善革职拿问，锁解进京，并将其全部家产悉数抄没入官；命奕山、隆文等星夜兼程，迅赴广东，整兵旅、歼丑类，收失地，惩汉奸，务期大伸天讨，而张国威。

英军获悉清廷派将增兵，遂先发制人，大举进攻，道光二十一年（1841）二月初攻陷虎门。广东水师提督关天培及数百守军力战不敌，壮烈殉国。三月，参赞大臣杨芳先至广州，一战又失乌涌炮台，英船驶入省河，广州城危在旦夕。

奕山等在道光圣旨再三催促下，于道光二十一年（1841）三月底到达广州。闻听英军船坚炮利，本无战心；若不战而和，又恐遭重咎，遂召同来新任粤督祁贡及参赞、巡抚人等计议发兵攻剿。四月初一日，奕山兵分三路，夜袭英军，希冀一战而胜。不意英军早有准备，激战五昼夜，所有炮台要塞尽失，清军兵困广州城，不时发炮轰击。奕山攻守无术，慌了手脚，急命高悬白旗示降，令广州知府余保纯出城乞和，签定了屈辱的《广州和约》，议定双方停战，赔偿英国军费 600 万元，英军退出虎门，奕山等撤出广州城，率军屯驻离城 60 里以外。

奕山战败求和，自知如实上奏朝廷，吃罪不起，于是谎称广州停战，系因他率大军屡次“焚剿痛击，而大挫其锋……英夷穷蹙乞抚”。至于赔款，则是因为英夷战败，无路可走，“其头目投伏于地，向城作礼，乞还商欠，并恳请拨库钱 280 万，否则，年余未能通商，货物不能流通，资本折耗，非但商欠无以偿还，而且生计无以维持”。因此，经广州文武共同商量，为表天朝怀柔远人之意，奖励外夷向化之诚，议定允其所请。

道光接阅奕山瞒天过海的奏报后，非但毫无察觉，还真以为是英夷慑于“天威”，倾心向化，从此中外和好，免去刀兵之苦，不觉转怒为喜，竟颁旨“准令通商”，同时传谕沿海各省，酌量裁撤调防官兵，以节糜费。至此，他越发怀疑林则徐等在广州的行为，相信英夷兴兵构难，是由林则徐“办理不善”、“操之过急”所致，自思年来寝食难安自不必论，其劳师糜饷，国无宁日，沿海生灵涂炭，不罪林则徐、邓廷桢，又由谁来任其咎？念及此，遂发谕一道，令将林则徐、邓廷桢从重发往伊犁，遣戍赎“罪”。

正当道光误信奕山谎报军情，认为夷乱已平而令沿海各省裁军撤防之际，英国政府换将增兵，准备进一步扩大侵略战火。道光二十一年（1841）六月，英国新任特命全权公使璞鼎查、侵华英军总司令巴加聚会于香港，经过一悉密谋策划，月余后率军北犯厦门。总兵江继芸等力战牺牲，厦门陷落。随后，璞鼎查和巴加调集大队，北犯浙江，仅两月时间连陷定海、镇海、宁波三镇。定海三总兵葛云飞、郑国鸿、王锡朋等率军英勇抵抗，全部以身殉国；两江总督裕谦亲自登城督战，而浙江提督余步云未战先逃，以致镇海、宁波失守，裕谦自杀谢罪。总督死，提督逃，三总兵殉国难，整个浙东地区风声鹤唳，侵略军恣意烧杀淫掠，千千万万无辜百姓在铁蹄下呻吟。

为阻止英军的进攻，道光于道光二十一年（1841）九月初四日诏令宗室协办大学士吏部尚书奕经为扬武将军，侍郎文蔚、副都统特依顺为参赞大臣，调集江西、湖北、四川、陕西、甘肃数省马步各军，驰赴浙江。哪知奕经一出京师即把皇帝谕旨置诸脑后，一路游山玩水，广纳贡献，道光二十二年（1842）正月始到绍兴，并且视战争如儿戏，仓猝之间并未认真了解敌情即兵分三路，幻想一举夺回浙东三镇。结果是三路大军相继败北，奕经一口气逃到杭州，不敢再战，一面屯兵与英军对峙，一面上奏败绩，自请处分。

道光接到奕经败报，深感局势严重。这时他想到可以信赖的重臣及可以调拨的精兵基本已和盘托出，而夷焰非但未能稍戢，反而日见鸱张，足证英夷之凶狠。因此已心灰意冷赶紧诏令盛京将军耆英署杭州将军，颁给钦差大臣关防，授以“便宜行事”之权；起用以前困主和革职的伊里布，赏给七品顶戴。使二人赶赴

浙江前线，办理对英交涉事宜，做出了准备停止抵抗，实行所谓“招抚”方略的姿态。

耆英、伊里布到浙江后，即开始策划“羁縻”之策，试图“招抚英夷”，可他们怎么也没想到英夷竟不肯就“抚”。道光二十二年（1842）三月，英国侵略者为了迫使清政府彻底屈服，决定按预定计划，集中优势兵力，攻取清政府南北交通的咽喉之镇江，进而控制长江下游，切断清廷漕粮运输。

道光二十二年（1842）四月初至六月底止两个多月的时间，英军相继攻取乍浦、宝山、上海、镇江。江南提督陈化成率部抗击，壮烈牺牲，镇江副统海岭统驻防旗兵拼死抵抗，全部殉难，两江总督牛鉴则闻风逃匿，英国侵略者兵锋直抵南京城下。至此，道光自觉已别无良策可寻，急命耆英、伊里布迅赴南京设法议和。

道光二十二年（1842）七月二十四日，经道光批准耆英、伊里布等在南京城下江面上的一艘英国侵略者的军舰上，签订了近代历史上第一个屈辱的不平等条约，内中规定诸大端者为：（一）清政府赔偿英国在广东缴出销毁的鸦片烟费 600 万元，商行“积欠” 300 万元，军费开支 1200 万元，合计 2100 万元；（二）将香港割让给英国；（三）开放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等五处为通商口岸；（四）实行协定关税，嗣后进出口货物应纳关税等项，均应“秉公议定”，不能由中国自己做主；（五）废除公行制度，凡来中国贸易的英商，不论与何人交易买卖，均听自便。这就是后来人们所说的《南京条约》，时人称之为《江宁条约》。

历时两年多的对外战争，清朝政府支出战费 7000 万两，战

后赔款 2100 万元，加上战争期间英国侵略军的无耻抢劫和战后鸦片的继续大量涌入，清王朝本已十分拮据的国库开支，濒于崩溃。为了偿还赔款，弥补亏空，道光在战后已顾不了许多，只有默认各级官吏尽情搜刮民脂民膏了。结果是“天下贪官甚于强盗，衙门污吏无异虎狼。民之财尽矣！民之苦极矣！”

官逼反，民不得不反。鸦片战后，清王朝内地十八省和台湾、伊犁、西宁等地区，反清起义连年不断。自道光二十二年至三十年（1842—1850），各地各种起义暴动，令清政府手忙脚乱，损兵折将而载于史册的就有 92 次之多。道光历经两年多对外战争的磨难和美、法等相继遣兵船来华威逼签约，已是心力交瘁，不觉老之将至。面对风起云涌的起义暴动，他只知频频谕旨，限令各地将军督抚及提镇大员加意弹压，尽力兜剿，再也无力无心去设法根治起义暴动之源，规复祖宗盛世之业了。

道光三十年（1850）正月十四日，节俭一生的道光，外耻未雪，内忧未除，饱含一腔恨和愁，悄然长逝。死后谥号曰“成”，庙号“宣宗”。葬地在河北易县北宁山慕陵。

文宗爱新觉罗·奕訢

爱新觉罗·奕訢(1831——1861)，清王朝自顺治帝以来的第七位皇帝，因他即帝位后的年号是咸丰，所以人们一般又称他为咸丰帝。

一、兄弟争位 母死失和

奕訢出生以后，深得父亲和母亲的疼爱，生活自然是欢乐而优越的。为了更好地对奕訢进行教育，道光帝不仅经常亲自督教，而且按照培养幼君和皇子的惯例，6岁的时候开始入学读书。所学的课程很多，除学习蒙古、满族语言文字，并按照满族的习俗练习骑射技能外，主要是学习儒家经典、历代治术、圣训、列朝实录等等。

道光二十年（1840），奕訢的生母孝全成皇后突然病死，奕訢还不满10岁，母亲的死给他带来了极大的痛苦和打击，欢乐的童年留下了一丝阴影。孝全成皇后死后，奕訢由奕訢的生母静贵妃抚养。值得庆幸的是，静贵妃见小奕訢过早地失去了母

爱，十分爱怜他，所以对他就象亲生儿子奕訢一样，处处关心和照顾他，可以说是无微不至。小奕訢也很懂事，见静贵妃对自己这样好，也十分感激和尊敬静贵妃。奕訢和奕訢年龄相仿，兄弟俩同在书房读书，共同练武，两小无猜，关系十分融洽。虽然他俩是异母同父的兄弟，但两人的性格却迥然不同，奕訢好静，奕訢好动；奕訢性浑朴，奕訢性机敏；奕訢谦恭温和，奕訢争强好胜。道光帝晚年，为了建储传位的事费了不少的脑筋和心思。在道光帝看来，皇四子奕訢和皇六子奕訢，都是很好的人才，自己都很喜欢，两人虽各有千秋，但却都有继位的资格。奕訢是正宫皇后所生，而且年长，按照一般的惯例和传统，理应奕訢继位；而奕訢生性聪明，才华出众，尤其是相貌和平时的行为都很类似道光帝，所以虽然是庶出而年少，却受到道光帝格外的器重和垂青。所以，道光帝虽想早些立下储位，以减少一件心事，但却犹豫不决，一直拿不定主意，所以定储一事，悬而未决。

随着年龄的增长，奕訢和奕訢逐渐懂事了，虽说两人一起长大，关系十分密切，但是谁都希望自己能继承皇位，即然父亲久未决定此事，那就说明父亲还没有最后决定谁优谁劣，只要努力，自己就有继位的希望。所以弟兄两人彼此开始或明或暗地展开了竞争，两小无猜，赤诚相见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不仅他俩是这样，就是他们的师傅们也参与了此事，积极为自己的学生出谋划策。道光帝晚年，渐渐感到身体不如从前，所以抓紧对两个孩子进行有意识的考察，以便决定皇储问题。有一次，道光帝通知奕訢和奕訢，想亲自考问一番。奕訢和奕訢知道后，知道此事关系重大，所以都连忙跑去问自己的师傅。奕訢的师傅卓秉恬告诉他说：“如果皇上有何垂询，要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咸丰

的师傅杜受田则不同，他告诉咸丰说：“若谈古论今，条陈时政，你的才识绝不如六爷。只有一个办法，如果皇上自言老病，将不久于帝位，你就伏地痛哭，以表孺孝之诚。”咸丰按照他师傅的指点去做，果然有效，道光帝认为咸丰仁慈孝亲，心中十分喜悦。又一年的春天，道光帝去南苑校猎，命诸皇子都随从自己去。春天，万物复苏，春意盎然，皇家的林园，更是草木泛青，鸟语花香，令人心旷神怡。道光帝和诸皇子个个兴致勃勃，兴趣旺盛，开弓放箭，争先恐后。校猎结束时，奕訢猎获的禽兽最多，道光帝心中自然高兴。这时，他才注意到四子咸丰竟一箭未发，心中十分纳闷，便叫过咸丰问他怎么回事，咸丰十分认真的回答说：“现在是春天，鸟兽正在孳育，我不忍心伤害天下生灵。”道光帝听后，心中大喜，说：“这才是有道明君的话呀！”经过几次反复考察，道光帝逐渐认为咸丰更适合继承帝位，于是决定了储位的问题，但他不能委屈了六儿子奕訢，于是道光二十六年（1846），道光帝亲笔朱谕：“皇四子奕訢立为皇太子，皇六子奕訢封为亲王，世袭罔替”。并按照清王朝的立储家法，藏在太和殿正大光明匾之后。道光三十年（1850）正月十四日，道光帝病死，年方20岁的奕訢正式即位，改年号咸丰，以第二年（1851）为咸丰元年。

在众多的兄弟中，咸丰帝和恭亲王奕訢关系最为密切，所以一继位就按道光遗诏封奕訢为恭亲王。咸丰帝也素知他的才能。所以咸丰元年（1851）十一月，任命他为军机大臣，不久便以亲王身份任军机处领班军机大臣。咸丰帝也时常召见他，共同议事。可是，奕訢并不以此为满足，他恃才傲物，而且原本对咸丰继承皇位就不服气，所以在咸丰帝面前有时表现得盛气凌人，多

有越轨之举。如此，咸丰帝渐渐就对恭亲王有了看法，逐渐对他就不如从前那样信任和热情。结果弟兄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冷淡，到后来甚至互相猜疑。最后终因静皇贵太妃受封皇太后一事而公开化。

静皇贵太妃就是恭亲王的生母静贵妃。她初入宫的时候，被封为贵人，后晋升为静嫔、静妃。道光十二年（1832）十一月二十一日，她生皇六子奕訢，又晋升为静贵妃。咸丰帝的生母孝全成皇后死后，升为皇贵妃，管理六宫事务。当时，道光帝已经秘密定储，立咸丰为皇太子，于是便不能再册封为皇后。咸丰帝即位以后，尊封她为康慈皇贵太妃，对她格外尊重。可是，静贵妃并不满足现在的封号，她想是我抚养了咸丰，现在咸丰做了皇帝，我理应得到皇太后的封号。奕訢也想为她的生母争到皇太后的封号，以便提高自己的地位，所以对此事也非常积极。咸丰帝对此事老大不愿意，认为先帝的嫔妃被嗣皇帝尊封为皇太后的事，前朝没有先例。所以虽然奕訢母子屡次提起，咸丰帝都没有答应，因此奕訢母亲皇太后的封号迟迟定不下来。

咸丰五年（1855），皇贵太妃病危。有一天，咸丰帝来到皇贵太妃的寝宫，正想进去探视，恰好恭亲王从里面出来。咸丰帝便问太妃的病情如何，奕訢立即跪下，哭着说：“已经病危了，看太妃的意思，只有得到封号才能瞑目。”咸丰帝没有想到恭亲王会在这个时候提到封号的问题，一点思想准备也没有，所以他不知怎样回答才好，只是随便应付了两声：“哦，哦！”奕訢则认为，咸丰帝已经答应了给皇贵太妃以皇太后的封号，格外高兴，于是匆匆忙忙赶到军机处，传咸丰帝的旨意，立即置办册封礼。咸丰帝探视后见奕訢等人已经办好皇太后封号的事宜，心中十

分诧异和气恼，认为他是有意胁迫自己，可是木已成舟，不好更改。咸丰帝不得不在七月一日传旨，尊康慈皇贵太妃为康慈皇太后。事后，咸丰帝越想越气，对他十分不满。康慈皇太后死后，咸丰帝下令减杀太后丧仪，不按皇太后的规格发丧。

不仅如此，咸丰帝还想趁机杀一杀奕訢的威风 and 锐气，于是颁发谕旨，以恭亲王“于一切礼仪多有疏略之处”为由，罢免了他的军机大臣职务，宗人府宗令、正黄旗满洲都统等职也均著开缺，并不准他恭理康慈皇太后的丧事。并警告奕訢，今后要“自知敬慎，勿在蹈愆”。后来，咸丰帝虽然也对奕訢有一些照顾，但直到咸丰帝临死以前，奕訢始终没有得到重用。

二、励精图治 企望中兴

咸丰帝即位以后，展现在他面前的清王朝是政治混乱，财政匮乏，军队腐败，民不聊生的萧条景象，面对这种局面，年仅20岁的咸丰帝年少气盛，血气方刚，颇有点进取的精神。他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调整对内对外的政策，整顿吏治，治理财政，任贤用能，对清王朝的统治政策进行了全面的修整。

首先是罢庸任能，整顿吏治。咸丰帝即位的时候，大清王朝的官场习气已腐败到极点，机构臃肿，人浮于事；结党营私，互相倾轧；互相推诿，效率极低。咸丰帝对此是清楚的，他知道，腐朽的官场习气，大大降低了政府的功用，不利于自己的统治，必须改变这种状况。

为了整顿吏治，就必须罢免昏庸官吏，以儆效尤。为此咸丰帝首先向军机大臣穆彰阿开刀。穆彰阿，满洲镶蓝旗人。历任内

务府大臣、步兵统领、兵部尚书、吏部尚书、大学士等职。深得道光帝的信任和宠幸，任军机大臣 20 余年。他结党营私，排斥异己，压制群僚，无恶不作。咸丰帝上台以后，大权在握，便把穆彰阿做为自己整顿吏治的第一个目标。咸丰帝即位十个月后，即亲笔朱谕，宣布穆彰阿的罪恶。历述穆彰阿的罪状后，给予革职永不叙用的处分。对另一个大学士曾任广州将军签订《南京条约》的耆英也因与穆彰阿狼狈为奸，先是贬官，后予处死，这些处置一时使朝野震动。

为了进一步扭转这种局面，咸丰帝在罢免庸官的同时，选拔了一批他认为有才能的人。这其中有穆荫、肃顺、匡源、杜翰及怡亲王载恒、郑亲王端华等。尤其是肃顺在清朝宗室中算是出类拔萃的佼佼者。他性格开朗，才华横溢，勤于任事，而且钦佩法家治术，主张为政要严。他认为，只有重刑厉典才能挽救颓风，稳定清王朝的统治。这些十分合于咸丰帝的心思，于是肃顺渐渐得到咸丰帝的喜欢，青云直上，飞黄腾达，提拔速度之快，令人吃惊。尤其是后来，咸丰帝凡事都与肃顺密谋，肃顺也依仗咸丰帝的势力，为所欲为，独揽大政。

咸丰帝上台以后，任命提拔的这些重要官员，有的确有才能，协助咸丰帝处理了一系列军政大事，但是这远不能扭转整个清王朝的时局。而且肃顺等人越级升迁，包揽一切大权，又造成新的专横，于是也造成了清廷内部新的矛盾和斗争。

咸丰帝即位以后，在调整统治班子的同时，也加强了对社会腐败现象的治理。科举是封建文人登上统治地位的重要途径，也是统治者选拔人才的重要方法。可是，随着社会风气的腐败，考试中的弊端日益严重，漏洞百出，行贿受贿事件经常发生。咸丰

初年，科场上向考官递条子的风气十分盛行，在大庭广众之前也不忌讳，达到了公开化的程度。一些善于投机钻营的人，虽然不学无术，也往往会金榜题名，而那些正直朴实的人，虽有满腹经纶也往往名落孙山。面对这种污浊腐败的科举情况，咸丰帝十分愤恨和忧虑，他担心这样下去，会危及自己的统治，所以时有加以整顿的想法。咸丰八年（1858），顺天府乡试，军机大臣、内阁大学士柏葭为主考官，副考官为户部尚书朱凤标、左都御史程庭桂。发榜以后，人们发现，在中试前十名中，有位旗下大爷平龄，因为平时喜欢唱戏，曾经登台演出，于是京师舆论哗然，人们窃窃私议：“优伶也能高中了。”人们的议论，引起了御史的关注，有人上疏弹劾。咸丰帝立即下谕，严肃查办。首先将凡有牵连的考官先都解职听候审查，不久查明确有舞弊行为。柏葭、朱凤标、程庭桂等人都被革职下狱。咸丰帝感到柏葭为中枢重臣，不愿对他施以重刑。肃顺等人则说：“取士大典，关系至重，必须严厉执法，以惩积习。”咸丰也想借此好好整顿一下科举利弊，因此也就不再为他开脱，于是柏葭和同考官浦安，中试举人平龄，罗鸿泽，主事李鹤龄，程庭桂的长子程炳采共七人被下令斩立决。程庭桂发往军台效力，朱凤标革职，其余受株连而被褫、革、降、调的有数十人。

不久肃顺主持查出铸币局贪污案，咸丰下令追查，结果主管财政的大学士翁心存，协办大学士周祖培等均受到不同处分，户部官员十几人被杀，家产籍没。

另外还有商人、胥吏数十人，也一同被抄查家产，此案总计诛连者达数百人。

咸丰帝重用肃顺等人，并用严刑整顿朝纲，打击贪官污吏，

力图挽救腐败的世风，虽然也取得了一些成效，然而肃顺等人利用这机会，打击异己、结党营私，结果弄得怨声载道，更加剧了清朝内部的分裂和斗争。

三、竭力平叛 力御外辱

咸丰帝即位前夕，清王朝的西南边陲到处都是零零星星的农民起义，尤其地处广西紫荆山的洪秀全等人也在酝酿大规模的反清活动。对此，年少气盛的咸丰帝并没有放在心上，认为只不过是几个土匪，派兵剿灭也就完了。然而事情并不象他想象的那样简单。咸丰帝即位刚刚十个月，即道光三十年（1850）十二月初十日，洪秀全等人在金田起义，建号太平天国，称天王。对此，咸丰帝大为震惊和恼怒，立即派兵命将，抓紧进剿，企图把太平军扼杀在摇篮里。然而，令咸丰帝失望的是，清军虽然人多势众，穷追不舍，但却未能实现咸丰帝的就地围歼计划，相反，太平军在天王洪秀全、东王杨秀清的率领下，施展巧妙灵活的战术，摆脱清军围追堵截，出广西、入湖南，进湖北，于咸丰二年（1852）十一月中旬，连克湖北的汉阳、汉口，武昌。不久，太平军顺江而下，于咸丰三年（1853）二月十日占领了南京。太平军占领南京以后，改南京为天京，建立政权，颁布社会政策及纲领。这样咸丰帝的统治就面临着一个新政权直接威胁和挑战。

在接连失败的情况下，咸丰帝认识到，只靠原先的绿营兵和八旗兵已无济于事，必须进一步增强清军的战斗力，提高清军的素质。咸丰帝接受其他大臣的建议，重新使用古老的形式——办团练。咸丰帝的这种政策确实收到了成效，在镇压太平天国的过

程中起到关键的作用。其中最为著名的首推曾国藩的湘军。

曾国藩，字伯涵，号涤生，湖南湘乡人，出身于地主家庭。道光十八年（1838）中进士，后官至礼部侍郎。咸丰二年（1852）秋，他因丧母回籍守制。十一月，咸丰帝命令他为帮办团练大臣，到长沙帮助湖南巡抚办理团练。曾国藩以湖南原有的一部分湘勇为基础，另定营制及各种章程，经过一段时间编练组成一支新型军队即湘军。湘军的组织十分特别和严密，实行由统领挑选营官，营官挑选哨长，哨长挑选什长，什长挑选勇丁。所募兵勇，大多是纯朴老实的农民，而且需取结具保，入军以后，又灌输以封建伦理纲常，加强思想控制。这样，湘军组织严密，内部稳定，兵为将有，全军统辖于曾国藩，有较强的战斗力，成为太平天国的死敌。

由于满州贵族害怕汉族地主掌握军权，因此对于曾国藩的湘军，咸丰帝心中十分矛盾，要利用却不敢放手重用。这种矛盾心理使他采取了两手防范措施。首先，咸丰帝把自己的希望寄托由八旗兵绿营兵组成的江北、江南大营身上，尤其是江北大营，所以不论是火器或粮饷都优先供给。其次，咸丰帝在表彰曾国藩的同时，任命满族贵族官文为湖广总督、钦差大臣，总揽长江中游的一切军政大权，任命满族将领如塔齐布、都兴阿、多隆阿等为战将直接插手湘军，或率领八旗、绿营兵与湘军配合作战，以便监督控制曾国藩集团的势力。而对曾国藩个人，咸丰帝只给予口头上的称赞，以便让他为自己卖命和出力，就是不给他实际权力。虽然曾国藩为清王朝出了大力，但甚至到了1858年，曾国藩官职仍是原来的礼部侍郎。咸丰七年（1857），曾国藩因父丧回籍，湖北巡抚胡林翼请求咸丰帝起用曾国藩领军，给事中李鹤

年也请咸丰帝重用曾国藩，但都被咸丰帝拒绝。

然而，到咸丰十年（1860），咸丰帝的如意算盘彻底落空了。在与太平天国作战的过程中，八旗兵和绿营兵受到严重的打击，江北、江南大营不堪一击。咸丰六年（1856），江北、江南大营就被击溃，钦差大臣向荣毙命，另一钦差大臣托明阿被革职查办。同年，太平天国内部发生内讧即天京事变，清军乘机重建江北、江南大营。可是江北大营在咸丰八年（1858）又被太平军陈玉成部击破，统帅德兴阿被革职；江南大营也在咸丰十年（1860）被英王陈玉成、忠王李秀成联合摧毁，主帅钦差大臣和春落水身亡。与此相反，湘军在曾国藩等人的着意经营下，实力逐渐增大，成为清政府对付太平军的最有力的武装力量。在这种严酷的事实面前，咸丰帝不得不重新估价湘军的力量和作用，肃顺等人也极力保荐，咸丰十年（1860）六月二十四日，咸丰帝不得不任命曾国藩为两江总督兼钦差大臣，督办江南军务，大江南北水陆各军悉归其节制，至此，咸丰帝经过多次的挫折和打击，才最终冲破了清王朝抑制汉人的传统祖制，真正开始重用曾国藩，给予他实权。

战争需要坚实的物质基础作后盾，物质力量的强弱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战争双方的胜负。对此，咸丰帝是清楚的。咸丰帝为了镇压太平天国，不惜一切代价，他表示：“朕不惜千万帑金，只需全力剿办。”可是，在太平天国兴起前夕，清王朝的财政已经十分困难，而太平天国起义后，战争规模越来越大，军需大增，清王朝的财政更是捉襟见肘，难于应付，所以解决财政困难就成为摆在咸丰帝面前的一个重要而又迫切的问题。太平天国兴起以前，清政府的财政收入主要靠地丁、盐课、关税等项。为了解决

军需，咸丰帝首先从原有的财源入手，进行了一些整顿和修改，以进一步扩大收入。但这远远不能满足急剧增长的军需开支，于是咸丰帝在其属臣的帮助和策划下，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广开财源，主要有捐纳、铸造大钱，发行钞票、征收厘金等等，其中尤以厘金最为重要。所谓厘金，是清政府新创设的一种商税。厘金又分行厘、坐厘两种，也就是过境税和营业税。咸丰三年（1853），帮办扬州军务雷以 诚、采纳幕客钱江的建议，向扬州仙女庙等处的米行抽厘，半年竟收款达 2 万多贯。咸丰帝接到奏报后，认为此法甚妙，于咸丰四年（1854）批准在河南、江苏等地府州县广泛推行。后来，在大臣们的建议下，咸丰帝逐渐扩大抽厘的范围，于咸丰七年（1857）推行于全国各省。这样厘金就成为一种普遍而持久的财源，为解决清政府的财政困难起了很大作用，当然也就增大了人民的负担。

正当咸丰帝为镇压太平天国使出浑身解数而心力交瘁的时候，咸丰六年（1856）九月下旬，英国以“亚罗号”事件为借口，进犯广州，其后法国也以“马神甫”事件为口实，与英国狼狈为奸，一起对中国进行侵略，挑起了第二次鸦片战争。面对列强的侵略做为一国之主，他当然不希望列强来掠夺自己的权益。然而，太平天国运动极大地牵制了咸丰帝的精力，使他不敢放手去对付外国侵略者。面对内外两种压力，咸丰帝感到力不从心，从内心深处发出了和战两难的感慨。于是，他采取了一种具有很大伸缩性的政策，那就是软硬兼施，恩威并用。第二次鸦片战争刚刚在广东爆发，咸丰帝就谕令两广总督叶名琛说：“此次开衅，不胜固然令人担忧，也有损国家体面；胜则洋人必来报复，奔赴各口诉冤。现在中国境内尚未安平，岂可在沿海另起风波？”根据

这一想法，咸丰帝命令叶名琛要灵活掌握，如果英人自悔返悟，就要设法驾驭，以泯事端；如其仍恃强欺人，断不可任意迁就议和。事隔一年，即咸丰七年（1857）十一月，英法联军攻入广州，两广总督叶名琛也被掳走。咸丰帝接到奏报后，十分震惊和气愤，尤其是叶名琛被掳，使他感到大清王朝受到了莫大的侮辱。他立即下令给广州将军穆克德纳、广东巡抚署两广总督柏贵等人，让他们首先以情理开导英法，如果英法军队退出广州城，仍然请求通商，即可相机筹办，以示和好；如果英法不肯退出广州城，则要调集兵勇，用兵力驱逐出城。咸丰帝还不厌其烦地嘱咐穆克德纳等说：“办理此事，固然不可失之太刚，亦不可失之太柔，致生洋人轻视中国之心，是为至要。”

英法联军占领广州后，并没有达到他们预期的目的，为了进一步迫使清政府就范，英法联军挥师北上，英法俄美四国公使也随军前往，于咸丰八年（1858）三月，英法侵略军攻陷大沽口直逼天津城门。四月十六日，咸丰帝急忙派大学士桂良、吏部尚书花沙纳前往天津，同英法等国公使议和，并迫于英法的要求，给予他们“便宜行事”的权力。在英法等国的武力逼迫下，桂良、花沙纳同英法签订了《天津条约》，咸丰帝对条约内容并不满意，心中十分窝火，但转念一想，如果不批准条约，英法等国必不善罢甘休，会重起战争，不如先批准条约，暂救燃眉之急，于是他抱着“自古结盟本属权宜”的侥幸心理，批准了《天津条约》。

《天津条约》签订以后，英法联军南返，军事危机暂时解除。这时，咸丰帝越来越觉得自己亲手批准的《天津条约》有种种不当。咸丰八年（1858）六月五日，命桂良、花沙纳赶往上海，同英法去举行修约谈判，当二人向咸丰帝辞行时，咸丰帝命令他们

向英法等宣布：“中国愿免除洋货入口税，请外国将原订《天津条约》作废。”后来，谈判没有结果，咸丰帝只得退了一步，认为其他各节均可按原约执行，唯有外国公使驻京一节，为害最巨，断难允行。即便是这样，英法也不同意，咸丰帝企图通过谈判来取消《天津条约》的设想失败了。这使咸丰帝更加气恼，决心寻机报复，他命令僧格林沁修筑大沽炮台，并命令说：“洋人北来，我军必先开炮。”咸丰九年（1859），英法美公使北上进京换约，咸丰帝发布上谕：命外使入京必须照朝贡国进京惯例，不能乘轿摆队，觐见皇帝必须行三跪九叩大礼。并指定英法等公使必须从北塘登陆，经天津去北京。可是英法公使断然拒绝按照指定路线进京，并要求撤除大沽口内障碍，清政府坚决不允，双方争持不下，战端再起。五月二十五日，英法美舰队炮轰大沽炮台，由于僧格林沁早有准备，奋起还击，击退英法联军。大沽之战胜利后，咸丰帝十分兴奋，认为列强黔驴技穷，因此态度转得更硬，宣布彻底取消《天津条约》。

咸丰十年（1860）六月十三日，英法联军兵船数十艘，又突入渤海湾，决心回报去年大沽战败之耻。由于清军的落后和战略失误，连连失败，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北塘、大沽失陷，天津失守，北京震动，报急文书象雪片一样飞向京师。在这种情况下，咸丰帝真是六神无主，不知所措，只好调兵防堵，以防万一。另一方面，接二连三派出求和大臣，谋求和平解决。但与英法和谈没有成功。英法联军长驱直入，直逼京师。咸丰帝知道大势已去无可挽回，决意以巡幸为名出逃。八月七日，咸丰帝命恭亲王为议和全权大臣，速与英法公使议和，咸丰则带领一批亲信大臣和妃嫔匆忙逃到了热河。由于十余年间太平天国的致命威胁和外国

列强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的接连不断的打击，使咸丰长期以来都忧心冲冲，加上为排忧解难，他后来既寄情声色，如此严重地损坏了他的健康。逃往热河途中，又非常狼狈，因此到热河后咸丰帝明显感到体力不支，健康状况更加恶化，经常痛泄呕血。可是他在肃顺等人的放纵下，仍然整日花天酒地，醉生梦死，以酒色取乐。咸丰十一年（1861）七月七日，咸丰帝在忧虑和淫乐中死去，终年 31 岁，葬定陵，结束了他多灾多难的一生。

穆宗爱新觉罗·载淳

载淳即同治帝，他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朝自顺治帝以来的第八位皇帝。他一生只活了 19 岁，而且一直在其母后西太后的挟制之下，基本上没有什么作为。

一、幼年继位 纨绔少年

咸丰六年（1856）三月二十三日，清宫内部一片繁忙气氛，尤其是位于紫禁城西部的储秀宫，更是人来人往，一个个喜气洋洋，大家都在为懿嫔叶赫那拉氏的分娩做着紧张的准备。这真是个令人兴奋而又焦虑的时刻。原来咸丰帝虽然三宫六院，妻妾成群，可是他已 26 岁，却不曾有一个儿子。古人说过，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一般人家尚且需要男儿来传宗接代，更何况是帝王之家呢？咸丰帝渴望自己有一个儿子，来继承自己的皇位。三月二十三日下午两点左右，叶赫那拉氏顺利分娩，果真生一男孩。咸丰帝接到奏报后，见自己终于有了儿子，十分高兴。他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和兴奋，立即挥笔亲批朱谕，懿嫔晋封为懿

妃，在储秀宫值班的太监也各有升迁。这个给其父咸丰帝带来欢愉，并给其母带来恩宠的孩子，就是后来的同治帝——载淳。

载淳的生母叶赫那拉氏，出身在一个世代为官的中等官僚家庭。其父亲名叫惠征，曾任安徽宁池广太道。那拉氏的乳名叫兰儿。她相貌出众，漂亮美丽，而且十分聪明伶俐。咸丰帝 20 岁登基继位，选钮祜禄氏为皇后，并广选秀女，补充宫娥，兰儿有幸被选中。咸丰二年（1852）兰儿入宫，被封为兰贵人。入宫之后，兰儿虽然不满自己的“贵人”称号，但也无可奈何。兰儿是一个有心计的人，为了讨人喜欢，她操作勤恳，努力干活，任劳任怨，而且对人态度温和，乐于助人，人缘十分好。更抓住一切可能的机会接近皇帝。据说，有一次咸丰帝游圆明园，走到“洞阴深处”附近，听到有人歌唱南方小调，声音清脆，曲调幽长，非常悦耳动听，感到十分惊异。咸丰帝便问侍从太监这唱歌的是谁，太监告诉咸丰帝是兰贵人。于是咸丰帝便步入“洞阴深处”，命召那拉氏入见。咸丰帝见兰儿极为美丽，心中十分欢喜，就让她再唱一支南方小调。这次兰儿有幸被皇上召见，能说会道，又善猜人意，很讨皇上喜欢，渐渐就得宠了，不久由贵人升为懿嫔。咸丰六年（1856）又生了儿子载淳，满足了咸丰帝盼子心切的愿望，更是如鱼得水，因子而贵，再晋升为懿妃，第二年，又晋升为懿贵妃。

小载淳在其出生以后的几年内，生活是快乐的、幸福的。他的父亲咸丰帝，对他寄予了极大的希望，望他能继承大业。他的母亲那拉氏，不仅出自天然的母子之情，而且也因儿子给自己带来了极大的好处，载淳既是那拉氏的亲生骨肉，也是她的重要政治资本，所以那拉氏也十分爱怜载淳，细心照顾他的生活和成

长。可是这种欢快的生活并不长久，一场变故把载淳推上了皇帝的宝座，同时也把他推入痛苦和郁闷的深谷。

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清军节节败退，而英法联军却长驱直入，逼近北京。咸丰十年（1860）八月，咸丰帝仓皇逃出北京。这时，小载淳才4岁，也随父母逃到热河的避暑山庄。咸丰帝逃到热河后，病情逐渐加重，经常吐血，他深知自己病情严重，于是便于咸丰十一年（1861）七月十六日，把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协办大学士肃顺、御前大臣景寿、军机大臣兵部尚书穆荫、吏部左侍郎匡源，署礼部右侍郎杜翰、太仆寺少卿焦佑瀛等8人召至榻前，接受遗诏，立皇长子载淳为皇太子，并任命以上8人为“赞襄政务王大臣”，辅佐载淳。第二天，咸丰帝病死，年仅5岁的载淳继位，拟年号“祺祥”。可是，这个年号尚没有正式应用，清朝廷内部发生了一件重大的夺权斗争，这个斗争的结局又影响了小皇帝载淳的一生。

原来，在咸丰帝生前，肃顺等人很受信任，权力极大，这使载淳的生母那拉氏十分嫉妒和痛恨；肃顺等人则想，咸丰帝死后，那拉氏成为皇太后，会对自己不利，所以也经常在皇帝面前诽谤那拉氏，载淳继位以后，肃顺等人以“赞襄政务王大臣”的名义，掌握大权，执掌朝政。那拉氏和钮钴禄氏被尊封为皇太后。因为钮钴禄氏和那拉氏在热河时分别居住在东宫、西宫，故也分别称为东太后，西太后。西太后因前面的原因对肃顺等人的掌权更加不满，所以两者之间的矛盾进一步激化，一场变故就不可避免了。

西太后明白，要想同肃顺等人争夺大权，就必须首先征得东太后的同意和支持，于是便向东太后提出执政的事。东太后性格

温和，胆小怕事，对权力也没西太后那样的兴趣，所以，对西太后的提议，起初并没有应允。西太后便向东太后诉说肃顺等人的种种专横之事，以引起东太后对肃顺等人的不满，东太后被说动心，建议和奕訢商量一下。于是她们密旨令奕訢速赴热河。奕訢和其兄咸丰帝不合，一直不得意。咸丰帝逃往热河时，奕訢被留在北京收拾残局。咸丰帝死后，奕訢连顾命大臣也没有份，而且肃顺等人传旨，命奕訢仍留京办事，不必来办理丧事，这更引起奕訢的不满，所以肃顺也成了奕訢的冤家对头。奕訢于咸丰十一年（1861）八月初一日到达热河，抓紧与两太后密谋。他指出，要想制服肃顺等人，非还京不可，并向两太后保证，外国人不会干涉此事。密谋之后，他立即返回北京，为政变做准备。

西太后为了摆脱肃顺等人的控制，以便进行政变，坚决主张回京。肃顺等人似乎忘记了“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古训，对此重视不够，表示同意回京。九月二十三日，小皇帝载淳恭奉咸丰帝的梓宫启行回京。早晨，行完启灵礼后，两太后和小皇帝载淳间道先行，载垣、端华、景寿、穆荫等人随从，而让肃顺跟随梓宫后行。这样，西太后就把肃顺这个最难对付的敌人孤立了起来。

九月二十九日，到京以后，西太后见奕訢等人已准备就绪，立即于九月三十颁布谕旨，将载垣、端华、肃顺、景寿、穆荫、匡源、杜翰、焦佑瀛赞襄政务八大臣解职拿问。十月六日，又颁布上谕，载垣、端华均加恩令其自尽，肃顺加恩立斩，其他五位或革职，或流放。这样，西太后等人以迅雷之势一举彻底击垮了肃顺等人的势力，登上了“垂帘听政”的宝座。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辛酉政变”，也称“祺祥政变”。

十月初九日，载淳在太和殿正式继位。在热河的时候，颁定

的年号是“祺祥”，但并未实施。回京以后，朝政变迁，有人提议更改年号，西太后便命王公大臣会议。众人议定新的年号为“同治”，以示两宫太后临朝同治之意。西太后听后十分高兴，特颁谕旨，改年号为“同治”，以明年为同治元年。此后不久，王公大臣又制定了垂帘章程，经过两宫太后批准执行。十一月初一日，两太后和小皇帝共到养心殿，接受众臣的朝拜，从此正式开始了两太后“垂帘听政”的时期，也就是从这个时候起，同治帝就失去了家庭生活的乐趣，成为他母亲手中的一个傀儡和工具。

为了把载淳培养成人君，两宫太后为同治帝挑选了强大的师资阵容。尤其是同治登基之后，特派同治帝的叔父醇郡王奕訢教习蒙语及骑射，大学士倭仁教习满文，恭亲王奕訢稽查弘德殿一切事务，惠亲王绵愉常驻弘德殿照料一切。早在咸丰帝在世的时候，大学士李鸿藻就被任命为同治帝的师傅，后来又有倭仁、李棠阶、翁同和等人相继入值弘德殿，教授同治帝汉文。奕訢、奕訢、绵愉等人都是皇族尊贵，地位极高；而倭仁等人又大都是清中央的权臣，并具有较高的封建文化素养。为了约束同治帝，按照清朝祖制，对学习内容，学习方法都有十分严格的规定和要求。同治帝每日到书房后，要先拉弓，然后学习蒙古语，读满文书，最后读汉文书。

本来同治帝自幼聪颖，有成人的风度，而且天性浑厚，按常理发展，本可成为一个有所作为的人。可是载淳虽然贵为一国之君，却有着诸多的不幸和烦恼，其父咸丰帝早死，使他过早地失去父爱；其母西太后自“垂帘听政”以后，一味倾心于宫廷斗争，争权夺利，对同治帝很少关心，根本没有什么母爱可言，更不用说母教了。载淳得不到别的孩子所享受的父爱和母爱，享受不到

家庭的乐趣，他只有和阉宦们鬼混在一起，寻找欢乐，以弥补他那缺少温暖的心灵。太监们大多是阿谀奉迎之辈，他们为了讨得小皇帝的喜欢，根本不可能对同治帝进行有益的照顾和教育，往往以声色犬马诱惑皇帝，使同治帝幼小的心灵受到极大的污染。由于师傅们上课时不能呵责皇帝，因此就找了一些贵族子弟伴读，当皇帝有错或不认真学习时，拿他们立威。但同治帝在稍稍长大之后，在一些贵族子弟诱导下，同治帝往往微服出宫，到处游荡。寻欢作乐。尤其同治帝与恭亲王之子贝勒载徵两人很要好，而且两人都喜欢穿黑衣服，而载徵是个好色之徒，因此在他的带领下，凡有女子的娼寮酒馆及其摊肆，他们几乎无所不至。

因此同治帝根本不能安心读书，而且厌学情绪越来越强烈。功课越重，他越依恋玩乐的兴趣和轻松；师傅们越严肃，他越喜欢那些阿谀奉迎之辈，因此同治帝在弘德殿成为一个十分难治的顽皮“学生”，在上书房读书时，虽然师傅们屡次告诫他“读书尚勤”，可是他根本不理睬，不是精神不聚，乱动嬉笑，就是昏昏欲睡，甚至还和伴读的载徵打闹在一起，让他们的师傅们啼笑皆非，想尽了办法也无可奈何。

正因为这样，虽然倭仁等人用心教授，兢兢业业，可是同治帝的学业却进展不大，到同治十年（1871），同治帝已有16岁，即将大婚亲政，但对学习仍不热心，他的师傅虽心急如焚，可无法改变，因此到亲政的时候，同治帝不仅连最基本的经典如《左传》都讲解不了，甚至不会句读，读奏折也不成句，书写时则别字连篇，说话也不太清楚。这就是大清国第八位皇帝的文化水平和素质。

二、母子不和 淫病而终

同治帝是西太后的亲生儿子，可是母子之间却没有一般人家所具有的那种天伦之乐，也没有封建伦理纲常所要求的母慈子孝。作为母亲，西太后以子而贵，使她有机会登上清王朝权力的顶峰，在她眼里儿子无非是她争权夺利的工具而已，她对儿子缺少一个母亲所应当具有的母爱和温情，更多的是控制和利用。同治帝性格倔强，对母亲也没有那种缠缠绵绵的感情，相反更多的是反感和不满，尤其是同治帝亲政以后，对母亲的专横揽权更加不满和恼火，时时有摆脱母亲控制的想法。

使同治帝更为恼火的是，西太后蛮横干涉他的私生活。同治八年（1869），同治帝载淳已年满14岁，按照惯例，就该举行大婚了，大婚之后就要亲政。西太后权力欲极强，视权如命，她不愿归政给同治帝，所以对同治帝的婚事也一再向后推延。到同治十一年（1872），同治帝已经17岁了，西太后无论如何没有理由再拖下去了，不得不为同治帝议婚。当时，在备选的女子中，侍郎凤秀之女富察氏漂亮美丽，相貌出众，而侍郎崇绮之女阿鲁特氏虽然相貌上较富察氏逊色，但雍容华贵，举止端庄。东太后嫌富察氏轻佻，十分喜欢阿鲁特氏，意立阿鲁特氏为皇后；西太后则不喜欢阿鲁特氏，因为阿鲁特氏是西太后的政敌郑亲王端华的外甥女，不愿把皇后这个位子让给这样的人，所以意欲立富察氏为皇后。东太后告诉西太后说：“凤秀的女儿太轻佻，怎能选为皇后呢？只能当一个贵人。”这话正刺中了贵人出身的西太后的痛处。两太后争议不下，就让同治帝拿主意，结果大出西太后的

意料，自己亲生儿子竟不向着自己，同治帝表示喜欢阿鲁特氏，要选她为皇后，九月同治帝举行了大婚典礼，阿鲁特氏入宫，被封为孝哲毅皇后，富察氏同时入宫，被封为慧妃。

结婚以后，同治帝和孝哲毅皇后相敬如宾，情投意合。孝哲毅皇后不苟言笑，气度端凝，同治帝十分钦佩和敬重。宫中没事的时候，同治帝常常给皇后提问唐诗，皇后都能对答如流，同治帝心中十分喜欢。可是，西太后却不能理解儿子的心情，有意挑拨同治帝和皇后关系，不仅婆媳关系不好，也使母子关系进一步紧张。西太后多次向同治帝说：“皇后太年轻，不懂礼节，皇上不要常到中宫去，以免妨碍政务”，并且极力赞扬慧妃贤惠，要同治帝多加眷爱。不仅如此，西太后还派人时时刻刻监视同治帝。同治帝对其母西太后干涉自己私生活的做法十分不满，偏偏不听母亲的话，索性独自一人居住在乾清宫，以示对母亲的抗议。

同治十二年（1873）一月二十六日，西太后归政，同治帝亲政。然而，同治帝仍然没有真正的权力，清朝的大权仍然掌握在西太后手中。同治帝亲政以后，并没有什么政治作为，他用心最多的恐怕就是修复圆明园一事了。在这件事上，他和母亲西太后意见一致，步调统一，可算是他们母子之间难得的一次谅解。

修复圆明园殊非易事，工程浩大，耗资甚巨，不仅给清政府的财政带来了巨大的负担，还将引起奢华之风，因此招来一片非议声。这时候，原本就不同意但却未敢极力劝阻的恭亲王奕訢不得不出面了。同治十三年（1874）七月十六日，奕訢上疏，请求同治帝停修圆明园，并指出了同治帝一些不符合祖制的生活作风和行为。如在内宫与太监打闹，出宫游玩，不用心读书等等。

奏疏上后，奕訢又怕同治帝看不明白，请求皇上召见，同治帝不予理睬。奕訢再请，同治帝才于十八日召见了奕訢，召见时，奕訢将其奏折中所陈诸条反复讲解，同治帝不耐烦地说：“我停工就是了，你何必费这么多口舌呢？”奕訢说：“臣所奏很多，不只请求停修圆明园一事。”同治帝更加恼怒，没好气地说：“我这个位子让给你怎么样？”二十九日，同治帝上朝，召集诸王大臣，指责奕訢无人臣礼，应当重处。同治帝颁诏尽革恭亲王所任军机大臣及一切差使，交宗人府严议。虽然诸王大臣极力劝阻，但同治帝余怒未消。于三十日又发布谕旨，以“语言之间诸多失仪”为名，革去奕訢亲王世袭罔替，降为郡王，仍在军机大臣上行走。八月初一日，又颁布谕旨，以“朋比谋为不轨”为名，尽革恭亲王奕、醇亲王奕訢等10人的职务，由此发泄对奕的不满。两宫太后听到消息，急急忙忙赶到弘德殿，斥责同治帝年少不懂事，同治帝只好撤销了对奕訢等人的处罚。经过这场风波，同治帝和西太后也只得放弃了修复圆明园的想法，但却再次提出修建西苑三海为交换条件。至此围绕着修复圆明园的争论才告一段落。

同治帝虽然名义上是一国之君，但却没有一国之君的尊严和权力。在政治上，同治帝受到西太后的控制，年幼的时候暂且不说，即便是亲政以后也是如此。加之实际上他也没有康熙帝那样年少有为的素质，因此，可以说政治上是一无建树。在生活上，同治帝也受到西太后的无理干涉，使他丧失了家庭乐趣，这使性格倔强的同治帝十分苦闷和烦恼。在这种情况下，同治帝肆意出宫去寻找乐趣。他到处寻花问柳，纵情淫乱，一点也没有国君的样子。长期的淫乱生活，使同治帝渐渐染上了梅毒，身体垮了下来，同治十三年（1874）十月前后，同治帝感到身体很不舒服，

传太医看视。太医看后大吃一惊，便知道是淫乱生活所造成的病毒，但却不敢明言，便奏请西太后，西太后心中也明白，但为顾全皇家的声誉，也不好明说，便说是天花。于是太医便用治天花之药给同治帝治病，当然不可能奏效。同治帝十分痛苦，气愤地说：“我的病不是天花，为什么按天花治呢？”此后，同治帝的病情不断加重，身体下部已溃烂，臭不可闻。在同治病重期间，孝哲毅皇后不断到同治帝床前看视，好言劝慰，并亲自为同治帝擦去身上的脓血，以尽夫妻之情。就在儿子病危的时刻，西太后也没有尽自己应尽的母爱，相反，常常借故迁怒于孝哲毅皇后，甚至破口大骂。这时的同治帝已无力与母亲抗争，只是痛恨在心中。

同治帝不久认识到，自己已没有生的希望，回顾自己 19 年的生活，感慨万千，痛恨不已，到这时他才明白，自己是多么的可悲！于是，他召见了他的师傅、军机大臣李鸿藻，口授遗诏，要求在他死后，找一个年龄稍大的人继承大统，以避免自己的悲剧。李鸿藻退出后，拿着同治帝的遗诏，浑身战栗，面色大变，立即奔告西太后。西太后见到同治帝的遗诏，如雷轰顶，即恨又惊，当场撕毁了同治帝的遗诏。同治十三年（1874）十二月五日，同治帝病死，终年 19 岁。孝哲毅皇后无法承受西太后的虐待和非难，在同治帝死后不到 100 天也痛恨殉节而死。

同治帝死后，葬在惠陵，追赠谥号为“穆宗”。

德宗爱新觉罗·载活

载活即光绪帝，是清王朝自顺治帝以来的第九位皇帝。光绪帝自幼聪颖好学，才思敏锐，立志要有一番作为。但他一生都无法摆脱西太后的种种挟制，最终治国抱负被扼杀，个人的家庭生活也被无情的践踏，成为西太后手中的囚徒，带着对未来的希望和憧憬，抱着满腹的遗憾和怨恨离开了人世，度过了他进取而又带有浓厚悲剧色彩的一生。

一、冲龄践祚 聪颖好学

同治十年（1871）六月二十八日，北京宣武门内太平湖边的醇王府，一派节日气氛，豪华庄严的大院更加富有生机，随着一个婴儿的啼哭声，一个小生命又来到了人世，给醇王府带来了新的欢悦和喜庆。这个孩子就是后来的光绪帝载活。

说起来，小载活的家世是显赫的。他的祖父是清代第六位皇帝道光皇帝，父亲是道光皇帝的第七子醇亲王奕訢，他的母亲是

慈禧太后的胞妹叶赫那拉氏。

载活年幼的时候，聪明漂亮，很讨人喜欢，加上他的大哥和三弟、四弟早殇，其他几个弟弟尚未出生，所以载活深得父母的钟爱，被奕訢夫妇视为掌上明珠。在这样优越的环境和家庭中，载活本可无忧无虑的生活，然而，一个偶然的事件，改变了他的生活道路。

同治十三年（1874）十二月五日，做了13年傀儡皇帝的同治帝病死，这在清廷中引起了巨大的震动，当然反应最为强烈的是同治帝的母亲西太后。西太后以子而贵，现在儿子死去，给她带来了极大的难题。因为同治帝早死，没有儿子，按照清王朝的家法，在同治帝死后就应从晚辈近亲中选出一个人，为同治帝立嗣，并继承皇位。当时同治帝载字辈之下是溥字辈，按惯例，应从溥字辈中选出一人，继嗣给同治帝并称帝。但是，如果这样做的话，那么西太后将因孙字辈为帝而晋尊为太皇太后，太皇太后固然也很尊贵，但从血缘关系看却疏远了很多，无法继续控制清王朝的大权。这对权欲熏心的西太后来说，确实是一件难以接受的大事。西太后不甘心就此罢休，苦思冥想，终于想出了一个办法，那就是让醇亲王的儿子载活继位。载活年幼，又与同治帝载淳同辈，自己仍可保持皇太后的身份，执掌朝政，再说，就亲属关系而言，载活既是自己的侄子，又是自己的外甥，关系密切，利于控制。拿定主意后，西太后立即在养心殿西暖阁召开了御前会议，西太后向到场的宗室贵族、军机大臣等群臣说：“皇上的身体很虚弱，若有不测，宗室中谁可继大统？”话音刚落，内务府大臣文锡就说：“请择溥字辈中贤能者立为皇帝。”这是西太后最害怕的，她按捺不住心中的怒火，脸色陡变，她不再想兜圈子，

因此厉声说：“溥字辈中没有可立为皇帝的。奕 活 的儿子（载 恬）已经 4 岁，且是至亲，我想让他继位。”随后，西太后突然宣布同治帝已死的消息，群臣惊惑不已，一个个呆若木鸡，失声大哭，闹成一团。这样的情况下，没有人提出异议，于是西太后的阴谋得逞。就在当天，刚刚 4 岁的小孩子载 恬被迎到宫中，正式继为皇帝，改明年为光绪元年。

光绪入宫以后，离开了亲生父母，也失去了欢乐幸福的生活。西太后为了把光绪培养成自己的驯服工具，便从多方面对小皇帝进行精心塑造和训化。光绪小皇帝刚入宫的时候，年仅 4 岁，生活尚需要别人照料，说句公道话，西太后对光绪帝还是比较关心的。西太后有时让光绪帝睡在她的寝榻上，爱护光绪帝的身体，照料光绪帝的饮食，并根据季节的变化为他加减衣服，高兴的时候，还口授光绪帝念四书五经。西太后想，只要关心光绪帝，那么就能在她和光绪帝之间建立起“母子”关系，就可以用封建孝道来加强对光绪帝的控制和约束。西太后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在关心光绪帝的同时，不近人情地切断了他与其亲生父母的关系，连醇亲王夫妇都不敢给光绪食物吃。西太后还精心选拔了一些宫内太监侍候光绪帝，并嘱咐他们，要经常告诉光绪帝，他不是醇亲王的儿子，太后才是他唯一的母亲。

西太后也明白，只靠关心爱护是不行的，还要有必要的规矩和制度，这样才能树立起自己的权威和尊严，才能永久地控制光绪帝。为此，她为光绪帝制定了一些不可违背的条规。每天早晨，光绪帝必须到西太后的住处去，给西太后问好请安。随着光绪帝年龄的增大，西太后对光绪帝的要求也更加苛刻。在光绪帝磕头请安的时候，没有西太后的命令，光绪帝是不敢起来的，如果遇

上西太后不高兴，那么光绪只得长跪，还不敢表示什么不满。每逢西太后乘舆外出，光绪帝必须亲自随从，即便是炎风烈日的夏天，或是北风凛冽的冬天，也不能例外。就这样，年少的光绪帝没有一点人身自由，整日生活在西太后的淫威之下，给光绪帝幼小的心灵留下极大的阴影和创伤，致使光绪帝陷入无法言语的痛苦之中。正因这样，光绪帝十分害怕见到西太后，每见到西太后总像见到狮虎一般，战战兢兢，生怕惹怒西太后。这一惧怕心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他的一生。

值得庆幸的是，光绪帝的师傅们尤其是翁同和还是十分爱护这位“学生的”。他曾经任过同治帝载淳的师傅，这次又出任光绪帝的师傅，他希望能把光绪帝培养成一个治国安邦的明君。在教书的过程中，翁同和给光绪帝反复讲解列圣遗训，古今治乱之道，并指出做为皇帝，要勤政爱民，善于纳谏。光绪帝听着师傅的讲解，十分认真，虽然有些问题是几岁的孩子尚无法理解的，但光绪帝还是用心地听着、记着。翁同和不仅教书，而且在生活上也相当关心光绪帝，以长辈的厚爱温暖了光绪帝那颗受到创伤的心灵，虽然他们之间有君臣的名份，然而他们的关系十分融洽。翁同和得到光绪帝的尊敬和信任，成为以后光绪帝倚重的重要人物。光绪帝天性聪敏，记忆力很强，又酷爱读书，勤思好问，所以学业上进步很快。每当翁同和提出问题，或者让他背诵已念过的书，他都能应付自如。

功夫不负有心人。到光绪十二年（1886），16 岁的光绪皇帝已经经历了整整十年的学习生涯，不仅对传统的六经诸史有了较深的了解，而且也有了一定的披阅奏章，论断古今，剖断是非的能力，较好地完成了学习任务。这时的光绪帝已不是一个毫无知

识的孩子了，他开始有了自己的思想，开始有了参政意识，对朝政表现出越来越大的兴趣，正在冲击着西太后一手遮天的局面。

光绪十三年（1887），光绪帝已经是17岁的人了，在那个时代，已经到了结婚的年龄。按照清王朝的惯例，幼帝一经大婚（指结婚），便要亲政即独立执掌朝政。这又一次给西太后出了难题。

西太后权力欲极强，让她归政于光绪，当然不是她的本意。但她心中明白，一直拖下去也不是个办法，那样会引起一些人的不满和非议。更何况她早已许下诺言，即一旦光绪帝典学有成，即行归政，她也不愿落一个言而无信的恶名。想来想去，她找到了办法。光绪十二年（1886）六月十日，西太后发布懿旨，公开宣称明年举行亲政典礼，让光绪帝亲政。对西太后这种虚伪的表示，其亲信心神领会，赶忙出来圆场。几天后，醇亲王奕譞，礼亲王世铎等人上了一个奏折，请求西太后再训政数年。西太后顺水推舟，装出无可奈何的样子，说皇帝年幼，不能不遇事提携，王大臣多次恳请，只好再训政几年。十月二十六日，西太后和其亲信一起，又制定了一个《训政细则》，其中规定凡军政大事，任免二品以上官员以及考试命题等大政，都要禀承西太后的旨意，方可实行。这实际上是用法律的手段肯定了西太后的统治地位，仅仅是让光绪帝举行了一个所谓的“亲政”仪式，这样，“垂帘听政”改为“训政”，但实际权力并未移到光绪帝手中。

因光绪已18岁，就是一般老百姓家也该婚娶了。因此在光绪十四年（1888）六月十九日，西太后颁发懿旨宣称，明年为光绪帝举行大婚，并让他亲裁大政。在封建社会里，婚姻往往成为统治者争权夺利的工具，后妃对皇帝有重大影响，妃子出身的西

太后是很清楚的。因此，她对光绪帝的大婚尤其是选择皇后问题格外重视。十月五日，在皇宫的体和殿为光绪帝选择后、妃。当时备选的女子有5人，首列是都统桂祥之女，她也是西太后的侄女；次为江西巡抚德馨的两个女儿；末为礼部左侍郎长叙的两个女儿。按清朝传统，选中皇后者给予如意，选为妃者给予荷包，以为选定的信物。以西太后的心愿，她当然希望自己的侄女被选为皇后，以便通过皇后进一步加强对光绪帝的控制。但也不能做得太露骨，为了作一下姿态，她面对光绪帝，指着站成一行的五位女子说：“皇帝，谁能中选，你自己裁决，合意者即授以如意。”说着就把如意递给了光绪帝。光绪帝当然希望按照自己的喜爱选择自己的皇后，为自己找一个温柔的妻子，但却不敢表示出来，就谦让说：“此大事当由皇爸爸（光绪帝对西太后的称呼）主持，子臣不敢自主。”西太后坚持让光绪帝自选，光绪帝只好答应。他面对眼前的几位女子，逐一寻视了一遍，略一沉思，就走到德馨的女儿面前，想把如意给予她，选她做自己的皇后。这时，西太后大叫一声“皇帝”，光绪帝猛的一惊，但他立刻明白了西太后的用意，心中虽不痛快，但却无可奈何，只好把如意交给了桂祥的女儿。经过上面的举动，西太后看出光绪帝喜爱德馨的女儿。她想，若把德馨的女儿选为妃子，将来也有与自己的侄女争宠之忧，于是她一不做，二不休，匆匆命人把一对荷包交给了长叙的两个女儿。选后活动在西太后的蛮横干涉下草草收场。光绪帝虽然名义上是一国之君，但却连选择自己后妃的权力都没有，以后，造成了又一桩不幸的婚姻悲剧。

皇后、妃子选定以后，接着就该是大婚。光绪帝的婚礼场面隆重宏大，花费也相当惊人，据不完全估计，光绪帝大婚共用黄

金 4126. 935 两，白银 482. 4183 万，制钱 2758 串，皇家的奢侈可见一斑。

结婚后不几天，按照西太后的旨意，在太和殿为光绪帝举行了正式的“亲政”典礼。西太后时断时续地住进颐和园，做出让位的样子。光绪帝正式亲裁大政了。

大婚、亲政过后，光绪帝的境遇并不令人满意，小皇帝光绪也没有成为清王朝的真正主裁者。当时，西太后的势力已经形成，有些大臣紧跟西太后，唯西太后的旨意行事，根本没把光绪帝当做一回事。清王朝一切用人行政都由西太后及其亲信把持，朝中有重大事件，光绪帝无权裁决，必须向西太后请示。因此，光绪帝仍然是一个挂名皇帝。

三、抵御外辱 力不从心

光绪帝在位的 30 年，正是清王朝的多事之秋。列强步步进逼，加紧侵略中国，中国半殖民地程度急剧加深。面对列强的入侵，血气方刚的年轻皇帝从其统治和江山社稷的利益出发，怀着极大的激愤之情，积极主战，表现出满腔的民族义愤和忧国之情。

中法战争期间，光绪帝还是上书房的小学生，由于年龄的关系还不可能对中法战局有全面的了解，当然也不可能提出有价值的策略，但小皇帝表现出年青人所具有的锐气，鲜明地表明自己的抗战态度。他在和师傅翁同龢和交谈中，对中国的前景表示担忧，坚决支持两广总督张树声，山西巡抚张之洞（后调任两广总督）等人的抗战主张。战争开始以后，西太后等人总想议和，法

方提出，中国必须赔款，光绪帝听到以后，认为坚决不能赔款。马尾海战惨败（光绪十年七月）后，光绪帝更加激愤，态度更加坚决，主张向镇南关外加兵，痛击法国侵略者。可是，令小皇帝失望的是，中国最终还是与法国签订了屈辱的条约。这给小皇帝极大的刺激，他在想，大清王朝怎么总是屈服于洋人呢？

光绪帝亲政不久，清王朝又面临着更加严重的危机。日本自明治维新以后，建立起地主资产阶级联合专政，狂妄地想称霸世界，走向了对外侵略扩张的道路，与它一衣带水的邻邦中国成为它的首要侵略目标。

光绪二十年（1894）春，朝鲜爆发了农民起义，由于历史上形成的中朝之间的宗属关系，清政府应朝鲜政府之邀，于五月派兵入朝，帮助朝鲜政府弹压农民起义。清军出兵之时，按照光绪十一年（1885）签定的《中日天津条约》的有关规定，主动通知了日本。可是日本却借此机会大作文章，在朝鲜国内起义已被镇压下去，中国通知日本准备撤军之时，反借口保护日本侨民，大量向朝鲜运兵蓄意发动战争。清政府为平息事态，提出中日两国同时撤兵的建议，日本不但不接受，相反一再增兵，并向中国驻军挑衅，中日战争迫在眉睫。

在这种情况下，清政府内部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主张。以西太后和李鸿章为代表的妥协派，为一己私利主张妥协退让。在国家御敌备战，需款孔急之际，西太后却为了准备当年的60大寿，在颐和园等处地段装点景物，肆意挥霍钱财，在她看来，没有什么事比她的60大寿更重要。手握重兵的李鸿章，怕损失自己苦心经营的实力，所以在西太后的支持下，借口衅不自我开，一味因循玩误。与此相反，以光绪帝等人为代表的主战派，则以

国家民族利益为重，坚持备战抗敌的方针。在日本已露侵略端倪的时候，光绪帝毫不犹豫地表明了自己的抗战态度，一力主战，并且积极支持朝野官员的备战抗敌呼声，不断发布谕旨，责令李鸿章加紧备战。

自光绪二十年五月中日关系紧张加剧，到八月一日清政府正式对日宣战止，光绪帝在抵抗派的支持下，以极大的热情和努力，筹备抗战事宜。首先，光绪帝坚持依靠自己的力量，反对李鸿章等人寄希望于列强调停的错误方针。甲午战争正式爆发前，各国列强为了自己的利益，表示为中日调停。对这种虚伪的表示，李鸿章等人深信不疑，视为救命法宝，同各国公使频频往来，不注重备战，而把全部的希望寄托在列强的调停上。光绪帝对此十分反感，强调抗战要靠自己的力量，不能依靠他国。五月下旬到六月初，光绪帝连续几次下令给李鸿章，要他认清日本蓄意挑起战争的严酷现实，应抓紧调派兵丁，准备军火粮饷，作好迎战准备。并明确指出，各国列强的调停是靠不住的，他们都有自己的企图，不要麻痹上当。光绪帝之所以不同意利用列强调停的政策，一方面是由于光绪帝怀疑列强的诚意，另一方面也不愿借助他邦，示弱于人。可是，李鸿章在西太后的支持下，置光绪帝的指责于不顾，我行我素，继续寄希望于列强的调停。六月下旬，日军在朝鲜丰岛海面突袭中国的运兵船，致使中国上千名官兵壮烈牺牲。李鸿章兴高采烈，因为被击毁的运兵船是李鸿章雇用的英轮——高升号，他认为英国必会勒令日本妥协。光绪帝对此十分愤怒，又连续几次谕示李鸿章，不要坐失时机，观望不前，要立即整军奋击，否则，一定要严惩不贷。其次，光绪帝积极筹措款项，为备战提供物质条件。战事紧迫，需要大批物资供应，然

而当时清政府财政吃紧，这使光绪十分为难。可是，西太后却为了自己的寿典，修建颐和园，动用大批经费，置战事于脑后。光绪帝为了集中国力备战，冒着被西太后痛骂的风险，请求西太后停止营建颐和园，把钱财用到军费上。对此西太后十分恼怒，痛骂光绪不仁不孝，可是迫于形势，不得不忍痛发布懿旨，同意光绪帝的请求。并同意简化万寿庆典的准备活动。光绪帝督促户部、海军事务衙门，从盐课、海关税、各省地丁银等项中抽出300多万两，交给李鸿章做军费。光绪帝虽然受到西太后的压制和李鸿章等人的抵制，但却为备战付出了很大的努力和心血。

光绪二十年（1894）六月下旬，日军不宣而战，向朝鲜牙山中国驻军发动进攻，中日战争拉开了序幕，这在中国社会中引起了极大的反响，社会上的抗战呼声更加高涨，主战派也更加活跃。人们纷纷揭露日本的侵略行径，斥责李鸿章等人欺骗朝廷，抵制圣意，屡失事机的误国行为。主战派的中坚人物礼部右侍郎志锐、侍读学士文廷式等人，请求光绪帝乾纲独断，严明赏罚，扩充海军，审视邦交，挽救抗战大局。在抗战呼声的激励下，光绪帝的抗战态度更为坚决。这年八月一日，光绪帝正式颁布上谕，向日本宣战。在这个上谕中，光绪帝猛烈抨击了日本威迫朝鲜，伤我兵船的侵略行为，严正指出，日本的行为不仅不合情理，简直就是不遵条约，不守公法的强盗主义；命令李鸿章立即派出军队，迅速进剿，还击自卫；并命令沿海各地的将军督抚，要严守各口，加紧备战，随时准备痛击日军。

在封建社会里，皇帝的谕旨应具有绝对的权威，臣子只有执行的义务，而没有提出一点异议的权力，然而这一常规却在光绪帝这里行不通，因为光绪帝有名无实，没有真正的权威。所以，

虽然光绪帝心急如焚，措词严厉，但手握实权的主和派却置若罔闻，无动于衷。光绪只能利用他手中有限的权力，以李鸿章指挥无方，旅顺失守，给予他革职留任，摘去顶戴的处分，对主和派进行了力所能及的督促和处罚。

光绪二十一年（1895）正月，威海卫海战失败，北洋海军全军覆没。日本侵略者认为时机已到，向清政府透露，如果派位望甚尊，声名素著，并有让地之权者来日本，中日便可议和。当时，主和派固然成为惊弓之鸟，乱作一团，即便是光绪帝等主战派也拿不出良策。西太后根据日本的要求，主张派李鸿章去日求和，光绪帝表示异议。但西太后单独召见朝廷枢臣，命让李鸿章来京请训，奕訢小心地说，“皇上的意思不令其来京。”西太后大怒，蛮横地说：“我可做一半主张！”在西太后的指使下，军机大臣孙毓汶草拟谕旨，正式任命李鸿章为头等全权大臣，并宣告，光绪帝在此以前给李鸿章的一切处分均免，赏还翎顶、黄马褂，开复革职留任处分。

李鸿章到日本后，于三月二十三日与日本签订了《马关条约》，三月二十九日，条约文本送到北京。光绪帝看到条约中的苛刻内容，心中十分愤慨，百感交集，痛心地说：“割台湾则天下人心皆去，朕何以为天下主？”主战派人物翁同和，军机大臣李鸿藻等人也坚持不能承认这个条约，国内舆论也纷纷要求废约再战，并提出迁都持久抗战的策略。所以，虽然孙毓汶等一再逼迫光绪帝批准条约，但光绪帝没有答应，拒绝用宝签字。光绪帝想，要想废约再战，也只有迁都一条路了，所以光绪帝亲自到颐和园，力争西太后的允准，西太后淡淡地说“大可不必”，这样，光绪帝唯一的希望也破灭了。四月初八日，光绪帝在无可奈何的

情况下，被西太后等强词逼迫，顿足流涕地在条约上签了字，批准了《马关条约》。

四、锐意维新 千古遗恨

甲午战争的惨败，《马关条约》的签订，使民族危机更加严重，举国震惊，人们愤慨悲痛，为堂堂天朝而叹息，形成了“四万万万人齐下泪”的悲壮局面。在时代的逼迫下，救亡图存的呼声逐渐高涨，这不仅表现在一部分统治者掀起了追求富强之术的热潮，更重要的是以康有为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维新派登上了历史舞台。在时代波涛的冲击下，光绪帝也进入了他一生中最富有生机的时期。

光绪帝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批准了《马关条约》，割地赔款，开埠通商等不平等内容，大清王朝的权益大量丧失，这使光绪帝陷入极度的痛苦和郁闷之中。他想，祖宗之地在自己手中丧失，自己不就成了不忠不孝的千古罪人了吗？痛定思痛，他苦苦思索，素以天朝自居的大清王朝为什么竟会败于“弹丸小国”之手？这一问题始终困扰着他，使他寝食难安，坐卧不宁。

中国的出路何在，何以自强？对此，光绪帝虽有满腔热忱，但却不知从何下手。这时，翁同和再一次充当了光绪帝的指路导师。翁同和自任光绪帝的师傅之日起，就立志把光绪帝培养成“明君”。在甲午战争期间，翁同和积极主战，同孙毓汶等主和派进行了坚决的斗争。甲午战争的惨败，使翁同和十分震惊，他认识到，光靠祖先的遗训是无法挽救清王朝的。他思想变化较快，从一个尊王攘夷的封建正统人物变为颇具维新思想的开明人物

了。翁同和思想的变化，直接影响到光绪帝。翁同和多次在光绪帝面前陈述西方的长处，指出向西方学习的必要，并多次向光绪帝推荐康有为及其主张。事实上，光绪帝最初就是通过翁同和等人多少了解了外部世界的一些情况，翁同和等人的开导和启发，使愁闷苦恼的光绪帝茅塞顿开，如梦初醒，看到了希望，一条救国的道路隐隐约约地展示在他的面前。这使光绪帝异常兴奋，他开始对外部世界的形势产生了兴趣，也喜欢读新书了。

为了更多的了解外洋形势，光绪帝通过各种途径搜寻有关国外情形的书。光绪帝向翁同和等人索要了黄遵宪的《日本国志》，详加阅览，对日本的情形有了大致了解。光绪二十四年（1898）春天，通过翁同和的“代呈”，得到了康有为的《日本变政考》、《俄彼得变政记》及英人李提摩太编译的《泰西新史揽要》、《列国变通兴盛记》等书。光绪帝得到这些书后，如获至宝，如饥似渴地阅读学习，有时伏案苦读，有时沉思不已，读到精彩处更是兴奋之情溢于言表，拍手称绝。虽然由于种种条件的限制，光绪帝所看的书有很大的片面性，对西方各国的了解还是十分肤浅的。然而他毕竟知道了一些前所未闻的新事物和新思想，明白了一些新道理。到这时候，光绪帝的思想更加豁然，他开始认识到，中国许多地方都落后于洋人，很多事情都无法与列强相比，怎么能不被动挨打呢？承认自己的不足，敢于正视现实，使光绪帝心目中的“天朝至上”的虚渺观念开始破灭，对传统思想和先祖遗训开始怀疑，甚至唾弃。光绪帝对那些夜郎自大、顽固愚昧的封建官僚开始露出厌恶的情绪，甚至把原先奉为治国之宝的经典之书视为无用之物，只不过是一堆废纸，命手下的人焚之。到此时，光绪帝不仅有救国的热诚，而且找到了救国的道路，

那就是变法维新、决心要仿照外国来革故鼎新，励精图治。

但这时候，光绪帝仍然是个有名无实的皇帝，没有封建帝王所具有的独断的决策权。上有西太后的控制和束缚，下有众多顽固派的阻挠和抵制。光绪帝要想在这种情况下变法改革，谈何容易！为了支持康有为等人的变法活动，把变法愿望付诸事实，光绪帝在光绪二十四年（1898）春、夏之际，做了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首先，光绪帝冲破顽固派的阻挠，打通同康有为等人的联系。前此，由于顽固派的干扰，康有为的“公车上书”以及前几次上清帝书，光绪均未看到。光绪二十一年（1895），光绪帝间接见到康有为的《上清帝第四书》，便十分赞赏。以后，在《上清帝第五书》中，康有为以极其沉重忧伤的语调指出，如果因循守旧，不思进取，恐怕日后“皇上与诸臣求为长安布衣而不可得”，意思是说不改革就有可能重演崇祯帝吊死煤山的悲剧。康有为的论断在光绪帝心中引起了强烈的共鸣，光绪帝赞赏康有为的忠肝义胆，更激起了他变法图强的信念和决心。他立即给总署诸臣下令，以后康有为如有条陈，要即日呈递，不得阻格。这就初步打通了光绪帝和康有为等维新派的联系。其次，光绪帝支持康有为等人的变法行动，帮助他们迎击顽固派的破坏。面对康有为等人的变法活动，顽固派如丧考妣，既恨又怕，大肆叫嚣“祖宗之法不可变”。针对顽固派的进攻，光绪帝鲜明地站在康有为等人一边，他说：“今祖宗之地都保不住，何有于祖宗之法呢？”光绪二十四年（1898）春，康有为等人在北京成立了“保国会”，提出了“保国、保种、保教”的口号，以便组织变法力量。封建顽固派官僚纷纷起来攻击，御史文梯上了一个奏折，污蔑康有为是招诱党羽，犯上作乱，名为保国，实则乱国。在这危急时刻，

光绪帝针锋相对，质问顽固派说：“会能保国，岂不甚善！”及时地支持了保国会。最后，争取西太后的许可，取得变法决策权。光绪帝心中明白，不争取决策权，换句话说，不取得西太后的许可，所谓变法最终是一句空话。光绪帝拿出自己最大的勇气，公开向西太后要权了。光绪帝曾召见西太后的亲信庆亲王奕劻，让他转告西太后，“我不愿做亡国之君，如仍不给我事权，宁可退位。”奕劻找到西太后去说了，西太后暴跳如雷，立即就说：“他不愿坐此位？我早不愿让他坐了。”可沉思了一会，西太后想现在还不到时候，于是她让奕劻转告光绪帝，“皇上办事，太后不会阻拦。”光绪帝听到此话，长长出了一口闷气，心中也踏实了许多。就这样，光绪帝总算争得了一点变法的权力，虽然这种权力是暂时的、有限的、很不稳定的，但它却是变法付诸实施的重要前提。

光绪二十四年（1898）6月11日，光绪帝断然颁布了《明定国是》诏，正式宣布，进行变法革新。在这个诏书中，光绪帝尖锐鞭挞了那些墨守陈规，阻挠变革的守旧势力；沉痛地指出了中外悬殊，国势颓衰的严酷时局；明确指出了革新的合理性，肯定了变法是不可抗拒的必然趋势。诏令中外大小诸臣，上自王公，下至士庶，都要努力，发愤为雄。自《明定国是》诏拉开维新变法的序幕，到9月21日变法夭折，共计103天。在这一段时间内，光绪帝共发布改革谕旨180条左右，最多的一天竟发布11条谕旨。从所发布谕旨的内容来看，几乎涉及到国家生活各个重要的方面，主要有：选拔、任用通达时务和有志维新的人才；开办学堂、发展近代教育；鼓励士民上书言事；提倡办报、译书和出国留学；发展近代工商农业及交通运输业；奖励发明创造；

整顿民事，改革财政；整顿海陆军，加强国防力量等。

《明定国是》诏的颁布，犹如一声炸雷，在当时社会中引起了强烈而复杂的反响。一部分开明官员士大夫，拍手称快，积极响应，争谈变法，他们从光绪帝的变革中，看到了中兴的希望。然而，就当时的中国社会而言，封建顽固派的势力还是十分强大的，他们不学无术，因循守旧，鼠目寸光，只知图高官厚禄，花天酒地，养尊处优，置国家和民族的前途于不顾，形成一种十分腐朽顽固的社会力量。光绪帝要变法改革，不仅撞击着中国传统的思想观念和伦理道德，而且也直接触及到这些顽固大臣的切身利益，引起了他们丧心病狂的攻击和反对。所以，光绪帝和维新派所设计的改革方案，要想在中国大地上变成现实，不能不需要进行一番艰苦的斗争。

光绪帝颁布《明定国是》诏后的第四天（四月二十七日），西太后为了控制变法的势头并为以后绞杀维新运动准备条件，先发制人，这一天，西太后逼迫光绪帝发布谕旨宣布：一，以揽权狂悖的罪名，将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翁同龢革职，逐出京城回籍，由此砍掉了光绪帝的左膀右臂；二，规定以后凡授任二品以上官员都需向西太后谢恩，由此控制了人事任免权；三，将王文韶调进中央为军机大臣，任命荣禄署直隶总督（不久实授），由此抓住了京师重地的军权。这些谕旨的实质就在于，西太后不仅控制了军政权力，加强了顽固守旧力量，还削弱了光绪帝的权力及其支持力量。面对西太后的压力，光绪帝也采取了对策。第二天（二十八日），光绪帝召见了康有为，召见的地点就在西太后身边、颐和园的仁寿殿。他任命康有为“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上行走，”并允其专折奏事。但与西太后代表的顽固派相比就软

多了。

到光绪二十四年(1898)8月中旬,变法已进行了近3个月,光绪帝虽然尽了最大努力,但由于顽固派的反对,实际进展缓慢,成效不大。在这期间,光绪帝尝到了改革的酸辣苦咸,也感受到了守旧派的愚昧和狡诈。但是,他知道改革变法的事业不能停止,必须继续前进,否则将前功尽弃。所以,在8月中下旬,光绪帝又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把变法运动推向深入。

首先,废除旧衙门,严厉打击顽固分子的破坏行为。变法开始的时候,光绪帝接受了康有为的建议,只增新衙门,勿废旧衙门。可是顽固派的干挠破坏,使光绪帝十分恼火,他认为有必要对守旧大臣进行警告和处置,所以光绪帝冲破了“只增新、不黜旧”的框框,果断地向封建旧官僚体制开刀,裁撤闲散机构和冗员。光绪帝颁布谕旨,把中央的詹事府,通政司、光禄寺、鸿胪寺、太仆寺等衙门裁撤,同时宣布,上下冗员也一律裁撤尽净。并严词警告内外诸臣,不准敷衍了事,多方阻挠,否则定当严惩,决不宽贷。光绪帝的大胆举措,使清朝的守旧官僚们惊心动魄,人心慌慌,都怕丢掉自己的乌纱帽,有的甚至被吓得大哭不止。

其次,提拔维新人才,加强变法力量。分别诏谕任命内阁侍读杨锐、刑部主事刘光第、内阁候补中书林旭、江苏候补知府谭嗣同,均赏加四品卿衔,在军机章京上行走,参与新政事宜。虽然这四个人的经历和思想认识不尽一致,但却都有变法愿望,尤其是谭嗣同,更是坚定的变法维新人士。

再次,光绪帝准备模仿西方国家设立议院,开懋勤殿以议制度。设议院,兴民权本是康有为等宣传变法时的重要内容。但是变法开始以后,鉴于严峻的现实,康有为放弃了这一主张。光绪

帝对设立议院有一个认识过程，逐渐有加紧实施以推进改革的想法。对此，顽固派既恨又怕，百般劝阻。大学士孙家鼐危言耸听地说：“若开议院，民有权而君无权矣。”光绪帝曾决然回答说：“朕只欲救中国，若能拯救黎民，朕虽无权又有何妨？”8月下旬，光绪帝想把设议院的主张付诸实施，康有为劝他说：“现在守旧之徒充斥朝廷，万不可行。”光绪帝想了想，接受康有为的建议，但他不肯完全放弃自己的主张，因此准备采取变通方式，即开懋勤殿。其目的在于把维新的骨干人物集中在一起，并聘请国外政治专家，以便议论制度，全面筹划变法事宜，作为变法运动的最高指挥中心。

可以看出，到光绪二十四年8月中下旬，光绪帝拿出了自己最大的勇气，大胆推进变法，维新运动向纵深发展。可是，变法的深入，使光绪帝和顽固派的矛盾更加尖锐，尤为重要的是，光绪帝的改革行动，激怒了一直待机而动的西太后。八月十九日，因礼部尚书怀塔布等官员压制维新派，光绪帝一怒之下，将礼部尚书、侍郎六个官员全部撤职。对光绪帝罢免怀塔布等人，顽固派大臣十分不满，纷纷要求西太后出面制止。怀塔布的妻子经常在颐和园侍候西太后，深得西太后的喜欢，她利用这种机会，更是多次哭哭啼啼，请求西太后的庇护。有一天，光绪帝照例到颐和园向西太后问安，西太后满面怒容，厉声说道：“朝列重臣，非有大故，不可轻弃；如今你以远间亲，以新旧，依靠康有为一人而乱家法，何以面对祖宗？”光绪帝分辩说：“祖宗若在今日，其法也不会与以前一样；儿臣宁愿坏祖宗之法，也不愿弃祖宗之民，失祖宗之地，为天下后人笑。”西太后心想，不能再让光绪帝干下去了，自己收拾局面的时候到了。于是，西太后便和其亲

信开始了紧张的密谋活动。他们一面大造舆论，散布紧张空气，一面加紧进行军事部署，准备发动政变。遵照西太后的旨意，荣禄密调聂士成的武毅军进入天津，命董福祥的甘军进驻北京附近的长辛店，蠢蠢欲动，局势骤然紧张起来。

面对西太后等人的进逼，光绪帝也感到形势危急，于是便同维新派一起，也加紧制定对策。8月三十日，光绪帝给康有一个密诏，让他和谭嗣同等迅速筹划，设法相救。可是光绪帝和维新人物既没有实权，也无军队，因此显得十分软弱，当即陷入手忙脚乱的境地。9月初，在康有为等人的支持下，光绪帝先后两次召见当时以维新派面目出现，手握一定军权的袁世凯，给他加官进爵，竭力拉拢，幻想利用袁世凯的军队来保护自己，保护维新事业。可是，狡诈的袁世凯并未明确表示真心诚意地为光绪帝效劳。至此，光绪帝也认识到败局已定，无法挽回了。在这种情况下，为给将来的维新事业留下组织力量，光绪帝于9月2日密谕康有为，说：“你可迅速外出，不可迟延。你一片忠爱热肠，朕所深悉，望你爱惜身体，善自调养，将来更效驰驱，共建大业。”这时，康有为、谭嗣同等也在为保护光绪帝而做积极的努力。9月三日，谭嗣同夜访袁世凯，请求袁世凯杀荣禄，围颐和园，袁世凯假意答应。9月5日，光绪帝又接见了来华游历的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希望他帮助自己。当天，光绪帝第三次召见袁世凯，命他保卫圣躬。可以看出，光绪帝以及维新派在紧急关头，病重乱投医，未能拿出任何切实可行的应急办法。相反，西太后及其亲信却做了大量的准备，已经磨刀霍霍，准备动手了。

在这新旧较量的关头，善于见风使舵的袁世凯，雪上加霜，又给光绪帝等人捅上了一刀。9月5日，袁世凯被召见以后，立

即乘火车赶回天津，把光绪帝及维新派的谋划全盘告诉了荣禄。荣禄立即乘车赶到北京，告诉了西太后。西太后听到荣禄的报告后，十分恼怒，她痛恨维新派，更痛恨光绪帝，恨不能立即处置他们。第二天黎明，西太后在重兵控制北京后带人直奔光绪帝的寝宫，光绪帝知道事情不妙，慌忙出来迎接，西太后也不理睬光绪帝。命人搜查光绪帝的寝宫，把全部奏章席卷而去。然后怒斥光绪帝说：“我抚养你 20 余年，你竟听小人之言要谋害我？”光绪帝吓得浑身战栗，面色发白，慌忙回答：“我无此意。”西太后唾了光绪帝一口，说：“痴儿，今日无我，明日还有你吗？”当日，又以光绪帝的名义颁布谕旨，重新让西太后训政。随后颁布谕旨，捉拿维新党人。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已在政变以前逃出，幸免于难。九月十三日，谭嗣同、康广仁、刘光第、林旭、杨锐、杨深秀等 6 人，在北京菜市口被杀，史称“戊戌六君子”。至此，光绪帝及其维新派的变法活动就被以西太后为首的顽固派绞杀了，光绪帝的变法图强方案也就被无情地摧毁。随之，光绪帝也就进入他一生中最苦闷和痛苦的时期。

五、被囚瀛台 抱憾而终

戊戌变法失败以后，光绪帝生活境遇更加恶化了。为了彻底消除光绪帝的政治影响，西太后曾连续三次对光绪帝组织围攻和斥责。西太后发动政变的当天，在便殿召集起一大群顽固守旧大臣，令光绪帝跪在案前，并置竹杖于座前，如同审讯一般。她质问光绪帝说：“天下者，祖宗之天下，你怎敢任意妄为，各位大臣，皆我多年历选，你怎能任意不用。你竟敢听信叛逆蛊惑，变

乱典刑。康有为能胜于我选用之人？康有为之法，能胜于祖宗之法？”面对西太后的斥责，光绪帝虽然不敢顶撞，但也不想忍气吞声，他为自己分辩说：“我自己固然糊涂，但洋人逼迫太急，为了保存国脉，通融试用西法，并不是听信康有为之法。”第二天，光绪帝再次被西太后等人围攻，西太后还逼迫光绪帝颁布捉拿康有为的谕旨。第三天，西太后组织顽臣，将光绪帝寝宫、书房等处搜去的奏疏文稿拿出来，逐条批驳，要光绪认罪。此后，又把光绪帝押解到瀛台的涵元殿，囚禁起来。

瀛台是中南海中的一个人工岛屿，四面环水，一面设有板桥，以便出入。西太后把光绪帝囚禁在瀛台后，选派 20 多名太监轮番看管。太监每天送“御膳”之时，就架起跳板，走进瀛台，“进膳”之后，便撤掉跳板。光绪帝只能望水哀叹，不能离开瀛台一步，为此他曾写下“欲飞无羽翼，欲渡无舟楫”的诗句。生活在瀛台的光绪帝，接触的都是那些令人讨厌的太监，所到之处，无非是瀛台上的几座殿阁，没有什么乐趣。他在看《三国演义》时，往往哀叹：“我还不如汉献帝。”光绪帝无法排解自己心中的闷气和怨恨，有时往往把太监作为自己发泄的对象，经常对他们发脾气，罚令长跪，还天天书写袁世凯的名字，以表达自己的怨恨之情。贵为一国之君的光绪帝，成为一名不见天日的囚徒。

其实，按照西太后的意愿，何尝不想彻底废掉光绪帝呢？只是迫于外界的压力，不敢冒然行事，所以才把光绪帝押入孤岛。可是西太后囚禁光绪帝一事，不仅引起国内舆论的哗然，而且也引起各国列强的注意。列强各国感到，西太后的复旧很有可能使中国回到排外的时代去，与其如此，还不如支持开明的光绪帝对

自己更有利，于是他们对光绪帝的处境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关心。英、日驻华公使极力帮助康有为、梁启超出逃，并再三要求觐见光绪帝。英国在华的舆论工具《字林西报》也多次发表文章，抨击西太后，赞扬光绪帝。这一切，都给西太后很大压力，使她不敢断然对光绪帝下毒手。但她一直担心光绪帝的存在会威胁自己的权力和统治，忍气吞声地寻找机会实现她的废帝阴谋。

正当西太后为废掉光绪帝而忙碌时，中国大地上爆发了义和团运动，西方列强出兵武力干涉，爆发了八国联军侵略中国的战争。于是，在对待义和团的剿抚问题上，尤其是对外国武装干涉的战和问题上，清朝统治阶级内部存在着严重的分歧，展开了一场激烈的争论。光绪帝忧心忡忡，虽身陷囹圄，但却及时表明了自己的态度。光绪二十六年（1900）五月二十日，西太后在仪鸾殿召开第一次御前会议，到场的有大学士，六部九卿，光绪帝也奉西太后之命到场。会上，吏部侍郎许景澄、太常寺卿袁昶等人极力主张议和，而载漪等人却从自己的私欲出发，说：“义民可恃，其术甚神，可以报仇雪耻，”竭力煽动对外宣战，两者相持不下。光绪帝则说：“现在人人喜言兵，然而甲午中日之役，创钜痛深，可引以为鉴。况且诸国之强，十倍于日本，联合而谋我，怎样才能抵御呢？”分析完利害得失后，光绪帝断然说：“断无同时与各国开衅的道理。”五月二十一日，西太后再次召开御前会议。一开始，西太后便怒气冲冲，她对列强各国庇护康有为等，干涉自己的废立活动十分不满，积怨甚深，所以一向对外妥协的西太后，现在却决心对外开战了。她说：“今天的事，各位大臣都看到了，我为江山社稷着想，不得已而宣战；然而成败未可知，如果宣战之后，江山社稷仍无法保全，诸公当谅解我的苦心，不

要归咎我一人。”西太后话音刚落，载漪等人立即应声附合，大谈宣战。光绪帝心中十分焦急，他想国家安危，在此一举。想到这里，光绪帝再次表示异议，他说：“战不是不可言，但中国积弱，兵不足恃，用乱民孤注一掷，会有什么好处呢？”接着他又耐心地分析说：“民众均未经训练，一旦上阵，在枪林弹雨之中，以血肉之躯抗击敌人，怎么能持久？所以，不要以民命为儿戏！”西太后听了光绪帝的话，心中老大不自在，但她没有正面反驳，质问光绪帝说：“依你之见怎么办呢？”光绪帝回答说：“寡不可以敌众，弱不可以敌强，决没有一国能敌七八个国家的道理。现在，只有停战议和才是上策，其次就是迁都。”由于两者争议不休，所以这次会议仍未能就和战问题作出决定。五月二十二日，举行第三次御前会议，西太后及载漪等人控制了局面，大喊大叫，不可一世，决意向列强宣战。光绪帝看到无法挽回，欲言又不敢言。他拉住许景澄的手，沉痛地说：“兵端一开，朕一身不足惜，只是苦了天下的百姓了。”我们知道，光绪帝在中法战争和中日战争中，一意主战，是一个积极的主战派，那么他在义和团时期为何力主求和呢？这主要是从中外力量的悬殊考虑，虽然光绪帝的主和也并非什么高明的见解，但起码在了解外情这一点上比西太后等人高明一筹。

西太后等人不顾光绪帝等人的反对，一意孤行，盲目主战，于五月二十五日正式颁布了对列强的宣战上谕。然而西太后等人既没有御敌的力量和本领，也没有彻底抗战的决心，结果清军节节败北，七月二十日北京陷落，西太后只得仓皇出逃。当西太后逃出北京之际，光绪帝要求留下来，以便同外使会谈，收拾残局，并乘机摆脱西太后的控制。可是未被西太后应允，只得随西太后

出逃。在逃亡的过程中，光绪帝所到之处，凄凉萧条，满目疮痍，民不聊生，新仇旧恨一齐涌上心头。他痛恨列强的侵略，更加怀念自己的变法维新事业，也更加怨恨出卖自己的袁世凯。他每到一处，往往画一个龟，在龟背上填写袁世凯的名字，然后粘在墙上，用小竹弓射击，然后再取下来剪碎，用这种最简单的办法来发泄自己胸中的闷气。

光绪二十七年（1901）七月二十五日，经西太后批准，李鸿章、奕劻等人与各国列强签订了屈辱的卖国条约《辛丑条约》。十一月，光绪帝随西太后回到北京，当他看到被列强破坏后的京都情景时，立即感到一种无法排泄的耻辱，感到不可遏止的愤怒。

面对国亡无日的残酷现实，光绪帝多么渴望自己能够独掌大权，继续推行新政啊！然而，自幼养成的怯弱秉性使他无法摆脱西太后的控制，相反，为了自己的安全，只得屈从在西太后的淫威之下。可是，即便是这样，光绪帝也还是耐心地等待时机。为了更好地了解世界，光绪帝仍然朝夕研读书籍，尤其留意有关西学的书。而且，光绪帝还坚持每日以一定的时间学习英文，虚心向人求教，持之以恒，因此对西方文化有了更深的了解。

政治上的挫败，生活中的不幸，使光绪帝陷入无法自拔的痛苦和郁闷之中，整日忧心忡忡，焦虑不安，这极大地损伤了他的身体，健康状况日益变坏。光绪三十四年（1908）十月二十一日，光绪帝抱着自己终生的遗憾在瀛台涵元殿病逝，终年 38 岁。

光绪帝死后，葬于崇陵，谥号“德宗”。

宣统帝爱新觉罗·溥仪

清朝是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爱新觉罗·溥仪是这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的末代皇帝。爱新觉罗·溥仪的一生，坎坷曲折，前半生，3岁登基，以后三度称帝，在位时名义上唯我独尊，事实上无异囚徒；后半生，由皇帝变公民，过上了一个正常人的生活，为中国人民做出了他所能做出的积极贡献。

一、冲龄登基 唯我独尊

光绪三十二年（1906）正月十四日，北京城里醇王府邸，一位新生婴儿呱呱坠地，这就是中国的末代皇帝——爱新觉罗·溥仪。

溥仪的父亲载沣，8岁时承袭王位，长大后谨遵其父醇贤亲王奕譞的遗训，为人处事酷似其父。他所以能像第一代醇亲王一样成了皇父，却不是因为像老醇亲王那样有一位皇太后的亲妹妹做福晋，而是另有因由。

原来在戊戌政变后，光绪虽被囚瀛台，但只要他活着，对慈禧和顽固派们来说，就是一个潜在的莫大威胁。因此，他们想方设法要根除后患，结果是由于洋人的干涉，未能如愿。于是，慈禧决意利用“义和团”发泄胸中的闷气，同时要使列强明白左右中国局势的是她，而不是那个列强为了自身利益所极力维护的光绪。结果弄巧成拙，胸中闷气未出自不必说，还险些被列强当做“祸首”加以惩办。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八国联军统帅瓦德西，公开要光绪五弟载沣前往德国，为克林德公使在义和团运动中被杀一事道歉。载沣到德国后，受到了德国皇室的隆重礼遇，再有列强对光绪的态度也还没有改变。积数十年统治经验的慈禧，深知“庚子事变”后的清王朝，内外诸事若违背了洋人的意愿，后果不可逆料。因此，为缓解各方矛盾，确保自己的地位，慈禧觉得有必要觅一良策。这个“良策”很快让她找到了：即为醇亲王指婚，将心腹大臣荣禄之女嫁与载沣，以笼络控制光绪及载沣。不过，这时她恐怕还没有在醇王府里再造出一条“潜龙”的想法。促成醇王府飞出第二条“潜龙”的，应该说主要是庆亲王奕劻和戊戌政变后飞黄腾达的袁世凯。

奕劻（1836—1918），爱新觉罗氏，乾隆第十七子之孙。为人贪鄙庸劣，精于投机钻营之道。光绪一朝，由一名远支宗室最低爵位的辅国将军，累迁至亲王。八国联军攻占北京时，他奉旨议和，结好洋人，同时也为慈禧所看重，随后即入值军机处，并升到首席军机大臣的高位上，儿子载振也做了工部尚书，父子同朝，显赫一时，令王公大臣们侧目。

袁世凯自戊戌政变为慈禧立了大功，从此官运亨通，扶摇直上，几年时间由直隶按察使逐次升迁山东巡抚、直隶总督兼北洋

大臣、外务部尚书。在此期间，他不惜重资，买通了只要给钱连祖宗都可以卖掉的庆亲王奕劻，借改革军制扩编北洋新军之机，使其成为京师重地的一个强大武装集团，并采取种种手段，几乎使北洋军成了完全听命于他一人的袁氏武装。

奕劻的贪鄙庸劣、要钱不要祖宗，袁世凯的购买新贵、暗建袁氏武装，使慈禧有些不放心的。于是，她借筹备立宪之机，上调袁世凯入值军机处，意在收回袁世凯军权。政治嗅觉十分灵敏的袁世凯，从自己的升迁调任中，也感觉到气候有些异常，他这时感到自己远不是西太后的对手，因此为长久计，不待慈禧下令，便主动交出了北洋军权。做为一名汉族官员，袁世凯的这一举动，非但没有使慈禧解除疑虑，反而预感到了某种可怕的威胁，这不但是对自己的威胁，而且是对爱新觉罗氏江山的威胁。这位统治中国近半个世纪的皇太后，垂暮之年并不糊涂。她深知袁世凯交出北洋兵权并非出自本意，其对北洋军的实际控制能力，远非朝夕能解除得了。至1908年秋，竟也大病缠身。就在这时，一个令她震惊的消息传来：袁世凯怕西太后死在光绪之前，光绪再次执政将报复自己，因此正在策划废掉光绪，拥立奕劻之子载振为皇帝。为了爱新觉罗氏的江山社稷及子孙计，慈禧认为该是采取果断措施的时候了。

经过再三权衡，慈禧终于拿定了主意。谕令庆亲王奕劻前去察看东陵工程，同时将袁世凯的亲信段祺瑞所部第六镇北洋军调离北京，令陆军部尚书满州贵族铁良统辖的第一镇进京换防。光绪三十四年（1908）十月二十日，光绪帝病危，慈禧颁发了“醇亲王载沣著授为摄政王”的懿旨，同时令将载沣年满3岁的长子溥仪送进皇宫教养。从而为大清王朝的皇统接续做好了安排。

光绪三十四年（1908）十月二十一日，光绪驾崩，慈禧面谕王公大臣：摄政王载沣之子溥仪，“著入承大统为嗣皇帝……著摄政王载沣为监国，所有军国大事，悉秉予之训示裁度施行……”这时慈禧并不认为自己也要紧随光绪而去，二十一日这天，她“终日料理大事，至晚乃获休息，虽极辛苦，而体力反较佳。翌日，仍于六点钟起召见军机与皇后、监国摄政王及其福晋即荣禄之女，谈话多时，以新帝之名下一谕，尊皇后（光绪皇后隆裕）为太后”。不意午饭时分突然晕倒，醒后感觉异常，自知末日已至，急诏隆裕皇太后暨监国摄政王等，谓：“现予病势危笃，恐将不起，嗣后军国政事均由摄政王裁定，遇有重大事件必须请皇太后懿旨，由摄政王随时请而施行。”作好了这样的安排之后，慈禧才放心地归天去了。她满以为有光绪亲兄弟摄政监国，有自己的亲侄女裁决“重大事件”，大清王朝的江山就万无一失了。

光绪、慈禧去世之后，经过半个多月的准备筹划，王公大臣们拟定新帝于光绪三十四年（1908）十一月九日举行“登基大典”，年号宣统，改明年为宣统元年。

溥仪自3岁称帝成了“真龙天子”后，便像以往的皇帝一样，再也听不到别人呼唤他的名字。同、光二帝的后妃及他的祖母、亲生父母都称他“皇帝”，朝廷里王公大臣、文武百官及后来他的师傅们呼他“皇上”，太监、宫女和乳母等叫他“万岁爷”或“老爷子”。从这时起，他就被从不同侧面培养和铸造着“真龙天子”的特殊人格。太监们告诉他：地上万物乃至头上的蓝天都是“皇上”的，天下百姓都是“皇上”的子民和奴仆；随着年龄的增长，现实生活的灌输使他逐步明白了：他衣食住行一切器物上

的黄色，是唯“天子”才能享用的明黄色；在宫廷中，除了同治和光绪两位先帝的后妃，所有的人见了他都要跪倒磕头，不论是平辈兄弟还是亲族中的长辈，也不管是鬓发皆白的老者还是教他读书的师傅，无一例外；他说“饿了”，有人为他喝令“传膳”；他要睡觉，有人为他铺床、洗脚；他要起床，有人为他穿衣、洗脸；他要解手，即有人为他端来大小便器具……。总之，紫禁城的一切都是为他而设，城中所有人都得围着他转，在位三年如此，退位后享受民国优待十二年间也是这般。耳濡目染，潜移默化，溥仪自幼年起就逐步树立起天下唯我独尊的信念。

就在古老的紫禁城按照传统模式精心铸造着大清王朝末代“真龙天子”的时候，整个大清帝国，却早已成为一只破烂不堪的漏舟，无论爱新觉罗氏如何使出浑身解数，也难以使其在中国历史的长河中再前进半步，终于在辛亥革命的风暴中沉没了。

溥仪登基称帝后，遵照慈禧遗旨，由其父监国摄政王执掌朝政，如有重大难决之事，则须向隆裕皇太后请示办法。然而，无论是监国摄政王还是隆裕皇太后，谁也不可能像慈禧生前那样，随意制定推行重大国策，决定文武朝臣乃至皇帝的命运了。

载沣执掌朝政后，迫于形势，为了保住清王朝的统治，一面继续推行慈禧生前确定的以立宪笼络人心的政策，诏令加紧筹备立宪，一面实行加强皇室权力的方针，并立誓借机报其兄光绪皇帝十载瀛台囚徒生涯之仇，杀掉袁世凯。虽然载沣宣布自己以监国摄政王身份亲代全国陆海军大元帅之职，令胞弟载洵、载涛分任海军大臣和军谘大臣，但却指挥不动听命于袁世凯的北洋军队；找满族重臣商议杀掉袁世凯为兄报仇，不意庆亲王奕劻以“杀了袁世凯，北洋军造反怎么办”为由极力反对，只好请示皇

太后，隆裕也别无良策。这时袁世凯的老朋友英国公使朱尔典亲自出面多次力保，最后只能以袁世凯患“足疾”为名，将其遣回河南彰德老家“养病”了事。这既未能斩断袁世凯同中央奕劻、徐世昌等满、汉朝臣的联系，更没有做到解除他对北洋军的实际控制能力。监国摄政王意在保住清朝统治的种种措施和企图，不但毫无成效可言，反而加速了清王朝走向坟墓的步伐。

宣统三年（1911）八月十九日，革命党人武昌首义成功，南方及西部数省闻风响应，辛亥革命风暴席卷了大半个中国。清廷派出南下镇压革命党人的北洋精锐，不听满族将帅号令，摄政王载沣万般无奈，只好接受了奕劻、徐世昌等人的建议，重新起用袁世凯。老谋深算的袁世凯，以北洋军为资本，以外国侵略势力做靠山，巧妙地玩弄两面手法，先借用资产阶级革命党人的力量胁迫清廷授予他军政全权，否则即以“病未痊愈”为由，呆在彰德不肯出山；当军政全权到手之后，又利用北京的清王朝、手中的武力和赞成共和的虚假许诺，诱迫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最终做出了只要袁世凯倒戈推翻清廷，拥护共和，即由他出任新成立的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决定。为了达到据天下为已有的卑劣目的，袁世凯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一会儿指使北洋军将领通电南京临时政府誓死反对共和；一会儿又指使他们通电北京清王朝声称赞成共和，如不满足要求，将以兵谏相争，由此要清廷自行退位。他本人则装出既忠于朝廷，又不得不顺应时势的样子，规劝皇太后和摄政王交出政权，免致法国大革命时“路易子孙，靡有子遗”的悲剧重演于中国。与此同时，袁世凯一再表示“决不辜负孤儿寡母”（指溥仪和隆裕），并抛出了一个旨在显示他的忠心和促使清廷早下决心的《优待条例》，其中主要条款规定：清

帝自行退位后，“尊号仍存不废”，暂居紫禁城，以后移居颐和园；新建民国政府负责保护清帝原有的私产，并每年拨出 400 万两以供皇室享用（改铸新式银币后为 400 万元）。

在辛亥革命风暴的致命打击下，隆裕太后和王公大臣们为了保住大清皇帝称号和各自的身家性命，于穷途末路之中接受了袁世凯的《优待条例》。1912 年 2 月 12 日，隆裕太后颁发了清帝溥仪的退位诏书。次日，袁世凯公开声明赞成“共和”，孙中山向南京临时政府参议院提出辞职。15 日，袁世凯接替孙中山，当上了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

清王朝灭亡了，但宣统皇帝的称号保存下来了。此后，不但民国历任总统如袁世凯、黎元洪、徐世昌等，无论在私函亦或公文中，都赫然称溥仪为“大清皇帝陛下”，紫禁城外的遗老遗少，各地一些大小军阀政客以至像胡适那样著名的“新潮人物”，更是毕恭毕敬地尊称溥仪为“皇上”。

1924 年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之前，溥仪仍像退位前一样称孤道寡，役使着紫禁城中的数千人马，过着与退位前相差无几的帝王生活。同清朝以往的皇帝一样，溥仪 6 岁即他退位那年，由钦天监选好良辰吉日，开始上学读书了。书房设在光绪小时候念书用的毓庆宫。皇帝上学自然与常人不同。每次上课，都是溥仪先乘坐金顶黄轿至毓庆宫，坐到背北面南的正位独座上，然后由太监奉上当日应学的课本，这时教课的师傅再进来，向他所教的徒弟见礼后开始教读，作为徒弟的溥仪始终端坐不动，更无须向师傅行礼，因为“虽师，臣也，虽徒，君也”。

在师傅们的着意培育下，受紫禁城中事事物物的熏染，溥仪随着年龄的增长，逐渐懂得了自己的身份和地位，从心里开始要

做一名“好皇帝”和“真正的皇帝”了。自幼时起，他先从太监，继而是从师傅们那里，知道了天下原本都是他的，只是因为可恨的袁世凯和可怕的孙文，他才变成紫禁城里的“皇帝”，而把整个天下“让”给了民国。尽管从袁世凯、黎元洪、冯国璋、徐世昌这些大清旧臣民国总统到吴佩孚、张作霖、陆荣廷等“乱世英雄”，表面上恭敬“大清皇帝”，尽管散居各地的遗老遗少不时地上折请安，登门觐见，声泪俱下地表示要辅佐他“恢复祖业”，一旦讨了“封赏”之后便杳无音信；尽管辫帅张勋 1917 年率数千辫子军扶他“重登大宝”，也仅仅当了 12 天“真正的皇帝”，便再次摔下了“宝座”，宣告复辟破产，可在溥仪心目中，天下依然是他的，师傅们也总是要他卧薪尝胆，“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等待着天再降“大任”于他。于是，溥仪从 10 多岁时，就开始在紫禁城中施展“天子”的威风，诚心诚意地学做一名“好皇帝”，准备着一旦风云聚会，天降大任，即出而做一名君临天下的“真正皇帝”。

要做一个“好皇帝”，首先要有驭下的权威和辨忠奸的能力。溥仪还在八、九岁时，就在服服贴贴的太监们身上试验过他的权威。当他不顺心时，就打骂太监出气，太监们毫无怨言；当他高兴时，则变着法测试太监们的忠心，太监们任凭摆布。有次他为了证实自己的权威和太监们的忠心，竟随意挑出一名太监，要其把地上的一堆脏东西吃下去，令他满意的是那个太监二话没说，趴到地上就把脏东西吃了下去。10 多岁以后，溥仪便开始在“大是大非”上展示他分辨“忠奸”的能力。在他 12 岁那年，奕劻去世，其家人上折请求谥法，溥仪想起了陈宝琛常说的奕劻曾如何断送了大清江山，于是便提笔写下了“谬”、“丑”、“幽”等几

个字作为“恶谥”，令内务府挑一个赐于奕劻。其生父载沣闻讯后，多方请求改赐，无奈溥仪又哭又闹，寸步不让。后来，载沣叫南书房翰林们拟了一个“密”字，溥仪以为“密”字也不是好字，勉强同意了，等他弄清“密”在谥法上为“追补前过”的意思时，觉得太便宜了奕劻，但想改已来不及了。此事颇得陈宝琛等几位师傅的欢心，在遗老们中间也传颂一时，梁鼎芬还为此在日记中赞溥仪为“真英主也”！

溥仪要励精图治，做一名“好皇帝”和“真正的皇帝”的种种努力，尽管结果大都不尽人意，有些甚至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可王公和中国师傅们都认为像个“真正的皇帝”所为，而他受报纸和外国师傅的影响所做的一切，却又令他们大失所望。

随着年龄的增长，溥仪对紫禁城以外的世界的好奇心越来越大。在英国师傅庄士敦的有意诱导和影响下，他开始逐步“洋化”，要做一个英国式的开明君主。于是，他大量“御膳”不“进”，专愿吃西餐；无数传统服装不穿，硬要穿西服；轿子不坐，却爱骑自行车；好好的辫子不要，硬是剪成了短发；一大群专供“传旨”的活人不使，偏偏装上电话；圣贤书不读，专爱订阅各种报纸。更有甚者，为了骑自行车方便，他下令把皇宫中所有的门槛统统锯掉；为了寻开心，他不时打电话要名饭店送上几桌上等饭菜到一个随便胡诌出来的地方去；为了满足好奇心，他竟把“新潮人物”胡适叫到皇宫里来看看是什么模样，甚至自己也常写了些小说、文章、新诗什么的，化名往外投寄一气……

这些都不能使中国的师傅们容忍，但有一件事是他们无论如何也无法容忍的，这就是溥仪要离开紫禁城出洋留学！原来，由于受英国师傅庄士敦的影响，溥仪认为要做一个开明君主，就

必须学些新东西，见点大世面，而更重要的是想得到能够左右当时中国政局的西方列强的支持和帮助。这一切，在紫禁城里是永远无法办到的。于是，他长时期以赏赐的名义，让二弟溥杰带走了大批清宫珍宝，预做出国经费。但他哪里知道，除庄士敦和溥杰之外，紫禁城中所有人都拼死反对他的出国之行。就在他与庄士敦秘密约定准备溜出紫禁城之时，不知怎么走漏消息，紫禁城里全部人马一齐出动，城外的“皇父”载沣也闻讯赶来，齐刷刷一齐跪到宫门外，阻止其外出，而且声明如溥仪不放弃，就决不起来，由此，成功地破坏了他们的出走计划。这次任凭小皇帝如何暴跳，以“皇父”载沣为首的王公大臣和中国师傅及太妃们，死活也不肯让步，因为皇帝一走，全部优待条件等于自动放弃，他们以及靠紫禁城吃饭发财的“皇亲国戚”便会丧失现有的一切。

为了锁住小皇帝的心，太妃及王公们决定尽早为溥仪完婚。经过多方协商并得到“皇帝恩准”，人选很快就确定下来。1922年12月1日，紫禁城中的“宣统皇帝”举行了隆重的大婚典礼。民国总统黎元洪派出了大批军警卫队保驾，并先以民国政府的名义送上贺礼万元，而后又和其他军阀、政客们以个人名义亲致祝贺，赠送厚礼。当时尽管共和已10年多了，可“大清皇帝”的名号在社会上还有相当声威和吸引力。溥仪作为“皇帝”，一次成婚，两个妻子：皇后，满洲正白旗郭布罗氏荣源的女儿，名婉容，字慕鸿，17岁；淑妃，满洲额尔德特氏端恭的女儿，名文秀，14岁。

少年“天子”，一后一妃，照太妃及王公们看来，该安顿一阵子了。但他们万万没想到，溥仪所以“恩准”成亲，愿意一下

子娶两位媳妇，是因为这是皇帝应该有的，并非是以有什么必要，他这时心里想的仍是怎样逃出紫禁城，出去施展自己的抱负，计划着在结婚以后如何开始“亲政”。至于什么夫妻、家庭，压根就没有想过。结果，新婚第一夜，按祖制皇帝和皇后要在坤宁宫喜房里渡过，可新郎却被那一屋子的暗红色——红帐子、红被褥、红衣、红裙、红花朵、新娘子的红脸蛋……，搞得心神不宁，竟独自回到养心殿静思默想结婚后如何“恢复祖业”去了。

1924年11月5日，溥仪终于离开了那个他日夜想离开的紫禁城。但这既不是他自己计划的成功，也不是太妃和王公们让步的结果，而是参加第二次直奉战争、跟随吴佩孚进兵山海关的冯玉祥突然倒戈，发动“北京政变”，将小朝廷赶出了紫禁城。至此，溥仪结束了他15年的“大清皇帝”生活。

二、梦想复辟 傀儡皇帝

溥仪被逐出宫时，曾向冯玉祥派来的代表鹿钟麟和一队士兵表示他早就不想做皇帝，而要当一名公民，并且说：“当皇帝并不自由，现在我可得到自由了！”这话虽有其他背景，并非全是谎言，可他所说的“自由”，是要“自由”地按照自己的意愿去“恢复祖业”，庆幸从此摆脱了在他看来迂腐不堪的王公大臣们对他的种种限制和束缚。

然而，溥仪在匆匆住进了他父亲的居处北府之后的最初几日，周围的一切使他感到绝望。北府四周由冯玉祥的军队把守，切断了同外界的一切交通联络，身边只有一个“王爷”（溥仪成年后，无论什么场合都称其父载沣为王爷），屁股上总像有把火，

终日团团乱转。

真是天无绝人之路，没过多久，溥仪在北府里感到气候有变。先是不知哪里去了的师傅和王公大臣陆续出现在身边，接着就不断传来一些使他宽慰之余觉得振奋的消息：荷兰、英国、日本等国驻华公使联合向民国当局提出了“抗议”，接着天津日本驻军司令部捎来口信说，为保护北府安全，北京日本兵营将不惜采取“断然措施”；段祺瑞发出了声讨冯玉祥“逼宫”的通电，并且同奉系军阀张作霖联手，逼走了冯玉祥，继而又重新组织了临时执政府，出任执政。于是，先后汇聚北府的王公大臣，遗老遗少，以“恢复祖业”纷纷为溥仪出谋划策。可如何恢复祖业呢？有人请他先去东交民巷使馆区，以确保安全；有人建议要设法“出洋留学，一旦有机可乘，立即归国”，成其大业；而以王爷为首的一批王公世爵们则要他留在北府，争取恢复优待条件。各派势力为了自己的利益，都在极力地要把“皇帝”拉到自己身边。

在纷纷嚷嚷的吵闹声中，溥仪以为上策是先寻得安全自由的栖身地，然后再徐图大计。当务之急是先离开北府这座束缚他的牢笼，甩掉那批无用的王公世爵。于是，他和陈宝琛、庄士墩、郑孝胥、罗振玉等几位师傅和“股肱之臣”秘密定计，借口外出查看租用的房子溜进德国医院，逼走“王爷”派来监视的随员，急急忙忙钻进了东交民巷日本使馆。

在使馆里，溥仪一行受到日本公使芳泽夫妇极为“热情殷切”的招待。公使为这班前清皇室及随行人员腾出一座楼房，并倒出礼堂，大肆装点布置，为溥仪 19 寿辰举行了隆重的庆祝活动。虽然在外国人的使馆里做寿使他伤感，但隆重的庆祝仪式和庞大的祝寿队伍，又似乎使他看到了希望。他暗自发誓，要为

“恢复祖业”大干一场，这次不能像以前那样，光想不做，必须立即付诸行动。生日过后不久，他便征得日本使馆的同意和支持，由日本便衣严密“保护”前往天津，准备在那里从事实现理想的大事业。

到天津之初，溥仪一度仍打算出洋，可这时吴佩孚给他上书称臣，张作霖向他磕头问安，认为还是在国内才有可能推动复辟大业，因而动摇了出洋的念头。

自吴佩孚上书称臣，张作霖磕头问安之后，溥仪联想张勋利用辫子军拥立自己的再度登极与退位，这一次的被迫出宫，以及当时中国与军阀混战密不可分的政局变幻，以为武人固然可恨，不过没有武人扶助，“重登大宝”无异比登天还难。因此他决心改变策略，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武人。在津数年，他“降贵纡尊”，凡上门求见的大小军阀，一律不用再行叩头礼，而是相互握手致意，然后与常人一般平起平坐；凡表示愿为“恢复大清”效力的武人，那怕是残匪败兵，他都有求必应，花费大量金钱财宝加以笼络。

在利用武人的同时，溥仪还接受郑孝胥等人的意见，结交“友邦”。驻津7年，他以“宣统皇帝”的身份，经常参加天津日本驻军的阅兵式，与各国领事及驻军司令频频往来，另外还派遣郑孝胥及日本浪人前往日本活动，以3600元年薪雇用奥国流亡贵族到欧洲各国游说；支付巨额经费支持白俄匪首谢米诺夫“反赤复国”（指推翻苏共政权，恢复沙皇统治）；请英国骗子罗斯为他办报鼓吹复辟帝制；将亲弟溥杰和三妹夫润麟等人送往日本学习军事，以备将来……在这些为“重登大宝”所进行的各种活动中，溥仪感到最可信任依靠的“友邦”，则是自“北京政变”以

来，一直把他当作“皇帝”加以“保护”的日本国。

1927年被蒋介石收编为四十一军军长的孙殿英，制造了令他和遗老们撕肝裂肺的“东陵事件”，掘了乾隆和慈禧的陵墓，扬尸盗宝……这一切，无不使溥仪忧虑、悲愤、甚至绝望。但是，一直“保护”他的日本人，则不时劝示他应“多加珍重”，慰而勉之曰“中国前途系之”；派往日本联络“友邦”的郑孝胥，学习军事的溥杰和润麟，去东北活动日本关东军的罗振玉等人先后带来消息，都给他以日本政府特别是军界，准备随时支持他“重登大宝”的美好印象。这一切，又使溥仪转忧为喜，似乎看到了希望。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决定抛出珍藏了7年之久的“秘密武器”，要溥仪去东北建立以他为首的“新国家”。溥仪认为“恢复祖业”“重登大宝”的日子终于到来，决计不惜一切前往东北，不意他身边除郑孝胥外的遗老及“近臣”们，几乎一致反对“北幸”，爱新觉罗氏中有人甚至提醒他，不要忘了历史上的石敬瑭。南京的蒋介石这时也派人来说，可以恢复民国初年的优待条件，居住则紫禁城、上海、国外任凭挑选，只是敬告他不要去东北与日本人合作。但溥仪为了将多年来“重登大宝”的美梦化为现实，1931年11月10日夜，还是在日本军警特务的特别“保护”下，悄然离开日租界潜往东北。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阴谋在中国东北建立伪政权之初，曾派时任关东军参谋之职的土肥原至天津面见溥仪，态度诚恳地请这位“宣统皇帝”到沈阳去“亲自领导”一个“独立自主”的“新国家”，并以肯定而又巧妙的言词回答了溥仪最关心的问题。谓“新国家”毫无疑问“是帝国”，至于“宣统帝”如

何领导这个“独立自主”的“帝国”，等到了沈阳以后再行详谈。到沈阳去领导一个新建的“帝国”，溥仪以为这正是自己“恢复祖业”的肇始之基。于是，他丢下了那些反对“北幸”的师傅和“近臣”，躲在一辆跑车的后箱里，驶出日租界，来到白河码头，与早在这里“恭迎圣驾”的郑孝胥父子一起，登上日本人为他们准备好的汽艇，开始了他去实现“重登大宝”美梦的旅途。

1931年11月13日晨，溥仪在营口登陆。

在营口，溥仪没有见到他所想象的东北百姓“恭迎大清皇帝圣驾”的壮观场面，甚至没有见到一个中国人。稍后，日本人没有按约带他去沈阳，而是以确保“宣统帝安全”为理由，将他秘密转移到旅顺，送进了一家日本人办的旅馆，不分昼夜地由日本军警“保护”起来，不得出居处半步，除了同他一起前来的郑孝胥父子和先期至东北联络关东军的罗振玉之外，不能同其他中国人会面，即使是天津方面尾随而来的师傅，“皇后”及“臣僚”们，也不例外。至于那个“新国家”的问题，则迟迟没有动静，派罗、郑二人再三去找日本人催问，得到的答复是“新国家”的建立正在研究。溥仪到东北后实质成了囚徒。

原来，此时日本国内对如何统治东北这块殖民地，尚未形成一致意见，关东军不便贸然行事。经过3个月时间的多方慎重磋商，日本军政各界最终统一了认识，决定在东北建立“满洲国”，暂行“共和制”；“国都”命名“新京”，设于长春；“国家元首”称“执政”，由溥仪出任。

1932年2月23日，关东军高级参谋坂垣征四郎专程来到旅顺，向溥仪转述了日本政府关于建立“满洲国”的决定。溥仪听说要他出任“执政”，不由无名火起三千丈，暗骂日本人背信

弃义，取消了他的“皇帝尊号”，断绝了“大清帝国”的统系，当即公开表示，无论如何也不能就任执政之职，满以为日本人会作出让步，仍请他当皇帝。谁知此时的日本人已不是在天津时候的模样了，坂垣竟当面称他“阁下”，声言关东军视不出任执政的答复为敌对态度，如不收回，即将采取敌对措施！无奈，“皇帝陛下”就这样在日本人那里变成了“阁下”，甚且立时要成为他们的阶下囚，如此突如其来的打击，一时弄得溥仪不知所措。就在这时，郑孝胥父子出场了。老子忠告溥仪说：“张作霖殷鉴不远，还请皇上三思”；儿子进言曰：“好汉不吃眼前亏，识时务者为俊杰。为久远计，皇上似应暂时屈就执政，以谋来日宏举”。溥仪见木已成舟，害怕自己真的成了第二个张作霖，在日本人的警告和郑孝胥父子的“忠告下”，最终作出了一个自以为不失“体面”的决定：暂任执政一年，届期如不“重登大宝”，即行引退。

1932 后 3 月 9 日，在日本帝国主义的精心策划下，溥仪正式出任伪满洲国执政。一直为他“恢复祖业”寻求日本人支持的罗振玉和郑孝胥，前者由于“顽固不化”，坚持帝制，被日本人一脚踢开；后者则因为“开明通达”，赞成“共和”，当上了“满洲国国务总理大臣”。从此，溥仪身边有了以“开国元勋”郑孝胥为首的一帮新的“文臣武将”，昏昏然又做起了“恢复祖业”的美梦。

出任执政后，溥仪决心遵照祖训，“敬天法祖，勤政爱民”，无辞艰辛，不避劳苦，为将来“宏举”奠定基础。为此，他把“执政府”的办公楼命名为“勤民楼”，并真的每天早上早早起床，进楼办公。可是，不久溥仪便发现，他所能办的“公”，不是在“总理大臣”郑孝胥送来的各类文件上签名认可，就是同各部

“总长”们闲谈聊天，所谓“军国大事”，原来都是由日本人担任的各部“次长”们决定的，而“满洲国”上至总理大臣、各部总长、次长、下至各省的大小官员，原来也都是由日本人提名，经他宣布任命的，所谓“执政”，原不过是为他人执政。尽管如此，溥仪并不灰心，因为希望在于一年之后。

在出任“执政”期间，溥仪签署了日本人为他准备好的《日满议定书》，出卖了大量国家主权，按照日本人的要求，向国联调查团表明了他“是由于满洲民众的推戴才来到满洲的”，他的国家“完全是自愿自主的”。对此，日本人感到十分满意。为了更好地利用手中的傀儡，加强对东北殖民地的统治，日本人也给溥仪一个回报，决定满足他的皇帝欲。于是，当溥仪“执政”一年期满之后，首先是关东军，继而是日本国内，不断地传出日本政府准备承认他为“满洲国皇帝”的消息。1934年3月1日，溥仪似乎如愿以偿了。这一天，他第三次登极，当上了“满洲国皇帝”，定年号为“康德”。

溥仪三度登极称帝后，享有了日本人需要他享有的“尊荣”，同时也遭受了日本人给他带来的屈辱、痛苦和灾难。

作为“满洲国皇帝”，溥仪所能享有的“尊荣”，说来其实也有限，可这有限的“尊荣”最初却使他得到了心理上的满足。

首先，所有日本人开始重新称他为“皇帝陛下”（任执政期间一律称“阁下”，这是溥仪几乎不能容忍的称呼），公开场合像恭敬日本天皇一样地恭敬他。同时，关东军规定“满洲国”所有机关、学校、部队及各种公共团体，都必须供奉“康德皇帝”的“御真影”（照片），所有公职人员及学生、士兵等要按时向“御真影”行九十度鞠躬的最敬礼，据说这和日本国内恭敬天皇的仪

式是一样的。

其次，关东军每年为他安排若干次“御临幸”和“巡狩”。所谓“御临幸”，是溥仪参加祭祀侵华日军亡灵和庆祝日本天皇寿辰“天长节”等例行仪式；所谓“巡狩”，则大多是到“新京”以外的东北一些地方，去参观日本人“建设”“王道乐土”的成就，“临幸”和“巡狩”的实际内容如何，溥仪并不理会，他所看重的是“皇帝”出行的威仪：每次“御临幸”或“巡狩”，先有大批全副武装的“净街车”开道，稍后是“满洲国警察总监”乘坐的红色敞篷车开道，继之才是他这位“皇帝”的全红色“正车”，车两边有摩托车随行保驾，再后面则是随从和一般警卫的车辆。

除了这些日常的几乎仅有的“皇帝尊荣”曾使溥仪感到满足和陶醉外，1935年4月日本关东军为他安排的访日之行，更使他认为自己具有了一个真正皇帝的权威：庞大的护航、迎送舰队，裕仁天皇亲自到车站迎接，检阅日本海陆军，日本皇室的隆重礼遇和日本国民的“热烈欢迎”……。这一切简直使溥仪飘飘然了，“回銮”后立即召集“新京”所有简任职以上满日官员，发表访日观感，大谈满日亲善，甚至于异想天开地把“满洲国皇帝”同日本天皇放到了同等位置上，说什么无论满洲人还是日本人，“如果有不忠于满洲皇帝的，就是不忠于日本天皇，有不忠于日本天皇的，就是不忠于满洲皇帝”等等。

然而溥仪这种飘飘然的自我陶醉没有持续多久，就被冷酷无情的现实扫荡得一无二净。

首先，“开国元勋”郑孝胥，以为“满洲国”改行帝制，是“后清”的开始，用不着再什么事都去请示日本人，碰了几次壁之后，便在背后发起牢骚，在他创办的“王道书院”里对听课的

人说：“满洲国已经不是小孩子了，就该让它自己走走，不该总是处处不放手。”结果，溥仪访日归来不到一个月，日本人就以“郑孝胥总理倦勤思退”为由，要他换上大字不识一箩筐但十分听话的张景惠。

再有，继郑孝胥之后，伪满洲兴安省省长凌升，因为在一次省长联席会议上，抱怨日本人言行不一，说他们口头上承认“满洲国”是独立的，可从上到下什么事都是日本人说了算，散会后即遭逮捕，以“反满抗日罪”被砍了头。还有关东军在“宫内府”增设了“宪兵室”，严格监视进出人员，检查来往信件，并故意制造事端，将溥仪精心训练的“护军”全部缴械拘留，后经溥仪亲自道歉，才选用部分加以改编，由日本军官“代为训练”，其余则作为“肇事祸首”统统“驱逐出境”。

至此，溥仪已经清楚地知道要想做“大清国皇帝”是不可能了，不过这时他还不觉自己现有地位和人身安全会有什么问题。因为在他看来，“大清国”的“龙种”是无论如何也不能和郑孝胥、凌升那些人相提并论的，日本人离不开他。可到了1937年前后，日本人加强了对他的限制，不但不准他同外人接触，而且连前来为他祝寿的亲属，也要在日本人的监视下，只准行礼告退，不许说话逗留。溥仪开始感到事情有些不妙，暗暗告诫自己要小心从事，“恢复祖业”既然无望，可怎么也不能再丢了现有的“皇帝”尊号。然而，令他绝望的事情，终于还是发生了。这就是溥杰的婚事和关东军炮制的“帝位继承法”。

溥仪自成婚后，一直朝思暮想的是如何“恢复祖业”和早日“重登大宝”，无如屡经变故，夙愿难偿，以致经年累月心绪烦躁，夫妻生活极不正常。

至1937年，溥仪而立之年已过，膝下仍无子无女，就在这一年由关东军一手安排，为溥杰找了一名叫嵯峨浩的日本侯爵的女儿，并在东京成了亲。随后，关东军即责令“满洲国国务院”抛出了一个“帝位继承法”，大意谓“满洲国皇帝”归天后，皇位依次由其子孙继承，如无子无孙就由弟弟继承，如无弟则由弟之子继承。溥仪这一下子就明白了，日本人原来要的是一个有日本血统的“满洲国”皇位继承人，因为关东军也曾劝他找一位日本姑娘作妻子，被他以语言不通、风俗习惯不同为由给拒绝了。在溥仪看来，“大清”的“龙子龙孙”，血统必须纯正。“帝位继承法”的颁布，溥仪觉得这不仅是“大清”统系断绝的象征，也是他个人性命随时都可能终结的标志。

溥仪在认识到自己的实际地位和所处境遇后，便由为了“恢复祖业”不惜一切代价，一变而为忍辱含垢求保性命了。自1937年“七七事变”前后始，他一面继续唯关东军之命是听，签发大量出卖民族权益，奴役掠夺东北百姓，屠杀各界爱国人士及无辜民众，支持日本帝国主义“圣战”的“满洲国”政令、军令，一面战战兢兢地看关东军给他派来的“皇室御用挂”吉冈安直的眼色行事，生怕有什么“过失”，丢了性命。到后来，竟至换了祖宗。自1940年起，溥仪便不敢再公开祭祀自己的祖先，而是迎请日本天皇的祖先“天照大神”至长春，作为祖宗供奉起来；每当吉冈安直给他讲那一套“父亲”理论时，他都低头垂手，静听这位“准父亲”的训示。只有在这种常人不堪忍受的时刻，溥仪才不由得想起了天津临行时，爱新觉罗家族中有人说的那句话：“不要忘了石敬瑭”！

直到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溥仪傀儡皇帝生涯

才告结束。16日，他在随关东军要人准备乘飞机逃往日本时作了苏联红军的俘虏。翌日，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重要战犯，溥仪被押往苏联。

三、接受改造 成为公民

溥仪被押往苏联后，先在赤塔一处疗养院住了两月，而后便同相继押送到这里的其他伪满战犯一起，被转移到了离中国不远的伯力收容所，在这里渡过了5年的拘留生活。

到苏联后不久，溥仪便觉察到苏联政府不像是要杀掉他，伪满时期那种日夜为性命担忧的高度紧张心情逐步松弛下来，可同时另一种恐惧又不时袭扰着他，这就是害怕被中国政府引渡回国，以叛国罪处以极刑。他觉得不管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谁得了天下都不会放过他。共产党是“洪水猛兽”，而国民党总裁蒋介石则早就警告过他不要到东北同日本人合作。因此，溥仪认为无论如何也不能回国。在苏联5年，他先后3次向苏联政府递交留苏申请，并把自己一直随身携带的一批珠宝首饰，挑出价值较差的部分捐献出来，支援苏联战后经济建设，希望苏联政府能批准他的申请，把他留下来，然后再寻求机会，到西欧哪个国家去渡过他的后半生。

命运再一次违背了溥仪的愿望，苏联政府没有理睬他的留苏申请，而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于1950年7月将他及其他伪满战犯全部移交给了中国政府。从此，溥仪开始了为时9年脱胎换骨的改造和自我改造生活。

“皇帝”战犯的脱胎换骨与常人有所不同，溥仪在9年的改

造与自我改造过程中，经历了一个比普通伪满战犯更为艰苦复杂的过程。

被引渡回国初，溥仪只想到死。从在苏联听到回国的消息后，他就认为这次必死无疑，共产党决不会轻饶了他这个皇帝加头号战犯。

然而，自从他到了中国土地上后，溥仪所经历的一切都令他大惑不解：政府没有立即处死他，而是把他送到抚顺战犯管理所。同别的战犯一样，战犯管理所安排他洗了澡，换了衣服，发给了一些生活必需品，甚至还配给了香烟。朝鲜战争爆发时，中国政府出兵援朝抗美，伪满战犯们几乎一致认为美国人会打进来，共产党会像历代王朝一样，在关键时候要先处理掉所有关押的重大犯人，结果是美国人没打进来，共产党更未把他们处理掉。

经过长达两三年之久的默默观察，到抗美援朝战争胜利又回到抚顺时，溥仪已经意识到他不会被处死，可以和其他人一样活下来了。“真龙天子”和常人原本也没有什么两样，溥仪从此开始考虑如何渡过以后的时光。

死的问题解决了，对其他伪满战犯来说，已不再有过不去的关口，绝大部分人都不再怀疑共产党的政策，开始努力学习，积极改造，争取得到政府宽大处理。可是对“皇帝”战犯来说，情况就大不相同了。

溥仪前半生，虽然在政治上三起三落，特别是伪满 14 年，无异任人摆布的木偶。但在个人生活方面，他却始终是按照皇帝标准，拿着皇帝的架子，即使是在苏联的 5 年间，也从不曾自己穿过衣服，叠过被子，甚至连脚都没自己洗过。成为战俘前，自然

有人服侍，成了战俘后，他的弟弟溥杰、侄子小秀、小固、小瑞以至岳父荣源，都曾自觉自愿地以臣仆的身份为他端饭、铺床叠被，穿衣洗脚。在家族中，溥仪依然是“皇上”，所不同的只是这些人不再明着称他“皇上”，而是悄悄地叫他“上边”了。因此，当战犯管理所为了使溥仪获得改造，把他与家族成员分开，安排其他伪满战犯住在一起时，这位“皇帝”战犯便遇到了有生以来未曾遇到的“难题”：他不但要自己端饭、整理床铺、穿脱衣服、洗脚、洗衣服，而且还要和别人一样轮流做值日，打扫房间卫生，甚至还要提马桶！起初，溥仪觉得这是所方故意要他难看，因为这些事他从未做过，也不会做，以致早晨起床时，他还没穿好衣服，别人已经跑操去了，他未洗漱完，别人又开始吃饭了。每当溥仪感到自己无能、为自己事事落人后而痛苦时，战犯管理所的同志就来帮助、开导他，同时也循循善诱地引导他认识过去，反复讲明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政策，鼓励他好好改造自己，争取做个新人。

自1955年起，战犯管理所一方面带着溥仪一行伪满战犯到东北各地参观工厂、矿山、农村、学校，请各方面的人诉说日本帝国主义和伪满政权的种种罪行，一面在加强思想教育的同时，允许战犯们的亲属写信和前来探望，促使他们认识自己的过去，看到光明的前途。溥仪同其他人一样，在这一过程中，他亲眼看到了新中国的成就，亲耳听见了那些伪满时期受尽非人折磨的人们，在诉说了他们这些过去的魔鬼的罪行后，又说出了希望他们能改造成一个正常人的动人心魄的话语。慢慢地，溥仪有了正常人的感情，开始认识自己的过去，并暗中盘算自己是否也能在什么时候过上一个正常人的生活。

1957年，溥仪与七叔载涛的会见，终于燃起了他重新生活的希望之火。时年69岁的载涛，是溥仪嫡亲长辈中仅存的一人。这位清末的“涛贝勒”、“军谥大臣”告诉十几年未见面的侄“皇上”：爱新觉罗家族的老人，新中国成立后都各尽所长，生活得很幸福，青年一代更是朝气蓬勃，为建设新中国积极贡献力量，他这个“皇叔”已当选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和全国政协委员，多次见到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毛泽东主席要他来看看“皇上”……。从此以后，溥仪真的变了。

195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10周年前夕，根据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建议，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发布了特赦令。是年12月4日，溥仪被特赦释放。

获释后，溥仪回到了阔别35年的北京。短短的两个多月的时间，他遍游了北京各名胜古迹，会见了爱新觉罗家族在京的所有成员，亲眼看到他们在新社会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尽情地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在此期间，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为他举行了家宴，详细询问了他的个人生活问题，并郑重地建议他重新建立一个幸福的家庭；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亲自征求他的意见，对他今后的工作和生活做了周到细致的安排。这一切都使溥仪增添了重新生活的无限勇气。

自1960年3月起，溥仪开始了自食其力的新生活。他先在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北京植物园半日学习，半日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主要是熟悉新的生活环境。一年后，他到了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任专员职，负责清理清末和北洋政府时代的文史资料，但仍坚持每周到植物园去劳动一、二天，工作闲暇，撰写自传《我的前半生》。在人民政府和各方面人士的共同关心

帮助下，1962年4月29日，溥仪与北京关厢医院的一名普通女护士李淑贤重新建立起幸福美满的小家庭。婚后，56岁的溥仪对李淑贤温情脉脉，体贴入微，夫妻感情可谓如胶似漆，形影难分。年过半百，溥仪终于尝到了人间真正爱情生活的甜蜜和幸福。

为了表示对党和政府的感激之情，也为了使自己后半生成为一个有价值的人，溥仪努力工作，勤奋学习，从各方面严格要求自己，在邻里之间、工作单位、国内各界名流以至国际上，都产生了良好的影响。在邻里之间，他正确对待自己和别人，和普通人一样自觉地打扫街道卫生，热情地为群众排忧解难，有时孩子般地把街道上的少年儿童成群结队地领到家里玩耍、游戏。在工作单位上，他学会了正确处理个人与集体及国家的关系，时时以一个普通公民的标准要求自己，国家特发的几套制服除会见外宾及参加重要宴会外，平时总舍不得穿，结婚时，政府特批费用可以公款报销，可他体谅国家经济困难，仅为新娘买了一套衣裙。在国内各界名流中，溥仪影响颇大，特别是在他的一些“旧臣”中。这些人最初见到特赦后的溥仪，总觉得还有那么一层说不出的关系，不少人仍旧表示跟他走。每当这种时候，溥仪总是坚定地说他跟共产党走，勉励他们为建设社会主义祖国贡献力量。前国民党政府代总统李宗仁在美国看了溥仪的《我的前半生》一书，感触极深，觉得一个封建皇帝和伪满战犯在新中国都能生活得很好，何况自己一个民国总统，从而坚定了回到大陆报效祖国的信心和决心。在国际上，溥仪特赦后短短几年时间会见了几百名国际友人、各国记者，向他们宣传中国共产党和政府的宽大胸怀，表示他对新中国前途的信心和为建设自己祖国尽力的决心。他的切身经历和感人话语，赢得了国际友人及各界人士的

信任和赞誉。有的西方记者说，西方人理解溥仪比理解雷锋容易得多。

溥仪以他特殊的身份，为中国政府和人民做出了他所能做出的特殊贡献。

正当溥仪沉浸在新生活的幸福和欢乐之中时，可怕的病魔悄悄向他袭来。其实，溥仪前半生长期的非正常人生活早已糟蹋了他的身体。1962年新婚后不久，溥仪就不时溺血，经名医诊治，暂时抑制了病情的发展，加之新生活的愉快，冲淡了疾病折磨的痛苦，表面看上去，身体一直很健康。1964年底，溥仪病情开始恶化，尽管在周恩来总理的直接关怀和特别保护下，专家为他进行特殊的精心治疗，使他减少了一些痛苦，也基本避开了随后刮起的“文革”旋风的袭击，但肾癌这一恶魔终于在1967年10月17日凌晨吞噬了他的生命。

溥仪去世之时，正值“史无前例”的“文革”风暴席卷神州大地，后事极难处理。周恩来总理为此作出特别指示，说“溥仪遗体可以火化，也可以埋葬。根据家属意见，可以选择革命公墓、万安公墓和另一处墓地的任何一个地方安葬或寄存骨灰”。爱新觉罗家族主要成员在年过八旬的载涛的主持下，聚会讨论决定将溥仪遗体火化，骨灰寄存八宝山人民骨灰堂。

“文化革命”十年动乱结束以后，新中国政府和人民不会忘记每一个为国家为人民做出贡献的人，对末代皇帝溥仪特赦后的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并于1980年5月29日为他举行隆重的追悼大会。会后，根据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指示，溥仪的骨灰盒移至八宝山革命公墓，在安放已故党和国家领导人及为中国革命作出卓越贡献的人们的骨灰盒的第一室副舍。